



策划编辑：唐建福  
责任编辑：庄 豪  
封面设计：郭 炜

## 李 锐 文 集

(卷三)“大跃进”亲历记(上、下)

李 锐 著

南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中)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中山新华印刷厂印刷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隆兴路)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0.5印张 15幅图 130万字

199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2次印刷

ISBN7-80609-673-6/Z·23

定价：19.60元

# “大跃进”亲历记

(下卷)

## 目 录

### ● 华东计划会议 ..... (1)

1958年6月中，我应召在中南海游泳池边同毛泽东谈了一次话，他的谈话使我吓了一跳。华东计划会议开了半个月，中央各部委都来捧柯庆施的场。为争取与会人员的支持，柯庆施安排大家看反映上海大跃进的纪录片。会后我给毛泽东去信，直陈“困难之言”……

### ● 徐水的共产主义天堂 ..... (19)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浪潮中，河北徐水县的“共产主义试点”轰动一时、震惊中外。毛泽东亲临徐水，中央更直接抓，舆论则推波助澜……这在当时及以后一段时间里造成很大的恶果。

### ● 农业卫星满天飞 ..... (40)

“大跃进”运动中震惊全球、最荒唐、最离奇的事情，要算竟放“放产卫星”了。给这场“擂台赛”加油助威的不仅有新闻传播媒介，而且竟然有赫赫有名的科学家，包括论证亩产稻麦可达四、五万斤的物理学家钱学森。毛泽东本人也为“高产卫星”助威催生。“共产

主义天堂”没见到，却迎来了严重的三年大饥荒！

## ● 北戴河滩上浪尖 ..... (86)

狂风巨浪的“大跃进”运动，北戴河会议是最高潮的标志。会上，毛泽东紧抓钢铁问题，逼得陈云不得不赶紧落实，甚至说出了“土炉子是关键”的话；毛泽东轻率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从“立”的方面找到了人民公社这个桥梁，从“破”的方面则有“破除资产阶级法权”……

## ● 人民公社好 ..... (139)

在毛泽东“人民公社好”的讲话影响下，1958年下半年一个月内全国农村就实行了人民公社化。这种“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一次社会制度变革的大大盲目冒进，是当时急于进入共产主义的规模极大的尝试，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急性病和革命空想。

## ● 公共食堂始末 ..... (158)

随着人民公社遍地开花，兴起一种共产主义将要到来的情绪。吃大锅饭、办公共食堂，如大海来潮势不可挡，不仅农村到处砸锅拔灶，全村老乡凑在一起吃饭，且大城市也一时宣布要办人民公社了，北京有的胡同传来集中锅碗瓢盆之声。

---

## ● 炼钢翻了一番 ..... (196)

“大跃进”中，那种土炉林立、火光冲天、伐木毁林、砸锅炼铁的景象，我是耳闻目睹的。作为参与管电的我，更知道一些大炼钢铁的决策过程。具有“钢铁情结”的毛泽东在莫斯科宣布“赶超英国”。全民大炼钢铁，“元帅升帐”，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

## ● 水利化运动及其灾难 ..... (241)

1957年开始的群众大办水利，可说是“大跃进”的开台锣鼓。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水利化运动的灾难后果，尤其是时间的延续性说，以全民大炼钢铁更为严重。“三主方针”对淮河流域的危害，引黄灌溉失败，引洮工程半途而废……1992年，近半个世纪的治淮主管人自称“还没毕业”，但却不将“学费”一一数来。

## ● 全民办电与昙花一现的“水主火辅” ..... (257)

“大跃进”时期提“以钢为纲”的口号，当年我就很不赞成，还想过不如提“以钢为纲”。南宁会议确定“水主火辅”的方针后，全国出现一个大上水电的热潮，大搞“小土群”全国办电运动。但这仅昙花一现，国家计委在次年4月安排压缩水电项目，我随即上书……

## ● 教科书“大跃进” ..... (286)

开国前夕，毛泽东就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文化“大跃进”是有两项独特内容：“兴无灭

资”和改造思想。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表示了种种藐视，武汉大学发起“拔白旗”运动，科学家们也争先“跃进”……坚持真理的科学家为麻雀“平反”取得胜利。

### ● 第一次郑州会议 ..... (339)

全国上下笼罩着似乎即将实现共产主义的热烈气氛，柯庆施率先提出“吃饭不要钱”的口号，于是“放开肚皮吃饭”成为时髦；“浮夸风”导致“高产卫星”竞放。为解决“乱子”，让“狂热”的气氛冷却，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及以后的一连串会议。陈伯达在会上遭毛泽东的痛斥。但毛泽东当时的思想仍然左右模棱、自相抵触。

### ● 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 ..... (356)

连起来开的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是继第一次郑州会议后再次给“大跃进”降温的会议。会上，毛泽东说“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降低过高的指标，承认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中国人大概是“冒失鬼”。但会议对总路线牵头的“三面红旗”仍从根本上肯定。

### ● 第二次郑州会议 ..... (393)

为纠正“共产风”这个可怕的乱子，毛泽东决定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对当时那种天下大乱的情况，两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确实起了一定的急刹车的作用，但在改正“左”的错误方面是

极不彻底的。

## ● 陈云抓设备成套工作 ..... (404)

大跃进期间，“以钢为纲”，“元帅升帐”之后，基建和重工业生产中暴露出“设备不成套”这个严重问题。当时任国家建委主任和中央财纪小组组长的陈云亲自抓此问题，我常参加有关会议，印象很深。

## ● 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 ..... (436)

毛泽东自信搞经济不比打仗难，但碰壁、闯祸、摔跤后，他的头脑才比较冷静。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主要是为讨论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农村人民公社的整理以及为二届人大产生新的政府领导人作准备等问题。毛、周、邓对降低指标的意见明确且坚决。我给毛泽东第三封信的内容，从当时的气候看，还是比较尖锐的。

## ● 上庐山开会前形势 ..... (486)

上海会议时毛泽东的长篇讲话曾引起很大震动，大家受到鼓舞确实敢于提意见。冶金部一马当先，继续落实钢铁指标。我的旧档中保存了中央批转全国的两封信.....

## ● “大跃进”失败的惨痛教训 ..... (507)

“大跃进”可说是古往今来中国的一大“创造”，



它对中国经济的破坏自然很大。毛泽东导演的这场运动，问题就出在大大超越了中国经济政治所提供的现实舞台，这就决定了它不能不归于“失败的命运”。对于毛泽东的错误，党已做了彻底否定的正式决议，但是想翻案的确还大有人在。

## 华东计划会议

成都会议之后，计划部门日夜忙于研究方案，拔高指标；大家争项目，争投资，其实不过都是纸上谈兵而已，电力部门似更紧张一些，因生产也好，基建也好，都离不开电。翻开当年的工作笔记本，全是数字，看得眼花缭乱。另一件较忙碌的事情，便是各部门的权力下放。此事电力系统也是比较复杂的，各地有中央直属地区电网局、直属厂、直属基建项目，各省都有电业局。当年大体有 80% 直属单位要下放到大区或省。6 月中旬，我代表水利电力部到上海，主持华东地区的电力系统下放会议，接着就参加华东区计划会议。

6 月 10 日左右，我应召同毛泽东谈了一次话，是在中南海的游泳池边。他精神抖擞，兴致很高，首先就谈到全年的钢要翻一番。这真使我吓了一跳。自莫斯科会议以来，如何赶超英国（后来加上了美国），一直是毛关注的问题，其赶超标志也一直是钢，认为有了钢就可以带动一切工业，也以此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年产几百万吨钢，太不像个样子了，有失体统。怎样才能快点增长

呢？当年几个并举的方针中，有一个中央与地方并举的方针，因此要让工业部门将一大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他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有很大好处，但中央过于集权就限制了地方的发展。谈话就从这里开头，又一次提到“虚君共和”四个字（南宁会议回到北京后，第二次找我谈话，就说过“我是虚君共和”这样的话）。他认为中国大小同欧洲差不多，但是欧洲有30多个国家，我们四川一个省就比欧洲哪一个国家人口都多。欧洲自有史以来就不统一，各大小国家都独立发起来了。我们的权力中央集中过多，要大大下放，这样，地方才能相对独立发展起来。钢也要这样办，各大区、各省（有条件的）都来搞，钢就上去了。后来才知道，柯庆施在八大二次会议选入中央政治局后，他主持华东区协作会议时，就确定华东七省市1959年要生产钢600万吨到800万吨。这个指标极大鼓舞了毛，1958年钢的原定指标800万吨已经很高了（要增长1/2），他却认为既然能搞到800万吨，现在就把地方积极性调动起来，何必不索性翻一番呢？这天的谈话还谈到赫鲁晓夫要在中国设长波电台和建联合舰队事，直接顶回去了。我还顺便问到，苏联有重要的对外举措，是不是跟我们打招呼？毛否定了我的问话：他们不打招呼的。

《龙胆紫集》戊己诗（九首）中有一首七绝记这次谈话：

游泳池边意气豪，海疆自守不偏劳。  
初闻元帅须升帐，北戴河滩八月潮。

谈话的第二天，我经过王府井，恰恰遇见王鹤寿，就连

忙告诉他主席要钢翻一番的话，王也感到突然。6月19日晚上，毛召集中央领导同志开会时，将王找去了，正式提出今年钢翻一番，说各省市都很积极。王回答说困难，设备能力不够，得回部再研究。经过冶金部党组研究，虽然设备能力不够，但有几个积极因素可以办成此事，即首先是毛主席的威望号召工农业大跃进，加快速度，这是一种巨大力量；其次是地方的积极性，尤其是上海和华东协作区的钢铁指标，比冶金部设想的要高得多（他们的基础也比较好）；三是可以增加一些小型炼钢设备，国内即可制造，不需要进口；第四，全国各大、中型钢铁厂，在总路线鼓舞下，可以提高生产的能力。于是，6月21日，冶金部就正式将1958年钢产量指标定为1070万吨，报告了计委和毛泽东。这以后才有北戴河会议钢翻一番那幕高潮戏。回顾历史，始作俑者是柯庆施。因此后来庐山会议7月23日的讲话中，毛谈到1070万吨闯“祸”时，没有忘记指着这位“柯老”说：“你也有责任”。

我大概是6月11日到上海的，第二天就正式主持了华东电力系统的下放会议，华东电管局下放华东协作区（上海）管。上海市长曹获秋也来参加了，因为江南电网由华东电管局统管，同江苏、南京、浙江、安徽之间，也有矛盾。当时原则上规定，生产、管理以省为主，照顾地方，要发挥地方特点的积极性。但电网规划、调度必须统一于上海，尤其尖峰负荷的安排，地方总有本位主义，计划与利润分配上总有矛盾。省电管局双重领导，即省与华东电管局。记得当时徐州电管局比较麻烦，电源来自山东，输电范围包括江苏、安徽与河南，一个省的地方局难以考虑其他省的问题。

我这个局存不存在有过争议，其基建投资要各省分摊。当年这种权力下放，目的是为了贯彻总路线，实现“大跃进”，实施结果是大大乱套了。后来60年代初，大概又都收回到中央了，大的电网尤其如此，必须由中央部门统管，才便于统一规划调度，解决地区间的矛盾。

华东区计划会议是6月下旬初才开始的，开了半个来月，直到7月7日左右才结束。这个会主要是讨论如何满足华东1959年钢产量达到600万吨。中央各部委都来捧柯庆施的场。除上海和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山东各省负责人外，北京来的人有李富春、王鹤寿、赵尔陆、吕正操、谷牧、王学明（财政部）等人。分冶金、机械、电力、煤炭、铁路、化工等小组，我负责电力组。会议由富春主持。小组会和大会交叉开。最初的小组会上传达了毛泽东最近的谈话要点：

- 1、1959年，工业和农业都要大抓、狠抓。
- 2、每人年均粮2000斤，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粮总产达1.5万亿斤，能储备3000亿斤。就不怕任何灾难，也不怕打仗
- 3、三大元帅：粮、钢铁、机械带头。尤以钢即原材料带头。
- 4、工厂要抓综合利用，鞍钢可干点别的行当，抚顺等亦然。
- 5、工作要有安排，抓大的，不要百废俱兴。农业要下决心靠自己，不靠机械化、化肥。
- 6、社会主义建设可以后来居上。有三个并举：工农业，中央、地方、大中小；还有群众路线，政治挂帅，我们一定

可以做到后来居上

7、1959年，农业抓7条：水、肥、土、种、密、田间管理、工具改革。

8、1959年农业指标：粮食6000亿斤，棉花6000万担。二五计划1962年：粮食9000亿斤，棉花1.2亿担。

开荒1.5—2亿亩。

6月24日，李富春讲话，谈目前全国情况、今年计划和“二五”设想

今年跃进已成定局。粮食比去年超过1000亿斤，夏麦增产250—300亿斤。1000亿斤超过“一五”计划总和（622亿斤）。工业总产值可比去年增40—50%，超过“一五”任何一年。基本建设投资（包括预算内外和自筹）等于“一五”总和的一半；250亿元，还可能超过。苦战三年，工农业和城市都将改变面貌。

钢铁等重要产品，不要三年即赶上英国。1959年钢2500万吨（英国今年1900万吨）超过英国。化肥、机床，三年完成农业纲要四十条。

人民生活也会逐步改善。三年后会有更大改善。

总路线为群众掌握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无穷无尽。对群众力量要有足够估计。农业高潮从2月开始，工业是4月。5、6两月，全党全民动员起来，发展得快，取得经验也快。指标早晚时价不同。得到的经验多而丰富。思想如何适应形势、跟上形势，总结经验推动工作，这一条极为重要。自己定个框框，以框框办事，必然吃亏。

“第二个五年计划”任务：提前实现“农业纲要”。基本建成完整工业体系，即完成工业化，不仅在全国，各大区也

如此。5年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大大推进技术改革，为10年内赶上世界先进科技水平打下基础。

如何进一步贯彻多快好省路线，如何超过英国美国？从全局考虑，“二五”、“三五”安排，真正做到多快好省。用什么方法部署，加以保证，这就是我们要着意研究的，利用这几个月的经验，可能改变前三个月的设想。现在想到的方针：

重点带一般，重点同一般结合。

点带动面，点面结合。

什么是重点？三个元帅（三个纲）。

粮食带动棉花、油料等。

钢铁与机械设备带动其他：煤炭、电力、有色金属、化工等。

两个先锋：电力（煤、电、油），运输—铁路。

曾经出现过全国化肥高潮，现在看来，首先还是元帅要出现高潮。因此：

首先，各行业之间必须分别轻重缓急，过关必须排队，行业内部也要先后次序，如机械，首先是重型成套设备，即电力、煤炭、化工、重机床。电很紧张，电很紧张，用电也要排队，先后多少。

其次，从地区来说，权力下放之后，中央与地方的概念有所变化，凡带全国性的要共同努力办好，特别是中央带好头—带地方性的（就地取材满足地方需要的），地方省、县全面安排，专区与县的布置必须经省统筹安排。先进与落后地区间，总原则是既要充分发挥、利用现有工业基础作用，同时又要将新建项目照顾落后地区，以逐步克服落后状态，

先进帮落后。从5年之间来说，先进、落后地区如何安排，多快好省；先进区头两年大发展，后三年努力支持落后区。到1962年，一起前进。

第三，从时间来说，五年如何安排，有头一二年后三、四年干哪些工业（包括地区）的问题；头一二年着重重点，突破重点，后二三年好走路，适当照顾一般。工业头二年着重二元帅二先锋（电一、二年难突破），煤、电、油化工、有色紧跟上，适当照顾轻工业。后一二年重点突破后，可以多搞些轻工业。地区亦如此。

华东地区问题是全国如何利用之，以达到多快好省。战役部署很值得研究。人，财物力如何快生长；技术、原材料与积累，用之得当，贯彻多快好省，也要分清轻重缓急，先后次序。

关于部署问题：只讲工业与交通。

1) 凡全国性重大项目，由中央各部、大区、省协作安排，最后由中央决定。地方一般项目由省市、专县统一安排决定。都是三级协商。

投资分配，专县自筹为主。即计划中双轨制。

2) 重点和一般结合，头二三年着重搞重工业生产资料和农业，适当发展轻工业。后二年可根据情况更多搞轻工业，国家和群众力量结合，许多事业可发动群众，特别是农田水利与小工业。

3) 人中小结合。除必要的大以外，中小为主。由无到有，由小到大，才能贯彻多快好省。首先解决有无、其次多少，将来有时间解决高与低。现在是洋土并进，因陋就简。建设项目必须有计划安排，不要分散投资，齐头并进，以免



似快实慢。第一个五年教训，有贪大贪新一条，不走回头路。

4) 工业建设布局：各大区在“二五”计划中基本上完成工业体系。华东、华北、东北、中南基本完成，各大区有轻重缓急、重点带一般。另外可根据具体情况，资源、市场，进行适当部署，这些都应基本相同，各有特点。农业机械除大型拖拉机、卡车、汽车归中央管外，其他都由地方自理。分轻重缓急后，有适当配合，男女劳力要配合。鞍山全是钢铁工人，不要重走此路。轻工业中，纺织、纸、糖、高级出口品由中央统筹外，其他各地自理。提高工资，降低物价，两者要结合。新企业要适当分散，沿交通线建。综合利用项目，须有适当条件。现有大城市周围，适当建卫星城市。新城镇先解决为企业服务，后搞市政建设。

关于二五计划指标，这是八大二次会议后北戴河会议前调整的最高指标

钢 6000 万吨，可能低了，还要修改。

电 2200—2400 亿度，5000—5500 万千瓦。

油 3800 万吨（包括小型炼油厂）。

煤 6.5—7 亿吨。

化肥 4000—4500 万吨。

水泥 6500 万吨。

木材 1.3 亿立方米

棉纱 1500—1700 万件。每人布 18—23 米。

糖 600—700 万吨。每人 20 斤。

铁路 4 万里。

投资 3000 亿元。包括预算内外，专县自筹。

预算 4000 亿元。

以上这些指标还会有变化，或多或少。

基建限额以上项目 5000 个以上重大项目 800 个。

保谓重大项目？电站 20 万千瓦以上，煤矿 300 万吨（年产，下同）。炼油厂 25 万吨。合成氨 5 万吨。水泥 45 万吨。机械 3000 万元。

全国约 800 个工业分布地区，分布范围：华东 163 个，华东 149 个，西北 118 个，西南 111 个，中南 104 个，东北 102 个，华南 53 个。

讲话最后谈到工作方法和当前应解决的问题：

必须自力更生为主，依靠自己，外援为辅。外贸抓了很多次要的东西，本来可以自制，或者可以从缓。卡车订的过多。不要随意使用外汇，请各省注意。坚持自力更生为主，这是毛泽东思想。

走群众路线，土洋并举。多搞些小钢铁、小煤矿、小水泥、小炼油、小铜矿、农具厂。

今明两年如何突破重点？首先是原料、钢铁、铜、铝、酸碱、木材等。华东 27 万吨铜不够，多搞小铜矿。其次是机械，重型与成套设备、冶金、重型机床等。各地可以搞通用机机械厂。电要挖潜力，电站下放，同时要排队，铁路，省际、支线由省负责。中央给铁轨。

劳动力已经很紧张，要做整个安排。工业城市可作个调查，全面安排，各得其所，。半劳动用半劳力，女代男。技术力量，各省及早招技工培训。

今明两年，钢、电、机械安排好，还有铁路，排好队。突破今年第三季与明年难关。能不能跃进是这两关。要有所

调整、改变、从缓，以适应过关。

钢今年 900—1070 万吨。明年 2500 万吨。

摆情况，摆问题，想办法，过难关，完成指标，必须有重大措施。矛盾困难何在？如何克服。大家充分讨论。

令明年指标要定下来。二五计划框框定下来。

富春最后还讲了“毛泽东意见”：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干工业、农业，干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破除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研究外国的经验，一定要学习外国的好经验，所有坏经验要引以为戒。这就是我的路线。

旧中国的电力工业是极其薄弱的。1949 年全国设备容量为 185 万千瓦，发电量为 49 亿度。1952 年为 197 万千瓦，78 亿度；容量的增加靠修复原有残旧设备，电量增加靠提高利用小时，从 2300 小时提高到 3700 小时（一年为 8760 小时）。到 1957 年，设备容量增到 462 万千瓦，电量达到 193 亿度。电力生产在世界的地位，虽然从 1949 年的第 25 位上升到第 13 位，但这个基础还是很薄弱的，问题尤在一五期间，绝大部分设备尤其是火电设备是由国外供应的，约占 81%。国内电机设备制造能力还很有限，当时火电还只能制造 6000 千瓦和 1.2 万千瓦机组，数量也有限，1957 年前者供应 8 台，后者只 6 台；2.5 万千瓦和 5 万千瓦机组，准备在 1958 年和 1959 年开始试制。设备供应当时还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发电设备要有一定的储备，不比其他货物，买来就用，即从制造出厂到安装发电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二是要做成套供应，不是有了主机（火电为锅炉、汽轮机、发电机）就行，还有辅机、开关、变压器、仪表、输电线路等

等，一台机组几千个零配件，这些需要成百厂家来生产。1958年全国计划生产的发电设备包括水火电，原定60万千瓦，当时我脑子里还装了这样一数字：如100万千瓦发电设备及相关建筑，至少相应需要5万吨（或者是7万吨）以上钢材；500吨—1000吨铜；1959年华东600万吨钢，相应的发电能力需要200万千瓦，电量110亿度，这是一种比例关系

一边参加协作区的大会，我同时主持电力组的小会，有上海、浙江、福建、江西、江苏、山东、安徽7省市管电的负责人参加。各省当然都是根据八大二次会议及其后的“大跃进”指标，来安排各自的要求，都是钢铁、机械、煤炭、尤其耗电的化工、化肥、铜、铝等等，一齐跃进，有的省几乎是漫天要价，越大越好。例如浙江，当时全省发电设备只有6万千瓦，要求1959年10万吨电解铝投产，就要火电30万千瓦，化肥要9万千瓦，总共要电力70万千瓦。福建底子薄，当时只有3万千瓦，也要求36万千瓦，安徽比较合理点，只多要15万千瓦。总计六省一市，1959年要求370万千瓦（其中由电力部安排170万千瓦），电量达156亿度。1958年华东总设备量为121万千瓦，总电量估计只有58亿度，一年要增加2倍。当时不得不一个省一个省算细帐，浙江、福建、江西、还可以多上水电项目，水电设备比火电容易生产些，机组容量也可大些。但“远水救不了近火”，1960年前，都要多上火电。当时一机部的部长助理陈易管机械设备平衡，我找他细谈过，他认为成套设备中电最难，怎么样满打满算，按照370万千瓦指标，缺90万千瓦。冶金部的副部长徐驰，在大会讲了半天，支持华东600万吨钢

的方案。他住在我的隔壁房，我找他谈，他说有此条件，别的区如一起按此标准上涨，那就不可能。当时各大区都在开计划会议，刘澜波参加西北协作区的会，同我通过电话，说这个“600万吨”引起连锁反映。我将华东的电账向他汇报了，他支持我在会上讲真话。煤炭、化工、铁道、建委、财政等部负责人，都在大会讲话，支持柯庆施的“大跃进”，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印象深的是关煤炭的跃进。华东 238 个县有煤，江北煤层厚，覆盖层也厚，宜建大中型煤矿，可以先开发分井，边建边生产。江南煤田分散，又薄，应以小型为主，遍地开花。地质人员不够，学生、工人都可以参加勘探，做地质报告；多搞勘探井，情况好就生产。地质勘探要大破规章制度。

我是 6 月 27 日向大会作的汇报，如实讲了情况。对各省承担的发电设备制造表示了怀疑。也说到如全力保证钢的指标，其他工业恐怕多少都要受到影响。我着重谈了水电的二五计划，尤其是福建和浙江的建溪、棉花滩、青田等几个大水电工程的情况；还是要大中小并举，大家对 1 万、2 万千瓦的水电站，兴趣都不大了。算了细帐之后，我说了一个约数，按照 600 万吨钢及相应其他工业的安排，电力大概要缺 20%。

6 月 30 日是·机部汇报。赵尔陆原则上讲，愿意接受这个规划。但他首先对发电设备表示怀疑，说计划定高了，上海厂还比较有条件，各省都定高了，可能只能完成 25%。他说，不要第一年就完不成任务，因为都是新厂子，中型、重型设备上不来，能否如愿，有问题，不能打如意算盘；厂

房都盖起来了，都挤着要设备。必须大力争取国外进口。记得他最后说：决不能齐头并进，要排队，否则影响速度；规模不要强调太大，要留有余地，先小后大。大会讨论时，富春多有插话，要大家多算细帐，进一步摸清情况。华东同全国的关系也要摆好，华东还有支援全国的任务，王鹤寿着重谈炼钢能力，华东提出 600 万吨，这是全国第三位。1959 年全国达到 4000 万吨能力。毛主席就抓这 600 万吨。有华东这个典型，可以带动其他地区，此举对大跃进有决定意义。对自己也是一个解放，曾经设想西南、西北、华中、华南也要快发展，现在可以让华东、华北去支援，先进地区快两年好。

在会议期间，由于有人有疑虑，也有争议，柯庆施曾安排大家看过反映上海大跃进的记录片。我在会议期间特别到闵行去参观了发电机、汽轮机和钢炉三个大厂。离开北京前，我找任一机部电机制造局（八局）局长周建南谈过，他是延安时期的老朋友，多年来因水电设备的制造，我们来往频繁，特地向他摸了一下底。他让我到闵行三个厂去看看，特别介绍发电机厂一位副厂长是老技术专家，可以信赖的。我到发电机厂参观时，即由这位副厂长陪同。他向我仔细谈到厂本身的情况。当年制造 1.2 万千瓦更不论 2.5 万和 5 万千瓦的，其关键部件是大轴，当时国内还没有大水压机，这种主轴从原料到锻造都靠苏联进口，人家是计划生产，供应有限，不能我一跃进，想要多少就是多少。他说，1959 年计划上海要制造 200 万千瓦，这是柯庆施在开会时压下的，不容分辩，就是将任务这样死压下来，不管你同不同意，这怎么行。他边愤愤地说着，边用手打转转：这个玩意儿是会

飞的，他这是讲主轴质量的重要，不能有一个疵点。旧上海有个发电机厂，轮子飞逸过，机壳厂毁，出大事故。火电的汽轮机转速是每分钟 300 转，不能有一点点质量问题。摸了这个底后，我在汇报中就讲得更理直气壮了。

会议中间，柯庆施为了打通我的思想，让我去参观当时上海三个最有名的跃进厂：江南造船厂、永鑫无缝钢管厂和一个变压器厂。

江南造船厂是中国最老的船厂，是本世纪初建造的。第一次造 5000 吨海轮，原计划船台周期是 18 个月，后来减到 14 月。成都会议后，上海文化广场召开万人跃进大会，“展开双反运动”船厂受到赶先进的鼓舞，三个半月海轮就下水了，报纸作了报导。我去参观时，看到的只是一个船壳，没有装柴油发动机，也无其他任何装修。永鑫厂是一个街道小厂，能做多种异形无缝钢管，基本是手工操作，当然也很不容易。变压器厂刚创办不久，也是街道厂性质，空旷的厂房内，一些女工做小变压器。我离开上海时，给这位柯老写一封信，简单说明，这三个厂不错，但解决不了电的问题。

离开上海的头天晚上（7 月 7 日），我给毛泽东写了第一封工作性质的信，从电的角度反映参加这次华东区计划会议的观感。这封信留了打印底稿，得以保存，全文如下：

主席：

这次来上海参加了华东区协作委员会部署 1959 年的计划会议。会议是由柯老和富春同志主持的。会议安排明年华东生产钢 600 万吨（今年计划产 190 万吨），以此为中心带动重点工业和一般工业的加快发展，这是一个力争上游的好

计划，大大突破了过去“上游”的界限，对全国贯彻有着深远的意义。会议有个决定草稿，特寄上供您一阅。我在会议中管电力小组的工作，同六省一市的有关同志一起工作了半个月，接触到一些情况和问题，特报告如下：

一) 600万吨钢的指标首先推动机械工业加速前进。钢铁一马当先，电力、煤炭、有色金属等重点工业必须并肩跟上，其他工业也要相应发展，于是形成一齐向机械工业要设备的局面，看来，钢铁的增长比较容易办到，这是由于采矿、炼铁、炼钢可以分散经营，可以多用土办法；冶金设备如高炉、炼钢炉、轧钢机等，在华东地区有上海的基础，也比较好解决。但因此而推动起来的机械工业全而上涨，其困难就多一些。机械工业品种十分复杂，特别是重型设备目前难以平衡，我感觉整个机械工业的增长把握不如钢铁大。如发电设备制造就已透露出这种困难的情况。

原来布置华东明年生产180万千瓦的发电设备，现在虽已尽力提高到350万千瓦，仍远不能满足需要。根据华东需要来推算，明年全国共需生产发电设备约900万千瓦（英国最高年产量为400万千瓦，苏联约750万千瓦，美国1370万千瓦），相当今年的10倍。全国现有发电设备的生产能力为230万千瓦，其余570万千瓦的生产任务，要靠明年新建企业生产出来。同时除主要的发电设备外，还有变压器、电缆、开关、仪表和电动机等用电设备，品种繁多，配套复杂，其产量都要比今年增加5倍到7、8倍不等，特别是钢、铝产量不够，就会直地影响到它们的产量。

二) 电与一切工业有关，为了保证钢铁、机械、煤炭、有色金属和其他工业的相应上涨，大家感觉电最为紧张。预



计明年华东需要 145 亿度电，尚差 20 亿度左右。明年全国钢的产量按 2500—3000 万吨水平计算，相应的发电量需要 600—650 亿度。1958 年全年已有发电设备约 600 万千瓦，发电量可能达到 280 亿度。即按明年生产 900 万千瓦，加上国外进口，可争取装上 750 万千瓦投入运行（水利电力部最近向中央汇报为明年装机 500 万千瓦）。这 1350 万千瓦估计最高发出电量为 500—550 亿度。这样，明年全国缺电约 100 亿度。今年下半年在工业全国跃进的形势下，电力将严重不足，明年情况将更加紧张，因此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使电力工业赶上全国跃进的形势。

三) 从电的角度出发，也要求工业的发展必须有轻重缓急，很好排队，这一点柯老和富春同志都再三强调，这次会议各省对工业的安排普遍有齐头并进的趋势，多想使各项工业全面发展。这个要求目前是难办到的。

另一方面，除钢铁、煤炭、机械等重点外，一般工业的用电确需有一定的保证，给得太少，也会出现国民经济失调，财政收入减少，反过来又影响重点工业的建设。上面提到的 1959 年华东电量供求间 20 亿度差额，使各省市对工业排队发生许多困难，各用电部门分电时也不免你碰我挤。所以问题是必须坚决排队，坚决分轻重缓急；电的分配也只有像配基建投资一样：分省包干。

四) 电的紧张情况短期内还难以改变，对大量耗电的工业，目前就不能不加以适当的约束。例如用电很多的化学肥料和某些化学工业，近期似不宜过多发展。铜和铝是必须加速发展的，但两者用电都很大，土铜用电则少，铜、铝又可互相代用，因此目前只要能多产土铜，也可暂时少产铝。这

在工业布置上是一个需要加以注意的问题。

五) 在解决电的问题上, 感觉各省自力更生的精神还不够。一方面, 过去水利电力部管得多, 下靠上的思想还未完全转变过来; 另一方面, 也因为在某些环节上(例如设备制造)遇到较多的困难。电的紧张情况已开始促使大家注意抓紧发电设备的制造。但是除上海外, 各省由由于基础差, 困难多, 干劲虽不小, 信心却不大。富春同志着重谈到, 人家不要只想吃“伸手牌”香烟。

六) 人家都全面跃进, 一切都感不足, 多少之争, 在所难免, 现今情况如此, 还是需要多强调互相协作和照顾整体精神。华东地区, 福建、浙江、江西三省水力资源较多, 应多发展水电; 江苏、山东两省只有多发展火电; 安徽水电也不很多; 上海则需外区多送电来。电网是一个水火结合的整体, 电力的产销难以截然划分省界。因此, 这次会议的决定(草稿)上有这样一条: “全区重大的电站及电网的建设, 电力的分配, 今后应逐步实现统一规划与安排”。

七) 华东明年产 600 万吨钢, 是华东有其特别有利条件。其他各区除东北、华北外, 一般缺乏制造设备的能力, 如果都照这个标准安排, 似值得考虑。富春同志说, 在各大区中, 华东有条件先行一些。以钢为纲, 关于第二个五年的规划我只想到电的问题。如果 1962 年钢的水平从 600 万吨升至 1 亿吨, 则电力的安排现在想来确实是难以赶上的。

八) 其他一些零碎感想:

这次还碰到喜大, 而又未深究其所以的事例。有些事情需要也可以“霸蛮”(按这是一句湖南土话, 即过分勉强之意), 但有些事“霸蛮”也无济于事。

大家确实都是鼓足了二十四分干劲，但是在计划上很少听见“留有余地”。

柯老与富春同志都强调将一些矛盾、困难摊开来，但不易摊开，人们还是不大愿意多听困难之言，困难之言有时也使人难以启口，至少先给自己带顶“中游”帽子，才好开讲。

本位问题似乎需要提起注意了。

这些意见是率直写来，片面之处定多。

1958年7月7日

## 徐水的共产主义天堂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浪潮声中，河北省徐水县进行了一次轰动一时、震惊中外的“共产主义试点”：全县并成一个人民公社，实行一级核算；一切财产归全民所有，不仅生产资料，也包括生活资料；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劳动与生活集体化；实行全民供给制，干部、工人、农民的吃、穿、住、行、用全部由县公社统包。目标是：1959年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

### 水利化建设的一个“典型”

徐水全县人口31万人，有土地79万亩。在历史上，徐水县是个多旱涝灾害的县。县境内有漕河、萍河三条小河流由西向东流入海河。雨水大时，东部闹水灾；雨水少时，西部闹旱灾。1942年发生旱灾，大部禾苗枯死。1954年水灾，粮食亩产110斤。1957年为200斤。据统计，1954年至1957

年4年间，遭灾面积共达87万，共减产粮食1.7亿斤，从全国各地调入粮食9260万斤。因而，群众对根治水旱灾害有强烈愿望。根据中央大搞水利化建设的精神，徐水县委积极贯彻“蓄、小、群”为主方针，在1957年冬和1958年春，掀起水利化建设高潮，把全县十多万主要劳动力组织起来，打破乡社界限，不分受益情况，实行全县水利建设大联合，还要求工商文教各部门打破常规，全力以赴为水利化建设服务。根据中央指示，县委组织全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对本位主义、分散主义和阻碍大跃进的保守思想，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搞群众自我教育，把“整风作为一切工作的纲”贯穿到水利化建设的全过程。结果，经过三个月苦战，修建山区中小型水库17座，“葡萄串”、“满天星”式的平原水库173座，还挖了自流泉，打了不少机井，即认为实现了水利化。

1958年1月，水利部编出《水利是农业的生命线》一书，书中介绍了河北省十几个典型，但没有徐水。南宁会议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到保定地区视察，听取了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的汇报，肯定了徐水县水利化建设的成绩和经验，他还在河北省委召开的三级干部大会上，亲自作报告，大力表彰。从此，徐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名声越来越噪。3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张国忠《苦战三月，改变全县自然面貌》的文章，同时配发《徐水创造了好经验》的社论。文章宣称：在一个冬春就基本上改变了全县的自然面貌，1958年要把粮食产量提高一倍，达到并超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规定的亩产400斤指标，达到500斤，社论肯定了徐水县委在组织上

“加强第一线，拧成一股绳”的措施，肯定了做什么辩论什么等发动群众的做法，并指出，徐水经验可能发展成为一套领导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完整经验，社论称赞：“徐水县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基本上消灭了火灾和旱灾，……从一个工作很平常的县一跃而为先进县。去冬以来，全国各地都在组织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各地都出现了一批把事情办得又快又好的典型，徐水县就是在全县规模又快又好地组织全面大跃进的一个好榜样。”3月28日，河北省委向中央正式报告了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运动的领导经验。4月17日，《人民日报》又以突出篇幅全文刊登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领导经验的总结》，同时有上千字的“内容提要”，《总结》中这样介绍徐水：“前人不敢想的事，我们现在做到了！”“白天赶太阳，夜晚追月亮，黑夜当白日，一天当两天。”“思想不冻地不冻”，“心硬地就软，心软地就硬。”“内容提要”认为，徐水县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主要经验，首先是抓政治思想工作；其次是加强第一线，指挥准确及时；第三通过整风，批判了各部门干部中的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和单纯的业务观点，把各部门的力量拧在一起；第四正确地解决了重点工作和各项工作之间的关系；第五采取试验、参观、推广先进经验和评比竞赛等一系列的办法，使生产高潮一个接着一个，促进先进经验遍地开花。1958年5月，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作为河北代表，参加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 谭震林、陈正人的报告

谭震林离开保定不久，陈正人（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国务院农办副主任）奉命到徐水总结水利建设的经验。3月14日，他写了一份关于河北省徐水县实现农田水利化情况的报告，送中央各负责同志，报告当即转到主持中央成都会议的毛泽东手中。报告中介绍了徐水县委在领导兴修水利高潮中的一些经验：（一）在群众高潮面前，强调“思想大解放”，只要依靠群众，什么事情都能办到，即使今天不能办到，明天也一定能够办到。（二）作风战斗化，说做就做，坚持到底。（三）找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四）强调加强第一线，一切工作深入现场。（五）坚持个人负责与集体领导相结合。（六）为了统一领导，努力使中心任务与各部门工作互相结合，“一切为中心，拧成一股绳”。（七）立场、态度坚定。陈正人在这份报告中还说：“徐水县的经验，使我体会到，对于社会主义的群众高潮，必须有足够的估计”，他举了许多例子：有一个乡，由480个妇女三天三夜奋战，修成一座蓄水13000立方米的“妇女水库”；700多个学生和40多个教员，只花一天时间修成了蓄水15000立方米的“红领巾水库”；“夫妻窑”、“姐妹窑”、“父子窑”、“母子井”也到处出现，他认为，徐水不仅水利方面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其他各项工作也都有大发展。养猪迅速由3万头增加到19万头，1958年准备发展到40万头，达到每2亩地1头猪，平均每1人1头猪。当然，他们的工作不是没有遇到挫折，

也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比如去冬发展养猪，因从南方买小猪到北方，没有经验，死了两万头。县委一个工作人员就把大字报贴在办公室门口，标题是《大喊救命》，要县委收兵，可是县委绝不畏缩，坚持发展方针。一个水利科长，对水利高潮采取消极反对态度，他们及时地展开了批判，后来发现他是一个右派，经过揭露，有力地推动了水利化建设高潮。

就在陈正人这份报告上报中央的前一天，即3月13日，在成都会议上，谭震林也上交了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水利建设初步安排”的报告。这两份报告，一个从微观上手，一个从宏观上着眼，即有指导性，又有可操作性。3月21日，毛泽东在看完了陈正人报告后，写出如下一段批示：“此件连同谭震林的报告付讨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3月29日，河北省委以文件的形式，将徐水经验印发全省各地、市、县。

通过中央的会议和舆论传媒，将一个地方的“先进经验”如此迅速、全面地传播到全国，恐怕是史无前例。当年立竿见影的影响有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以敢于提出降天服地、不怕标新立异的浪漫口号，尽管这些口号比起后来更浪漫的口号是小巫见大巫，但却有始作俑者之功。其次，开创了行动军事化大兵团作战的先河。当时徐水县仅有31万人，除去老弱病残妇幼和脱产人员，实际能投入的人力不足10万，但在兴修水利中却组成了一支“平时10万人，多时13万”的劳动大军，“转战三河两岸和山地、平原”，在干部的指挥下，以超强的劳动，突击完成县委交给的任务。如此作法被称为“扭转乾坤的决定力量”。第三，大刮强迫命令之风。我们的基层干部大多文化水平较低，加以唯命是听



的传统，考虑问题和工作方法都比较简单，自从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以后，辩论会就成为斗争会的代名词，只要有不同意见，就“辩论辩论”，扣上几顶大帽子，不怕你不服从。大事大辩，小事小辩，“辩论前，1400民工14天只开渠300米，辩论后，1000民工3天就开500米”。民工怕被扣上“右倾”、“促退”的帽子，只得拼命地干；而干部们则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几个简单的数字上。第四，为共产风推波助澜。共产风从合并大社起就开始出现，随着“大跃进”的来临，行动军事化的出现，共产风一发不可收拾，并成为衡量一个人对“大跃进”态度的标尺。

### 毛泽东视察徐水

自从毛泽东对陈正人报告作出指示之后，徐水的“创造发明”接踵而至。7月7日，县委发出《关于改革劳动组织和家务劳动普遍实行劳动大协作的指示》，基本的要求是“四化”，即行动军事化、田间管理工厂化，思想共产主义化，领导方法群众化。“四化”的核心是行动军事化。张国忠指出：要做到全民皆兵，思想行动一致；要以党的组织为核心，把全民团结在党的周围，充分发挥党员、团员和民兵的作用。乡、社、队都要实行军事化的编制，乡要建立社会主义跃进兵团，设总指挥（司令员）、政委、后勤部主任等职，由书记、乡长出任；社要建立营、连排的组织，每个排要有政治干事，负责掌握思想情况和组织辩论；每个村为一个营或一个连。乡要划分若干战区，乡党委分片包干。使这

一军事组织真正成为坚强的农业社会主义跃进兵团。

几天之间，全县打破了地界，建立了 93 个团、299 个营、1099 个连、3365 个排。有的乡还根据劳动力的强弱和年龄的大小，组成“青年火箭排”、“壮年跃进排”、“妇女突击排”、“少年先锋排”。上下工要列队，并按口令行进，开工有战前动员，收工有总结评比，从而实现了统一调配劳动力的大协作。同时，社社建立了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幸福院、缝纫厂，促成了家务劳动的集体化和社会化，县委把公共食堂作为共产主义的萌芽，普遍推广，共办食堂 1693 个，全县在食堂吃饭的社员达 225639 人，占全县人口的 70.5%。一时间，徐水县成了一个大兵营。

北戴河会议之前，毛泽东决定视察河北、河南和山东三省农村。8 月 4 日，他首先到了徐水。为了迎接毛，县委做了充分准备，把大部分劳力、车辆集中在铁路两旁和计划参观的地方；下面按军事编制，明确连、排班负责人；路两旁的庄稼地不准有杂草，地里有人就得有红旗。县委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被打发到偏远的地方，不准回城。

毛泽东来到徐水县南梨园乡大寺各庄农业社，视察了粮食加工厂和供销部、医院、猪场、缝纫厂等，参观了幼儿园和老人“幸福院”，还察看了食堂、细菌肥料厂、铁工厂和农作物的生长情况。

在参观的时候，张国忠和农业社主任等以及省、地负责人一直陪同，他们之间的对话随即在《人民日报》发表，成为以后史家研究“大跃进”必引的材料。我也照录寻下：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毛，当年全县夏秋两季共计划要拿到 12 亿斤粮食，平均亩产 2000 斤。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

了春夏山药 35 万亩。毛听后说：要收那么多粮食啊！你们夏收才拿到 9000 多万斤粮食，秋季要收 11 亿斤呀！你们全县 31 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张答：“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毛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大寺各庄农业社主任李江生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毛说：“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张说：“我们只是兴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毛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一天吃五顿。”年来毛又充道：“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吗？”

在食堂问题上，毛问：办食堂老年人同意不同意？“张说：刚开始有思想不通的，说吃了大锅饭。”毛说：“你们这不是大锅饭吗？”张答：“我们现在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除个人生活用品外，关于房屋、树木、羊群、自留地、大车、牲畜等等，群众都要求转为全民所有和办国营企业。农村没有小商人，城市也没有商人。社内还有个专管居屋建筑和分配的组织。我们讲，不共产，几千年是贫穷落后、阶级压迫；一共产，就大跃进，拆了旧房搞新的，因此大家都说共产好。”看到地里做活的妇女很多，毛说：“这妇女劳力解放得很彻底哩！”陪同视察的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说：“这里的妇女都脱离了炕台、锅台、磨台、碾台。”毛说：“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全县是 11 万多劳力，抽出 4 万多搞水利、打机井、办工业，只有 7 万多人搞农业

吗？”随后，他对省委书记解学恭和副省长张明河说：“他们这又解放妇女劳力，又搞军事化，全县农业社搞了90多个团，两百多个营。他们就是这个办法哩！”毛对这里军事化表示很满意，于是问悦农：徐水的军事化，你们推广了没有？”他还对大家说：“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斤！”临离开徐水时，毛说：“下边真好，出的东西真多，北京就不出什么东西。”他问张国忠：“北京出什么？”张答：北京出政治领导，出党的总路线。毛点了点头。

在徐水视察时，毛泽东曾问农业社主任李江生：“你们农业社叫什么名字？”李答：“叫第八瀑河农庄。”毛泽东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

## 中央抓的共产主义试点

毛泽东亲临徐水，给这里的干部、群众以无比殊荣和莫大鼓舞。据《人民日报》报道，徐水的“人们兴奋跳起来，兴奋地心神无主地南北跑动。人们欢呼领袖，向领袖伸过手来。我们伟大的领袖，……他那集中了上下古今的劳动人民智慧的眼睛看着大家，他那人山般魁伟的身躯和海洋般宽阔的额头，发出万道光彩，照射到每一个徐水人的火焰熊熊的心上。”这是对当时领袖与群众关系的一种真实写照。从毛泽东视察这一天起，一段时间里徐水在“共产主义试点”问题上迈出了闪耀着奇光异彩的步伐。

步伐之一：248个农业社宣布转为人民公社。8月4日

晚7点半，毛离开徐水的当天晚上，徐水县委立即召全县电话会议，“乡乡社社都在电话会议上自觉向党和毛主席宣誓，保证今年亩产超过2000斤，保证工业的百花也要在全县处处争奇斗艳，保证整风和思想也一定要丰收，保证各个战线上都有无数卫星发射上天，要把天上的星星都遮没。”当夜，大寺各庄成立了人民公社，为了纪念领袖视察，定名为徐水东方红八四人民公社。并宣布：一切房子、树木、猪只、羊群、大车、牲畜全部归集体。社员实行了工资制。公社党委还连夜修订跃进指标，粮食产量原计划亩产3800斤提高到5000斤。第二天，县委又召开全县共产主义的思想文化跃进大会，张国忠作向共产主义进军的讲话。他说：“向共产主义进军，北京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我们党领导群众多年，就是要为建设共产主义，使人民进入生活、劳动的幸福乐园，消灭贫困、压迫和阶级。我们这一代，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正在向幸福的乐园前进。”“今天是共产主义文化跃进大会，这是我们要向共产主义迈进，使我们的思想、文化、教育都要提高，向共产主义进军。”讲到建立公社时，他说：“现在高级社改为公社，就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组织。”“把人民的生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包括在内。”他把共产主义理解为现在就把一切劳动工具和部分生活用品全都共产，说：“大车、牲口全要公有，粮食很多，有新房、有胶皮（指胶轮车）、机器，哪个是个人的？存款还算自己的，生活用品是自己的。这就叫共产。越共越好，一共就富了，私产是贫苦受罪，粮食不能高产。共好了是2500斤。”基于这种思想，会后立即将全县248个农业社宣布转为人民公社，各户私有的部分农具、牲畜、房屋、树木等都转为公社

所有；生产资料入社折价款的部分也决定取消。为了把现在规模很小的公社合并成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大型的人民公社，徐水县于8月15日将全县20个乡镇并为9个大的乡镇。9月1日《人民日报》向人们透露这样一种信息：“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北戴河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传达后，徐水县更加受到鼓舞，于9月15日成立了“徐水县人民总公社”（后改称徐水人民公社），实行县级政社合一，一级核算，将分配权控制在总社（由于只是给县人民委员会加了一个人民总公社的空名，原计划在其下边设置15个部门，没有来得及作实质性变动就流产了。在当时，这个县人民总公社并未起什么实际作用。）

步伐之二：提高军事化水平。在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多次提到徐水军事化。他说：“河北省徐水县搞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几天后，他又说：“人民公社，有的地方采取军事组织一师、团、营、连，有的地方没有，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产纪律化’这三化的口号很好。这就是产业大军，可以增产，可以改善生活，可以休息，可以学文化，可以搞军事民主。”而在徐水，由于毛泽东视察时曾鼓励了全民皆兵的军事化措施，赞美了徐水实行军事化以后劳动效率的提高和生产跃进的发展，因而国家决定给徐水全民皆兵的公社社员发枪。8月13日，首先在毛泽东到过的南梨园乡举行发枪典礼。发枪典礼之后，1100名民兵战士根据命令，肩扛锄头手持枪，跑步奔赴生产战场，两个半钟头就锄地410亩，拔草340亩，追肥

96亩，生产效率比发枪前又有所提高，人们处在从来没有过的兴奋状态之中。民兵们在上工以前和下工以后，都雄纠纠地操练一遍；在生产的时候，将枪架在地边，男战士们甚至做着活还要喊“一二三四”。

步伐之三：推出“共产主义试点”规划。8月6日，陈正人再次到徐水，带来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康有为的《大同书》两本书，奉中央之命在这里搞“共产主义试点”。8日，他召集河北省常委、副省长胡开明，省委秘书长尹哲和保定地委、徐水县乡村的干部，进行座谈。他说：第二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差不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就要向共产主义过渡了。过去没有想到跃进这么快，今年钢的产量可搞到1200万吨，炼钢设备可搞到1200万吨，炼钢设备可搞到200万吨，明年钢产量达3000万吨，超过英国。这样就逼得我们想问题了，就要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刘少奇同志指示：在徐水搞一下试点，搞共产主义，搞工、农、兵、学商结成一体，在农村、学校、机关都要搞。陈正人提出，要使徐水的发展速度比其他地方走在前头两三年，按照共产主义的标准和要求，对工业、农业、文化、教育和生活搞一个具体规划。他要求大家学习《共产党宣言》和他带来的那两本书。为搞好规划，中央、省地、县共同组成一个有100多人参加的“共产主义试点规划小组”。8月22日，《中共徐水县委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出台。“规划（草案）”提出：他们的任务是，随着生产关系的伟大变革，继续组织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加速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力争生产的高速度发展，为丰衣足食的生活创造充分的物质基础；积极展文化教育事业，为

群众的高度文化水平创造条件。奋斗目标：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到1963年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

步伐之四：实行供给制。徐水县委认为，全县的农业社都已转为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多种经济配合的全县范围的人民公社，已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水平的提高以及广大工农群众共产主义思想觉悟提高的新形势，已不适应继续采取记工分红、工资制等按取酬的分配制度，而需要采取一种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制度。于是在省委、地委的帮助下，9月20日，徐水县《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也出台了。《试行草案》要求，所有的公社社员都要尽自己的能力参加公社劳动，“每个人的吃饭、穿衣及主要生活必需品的需要，由公社有限制的、按照工农商兵大体平等的标准计划供应”，连洗澡、理发、看戏、看电影都由公社统一包起来。为了解决男女老幼之间不同的复杂需要，还补发一定数量货币的津贴。文件规定了实行供给制的范围，包括农民、工人、干部、职员（包括教员、商业人员）及一切在徐水工作人员。这个方案还分别对伙食、服务日用品、津贴费和卫生医疗文娱等方面的供给标准，作了具体规定，在每一项中都对农民、工人和干部规定了不同的标准。以津贴费为例，农民的津贴费，根据劳动态度，技术高低、劳力强弱分3等，每月一等的3元、2等2元，3等1元，每季评定一次。工人则分为7等，最低的1等1元，最高7等16元。干部则分为4等，县级16元，科局级12元，一般干部及教员8元，勤杂



人员6元。这个“供给制”是徐水县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核心。文件公布后，当地人举行了游行，大家抬着“庆贺全民实行供给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红匾，敲锣打鼓，高喊“拥护供给制”、“以实际行动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口号，但在事实上，当时徐水还是落后的小商品经济，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县，甚至有人还在外出讨饭。这里有一个插曲，因为从9月停发干部工资，干部没钱交饭费，于是只好吃完饭给食堂分别打白条子。

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就是在这种空想、盲目状态之中迈出了上述几大步伐。这里还可附带提及一事。在这样的形势下，又冒出一个比徐水还要说得好听的山东省范县（现属河南省）来。10月28日，范县县委第一书记谢惠玉代表县委在全县共产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任务，还用一首诗概括了范县的共产主义美景：“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在可以吃水果，各种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11月6日上午，毛泽东在一份登有“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宣教动态》”上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更出人意料的是，10月底，湖北当阳县跑马乡召开全体社员大会，社党委书记当众宣布，11月7日是全乡社会主义结束的日子，8日进入共产主义，一切以共产主义的方式来办，万万没有想到，一宣布散会，社员群众纷纷上街“共产”，拿空了商店，就到别人家拿，你家的鸡，我家抓来吃；我队的菜，你队可以来挖；更荒唐的是，还有去托儿所认个

男孩作儿子的。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当时人们谁也说不清。

## 舆论的导向

在徐水进行“共产主义试点”过程中及前后的一段时间里，舆论的导向曾起过很大的作用。“试点”之前，《人民日报》连续介绍徐水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的经验。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张国忠的文章，社论《徐水创造了好经验》，《中共河北省关于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领导经验的总结》等等。8月11日，发表了《毛主席视察徐水安国定县》的消息和康濯写的通讯《毛主席到了徐水》。此后，《人民日报》于8月23日、26日、27日、29日、30日和9月1日，连载特约康濯写的长篇通讯：《徐水人民公社颂》。这篇通讯写了徐水的全民皆兵，公社、供销社、信用社合一，食堂、幼儿园、缝纫厂、米面加工动力化，农村城市化等等，还写了将要发射的高产卫星：用狗肉熬汤浇地，山药每亩120万斤、白菜一颗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康濯是老熟人。几十年后，他对1958年徐水“共产主义试点”的历史作过回顾。他说：“我在徐水县那一段，写一些报导，《人民日报》都发了，这是特约的稿子，说我写一篇他们发一篇。有些稿子我写的数字低，见报时数字变高了，这是《人民日报》给徐水县委第一书记打电话，往高里加的。尤其在产量问题上，我问过张国忠：亩产万斤能够达到吗？张国忠说：是达不到。那为什么这么喊？他说：这么喊能喊出大家的干劲来，我们不能泄气，不喊几万斤，连600斤也达

不到。我说，你得实事求是，他说，不行，那样就泄气了，要紧跟形势，不跟形势就完蛋了。”

徐水，这个所谓水利化建设的典型涌动成为“共主义试点”高潮的县，在当时，震惊天下，引得各级领导、各方人士，甚至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派人来参观、考察。据当年徐水县接待参观访问的报告记载，从1958年3月到10月30日，到徐水参观的外宾有40多个国家的930多人，既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也有资本主义国家的。1958年9月5日，苏联驻华大使联合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朝鲜、蒙古、越南的驻华大使、代办和其他外交官到徐水考察。赫鲁晓夫还让塔斯社记者到徐水去采访。

据统计，1958年3月至10月，全国有32万人到徐水参观（后来徐水县委曾请求中央对到徐水参观的人员适当控制），各省市以及中央部门的单位共有三千多个，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全国兵役工作会议都在徐水召开。人群中，不仅有干部、工人、农民、学生、士兵、教授、记者、艺术家、工程师、民主人士、科学工作者、归国华侨，也有大批中央负责同志。9月10日和11日，刘少奇来到徐水，接着来视察的中央和军委的负责同志，以及各部委的负责同志有：邓小平、谭震林、谭政、刘澜涛、胡乔木、杨尚昆、李先念、薄一波、邓子恢、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罗荣桓、聂荣臻、粟裕、杨成武、安子文、程子华、钱俊瑞、钱正英、刘瑞龙、戎子和、张鼎丞、胡耀邦、杨献珍等。罗荣桓是拖着病弱的身体同贺龙、聂荣臻一道到徐水的，给他留下最深的印象是写在墙上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画在墙上其大如牛的肥猪、几个人才能抬得动的大白菜，还有幼儿园里像背课文一样呆板地回答问题的孩子，在“幸福院”里呆坐着的老人。罗荣桓风趣地说：这样的“幸福院”我可不来住。邓子恢不顾身体有病，也到徐水去看过。回到北京后，心情很不安，明确指出：“徐水是浮夸风、共产风的典型。”清华大学教授看了徐水后，发表感想：这样一月三块钱的共产主义，我们不要。

刘少奇在看过徐水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后，感到有些毛病，曾引用孟子的话说：“且一人之身百工之所为备”，指出了生产规划安排的复杂性。他指示徐水县对全县工农、后勤和各方面的人力要算细帐，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他还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上，周恩来提出，要注意方便群众，照顾北方人烧煤的特点。

1958年9月中旬，毛泽东将身边18名工作人员放到徐水县商庄人民公社参加劳动，作调查研究。10月18日，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就徐水问题给毛写一个报告。报告反映了徐水商庄水商人民公社在军事化、战斗化、集体化名义下，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情况，瞎指挥、浮夸风、弄虚作假等，还反映了“共产主义试点”中提出一些原则性口号等问题。继之，徐水的问题不断上报，毛终于逐步改变了对徐水的看法。11月10日，毛在中办机要室的报告上指示：“即送林铁、张承先同志：此件是说徐水县的情况的，长处短处都有，请你们研究一下。此种情况，可能不止一个社有。”1958年10月17日，毛在天津（当时河北省省会）又一次听

取徐水张国忠汇报，指出徐水在“共产主义试点”中的问题。在谈到幸福院、幼儿园和建筑房屋的试点规划时，毛说：夫妇住一处，老人住一处太单调，也要大中小结合。在谈到徐水全民所有制时，说：徐水县全民所有制，还不是6亿人民的所有制，6亿人民的所有制，由国务院发工资，你们还是自己发工资。

1958年10月18日，河北省委成立工作组，到徐水做了三天调查研究，10月21日下午就一些主要问题向毛汇报。毛提出：发展商品生产，对分配问题不要搞平均主义，对私人之间的债务不要一风吹，不要讲假话，不要压服，要去掉封建残余，在家庭问题下，阴阳五行还要讲。

11月初，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多次批评徐水。他说：徐水的全民所有制，不能称是建成社会主义。小全民所有制即大集体所有制，人力、财力、物力都不能调拨。”“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制，废除商业，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就会使台湾高兴。”“现在不能叫共产主义，水平太低，只能说共产主义的因素和萌芽。”他批评徐水“急急忙忙往前闯”，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

11月3日，保定地委研究徐水问题。从此时起，徐水又将一县一社改为三级实权制，全民供给制改为工资和供给制相结合。从12月份开始，干部、工人恢复补发工资，社员们虽然仍在食堂吃饭不要钱，但开始定量，停止津贴。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夭折了。

## 当时的恶果

为总结这场“试点”的教训，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于1994年11月编印一本《徐水共产主义试点专辑》，也有同志对此事做过调查研究，形成了一些材料。据这些资料反映，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在当时及其以后一段时间里造成了很大的恶果。

首先是一切“公”。把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全部改为所谓全民所有制。在扫除私有观念的影响下，有些村庄鸡猪和树木也归了公，把锅砸掉炼铁，户户不冒烟，全去吃食堂，有些地方甚至连箱箱柜柜都归公有。群众的基本生活资料—住房也要拆除。县委曾在住宅规划中提出，全民所有的土房和破老砖房，一律在10月底拆完。据统计，很快拆除了3.2万间房子，搞得社员一时住房紧张。清华大学曾派去几十名建筑系师生帮助设计新的居民点，由于资金、材料不足，很难照计划建设，只有大寺各庄边拆边建，拆300间平房，建9栋300个居室的楼房，群众搬了进去；大部分村没有及时建成；拆房拓宽了街道，使群众住房十分紧张。就是新建的这9栋楼，也极不方便，没有厕所，没有供暖设备，楼顶用木头、竹杆、草把子搭成，再铺一层杉皮顶子，楼上有动静，楼下听得见。一个叫郑秀兰的人，背着20斤棒子踩塌二楼地板掉到了一楼。

其次是供给制。从1958年9月开始，干部停发薪金，改发津贴费，但未按规定标准执行，县级干部每月8元；科

局级 5 元，一般干部 3 元，勤杂人员 2 元。有的干部发扬风格，一分钱不领，只是到食堂吃饭不付钱。全县社员的生活由县人民公社供给，可到 11 月，才发过一次生活用品贷款，全县共支出 550 万元；每人发条毛巾，全县需要 144 万条（小县并大县后的情况），但只发了 72 万条。其他生活用品只给幸福院、幼儿园发一些，至于看电影、洗澡等就更无法实现了。徐水全年财政收入不足 2000 万元，发津贴、办事业都支持不了，只好挪用商业系统资金 700 万元。

第三，强迫命令，打人捕人。县委书记张国忠要求每亩山药必须达到 15 万棵以上，达不到者受惩罚。有的群众接受不了这种超乎正常的“胡闹”，又怕张国忠手中的权力，于是采取办法抵制，在田边地头密植，在地中间稀植。但张国忠带领一班人检查，结果有 5 个小队长被绑在树上，接受现场斗争，喝骂、拳打、脚踢，然后被送到监狱劳改，一个叫高老先的小队长，劳改 3 个月就死了。有群众说。张国忠就是法律。1958 年 8 月和 10 月，张国忠搞过两次捕人高潮，并指示县乡村三级都成立劳改队，下达捕人指标，限额完成。他还亲自在漕河公社主持捕人现场会，一次即逮 358 人。而张国忠认为，逮捕人起作用，能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1958 年，徐水县共逮捕 4643 人，其中多五类分子，有 190 人是生产队干部和党团员。据西留营、南张丰、八一农场三个劳改队统计，有 30 人捕后，死在劳改队，其中包括两名党支部书记。

第四，饥饿、疾病和外逃。据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 1959 年 1 月调查，当时徐水有浮肿病人 2447 人，死亡 262 人。高林公社高林村对 20 名浮肿病人统计，1 至 9 岁儿童占

45%，老人占 50%，壮年人占 5%。容城公社 316 名浮肿病人中，有 74 人因饥饿引发脏病、肾衰竭而亡，病死率 23.4%。另据徐水有关部门统计，1959 年春，徐水有 11352 人被迫外逃，县委不得不在车站设站拦阻。

短暂的“共产主义试点”对徐水生产力是一次大破坏，是对农民群众的一次无情剥夺。同时，又是对民主、法纪和人性的摧残。它丝毫没有增强人们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和信心，反而增加了共产主义在人们心中的疑虑。后来 1961 年保定地委派工作组进驻徐水，搞“新三反”运动，张国忠因欺上瞒下、浮夸、违法乱纪等问题，先被定为“反党分子”，后作为人民内部矛盾给以处分，不久调到新城县做机关一般干部。1967 年，这个“试点”的风云人物病死新城，据《瞭望》周刊 1987 年 46 期《新的长征，新的飞跃》文（作者陈大斌等），文中谈及：徐水县 1978 年人均收入人民币 65 元，距当年共产主义试点已经 20 年了，还只不过是这样一个发展水平。



## 农业卫星满天飞

“大跃进”运动中最荒唐、最离奇的事情，要算是放“高产卫星”了。什么叫“高产卫星”？今天的年轻人是不大知道的。其实“高产卫星”就是“高产纪录”。缘何要把“高产纪录”比喻成“高产卫星”？因为1957年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人类开始摆脱地球引力向外层空间的进军。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大事，引起全世界的震惊。“大跃进”年代里，人们便借用“卫星”来比喻那些远远超出人们想象、超越常规的“高产纪录”。实际上，这些“卫星”是被“吹”上天的。同人造地球卫星截然相反，前者是科学发展的产物，后者则是违背科学、违背常识的结果。

放得最早产得最多的是农业“高产卫星”，放得最离奇的也是农业“高产卫星”。当年的一首大跃进民谣颇能说明“高产卫星”离谱到什么程度：稻米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超冬瓜；蚕长猫一样大，猪长像大象；一棵白菜五百斤，上面能站个胖娃娃；鱼秧撒下千万条，条条养得扁担样”；“玉米秸儿穿儿

天，浑身棒子有几千”……。今天人们无疑只会它们当作“神话”，然而当年它们却不是文学作品中的“神话”，而是堂皇之地发表在党报上的新闻。

由于工作关系，“大跃进”期间我同农业方面没有打交道，但是同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一样，差不多每天都与闻农业“放卫星”的消息。因为有某种“身份”，参加一系列中央会议。亲耳听到农业“大跃进”的种种说法，甚至于还到当时名扬全国的“高产红旗”——湖北麻城参观过。

“大跃进”中的农业“高产卫星”像肥皂泡一样，很快就破灭了，接踵而至的，是饿殍遍野的三年大饥荒。我在“公共食堂”一节写了我流放北大荒在饥饿中的身境和心境。——“丰”——饥、——虚——实、——天——地的反差情景，让人刻骨铭心。

## 农业“高产卫星”的由来

农业“高产卫星”可以说是农业高产计划指标的产物。

1957年9、10月间，召开了八届三中全会。这次会揭开了批判“反冒进”、农业“大跃进”的序幕。全会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这个草案起草的时间很早，是1956年1月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后，公开发表了这个草案。经过近两年的修改，在这次全会上基本通过。草案总计有40条内容，故简称“农业四十条”。“农业四十条”的第二条，就是“大力提高粮食的产量和其他作物的产量”。其具体指标是：从1956年开始，在

12年内，粮食每亩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即所谓“四、五、八”）。棉花每亩平均产量（皮棉），由1955年的35斤（全国平均数），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增加到40斤、60斤、80斤和100斤。其他农作物产量，草案没有提出具体指标，只是要求积极发展。

为了实现上述增产目标，“农业四十条”，提出了10个方面的措施，包括12年内水田和水浇地面积由1955年的3.9亿亩扩大到19亿亩左右、年产化肥达到1500万吨、增加谷种植面2.5亿亩、国营农场的耕地面积由1300万亩增加到1亿亩左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农作物最严重的虫害和病害等具体指标。

“农业四十条”提出的粮食单产指标，就全国范围来说，要想实现是比较困难的，事实上，直到80年代我国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才达到400斤的水平，1967年时还在200斤徘徊。至于它提的一些增产措施的指标，更是脱离了实际可能性。到1967年，全国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不仅没有扩大，反倒缩减了9208万亩；其中稻谷的种植面积有新增加，但也只增加了1894万亩，离2.5亿亩的目标相差很远；农用化肥的年产量才161.4万吨，此前的1966年的产量曾达到240.9万吨，离1500万吨目标也差得很远。

对本来就有些脱离实际的计划指标，毛泽东仍觉得不满足。他在全会上讲话说：“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上第一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

产两千斤行不行呀？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八百斤，淮河以北亩产一千斤，淮河以南亩产两千斤？到二十世纪初达到这个目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毛泽东把“农业四十条提出的粮食计划指标翻一倍；把时间延长到21世纪初，但也说可能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他还表露了把中国变成世界第一高产国家的期冀。

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1957年时总人口为64653万，1958年为65994万，这么多人口，吃饭的确是件大事。旧中国战乱频仍，农业凋敝，连年饥荒，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仅2263亿斤，亩均产量仅137斤，建国以后经过努力，到195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3901亿斤，每亩年增多产量提高到197斤，但是粮食问题还远未过关，按全国人口计算人均粮食大约五六百斤，这显然远不能满足对粮食的需要。我国的农业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人均耕地较少，尽管耕地总面积居世界前几位，但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3，而且后备资源不足，宜农荒地资源还不如人口和土地面积都少于我国的印度；二是技术装备落后，生产工具，生产手段及基本设施（如水利条件）的水平都比较低下，这两个特点决定了解决我国的粮食问题，主要不能靠扩大耕种面积，而要依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从而增加总产量。因此，人们把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注意力，一般都放在提高粮食单间的途径方面。

但是，与工业产品产量的提高不同，在上述条件下，粮食及农作物产量的提高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增长幅度必定远远低于工业产品的增长，在自然条件复杂、技术装备落后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即使把产量提高一二成，也需要付出

极大努力。

八届三中全会批判“反冒进”，指责主张反冒进的同志是“促退派”以后，便把“右倾保守”思想看成了提高农业产量的主要障碍。全会以后，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就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于客观规律的。一九五六年的成绩充分反映了这种跃进式发展的正确性。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后农民群众的伟大的创造性，所以他们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他们不了解所谓‘冒进’是没有实际条件，而因是没有成功可能的盲目行动，而我们在一九五六年的跃进却完全不是这样，是有很多可以实现的条件，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否则，就无法说明，为什么一九五六年我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而粮食产量却超过了大丰收的一九五五年一百多亿斤。”

这篇社论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1956年经济建设中确实存在的冒进问题被肯定为“跃进”，负面变成了正面，从此盲目冒进便可以在“跃进”的名义下出现；第二，反对急躁冒进被指责为忽视和否定群众的创造性，因此任何防止和纠正冒进情绪的主张都都很难再提出；第三，今后的经济生活中会不会发生冒进问题，需要不需要反对和防止冒进，社论没有说，没有说不是疏忽，实际上是不承认发生冒进的可能性。

批判“反冒进”的直接后果，就是“大跃进”的兴起，这里的“跃进”不是建立在客观可能性基础上的快速发展，而是把人的意志强调到极致的结果。从此，外部客观的因素被看得可有可无，而主观意志则被夸大到无所不能的程度。人们主要甚至仅仅凭着自己的愿望，来设想提高农业产量的计划。前面引证的这篇社论就想当然地说：“如果说去年全国已有二十九个县、市会达到或超过这个指标。”一些地方还宣布要提前实现“农业四十条”。八届三中全会后，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召开党代表大会，制定本地实现“农业四十条”的规划。最典型的华东的柯庆施，他在1957年12月25日上海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要大大超过《四十条纲要》规定的指标，“争取在5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达到1500到2000斤，皮棉每亩平均年产量达到150年到200斤。”不少省都提出了提前实现的目标，至于实现的根据，无一例外地被认为是干劲、热情、积极性这些主观因素。

1958年1月南宁会议进一步批判“反冒进”后，农业产量计划的高指标风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刮起，河南省2月份提出，1959年就要基本实现水利化，争取1962年超额完成“四、五、八”，到1962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600多亿斤。广东省提出，到1962年就要实现全省粮食亩均年产800斤的目标，到1967年实现亩均年产1000斤，总产量由218亿斤增至480亿斤，陕西省提出，8到10年内使八百里秦川的粮食亩产达到800斤，总产量达到115亿斤。江西省提出，“十年规划，五年完成，”1958年粮食总产量由140亿斤增加到175亿斤。河北省提出，到1962年即实现“农业四十条”的产量目标，粮食亩产500斤，棉花（皮棉）亩产100斤。

各地提出的高产目标，都脱离了本地的实际情况，实际上是不可能完成的“空中楼阁”。只要看后来的结果就能说明这一点。河南到 1984 年粮食总产量才达到 580 亿斤，接近 600 亿斤；广东到 1984 年粮食总产量才达到 392 亿斤，也没达到 480 亿斤的水平。

如果说高指标是附着在“大跃进”温床上的种子，那么，“高产卫星”则是这个种子生成的恶果。在“大跃进”的气氛下，只要有高指标，就必然会产生“高产卫星”，这是“大跃进”运动自身逻辑的结果。当然，“大跃进”运动发动起来之后，高指标和“高产卫星”又是同时并存、彼此促动的，高指标引发了“高产卫星”，“高产卫星”又催生出更高的指标，两者形成愈演愈烈的浮夸循环。

## 竞放“高产卫星”

早在 1957 年底，就已从新闻媒介传出一批“高产典型”

这年 12 月 25 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广东汕头专区早在 1956 年就成为全国第一个亩产 800 斤粮食的专区，而这个专区的潮安、澄海、潮阳、揭阳、普宁、南澳等县亩产已突破千斤的水平。也就是说，“农业四十条”尚未在八届三中全会修改通过，汕头已经达到并超过了其规定的指标。报道还说，这个专区的澄海县以亩产 1257 斤粮食，居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首位。

不久，河北邢台地区又传出，这个地区邢台市南园村红

光一社亩产粮食 1112 斤、蔬菜 17553 斤，消息还说这个地区有七个社亩产粮食过千斤，其中有的社亩产皮棉 380 斤。按照农业区域划分，河北属“农业四十条”规定的 400 斤地区，而邢台地区这些社，已提前 11 年并超额 160% 完成了计划的亩产指标。

邢台的消息传出不 10 天，这个省又有渤海边沙荒地亩产千斤的“纪录”：渤海边的沧县地区黄骅县沙井子村 9000 亩水田产稻为 900 多万斤，平均亩产 1023 斤，其中有 40 亩亩产 1500 斤。土地属于沙地的地方“创造”了亩产千斤的纪录，《人民日报》形容它是“一匹红色的骏马”。

这是“大跃进”运动中最早的一批“高产典型”。虽然同后来的“高产卫星”相比，它们算不上什么，但它们是“高产卫星”的雏形。在大批“右倾保守”，“跃进”声浪日高的气氛中，“高产典型”显然具有“激励”作用，催逼人们“创造”更高的产量纪录。从成都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毛泽东一再号召“破除迷信”、破除教条，浮夸之风迅速弥漫全国。进入 1958 年夏收以后，比原来那些“高产典型”更高的“卫星”，一个接着一个“腾空而起”。用《人民日报》的话说“进入 5 月以来，丰收的喜报像春天的燕子，在祖国的天空到处飞翔；高额丰产的新纪录如滚滚的海浪，一个高似一个地向我们涌来。从大江南北到黄河上下，到处是一片丰收景象（《水稻生产要加油》，《人民日报》1958 年 6 月 20 日社论）。就“高产纪录”不断产生出来这一点讲，《人民日报》当时的确起了一种推波助浪的作用。刘少奇后来说过这样的话：“大跃进”的发动，《人民日报》要负一半责任。



1957年，全国小麦只在五六个地方的一二亩至多三五亩土地上，出现过“亩产千斤”的纪录；1958年夏收时节，全国所有的产麦区，所有的省，也几乎是所有的县，都出现了“亩产千斤”的纪录。亩产千斤的面积也不只是一二亩或三五亩了，如果以省为单位，已经是几万亩甚至几十万亩了。1957年年末制定规划时，尽管不少地方脱离实际地提出亩产千斤的指标，但毕竟还还没有敢提出两千斤以至更高的目标，而1958年夏收时报出亩产2500斤、3000斤的纪录已不是个别情况，甚至3500斤、4000斤以上的纪录也出现了。

据《人民日报》报道：

6月8日，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产2105斤。

6月9日，湖北襄阳专区大面积小麦亩产1500斤。

6月11日，湖北光化县幸福社11亩小麦亩产3215斤。

6月12日，河南遂平县卫星社2.9亩小麦亩产3530斤。

6月16日，湖北谷城县星光乡替乐民社亩产小麦4353斤。

6月21日，河南辉县亩产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县亩产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国县亩产5103斤。

7月12日，河南全国小麦亩产最大的“卫星”：该省西平县和平农业社社长陈颜理的2亩试验田，收了小麦14640斤，平均每亩达7320斤过。陈颜理向记者介绍“高产经验”：下种前耕了4次，第一次耕一尺到一尺二寸，第四次耕六寸到八寸；每亩播种70斤，施底肥12万斤；追施杂肥5万斤，返青时又施人粪尿450担，还上了500斤草木灰、

50斤硫酸胺、20斤磷酸钙。

这已不是在统计真实的产量，而分明是在进行一场竞放“高产卫星”的擂台赛。

给这场“擂台赛”加油助威的不仅有新闻传播媒介，而且竟然有赫赫有名的科学家！6月1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物理学家钱学森的文章，题为《粮食亩产会有多少？》。文章说：

“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

这是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我们的土地正在农民双手豪迈的劳动中，付给人们更多的粮食。六月十二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二千一百零五斤以后，又有二亩九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小麦。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碰顶了吗？

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年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这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

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产量就不仅仅是在的两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省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一百六十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一百六十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钱学森的文章不仅肯定了已经放出的那些“高产卫星”，而且还论证了比现有的“高产卫星”高出二十倍的产量出现的可能性。这时全国尚未出现亩产万斤的“卫星”，而钱的文章已论证亩产有可能达到四、五万斤。在你追我赶的浮夸风中，这样的论证文章怕也是起到了它的作用吧！1958年12月武昌会议时，毛泽东找我谈话时，我曾问他，怎么会相信那些“高产卫星”，毛说是看了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

紧接着钱文发表之后，7月5日至9日，全国科联和北京科联还组织首都科学家同三十多位种田能手（包括小麦、水稻、棉花）举行丰产座谈会，他们来自湖北、河南、河北、浙江、江苏、安徽、陕西等省及北京郊区，科学家中有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农业大学的有关负责人和专家。座谈会实为擂台赛，在上面的压力之下，科学家同种田能手展开了高指标大战。这种压力就是政治挂帅，认为科学落后于“大跃进”的形势，必须打破常规，解放思想，以虚带实，紧紧跟上。大家都表示，“要通过试验

田工作，在思想上、耕作技术栽培管理上、理论上和作物产量上来个四大丰收”会前，中科院 8 个有关单位还决定共同办试验田，向农民丰产能手应战的亩产指标下共拟定三本帐，分别为：小麦 1.5 万斤、2 万斤、3 万斤；水稻 2 万斤、3 万斤、4 万斤；甘薯 15 万斤、20 万斤、26 万斤；籽棉 3 千斤、4 千斤、6 千斤。可是一听到种田能手的报告后，大家觉得这些指标太落后了，于是改为，争取小麦 3 万斤、水稻 3 万斤、甘薯 40 万斤、籽棉 1 万斤。在分组会上，就出现了像拍卖一样，竞相抬价的局面，不仅农民能手之间互相竞赛，生物学部同农科院之间，也挑战应战。生物学部争取指标达到：小麦 6 万斤、水稻 6.5 万斤、甘薯 50 万斤、棉籽 2 万斤。可是，河南、陕西两个农业社提出小麦 10 万斤，江苏一个社提出水稻 7 万斤。

擂台会后，生物学部当真组织了丰产试验田委员会，而且真的进行了试验。在 6 亩小麦地，作出不同耕翻深度、播种密度、施肥量的对比试验。其中深耕最深达 10 市尺，每亩播种量多达 260 斤到 460 斤，粪肥多达 40~60 万斤。试验田里，白天鼓风机齐鸣，以增加二氧化碳，强化光合作用；晚上灯光如白昼，以增加光照。如此使尽了“科学”的浑身解数，迎来注定要失败的试验：1959 年 6 月麦收时，最好的一块地，亩产只有 900 斤。当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这种做法，有些科学家算过细账，如甘薯亩产要达到 15 万斤，则每平方米土地上，必须长有每个重 30 斤的 7 个半甘薯，像 7 个半小儿一样挤在一起；如果是 50 万斤，则需 25 个小儿挤在一起了。当年讲这样的真话真是难而又难呵！

小麦“卫星”的竞放，首先导致了对 1958 年夏季粮食

产量的高估。6月份召开的华东区第一次农业工作会议预计，华东四省一市（江苏、浙江、安徽、福建、上海）小麦比上年增产73.5亿斤，即增长57%；油菜比上年增产317万担，即增长76.2%。主持会议的谭震林估计更高，他认为，华东四省一市当年粮食增产是以70%的速度飞跃前进的；这些省市的粮食总产量1957年共715亿斤，1958年夏季即已达到203亿斤。6月上旬，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就本省小麦丰收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河南当年8335万亩小、大麦产量达206亿斤，其中6765万亩小麦（收获面积）平均亩产254斤，总产量达171亿斤，比上年增产1.29倍，有66个县、市增产一至两倍。吴还说，建国8年来河南省小麦平均每年增产3亿斤多一点，而1958年一年即增产96亿斤，夏粮比上年增产114亿斤。7月上旬，湖北省报出该省3081万亩夏季粮食作物总产量达到71.9亿斤，比上年增产32.8亿斤，增长83.9%，单产达到233.4斤，比上年的135斤增长72.9%，其中1666万亩小麦总产量达到44.7亿斤，比上年的24.1亿斤增长85.2%。

各地纷纷发出夏粮高产的喜报，新闻机构随之报道全国夏粮高产的“喜讯”。7月初，《今日新闻》发表当年夏粮增产350多亿斤，消息说，今年全国夏收粮食达到950亿斤上下，其中冬小麦增产220多亿斤，达到640亿斤左右，我国小麦总产量已超过英国居世界第二位。消息还说，小麦增产的主要原因是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冬小麦每亩平均产量1957年为112.8斤，1958年为180斤左右。7月下旬，农业部发布夏收粮食的正式公报：全国夏粮播种面积53900余万亩，总产量达1010亿斤，比1957年夏粮作物增产413亿斤，

增长 69%；平均亩产 187 斤，增长 70%。其中冬小麦播种面积 35600 余万亩，总产量达到 689 亿斤，比 1957 年增产 279 亿斤，增长 68%；平均亩产 193 斤，增长 71%。公报还估计尚未收获的 4500 万亩左右春小麦，总产量约在 90 亿斤左右。公报还公布了麦田高产面积的数字：亩产五百斤以上的面积有 924 万多亩，其中亩产 1000 斤不足 2000 斤的有 75.43 万亩，亩产 2000 斤不足 3000 斤的有 4236 亩，亩产 3000 斤不足 4000 斤的有 267 亩，亩产 4000 斤不足 5000 斤的有 34 亩。

小麦“卫星”的竞放，还刺激了更高的产量计划指标的出台。谭震林在华东区农业协作会议上提出，今年就可达到每人平均 1000 斤粮的目标，而且不需要五年即可完成人均 2000 斤粮食的任务。谭还说：棉花和油料也同粮食一样迅速增长，预计到 1959 年皮棉和油料的产量都要比 1957 年翻一番到两番。按全国人口平均五年内达到每人粮食 2000 斤，是毛泽东在 1957 年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目标，过了不到一年，实现这个目标的时间也被缩短了。

紧随着小麦“卫星”的竞放，又开始了新一轮早稻“卫星”的竞放。还在小麦“卫星”上天所起之时，1958 年 6 月 20 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水稻生产要加油》的社论，其中说到：“去年，我国水稻平均亩产到底 350 多斤的时候，小麦的平均产量才只有 110 多斤，水稻的产量比小麦高出两倍以上。今年小麦赶上来了，它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已经不是百分之几、百分之十几的增长，而是百分之几十的增长了。有些省、更多的专区和县、成千上万的农业社，甚至已经以一倍、两倍或更高的速度增长了。小麦等夏

收粮食作物的总产量比去年增长 50% 左右。小表的产量能够如此迅速地增长，素有高产作物盛誉的水稻为什么不能呢？仅以早稻为例，今年我国种植早稻一亿六千万亩，如果平均亩产增加 50%，由去年的亩产 300 多斤增加到 500 斤，全国就能叫获 800 亿斤稻谷，约占去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20% 以上。争取水稻产量更迅速地增长，对于争取全年农业大丰收，对于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具有多么巨大的意义和作用！”

农业部发表 1958 年夏收粮食产量公报的当天（7 月 23 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社论（《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说：“它们说明，我国的农业发展速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由渐进到跃进的阶段，这是我国全体农民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贡献。一切认为农业产量只能按百分之几的速度增长的悲观论调已经完全破产了。”社论还说：“既然一向被认为‘低产作物’的小麦都能以 71% 的速度跃进，那么高产作物水稻、玉米、甘薯为什么不能更加大量地增产呢？棉花的产量为什么不能跃进呢？”

当新闻媒介一再进行早稻高产的宣传鼓动时，各地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一场放早稻“高产卫星”的竞赛。据《人民日报》和地方报纸的报道：

6 月 26 日，江西贵溪县早稻亩产 2340 斤。

7 月 18 日，福建闽侯县早稻亩产 5800 斤，随后又报早稻亩产 7275 斤。

8 月 1 日，湖北孝感县亩产 15361 斤，这是早稻亩产超万斤的最早的“卫星”。没过多久，该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一社放出一个震惊全国的更大的早稻“卫星”：该社社长

王全成等人的 1.016 亩试验田，共产干谷 37547 斤，平均亩产 36956 斤。这颗巨大的“卫星”一放出，8 月 13 日的《人民日报》为此（连同为福建报出的花生亩产“卫星”）专门发表社论庆贺，题为《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社论说：“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花生亩产一万多斤的高产‘卫星’，从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和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的田野上腾空而起了。这是今年我国农业生产的又一件大喜事。这样高的单位面积产量，这样高速度的增产，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这又一次生动地证明，‘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解放了的人民可以创造出史无前例的奇迹来。”

这是新闻舆论中最早出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

毛泽东本人也为“高产卫星”助威催生。1958 年 8 月 13 日《人民日报》刊出了毛泽东视察山东农村的报道。他来到历城县北园农业社，“这里的水稻生长得很好。”毛主席一边看一边向社主任李书城询问水稻的品种、深耕、密植等情况，李书城一一作了回答。当毛主席问到计划产量时，李书城说：“五十亩高额丰产田，原来计划亩产两万斤，现在我们要争取四万斤，过去一亩只产二、三百斤。”毛主席听了高兴地说：“好，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

##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来自一份内部报



告。1958年夏收时节，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赴山东寿张县了解农业生产情况，其中成员刘西瑞写回来一封反映当地情况的信。8月2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这封信，并将“人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作为通栏标题。信中说：“这次寿张之行，是思想再一次的大解放。今年寿张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乃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八千斤、七千斤，提出五千斤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根本没有人提了，这里给人的印象首先是气魄大。”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1958年是主观唯心主义最为泛滥的一年，唯意志论不被视为极端错误的思想方法，倒成了四处飘扬的旗帜，在自然界面前，在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面前，人的意志被宣扬成不受任何局限、可以主宰一切的“神灵”。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固然可以发挥极重要的作用，但这是有条件的，即必须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绝不可能逾越自然条件所不许可而人类自身能力还无法做到的界限。这些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为人类有史以来的一切实践早已证明的常识，在“大跃进”年代却被遗忘，甚至被批判。《红旗》1958年第5期发表陶铸《驳“粮食增产有限论”》的文章，其中说道：“农业生产是一种人与自然的斗争。对于这种斗争，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从剥削制度解放出来的人民是力求主宰自然、征服自然呢，还是甘心处于自然的主宰之下面成为它的奴隶呢？在‘粮食

增产有限论’者看来，大自然神秘得很，不可能为人们所认识，人们更不可能改造它。我们共产党人则认为，自然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当人们正确地掌握了自然的规律，就能够驾驭自然，改造自然。”文章还以“高产卫星”为事例，来证明“粮食增产有限论”对自然界认识的“贫乏”（无独有偶，文章也引用了钱学森的文章）。今天看来，用违背自然界常识、人为制造出来的“奇迹”，去证明怀疑“高产卫星”者自然知识的“贫乏”，其中包含了多么深刻的讽刺意味！

如果说陶铸的文章还承认自然界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话，那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则已从认识上完全抛弃了自然界的规律。《人民日报》7月23日的社论就这样说过：“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有把握可以说，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人民日报》28日的社论《今年秋季大丰收一定要实现》中，还引述了当时流行的一些口号：“广大农民在总结夏季丰收的经验时说：‘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没有万斤的指标，就没有万斤的措施’。既然广大农民决心使大秋作物像夏季作物一样的速度和更高的速度增产，那就一定能够以更高的速度增产。”这些意思用当时的一句话概括，就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定能做得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过是反映当时唯意志论泛滥的更典型的口号罢了。

整个中国大陆被卷入了唯意志论泛滥的狂潮之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为那些人人为制造的高产“神话”唱赞歌，《人

民日报》1958年8月23日到9月1日连续刊载了作家康濯撰写的《徐水人民公社颂》，其中叙述了徐水“将要发射的高产卫星”：一亩山药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一亩小麦12万斤，一亩皮棉5000斤，全县粮食亩产2000斤。康濯特别仔细地写了山药是如何达到亩产百万斤的：那片长方形的地里，最北头的中部是一个二分地的塔形沼气山药堆，十五层环形梯级，折合平地四分；插秧五万棵，西侧六个小堆，有三堆沼气山药，共占地一分，插秧数各为三千五、一千七、一千五百棵；中外还有三堆不带沼气的山药。这几堆大小都相同，是为了比较有无沼气和稀密栽植的好坏而采取不同措施的。南面还有一亩拱形的沼气山药，下铺一层平均二尺厚的马粪，上面是粪土，再上面一层是好土；这个立体折合平地一亩三，插秧七十五万棵，此外，两侧的零星空地还有一些平地沼气山药和一亩六千棵的给秧子搭了架的山药。那一亩拱形山药计划产120万斤，只要每棵长半斤多山药，七十五万棵秧子就可以保证这个卫星数字；从眼时的生产情况来看，这颗卫星的上天应该说是毫无问题，因为一棵长二二斤山药本来就是不值得一提的低产。那二分塔堆上的五万秧子，看现在的情况，也可以成为亩产百万斤的卫星射上天去。一亩六千棵的搭架山药，共灌了四条狗的肉汤，也已长成茁壮的卫星模样，看来同样会直上云霄。

用沼气催肥，浇灌狗肉汤，注射葡萄糖，种种荒唐之举，在作家笔下被描写成了动人的故事。然而，远不只是作家在唱赞歌。陈毅在《广东番禺县访问记》一文中（载《人民日报》1958年9月26日），写了他在四川和广东亲眼看到亩产百万斤番薯、60万斤甘蔗、5万斤水稻的“经历”。陈

毅说：“这块试验田像个苍翠的山岗，又像一幢幢绿色的楼房，雄伟的气势，远远就吸引着我。最初我还想，一亩田收获一百万斤番薯，该要插多少薯苗？插得下插不下，要长薯块，又往哪里长？到了现场一看，一问，真是一目了然，完全信服。这一亩五厘地的试验田，是用土垒成了七拢高达八尺的梯形高畦。每畦插薯苗六千株，一共有四万二千株。乡党委书记解释说：每株年产二十五斤（采取分期抽挖薯块和间补薯苗的办法），合计一亩全年便可产一百零五万斤。”陈毅感叹道：“一滴水可以透视太阳，我所到的番禺县的普通乡村，这是我们国家的最基层。在这里所看到的种种变化，也就看到了中国六亿人民正在做着震惊世界的事情！”

由于当年对这两篇文章印象深刻，特地找到作了以上摘引。

作为“大跃进”运动的发动者，毛泽东对农业“高产卫星”更是欣赏备至。在“卫星”竞放的高潮中，他视察了河北、河南、湖北、安徽、山东、江苏、上海等地，为各地的“高产卫星”兴奋不已。8月份，他在天津视察时曾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他感到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甚至发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疑问。8月份他主持召开了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预计1958年粮食产量将要达到6000~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90%，全国每人占有粮食的平均数将达到1000斤左右，棉花产量将达到7000万担左右，比1957年增产一倍左右。按照7月份农业部汇总各省上报的数字新进行的统计，1958年粮食产量估计是1万亿斤以上。北戴河会议似乎还打了点“埋伏”，只公布6000~7000亿斤。毛泽东亢奋

的心情溢于言表，这七八月他对来访的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毛泽东是想在这个六亿人口的大国，制造一个落后国家一夜之间走向富裕、变为强国的奇迹。这个奇迹，实际上是毛泽东心目中的“卫星”。他要让这个“卫星”在亚洲、在社会主义阵营腾空而起，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为了这个魂牵梦绕的“卫星”升空，曾一生同主观主义作斗争的毛泽东，这时却把人的意志看得高于一切，超乎一切。“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这种充满浪漫主义的诗句，不正是唯意志论心态的某种流露吗？

在这种心态下，竟放“卫星”一浪高一浪，早稻“卫星”升天后，中稻、晚稻“卫星”又相继升空。9月18日，广西环江县放出全国最大的“卫星”：该县红旗人民公社中稻亩产130434斤！实际上，在环江水稻“卫星”放出之后，一些地方还放出过比环江亩产量更高的“卫星”，除了小麦、水稻“卫星”以外，玉米、高粱、谷子、蕃薯、芝麻、南瓜、芋头、蚕豆、苹果等农作物和蔬菜、水果的“卫星”也相继放出来。

下面是1958年农作物产量“卫星”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表：

1. 水稻（南方早稻、中稻、晚稻、北方水稻）亩产3万斤以上纪录

稻别	创造单位	亩产 (斤)	材料来源
早稻	湖北麻城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	36956	8.13 人民日报
中稻	安徽繁昌县峨山乡东方红三社	43075	8.21 新华社
水稻	河南商城余集乡跃进人民公社四队	30009	8.30 河南日报
中稻	湖北应城白湖乡长春社	43869	8.30 人民日报
中稻	湖北谷城黄畈乡新农村一社	52658	9.1 湖北日报
中稻	湖北麻城熊家沟乡建新六社	52590	9.1 人民日报
中稻	广西环江红旗人民公社	50090	9.4 广西日报
中稻	广西环江川山区洛阳乡	37315	9.4 广西日报
中稻	广东通县旱子乡田北社	60437	9.5 人民日报
中稻	云南漾濞平坡乡平坡社	33492	9.6 云南日报
中稻	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县 卫星人民公社	60479	9.9 云南日报
水稻	河南信阳鸡公山乡人民公社	48925	9.9 河南日报
中稻	广西环江红旗人民公社	130434	9.18 人民日报
中稻	四川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	82525	9.18 人民日报
水稻	河南光山钢铁人民公社新民大队	31302	9.20 河南日报
水稻	河北定县超美人民公社西坡生产大队	30216	9.25 河北日报
水稻	河北定县超美人民公社西坡生产大队	34178	9.25 河北日报
晚稻	湖南浏阳县红专人民公社	66277	10.22 新湖南报

## 2. 小麦亩产 5000 斤以上高产纪录

创造单位	亩产 (斤)	材料来源
河北安国南娄底乡卓头村社	5103	6.30 人民日报
湖北谷城庙滩乡气象五社	5467	7.2 人民日报
河南西平城关镇和平农业社第四队	7320	7.12 人民日报
河南西平猛进农业社	7201	7.18 人民日报
河南邓县都司乡岁营农业社小流河生产队	6541	7.18 人民日报
河南西峡回车乡先锋社	6494	7.18 人民日报
青海都兰县德令哈农场第五作作业站	5548	9.14 青海日报
青海些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	8585	9.22 人民日报

## 3. 玉米等农产品高产纪录

作物名称	亩产量（斤）	创造单位	材料来源
玉米	35,393	湖南商丘王楼人民公社第八生产队	9.17 人民日报
高粱	22,720	河南沈丘第十二人民公社郭庄大队第六生产队	9.22 人民日报
大麦	5,702	山西介休联福农业社第六生产队	7.7 人民日报
攸麦	3,012	河北张北东方红人民公社中道大队一小队	9.12 河北日报
谷子	27,733	河南商丘宁集人民公社田集大队王桥小队	9.20 河南日报
青稞	5,195	青海都兰县德令哈农场	9.14 青海日报
马铃薯	106,378	甘肃康县窑坡乡和平农业社	8.26 人民日报
存收甘薯	23,000	广东海丰公平山区丰联社	7.20 人民日报
大豆	4,517	山东临沂诸河乡南光明一社	9.17 人民日报
花生	26,968	福建晋王金井整乡集力社塘边村欧自强生产队	9.22 人民日报
芝麻	7,239	河南西平盆窑乡东风人民公社第三队八队第六生产队	9.20 河南日报
存油菜籽	6,05	甘肃武山二店乡新光社	8.26 人民日报
大麻	2,016	安徽金谷开顺乡红星一社	8.26 人民日报
黄麻	12,207	江西赣县火箭人民社武陵一区	9.16 江西日报
苧麻	1,325.8	河北阳新红光一社	7.27 人民日报
胡麻	647	宁夏中卫市和乡宣和农业社第四生产队	8.12 人民日报
西红柿	45,660	焦作市郊区新店蔬菜社“七一”青年试验场	8.26 人民日报
茄子	52,500	山东黄县中村乡光明社	9.15 今日新闻
芋头	31,400	福建建瓯吉阳社老年队	9.15 今日新闻
20,140		北京昌平镇卫星农业社南关第二生产队	8.1 人民日报
葱头	18,430	北京丰台区东铁营农业社	8.1 人民日报
南瓜	202,735	河南息县包信乡张人庄农业社关生产队	8.9 人民日报
蚕豆	2,606	河北张北东方红人民公社战海大队第四分队	9.12 河北日报
冬瓜	75,953	福建建阳县副县长赵存旺和“卫星”一社青年试验队	9.15 今日新闻
葡萄	26,115	山西清徐红旗人民公社	9.23 山西报
梨	90,007	河北交河月村	9.15 河北日报号外
苹果	14,714	四川蓬溪县园艺场	8.23 人民日报
茶叶	1,635	福建崇安黄柏乡高峰农业社	9.17 人民日报

## “高产红旗”——麻城

1958年11月中央在武昌开会。会后我随李葆华、刘澜波等一行人受邀，到全国有名的“高产红旗”——湖北麻城县参观“卫星”田，《人民日报》社论祝贺的“早稻花生双星”中的“早稻之星”便是从这个县“升天”的。

“大跃进”中，如果要列一个发射“高产卫星”数量的排等行榜，湖北怕是要名列前几名的。最早的“卫星”，最大的“卫星”，小麦的“卫星”，水稻的“卫星”，差不多都是湖北放出来的，而麻城县又是湖北放“卫星”的一面“红旗”，不仅扬名湖北，而且全国有名。

麻城县位于湖北东北部，属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南麓，平原、丘陵、山区各占1/3其土壤、气候、地形条件，在农业生产方面都属中等。但自1957年年末以来，该县便成了农业生产的先进县，八届三中全会大批“反冒进”以后，该县就报出了皮棉“百斤县”的消息。1956年全县棉花平均亩产量60斤，1957年按播种面积算平均亩量103斤，按实收面积算平均亩产量107斤，比1956年增产70%。按“农业四十条”目标，该县皮棉亩产量当年便达到要求12年内达到的目标。除了棉花，1957年全县小麦37万亩，平均亩产202斤，全县粮食亩产801斤。全县棉麦亩产合计千斤的面积有3000亩。县委书记赵金尧还在《人民日报》介绍了自己种试验田的“经验”：找了一亩多“落后田”作试验，亩产籽棉600斤，比全县平均亩产量最高的纪录还高出30%



以上。

王任重对麻城经验十分欣赏，《麻城报》1957年12月27日刊载了他的文章《向麻城看齐——学习麻城县委的领导方法》，文中说：“麻城县今年取得了大丰收，成为皮棉百斤和水稻粮食亩800斤的县，提前十年实现了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麻城县粮食和棉花的产量，都是跳跃式地向前跨进了一大步。”王任重还对前来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称赞麻城和该省另一个县——红安县领导下部种试验田的领导方法，说：凡是采用了这种方法领导农业生产的地区，落后的很快变成了先进，工作被动的很快变成了主动，生产上立即得到显著成就。王任重还说：麻城红安生产条件都不太好，但是广大群众在干部的鼓舞和指导下，革命干劲空前高涨，因此，生产面貌焕然一新，农业生产得到了大跃进。

我们在麻城参观一个小铁炉之前，路过田间公路，见到已收割的田埂上，插有“王任重试验田”和省委其他负责人“试验田”的牌子。这当是1958年春的事情。

1957年底，麻城县向全省兄弟县发出挑战：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为了在争取大跃进的斗争中，能够互相推动，希望和全省各县开展社会主义竞赛。粮食：1958年全县总产量比1957年提高27.5%，达到每亩平均产量950斤，争取1000斤，并创造小麦千斤亩一万亩。棉花：每亩平均产量保证130斤皮棉，比1957年提高26%，争取达到150斤皮棉，并培育1万亩平均产籽棉1000斤的丰产田。

1958年1月4日，王任重到麻城检查工作，对麻城给予鼓励。2月17日，麻城县委发出春节祝词：“跃进再跃进，

千千万万翻一番” 4月11日，李先念视察麻城，对麻城的“竞赛”给予肯定，他说：革命就凭着一股热情，一股干劲！有了热情、干劲，就没有任何克服不了的困难。他还说：干什么事都要坚持斗争，保守思想总会有的，看嘛，比嘛，保守思想就在先进事物面前甘拜下风了。

尽管如此，1958年上半年，麻城的粮食“卫星”在湖北全省还不是靠前的。湖北的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了该省各地放“卫星”的消息，令人眼花缭乱，

6月11日，《湖北日报》一版发表消息说：“光化县崔营乡幸福社第二生产队有29亩小麦，经过详细验收（验收时间为6月8日），每亩产量达2173斤7两，其中有11亩达到亩产3215斤，创小麦单位面积产量的世界纪录，参加这次验收的，除襄阳地委，兴化县委专门组织的验收工作组外，还有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湖北省农业部门的技术干部和不少的新闻记者，他们除了亲自参加打麦、过称外，还对这块地进行了测量，查实了面积”报纸还配发了图片：光化县崔营乡幸福社小麦高产的喜讯传到了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书记处书记张平化、张体学在观看送来的“三千斤”小麦样口。报纸发表了王任重6月9日写的诗《新纪录——献给光化县崔营乡幸福社》：

幸福社，真幸福，/创造世界新纪录。/小麦亩产三千二百一十五。

幸福社，真光荣，/光荣榜上点头名 /今冬明春再加劲，/争取亩产四千斤。

同日，还发表了一篇社论：《三千二百一十五》，称：“这是破天荒的大喜事。”“这是农业生产战线的大胜利。”这

是小麦生产上的一面大红旗。”

社论称赞“三千二百一十五”的出现，鼓励我们继续努力创造世界的奇迹。“三千二百一十五”的出现，鼓励我们继续努力做出前人不曾想象的事情。

同时还发表了署名“龚同文”的文章《有意思的对比》，其中讲到：“有一些自命为比农民高明的人物，比方像某些资产阶级‘专家’吧，他们自以为比农民懂得多，常看不起农民……可是一碰到实际问题，和农民比较起来，他们显得非常之不高明。就以这个‘三千二百一十五’为例吧，某些资产阶级‘专家’听说出了‘三千二百一十五’这件事，不仅表示冷淡，而且硬说这是不可能的。当然要问他们的理由，不外是什么‘世界从来没有这样的纪录’呀，‘书本上也找不出理论根据’呀，等等”（龚同文是湖北省委机关由王任重任组长的写作小组的笔名）。

7月2日，《湖北日报》发表新华社6月30日电讯：《全国小麦高产纪录》。消息称“我国小麦的主要产地河南、安徽、江苏等省，最近不断传出振奋人心的高额丰产纪录。到目前为止，据不完全统计，亩产3000斤以上的，就是20多个单位”。湖北光化县催营幸福社当然榜上有名。

7月8日，《湖北日报》消息：《根本改变农村面貌的伟大开端——我省夏季作物空前大获丰收，夏粮总产71.9亿斤，比上年增产32.8亿斤》，其中列举了全省夏收作物小麦、大麦、蚕豆、豌豆、洋芋、油菜的最高丰产纪录者，豌豆的纪录是麻城县柳林乡丰产六社创造的，1.2亩新加坡单产854斤。

大概是受到其他地方“卫星”的刺激，麻城县终于放出

了早稻“高产卫星”。《湖北日报》在“丰收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的眉题下，发表“湖北水稻高产卫星叠出”的消息。其中说：麻城县黄市乡前进五社 1.337 亩早稻亩产 5880 斤，木子店乡光明一社 1.1 亩早稻亩产 4815.5 斤，浠水县福主乡长远农业社 0.919 亩早稻亩产 4228 斤，孝感县六合乡五四农业社 1 亩田产 3567 斤，应城县盛淮一社 1.25 亩田亩产 31248。这组高产卫星中，麻城县成了第一名。

然而，“你方唱罢我登台”，麻城的“第一名”没当几天，又被别人突破纪录。7月29日，应城县白湖乡春光农业社第12生产队队长甘银发等人，共同培养的 1.613 亩早稻试验田，总产干谷 17093 斤，平均单产 10597 斤。麻城县梁家畈乡燎原四社 0.994 亩早稻试验田共收干谷 10176 斤。

7月31日，《湖北日报》发表社论《祝贺早稻万斤高产》，说：今年复收以后，水稻赶小麦、“高产”赶“低产”的浪潮，就汹涌澎湃地开展起来了。敢想、敢做的革新家们，英勇果敢，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以似乎寻常的措施和行动，踏踏实实、满怀信心地朝着既定目标驰去，但是，在前进道路上，总还有少数左顾右盼、前怕狼、后怕虎的“小脚女人”，他们对别人这种大胆的尝试，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他们对这种群众性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浪潮，抱着一种“观潮派”的态度。革命家们的论点是“思想解放无底，土地潜力无穷”。“小脚女人”们的论点却是“山穷水尽增产到顶”了。这两种论点，究竟孰是孰非呢？如果说本报前两天发表的早稻的高产丰产纪录（5467 斤），仍没有达到亩产万斤的话，那末，今天应该说是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吧！……这样说来，增产到顶论者，该闭嘴了吧！？社论发出号

召：要及时总结早稻丰产经验，把早稻的丰产经验，运用到晚稻生产上去。争取在晚稻的产量上，放出更大的“卫星”。

也就在7月31日这一天，又出了“早稻高产原子爆炸”的消息：孝感县朋兴乡长风农业社水稻一季超万斤，力争晚稻亩产3万斤。该社主作官木生和全体社员写信向湖北省委报喜，王任重当即复信，代表省委向全体社员祝贺。这两封信文字不长，照录如下：

官木生和全体社员致王任重的信

敬爱的王任重书记转省委全体同志：

我们的早稻丰收了，水稻亩产万斤的愿望实现了！特向您和省委的全体同志报喜。

我们全社共1050亩早稻，现在已经收割完毕，经过验收，平均亩产2810斤；我和社里党支部书记涂用清、团分支部书记官春管及青年突击队员，共同培育的1.21亩早稻万斤试验田，经过地县乡验收工作组验收结果，实产干谷18587.5斤，平均亩产15361.9斤。

我们能创造水稻万斤新纪录，是总路线光辉的胜利，是省委直接领导的结果。特别是王任重书记在6月份到我社参观早稻万斤试验后，对我们鼓舞很大。我们时刻记得王任重书记嘱咐的话，要力争亩产水稻万斤。从那时起，我们照着这个指示做了，日夜坚持向水稻亩产万斤进军。

我们知道：实现早稻亩产万斤，这仅仅是高产的开始，大面积还没有达到这个产量。因此，我们向省委保证：不骄傲，不自满，继续努力，战胜一切灾害，保证晚秋更大丰收，实现全社150亩水稻万斤的规划，创造晚稻亩产3万斤纪录，力争今年或明年实现水稻万斤社。

最后，请省委多多指示。

**孝感朋兴乡长风农业社主任官木生和全体社员**

**7月31日**

王任重的复信

官木生同志请转长风社全体社员同志：

看到你们的喜报，省委的同志都十分高兴，我们特向您和长风社的全体社员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

你们创造的 1050 亩早稻平均亩产 2810 斤的大面积高额丰产，和 1.21 亩试验田平均亩产 15361.9 斤的新纪录，是您和全体社员同志大胆创造、敢想、敢作、艰苦奋斗的结果，是农业生产上的一个重大胜利，是一颗新的大卫星，它对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现农业生产上更大的跃进，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

希望你们鼓足干劲，再接再厉，乘胜前进，争取中稻、晚稻的更大丰收，我们相信，在一两年内你们一定能够实现你们万斤社的雄伟规划。

王任重 7月31日

以上这两封信公开发表在 8 月 1 日的《湖北日报》头版，还配发了 3 幅漫画：《敢想》、《敢说》、《敢做》，对全省各地农村放“卫星”又是一个很大的刺激。麻城再次在全省放出大的“卫星”。

8 月 13 日，新华社、《人民日报》、《湖北日报》、《麻城

日报》发表了同一条消息：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主任王乾成，副主任冯福柄、社委王茂刚、第二生产队长罗学江等培育的 1.016 亩籼稻（江西早）试验田，共收干谷 37547.12 斤，平均亩产 36956.7 斤。《麻城报》称，这是创造了世界上水稻最高纪录。“这块田的稻谷厚到这样的程度：把鸡蛋放在稻禾上面滚动，它始终不会掉到田里去，小孩也能站立在稻禾上面”。全国一些农业专家纷纷赶来参观、学习，计有：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江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湖南农业科学研究所、湖南农学院农业系、华中农学院等单位的专家、教授。他们说，建国一社创造亩产 36956 斤的高产，是世界上没有的，书本上没有的。这是一个特大的卫星，“它标志着我国农业生产已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还说，“这块田的培育者都是土专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农民是有无穷智慧，是有巨大的创造性的。”“对照起来，我们有的科学研究人员就缺少这些。”建国一社创造的高产纪录，是我们全国的光荣，它对世界农业科学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一块高产田，引来 10 万多人参观，许多参观者说，看了这块田真正解放了思想，想不到田里的稻谷有这么厚，武汉电影制片厂还为这块高产拍了影片。

8 月 14 日下午，王任重率湖北省委、武汉市委负责人到麻溪河乡建国一社，向亩产 36856 斤的高产创造者贺喜，并发了写有“高举红旗，争取更大面积平衡增产”的奖旗。据 8 月 15 日《麻城报》报道，王任重仔细看了谷刁和稻兜以后说：多厚的谷子，连手也插不进，谁不相信高产就让他亲眼来看看，他还说：一亩田今年能产 3 万多斤，明年能不

能高产 5 万斤、大面积单产 1 万斤呢？王任重离开这里以后，社里决定：明年要大面积创造水稻 8000——10000 斤，高产试验田亩产 5 万斤。

8 月 5 日，《湖北日报》发表龚同文的文章《“卫星”的重量》，文中写道：“苏联的三颗人造卫星飞上天，是人类的大喜事。”“在我国，目前还没有发射出人造卫星，但是，我们发射了像人造卫星那样的创造世界奇迹的许多卫星”。“就说 1958 年的农业生产吧，我国已经出现的小麦和早稻的年产新纪录达到惊人的高度。这种惊人的高度，曾经使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及其应声虫感到惊慌，而是为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大跃进而惊慌。让它们惊慌吧，让它们因为惊慌而对我们进行诽谤吧，我们的小麦和早稻和其他农作物的单产新纪录绝不会因为敌人的惊慌和诽谤而减少一两一钱，恰恰相反，它们的单产纪录将会更高，会高到什么程度呢？这也是帝国主义者及其应声虫所不敢想象的。”

“唐宋元明清，水稻亩产三百斤，谁听说过 36956 斤？以 3000 斤作基础算帐，那就是说，把过去一亩田种 123 年的总收入，加起来也赶不上社会主义时代种植一季的收入。麻城建国一社亩产 36956 斤稻谷，是怎样来的呢？”这是 8 月 15 日《麻城报》通讯《高举红旗争取更大的平衡增产》（湖北日报记者：湖泊）的第一段话，然后，分题作了回答。

“要不要办高产？办高产的意义在哪里？5 月份，建国一社社主任王全成，从县里开高产会议回来（按：高产指标是县里的要求、上级的要求），召开主任会议商议办高产田事情。一听说要试验亩产 1 万斤、2 万斤、3 万斤，很多人都呆了。干部办高产，第一次会议——社主任会上，没有结



果，第二次会议——管委扩大会上到 37 人（按：搞群众辩论），王全成说，我们的社大，有 18 个院子，千多户，4700 多人，男女劳动力有两千多，土质好，油沙土，水源也比较好。”

“社委黄德忠说：办高产做什么事，只要把大面积的稻谷搞好就行了，几乎有一半人附和他的意见。”

“社委林道黄是主张办的，他说社里有条件，办它一个二万、三万斤的！接养很多人也同意他的意见。”

“王全成说，上甘岭就能打大胜仗，农业生产就不能打大胜仗？”“辩论了一通，37 人同意，6 个人半通，有 4 个人（社委）仍不通，最后来了一民主集中，把办高产在管委扩大会上通过了。”

用什么办法才能达到高产指标呢？他们从小麦高产里面得到启发。在报纸上他们看到，凡是高产小麦，其中一条经验就是密植。假如不留空，把插人多亩田的秧搬到一亩田里，插“挨挨”寸，可以收 4 万斤（就是把长好的水稻移植到一块地里。）”湖北省委写作小组又以“龚同文”为笔名写了一篇文章《再论“卫星”的重量——祝贺麻城县建国一社 1.016 亩早稻亩产 36956 斤的伟大胜利》，文章说，亩产早稻 36956 斤，就是比去年平均亩产 570 增加了 64 倍多。文章还宣称：“这些人：共产党员王全成和他的 16 个战友以及许多社员，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这样的奇迹，这是因为他们按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办事，这个奇迹的出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

正当麻城庆祝建国一社的早稻“卫星”飞上天的时候，天不作美，来了一场大暴雨，接连五十多个钟头，下了 330

多公厘，山洪滚滚，县委提出战斗口号：“大灾保规划，小灾超规划，无灾翻规划”；“水涨一寸，堤高一尺”，“人在堤上，人亡堤倒”，一百多人，像打仗一样，各人守住一块地方，把试验田团团围住，面对着风的人，把竹竿横挡着；背对着风的人，把竹竿倒钩着，使稻禾没有倒伏。

麻城建国一社的这颗“卫星”，一段时间里发挥着“示范”的作用。8月28日，《麻城报》报道：该县山区熊家沟乡建新六社1.017亩胜利籼中稻共产干谷53493.11斤，平均亩产52599.8斤（按：这比建国一社的“卫星”高出15643斤。）该报于9月2日发表文章称：这是山区高产的红旗。9月17日，又报道：白果人民公社中稻亩产突破了十万斤大关，同时发表社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0月1日还报道：《龟山公社传捷报，芝麻坐天大卫星——1.182亩亩产1182斤》。麻城县粮食“高产卫星”几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

8月25日至27日，王任重到麻城视察。他说：麻城县的红旗在今年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不但没有倒下去，而且举得更高了。

8月27日晚，在县劳模、先进工作者代表会和扩干会上，县委书记吴德简作了《全党全民总动员为实现1959年全面更大跃进的规划而奋斗》的报告。他说：今年我们县是大跃进了，但是麻城目前面临大的形势是一个伟大公社化运动后全面跃进的新形势。所谓全面跃进，就不是单一的农业生产，而是在工农并举方针的指引下，粮食、钢铁、机械三大元帅要升帐，电力、交通运输两大先行官要并驾齐驱。明年是毛主席号召的“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决

战的一年，全国各地都在争取更大的跃进。以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为首的省委负责同志，要亲自到我县来办高产卫星县。因此，我们一定不辜负省委的殷切期望，鼓起更大干劲，在全国更大跃进的队伍中走在前面，实现卫星县。

11月3日，《麻城县》以通栏标题登出：思想插红旗，跃进再跃进，战胜大灾害，丰收再丰收。宣布全县农业生产获得全面丰收。粮食总产101354万斤，比去年增长88.1%；棉花亩产1023斤，比去年增产259.2%；花生亩产1000斤，比去年增长233.3%。县委书记吴德简著文，用诗一样的语言赞美“大灾大丰收”：高山把头低，人定胜过天。

麻城的“卫星”实际上是伪造的，无非是将多少亩田里的已成熟的稻子集中移栽到一块田里，造成了虚伪的“高产”景象。这是当年全国各地凡放“卫星”的地方普遍造假的办法，也不是没有人识破，不过声音太小，大家听不到。如四川省委书记闫红彦在1958年8月就识破了这种现象，并且对人说过。我们一行人到麻城参观时，正值秋收过后，地光田净，晚秋的凉风中只有稀落零星几棵枯草和尚未割净的稻草有气无力地摇曳，看不到报上吹嘘的“五谷丰登”的场面，倒有几分萧条残破的感觉。当然，即便看到了“丰收”的场景，谁心里不明白那不过是假象呢？说实在话，当年我对这些“高产卫星”本来就不感兴趣，参观实在是应付，走过场。

对胡北这样一个接一个的卫星，王任重是深信不疑的，而且宣称全省已经达到和将要达到的平均高产。1958年10月初，他在湖北全省文教、卫生、生活福利现场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今年我们湖北省粮食每人平均可以达到1500斤，

甚至更多；省委安排明年的粮食生产，每人平均 3000 斤。生产这些东西作什么？出口吗？给谁？谁也买不起。这些东西卖不出去，要吃要用，谁吃谁用？我这次到宜昌，听他们说，他们种 20 万亩甜萝卜，可制糖 1 亿 5 千万斤，全省每人平均有 5 斤，恩施比宜昌还多。

进入 1959 年，浮夸风带来的恶果已经显露出来。在这种形势下，麻城乃至整个湖北省的农业“高产卫星”仍在发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开始后，在经济上掀起“持续跃进”、“更大跃进”的高潮。秋后，湖北实际粮食产量为 153 亿斤（后来的正式统计数），比 1957 年低 44 亿斤，仍高喊“大灾大丰收”（当年偏旱），一些地方仍坚持高估产、高征购、开展“反瞒产”斗争，在农村出现严重缺粮，甚至断粮、疾病、死亡等情况。1949—1958 年，湖北全省总人口平均每年增加 62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平均每年增加 44 万；1959 年全省总人口增加 26 万人，而农业人口减少 17 万人；1960 年全省总人口比 1959 年减少 21 万人，农业人口减少 43 万人。一方面粮食“高产卫星”大放；另一方面，农民缺粮吃，农业人口实际上在减少，这就是历史的事实。

## 天灾，还是人祸？

“大跃进”中曾有两句家喻户晓的民谣：“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大大小小的“高产卫星”的升空，使多少百姓相信：中国离那个色彩斑斓的“天堂”已经不远了。对共产主义的理论，一般百姓说不出子丑寅卯，也不懂

经典作家构筑的那些思维体系，他们对“共产主义”有具体得不能再具体的简单理解。山东范县 1958 年提出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设想到 1960 年就实行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用一首民歌描绘了那时的情景：“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不用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这首民歌八句话，其实只讲了四个字：丰衣足食，这就是老百姓对共产主义的想象。理论家们可以指责这种理解如何粗浅，如何庸俗，但无法否认丰衣足食是共产主义最起码的条件吧。

然而，老百姓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非但没有进入那个想象中的“天堂”，却反倒陷入了从来没有想到的人饥荒！

从 1959 年开始，中国大陆连续三年发生严重的经济困难。城乡人民的年平均粮食消费量，由 1957 年的 406 斤降为 1960 年的 327 斤，减少了 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下降了 23.4%；植物油年平均消费量，由 1957 年的 4.8 斤降为 1960 年的 3.7 斤，下降了 23%，其中城市人均消费量下降了 31%；猪肉年平均消费量，由 1957 年的 10.2 斤降为 1960 年 3.1 斤，下降了 70%，其中城市人均消费量下降了 78%。

数字是枯燥的，但这数字中反映的那段历史却令人痛心不已。我在“公共食堂”一节中叙述过人们饥饿的场景，那是我在北大荒亲历的事情，至今回想起来仍不寒而栗。那是整个中国大陆当时的一个缩影。

饥饿首先带来的是体力下降、营养不良和疾病滋生。据卫生部 1959 年春天的一份报告说：入春以来，肿病又有上

升趋势，涉及面也较广。从今年1月到日前，在山东、河南、江苏等11个省、自治区共发生肿病105.5万余人。死亡6700余人，其中以山东省最为严重，1月至4月14日发生肿病病人77.9万余人，死亡681人，仅4月1日至10月一旬即发生肿病病人17.3万余人。其次是河南省，从1月到4月20日发生肿病15.3万人，死亡2000余人。关于肿病发生的原因，报告综合各地区报的情况指出：第一，口粮较紧。也有个别地群众误以为吃盐可以增加力气，每天吃盐一两以上（正常日需三钱），因吃盐过多，引起代谢障碍发生浮肿，也有吃野菜而引起的过敏反应。第二，食品种类单调，长时间未能调节，脂肪、蛋白质严重缺乏或不平衡。第三，去年患过肿病，未根治，今年复发（河南省较多）。第四，原患有慢性病（如钩虫病等）、贫血、身体虚弱、年龄大、胃肠不好。卫生部的报告远远不是完全统计，而且仅仅是1959年春的情况，但是，从报告的内容已经看出当时的缺粮及饥饿的状况。“大丰收”的1958年刚过，各地就发生严重的饥饿情况，人们不得已用多食盐、挖野菜的办法来抵御饥饿。但这些反而招致浮肿病，饥饿加疾病又导致人口的大量死亡。

最令人心颤的就是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关于“大跃进”年份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至今没有一个正式的数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一千万，”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等《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说：“据估计，这几年增加的超过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数为1600万至2700万。”丛进著《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说：“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

抵后 2%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 年总人口应比 1959 年增加 2700 万人，两者相加，1959 年至 1961 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 4000 万人左右。金辉著《“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见《风云庐山》，团结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64 页。）一文中说：“全国在 1960—1961 年的两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 4319 万。”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的计算，是 2158 万人，（见《中共党史研究》1997 年第 2 期李成瑞文《“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种种推算和估计，没有定论，关于这个数字的考证可能还要继续到下个世纪。但在那三年中，以千万计的生命由于饥饿而在中国大陆消失，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这是本世纪中国历史上的最大悲剧，也是人类历史承刊年代的空前悲剧。

一方而是“高产卫星”的上天，另一方而是连续三年的大饥荒，这期间的反差太大了！当年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正式的解释都是“三年自然灾害”导致了严重经济困难。直到今天还有人用这个说法解释那段历史。

有人对那三年的气候作了详细考证，列出了一个前后 18 年间全国旱涝等级资料表：

年份	-2 度区 (涝)	-1 度区 (偏涝)	0 度区 (正常)	1 度区 (偏旱)	2 度区 (旱)	120 个站 总指数	全国平均 指数
1954	41	29	26	16	8	-79	-0.658
1957	15	17	35	34	19	+25	+0.208
1958	20	37	35	30	8	-21	-0.175
1959	13	34	35	25	13	-9	-0.075
1960	14	21	33	44	9	+11	+0.092
1961	12	36	28	29	15	-1	-0.008
1965	6	9	30	34	41	+95	+0.792
1972	5	12	26	35	42	+97	+0.968

研究者得出结论：不论从总指数，平均指数看，还是从2度区和1度区所占的比例看，1959—1961年都可以基本上说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年（总指数+25，平均指数+0.208）和1958年（总指数-21，平均指数-0.57）更为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指标0。（以上资料见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368页。）

至少可以说，导致悲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这一点，其实不用太细致的研究便可以知道。湖南农民当年就对下乡调查的刘少奇说过，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肯定了农民的说法。1961年5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1962年1月，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再次肯定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

尽管刘少奇的说法是有所保留的，并没有明确否定“三面红旗”，但他后来还是为这句话（当然不止这一句话）付出了从政治舞台上被打倒的代价。所谓人祸，就是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整套“左”倾指导思想及其一系列具体方针政策。这其中以浮夸、虚假为主要特征的“高产卫星”是一大“祸”。1956的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将1962年粮食产量定为5000亿斤，棉花产量定为4800万担。“高产卫星”开始之后，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二五”计划第二本账，就将1962年粮棉产量指标



分别提高到 6000—7000 亿斤和 6500—7500 万担，8 月的北戴河会议两次提高这两个指标，分别为 15000 亿斤和 15000 万担，比第一本账高出两倍和两倍多。竞放“高产卫星”导致对 1958 年粮食产量一次更高的估计。8 月份北戴河会议公报宣布：1958 年粮食产量将达到 6000—7000 亿斤，棉花产量将达到 7000 万担。10 月份，谭震林在西安召开的九省市农业协作会议上说，1958 年全国粮食产量 8000 亿斤是肯定的，1 亿亿斤是可能的。12 月份召开八届六中全会作了些纠“左”的努力，认为西安会议的估计有水份，在全会公报中打了折扣，宣布 1958 年粮食产量将达到 7500 亿斤左右。

实际上，后来经过落实的 1958 年粮食产量 4000 亿斤，比 1957 年的 3900 亿斤只增产了 100 亿斤。但是当年粮食的征购任务和人民生活，却是按照 7500 亿斤的虚假产量数字来安排的。1959 年起，粮食实际产量连年下降，但仍按虚假产量数征购粮食和安排人民生活。一方面 是粮食产量的低幅增长（1958 年）和连年下跌（1959 年以后），另一方面则是高征购，高销售。1957 年产粮 3900 亿斤，征购 961 亿斤，占产量的 24.6%，属于比较正常的比例。1958 年实际产粮 4000 亿斤，征购 1095 亿斤，占产量的 27.3%，这已经征多了。1959 年实际产粮 3400 亿斤，征购 1348 亿斤，占产量的 39.6%，1960 年实际产量 2870 亿斤，征购 1024 亿斤，占产量的 35.7%。实际产量下降，征购却反而提高，一少一多，使农村留粮减少，由 1957 年的 2940 亿斤，减少到 1959 年的 2052 亿斤和 1960 年的 1846 亿斤；按人口平均的农村粮食消费量，由 1957 年的 409 斤降到 1959 年的 366 斤再降到 1960 年的 264 斤。也就是说，到 1960 年，中国农村人均每天消

费粮食才七两多。同一时期，蔬菜和肉类的生产也受到巨大破坏，人均供应量也大幅度减少。使人们的饥饿和营养不足更加严重。

这是放“高产卫星”形成的可怕链条：从定高产指标到发射“高产卫星”，搞浮夸，再到高征购、高销售，再到农民粮食被挤占，农民吃饭“瓜菜代”，到逃荒要饭，高发病率，直至饿死人，造成灾难！

安徽风阳的情况，可以作为“人祸”乃引发灾难主要原因的一个例证。

风阳在历史上曾经颇有名气，14世纪这里出过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但朱元璋并没有给百姓带来好日子，流传很广的风阳花鼓这样唱道：

说风阳，道风阳，风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建国以后，风阳人民要还这块好地方的本来面貌，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过上富裕生活。然而，三年“大跃进”带来的灾难，迫使他们再次背起花鼓，流落他乡。1964年下放安徽霍山县磨子潭水电站时，我曾听说过风阳大量饿死人的种种事情。这里只摘录一些县委正式总结过的成文材料。

“大跃进”开始时，风阳也是充满热情和希望的。1958年6月14日，县委副书记张秉尧在全县有线广播人会上提出：“我们要求夏季作物样样丰产，要培育亩产5000斤到10000斤到20000斤的水稻，亩产10000—20000斤再到200000斤的山芋，亩产3000斤的烤烟，亩产2000斤的玉

米，亩产 1000 斤的大豆，亩产双千斤的黄豆，亩产千斤以上的皮棉，为实现 1958 年全面大丰收的光荣任务而努力奋斗。”9 月 16 日，安徽省农业厅陈振亚在烤烟观摩会上的总结讲话中说：“凤阳太阳升社主任张士俊真是胆有天大，竟然以自己计划亩产 7 万多斤的卫星烟田，大胆地提出与定远县八一社计划亩产 130 万斤的卫星烟田比高低。”可见，凤阳也争相放过“卫星”。但是，没过多久，灾难便同样降临到这块土地。这里列举凤阳由于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而导致的饿、病、荒、逃、死的一些材料。以下这些材料都是当年县委总结的。

—1958 年和 1959 年两年，我们都卖了过头粮。1959 年卖得最多。因此直接影响了群众生活，造成了人口非正常死亡。以高指标情况来说，1957 年生产计划订到 2 亿多斤是比较落实的，但是县委却订了 8 亿斤的指标。1958 年的指标没有实现，而 1959 年的指标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又订了一个 12 亿斤的指标，超过 1958 年实收产量 18266 万斤的 6 倍，这就严重脱离了实际。再以高估产来说，两年来，实际收成情况是年年减产，却把减产说成了增产。1958 年实收产量比 1957 年减少 1360 万斤，却虚估为 40500 万斤，超过实产 3.6 倍。高指标、高估产的结果，就产生了高征购，购了过头粮。1958 年实收粮食 18266 万斤，除了三留外，只剩 1180 万斤；而我们却征购了 7102 万斤，特别是 1959 年，总产只有 10960 万斤，按当时标准，仅够全县口粮，而我们却购了 5974 万斤，结果就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生活安排。这一年从秋收结束到 12 月底的两个月中，农村中没有供应口粮。我们认为，人口发生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就在

这里，如果我们不卖过头粮，把群众生活安排好，就不会发生人口非正常死亡，这是一个血的教训。（见《凤阳县的两年来的经验教训——马维民同志在县委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61年8月24日）

一面积报大了，产量估高了，不仅不向上承认错误，进行纠正，相反，用层层下压的办法硬购过头粮。1959年冬到1960年春，全县正当缺粮、疫病、外流、死亡严重的时候，还错误地认为没有粮食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于是就规定各公社每天的粮食入库数字，一天要下面三报：上午报打算，中午报行动，夜里报实际。不问实际情况，不分青红皂白，多卖的表扬，少卖的批评，不卖的指责。逼得卖了种子，卖了口粮。搞不到粮食就认为是资本主义思想作怪，进而召开全县生产队队长以上干部大会，进行反满产斗争，乱斗硬逼，提出要斗得狠，不狠就是“右倾”。由于声势大、压力重，会议期间，小溪河公社就边斗边打基层干部。县里的会开完以后公社开、大队开、小队开，年三十晚上也要开，一直开了40多天。并且规定，公社散会要经县委批准。散会后，把所说“惜售余粮”的干部留下来反省斗争，干部被斗得无法，造成全县到处翻箱倒柜，搜查粮食的局面。（陈振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1961年2月1日）

—1958年受灾后，缺粮断炊现象日益增多。析桥乡淮东社元月份调查，全社240户，1172人，缺粮断炊的有184户，892人。打溪河乡断炊得更多，并有吃青苗现象发生。长淮乡津淮社40余户流入蚌埠，大庙乡云营光实有200人到定远县讨饭。（《关于生救、副业多种经济、大办工业方面的文件》，1959年初）

1959至1960年，凤阳县农村人口外流达11196人，占农村总人口335698人的3.3%。发病人口达102994人，占农村人口的37.7%，其中：浮肿病27735人，妇女子宫下垂6932人，闭经8237人，最严重的小溪河公社，原有52233人，发病的就有26018人，占49.8%。门台子电港口灌站有一个60名妇女的民工队，闭经的就有58人，此外，全县还有营养不良，身体瘦弱的17482人，他们目前大部已失去劳动能力。（陈振亚：《关于凤阳县问题的报告》，1961年2月1日）

全县人口死亡现象更是惊人。据统计，1959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其中死人严重的武店公社，原有53759人，死去14285人，占26.6%，小溪河公社死去14072人，占26.9%。宋集公社原有4743人，死去1139人，占24.2%。武店公社半井大队原有4100人，死去1627人，占39.7%。打庙公社夏黄庄原有70人死掉48人，占68.6%。全县死绝的有8404户，占总户数的3.4%。死、跑而空的村庄27个。小溪河公社曾有21个村庄无人而空了。武店公社凤淮大队李嘴庄20户，死绝4户。县实验小学校长王焕业家中12中人全部死光，曹店公社和平大队北山下小队社员曹乐家34口人，死去30人。小溪河公社长塘大队赵庄子张玉璞的父亲，死后两天还抱着未死的女儿。有的人家两口子一夜同时死在一张床上，有的地方人死了没有抬埋。由于人口大量死亡，出现很多独苦的老人和孤儿。据初步统计，全县现有孤老1580人，孤儿2289人。（陈振亚：《关于凤阳县问题的报告》，1961年2月1日）

作家王立新80年代曾赴凤阳采访过，他在报告文学中

写道：“梨园乡小岗生产队严俊冒告诉我：1960年，我们村附近有个死人塘，浮埋着许多饿死的人。为什么浮埋？饿得没力气呀，扔几锹土了事。说起来，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冤魂。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的位亲戚见有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腿肚子吃，她也去了。开始有点怕，后来惯了，顶黑去顶黑回。我问她：‘怎么能……？’她叹息道：‘饿极了。’”

物极必反 后来农村改革——承包责任制从风阳发端，这同三年“大跃进”给这里的农民造在成的痛苦无疑有一种历史的因果关系。

## 北戴河滩上浪尖

7月23日，我接到中央通知，定于8月13日在北戴河开会，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参加，要求8月13日报到。过了几天，8月1日，又接通知，为了给各大协作区留出时间再开一次会议，北戴河会议推迟三天举行，改在8月16日始，8月15日报到。

我给毛泽东写的第一封信委婉地反映了华东1959年产钢600万吨的计划对机械工业造成的严重困难，以及电力难以相应保证计划的完成。其时，毛正在“大跃进”的兴头之上，根本听不进去，未予理采。我对北戴河会议抱一种观望的心态，而且竟有些“闲情”盛夏酷热，难得到海边避暑，我也是第一次到北戴河。于是，让人将两个孩子也带来住了几天。

### 会议讨论的问题

去北戴河之前，中央的通知就附了17个要讨论的问题：

1、明年、五年经济计划问题；2、今年铁、钢、铜、铝问题；3、明年农业问题；4、明年水利问题；5、合作化问题；6、今年商业收购和分配问题（包括今年粮食处理）；7、教育问题；8、干部参加劳动问题；9、劳动制度问题；10、570万人去边疆问题；11 技术保密问题；12、国际形势问题；13、今冬明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14、协作问题；15、深耕问题；16、肥料问题；17 民兵问题。

在这 17 个问题中，中心的问题是当年的钢铁生产和建立人民公社（即第 5 个“合作化问题”）。

八大二次会议开过之后，“大跃进”运动进一步升级，高指标风和浮夸弥漫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修改的提高指标成了一种“竞赛”，刚刚确定的指标很快就被更高的指标突破。而钢产量翻一番的计划指标，成了这场指标“竞赛”的龙头。5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计划提出，1958年产钢800万吨；5月下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提高到800—850万吨；6月中旬计委又涨到850—900万吨，同时毛泽东提出翻一番的设想，要把指标提高到1100万吨。不到一个月，钢指标涨了3次。

与高指标相伴生的，是竞放高产“卫星”的浮夸风，粮食高产“卫星”的竞放，尤其喧嚣一时。北戴河会议前，早稻田产放的最大“卫星”，是湖北麻城县麻溪河乡的所谓“天下第一田”亩产36956斤；花生亩产的最大“卫星”，是福建南安县胜利乡，亩产10000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是祝贺“双星”的腾空，竟使毛泽东发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疑问，还要人们“一天吃五顿”。8月12日，毛视察天津时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件东西就什么事



情都好办了。”这时在他看来，粮食的事情已经办好了，不是生产而是如何消费的问题了；不是要扩大耕地，而是要少种一些地了。

但是钢铁的事情还没有办好，截止6月底，全国钢产量完成312万吨，仅为年计划的27%。7月份，冶金部直属的大企业仅完成钢产量月计划的86%；11个省市没有完成月计划，而到年底只有4个多月了。毛泽东为粮食问题兴奋不已，对钢铁问题则忧心忡忡。钢翻一番是他的主张，话已说出去了，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只有背水一战，拧紧钢铁生产的“发条”，下死命令：钢产量一吨也不能少，必须确保翻一番。

我是16日到北戴河的，当天下午和晚上开预备会议，李富春谈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北戴河会议我的情绪不高，但记录还是做了的，有的还记得比较详细。

一、这次会议的主题是1959年计划和“二五”计划。先讨论1959年和“二五”计划的指标，再作决议。会议分10个小组谈。

二、投资方案问题。对目前这个方案主要有意见的是华东，华东根本不同意（中央对华东的方案是：财政收入为194.66亿元，投资数83.1亿元）。他们提出的投资数为92亿元（不包括铁道、交通、邮电），财政不能上，投资下不来。财政不上，基建能不能降下来？

三个方案：第一，都降下来。第二，钢2700万吨及直接有关的指标不降，其他指标作压缩。第三，根据财政收入700亿元，基建投资480亿元的计划，再超过一点（财政收入可增加一点预算收入。农业积累、农村生产资料有问题）。

倾向于第三方案。大区表示还可以增加财政收入。

工业与农业，大、中、小项目，中央与地方，沿海与内地，四个并举的问题，从全国看是贯彻了（1）现在农业过关了。但工业跟不上，工业赶不上农业，为农业服务不够。（2）项目确保的多，机动的少。中小项目靠自筹。大、中、小，在项目表上来说明，轻、重亦如此打算（3）中央管的企业少了，90%的企业属地方。中央与地方实质已变了，中央管的企业很少。（4）沿海与内地注意到了并举。从局部看，华东这点体现不够，有缺点。

三、重点和一般，后者比例小。都摆上重点，不仅没有机动了，而且保证“元帅”还不够。现在的计划，收入打高了，要把投资限死，两头卡死 20%左右的机动，在项目中未能表现出来。有些重点项目交地方。项目要再审查，看站得住不？小平提出，把若干重点项目变成机动，这样可多一些余地 机动的比例 20—30%。

四、重点问题是华东。与各省重新审查项目，辽宁、黑龙江、湖北、湖南、河北、山西、北京、四川、云南、甘肃共 10 省市，向华东调整。

每个部都有个别问题，加起来变成部分问题，项目摆得不全。石油、化工、建材项目安排没有问题，直属企业安排妥当。山西的煤运不出，还要投资？石油投资定得是否高了？机械基本来个平均主义，不分等级，除几个重型（企业）。续建、扩建的项目可以快些。资源、国防尖端、铁道干线可彼可此，摆得不平均，要调整。

要求增加投资 40—43 亿元，其中东北 10.5 亿，华北 4.5 亿，华东 18.7 亿，华南 4.7—6.7 亿，西北 5 亿。财政

收入要求减少 19.49 亿元，其中华北减少 5.13 亿，东北减少 16.58 亿，华东增加 2.2 亿。计划调整后，铁产量增加 975—1075 万吨，钢产量增加 495—545 万吨；铝产量减少 2.1—2.6 万吨。

这个方案本来就是由于华东计划提出高指标（包括华东钢产量翻一番）后，毛大加欣赏，逼得计委、经委重新调整修订的。而柯庆施仍不满意，还要追加投资，使得计委、经委不能不再次作调整。

8 月 17 日，北戴河会议开始。地点在北戴河中直一分院礼堂。第一天的会是下午 3 点半开到 5 点，记得有 80 多人参加。主要是毛泽东讲话，他这样讲到会议要讨论的 17 个问题：

这次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省和自治区的负责同志都参加。题目就是印发的这些，同志们还可出题目。

重点是第一个问题，明年、五年经济计划问题，主要是工业计划问题。这是重点、主题。这次会议也可以说是工业会议，农业、商业也有一点。发下一个参考数字，不太公道，大家来进攻，要搞公道一点，正确一点，搞三天，由富春负责。

第二个问题，今年的问题，也是工业问题，铁、铜、铝、的问题。钢由 1957 年的 534 万吨翻一番，达到 1100 万吨，到年底只有 4 个月 13 天了，有完不成的危险，中心问题是没有铁。现在都打了电话，发动了，可是还要抓紧些，要催回电话，保证完成。

第三个问题，明年农业生产安排问题，由谭震林负责准备一个文件。

第四个问题，明年水利问题，由谭震林负责。

第五个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印了一份河南试办人民公社的简章。第三至五个问题，由谭震林负责。

第六个问题，今年商业收购和粮食分配问题，包括今年粮食处理问题。由先念负责。粮食产量今年可能达到 6500 亿斤，一说 7000 亿斤，6.5 亿人口，每人 1000 斤。明年每人争取达到 1500 斤，后年 2000 斤。是否搞到 2500—3000 斤，这是方针问题，大家议一议。是否可以无限制地发展粮食，我看超过 3000 斤就不好办了。（谭震林插话：想搞 2500 斤。）

第七个问题，教育问题。陆定一同志写一篇文章，决议即可印发。

第八个问题，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包括我们在座的，不论作什么官，不论官大官小，凡能参加劳动的都要参加，太老的和太弱的除外。我们作官的几百万，加上军队有一千几百万，究竟有多少官也搞不清楚。干部子弟有几千万，近水楼台容易作官，官作久了容易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十三陵水库修成了，许多人都去修水库，劳动了几天。是否每年劳动一个月，一年四季分配一下，工、农、商都可以，把劳动和工作结合起来，一切人都如此。人家劳动，作官的不劳动怎么行？还有这分多干部子弟。学校教育要和劳动相结合。苏联农业大学的毕业生不愿下乡。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一切学校都要办工厂，天津音乐学校还办几个工厂，很好。参加劳动，县、乡级好办，中央、省专级难办，开机器怕不行，能用筷子吃饭和毛笔写字的人，难道不能开机器？开机器容易，还是爬山容

易？（邓小平插话：干部参加劳动的决议，我和乔木负责。）

第九个问题，劳动制度问题。由劳动部准备。

第十个问题，570 万人去边疆问题。从明年起，搞 570 万人去边疆。

第十一个问题，技术保密问题，发一个指示。

第十二个问题，国际形势问题。这个题目是我出的，因为到处有人问会不会打世界大战？打起来怎么办？西方国家军事集团究竟是什么性质？紧张局势对谁有利？中东的英美军队是早撤好还是多留几天好？禁运对谁有利？联合国承认有利还是不承认不利？到底谁怕谁？谁怕谁多一点？这个问题在党内也不是完全解决了。美国军队在黎巴嫩登陆，有人就对东风压倒西风发生怀疑了，说：可见东风未压倒西风，否则美英在中东怎敢登陆？这个问题看法不一致，党内外都有怕西方情绪，有恐美病。谁怕谁多一点？恐怕还是西方怕我们多一点。世界上有三个主义：共产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后两者都是资本主义。一派是民族资本主义，一派是压迫别人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原来是帝国主义的后方，可是它一反帝，就变成我们的后方。印、埃两面都搞，但比较对我们有利。我们两个主义站在一块，力量就大了。原子弹双方都有，人民力量我们大，因此不会打。但是也可能打，我们要准备打。垄断资本也难说，其中可能出疯子，假如它要打，是怕打好还是不怕打好？横起一条心，对敌人用黑心，拼命地打，打烂再建设。讲清楚不怕打是好的。

对北大西洋、马尼拉、巴格达三个帝国主义的军事集团，我们在宣传中说它是侵略的，因为它向民族主义、社会

主义侵略；但是，不要看的了不起，它只在一种情况下向我们进攻，即我们出了大乱子，反革命把我们推翻。匈牙利的反革命已被镇压下去，他们不敢来了，社会主义阵营在巩固中，我们中国有七八千万吨钢就巩固了。帝国主义那些条约，与其说是进攻的，不如说是防御的，是患了肺病的钙化组织，不要把它看得太严重了。巴格达条约搞了一个洞，中心突破，伊拉克一天早晨就变了。共产主义思想可以渗透，我很赏识赫鲁晓夫说的他们怕我们穿过去，帝国主义的军事集团是薄板墙，立在不巩固的基础上。北大西洋公约是比较巩固的，是整中间地带的，他们没有机会整我们，就整中间地带，并且互相整，英美整法国，又限制西德。我们宣传反对紧张局势，争取和缓，好像和缓对我们有利，紧张对他们有利。可否这样看：紧张对我们比较有利，对西方比较不利。紧张对西方有利是能够扩大军火工业，对我们有利是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7月14日早晨，伊拉克的盖子揭开了。紧张可以使各国共产党增加12个党员，可以使我们增加一些钢铁、粮食。英美在黎巴嫩、约旦晚走一些时好，不要使美国变成好人，多呆一天就多一点好处。抓住了美国的辫子，有文章好作，美帝成了众矢之的；但宣传上不能这样讲，还是讲立即撤退。

禁运越禁越好，联合国越不承认越好，我们有经验，抗日战争开始时，国民党给我们40万元，大家靠这点钱过的，没想办法，等钱买棉衣。后来蒋介石、何应钦不发给养，不给钱，我们提出团结自给，发动大生产，搞出的价值不只40万元，棉衣也穿上了，比何应钦给的多得多。那时如此，因而现在各国禁运也有利。最好再过七年再承认。我们头一

步需要七年。七年计划分三段，第一段苦战三年，第二段再苦战两年，再还要两年。那时我们可以搞到1亿到1.5亿吨钢，可以超过美国。这期间最好不要请我们到联合国去。前面有一个敌人，紧张对我们有利。

第十三个问题，今冬明春农村共产主义教育问题。要大辩论、大字报。要有一个文件。

第十四个问题，协作问题。是东北欧阳钦提出的。大区协作。

第十五个问题，我提出的深耕问题。这是目前农业的主要方向。深耕是个大水库，大肥料库。不深耕，水装不了，肥放不进，不能分层施，水肥再多也不行。北方要深耕一尺，南方要深耕七八寸，分层施肥，使土壤团粒结构增多，每个团粒又是一个小水库、小肥料库。深耕使地上水与地下水接起。密植的基础是深耕，否则密植也无用。深耕有利于除草，把根挖掉，又有利于除虫，草翻到底又可以变成肥料。这样一来，一亩可以当三亩，我们的土地多了。现在全国平均每人三亩地。我们向下边刨，就可以高产。苦战三年之后，土地的观念要改变，种那样多的地下什么？将来可以拿三分之一的土地种树，然后过几年再缩一亩。过去平原绿化不起来，到那时就能绿化了。如果不深耕，就没有这种可能。

人口的观念要改变，现在是人少，不是人多了，过去我说搞8亿，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也不要紧，不成问题。但也不要提倡多子女。人民文化水平提高以后就会真正节育了。大概三六十八亿，我看不会多。多子女的，实行邵力子、马寅初的办法，不然成航空母舰了。

第十六个问题，肥料问题。

第十七个问题，民兵问题。协作区或较大的省可以生产轻武器，如步枪、机枪、轻炮等，武装民兵。搞大合作社，工农商学兵一套都有。造那么多枪可能浪费，因为我们不打仗，浪费点也要搞。全民皆兵，有壮气壮胆的作用。多唱穆桂英、花木兰、泗洲城，少唱祝英台。再用六年时间，每人发一支枪，全国共需一亿支枪，每人发几十发子弹，必须打光。

会议形式大中小，今天算大会。明天下午3点，你们开战。

## 讨论计划和8月19日讲话

第二天开始讨论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邓小平主持，参加人比第一天多，有一百多人。李富春先谈了两个计划草案的起草经过：五九年计划和“二五”计划，是第一次大协作区会议以后，计委、经委的同志经过五天搞出来的，提交政治局作了初步讨论，然后又经过第二天的突击，第二次提交政治局作初步讨论，作为初步草案提交各大协作区会议。李富春详谈了6方面的问题：一、1959年计划的根据；二、700亿元的收入，480亿元的基建投资；三、工业布局，项目安排；四、1959年的计划方案；五、计划定了如何保证实现；六、“二五”计划如何制定。

刚开始讨论计划问题，8月19日上午，毛泽东就召集各大协作区主任开会，作了讲话：



第一书记要亲自抓工业。

“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全国、省只能搞一个计划），重点建设，枝叶扶持”，天津专区办了一个4万吨的钢厂，这就是他们的重点。分级是在统一计划下，小部分由中央管理，十分之二（投资、利润都可归中央）；大部分归地方管理，十分之八。六二年搞到一亿吨钢，那时怎样管，再看情况。重点放在哪里，要看哪里有这种条件。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要图快，武钢可以搞快些。但各县社都要发挥“钢铁积极性”，那不得了，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

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一定要在统一计划下，必须要有重点，有枝叶。不妨碍重点的大家搞，凡是妨碍重点的必须集中。各级只能办自己能办的事情，每个合作社不一定都办钢铁。合作社主要搞粮食加工，上化肥、农具修理和制造，挖小煤窑。要有所不为而后才能有所为。各协作区要有一套，但各省要适当分工，不要样样都搞。各省到底生产多少粮食，多少钢铁？以后各省都要自己生产，自己用掉。各省不要想销到别处去。还要准备中央调进一些。福建一百万吨钢，运到那里去呢？钢铁大的归中央，中小型的各省都可以搞一点。

所谓地方分权、各级（省、地、县、乡、社）都要有权，内容有所不同，范围有所不同。分级管理，但不要把原材料都分掉了。

各级计划要逐步加强，合作社的生产与分配，也要逐步统一管起来，没有严密的计划性与组织性是不行的。粮食生产也要有计划，明年是否要种到这样多的薯类？棉花要不要

种那样多？明年再鼓一年劲，粮食搞到每人 1500 斤再看。

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严密的组织网。一万年后，人多，汽车多，上街也要排队，飞机多了，空中交通不管也不行，在猴子变人的时候，是很自由的，往后愈来愈不自由了。另一方面，人类大为解放，自觉地统治宇宙，发掘出无限的力量。

社会主义，农民会先走一步。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将来坐汽车要不要分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者，可以照顾一下，其余不分等级了。

明年粮食生产还要不要鼓劲？还要鼓。苦战三年，储粮一年（每人 500 斤）。红薯可减少一点。

所有计划统统要公开，不要瞒产，地、县、乡不控制不行。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以后评比要比完成任务，比技术创新，比工作方法，比组织性纪律性，比更有秩序，比合理的独裁。要人鸣大放，才能独裁。现在铁也调不出，钢也调不出，几十万个政府，那还得了。

还要讲形势。国内形势要讲全国是一个大公社，国际形势要讲帝国主义可能要打大仗。全国是一个大公社，不能没有重点，不能没有统一计划。从中央到合作社，要上下一致，要有许多机动，但机动是属于枝叶方面的，不能妨碍骨干。钢明年 2700 万吨要完成，今年 1100 万吨要保证。

省委书记回去以后，要立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条子要灵，一个地区一个主，一个省只能有一个头，“冤有头，债

有主”。邯郸有一个合作社，赶一辆大车到邯钢要铁，不给就不走。各地那么多人乱跑，要根本禁止。要逐级搞平衡，逐级上报，社向县、县向专、专向省，这叫社会主义秩序。中央也只有-一个头，中央钢铁的头是王鹤寿，机械的头是赵尔陆。

中央计划，由各省、市参加共同制定，省计划由地县参加制定。一次也许讲不清楚，要多讲几次。

人民公社问题。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我的意见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治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搞人民公社，我看又是农村走前头，城市还未搞，工人的级别待遇比较复杂。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苏联片面强调物质刺激，搞重赏重罚。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不要几年功夫，就把大家组成大公社。

天津市有 100 万人能参加劳动而没有参加。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才能基本实现机械化。机械化了，劳动力才能彻底解放。

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中央决定（中央和地方共同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些还要强调。大权是主干，小权是枝叶；一是决策，

一是检查。钢铁专门小组每十天检查一次才行。你们回去以后，什么事情也不搞，专门搞几个月工业，不能丢就不能专，没有专就没有重点，粮食问题基本上解决，高产卫星不要过分重视。帝国主义压迫我们，我们一定要在三年、五年、七年之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大工业国。为了这个目的，必须集中力量把大工业搞起来，抓主要的东西，对次要的东西，力量不足就整掉一些，如种棉花要整枝打杈保桃一样。这样会不会损伤下面的积极性呢？合作社不搞钢铁可以搞别的，钢铁谁搞谁不搞，要服从决定。要下紧急命令，把铁交出来，不许分散。大、中钢厂的计划必须完成争取超过。在一定时期，只能搞几件事情，唱《逍遥津》就不能同时唱别的戏。要讲透“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为”的道理。

钢铁铜铝及其他有色金属，今明两年要拼命干。不拼命不行。钢要保证完成，铁少一点可以，也要争取完成。

派人到越南去时，我讲过一句话：你们对越南的一草一木都要爱护。那不是胡志明的，是地球上的，是劳动人民的；打敌人也不是胡志明的事，是地球上的事，是劳动人民的事。如果牺牲了就埋在那里。将来我们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但对立的阶级消灭了，才有可能。现在两个阶级各有各的计划，将来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分彼此，帮助困难的地方一个钱也不要。打了那么多年仗，死了那么多人，没有谁能赔偿损失。现在搞建设，也是一场恶战，拼几年命，以后还要拼，这总比打仗死人少。共产主义道德不能按钟头计算工作，要按那还算什么道德高尚。河北省计划15岁的人15年以后可以大学毕业，半工半读，人民的觉悟就高了。靠物质

奖励，重赏重罚过多是不行的。我们今后不要发什么勋章了。军官要下放当兵，没有当过兵的要当一下，当过兵再当一下也很有好处；师长、军长下放让班长管，搞三个月后再回来当师长、军长。云南有个师长，当了几个月兵，了解当兵的生活、心理，这很好。干部参加劳动，有人说搞两个月，搞一个月总是可以的。我们与劳动者在一起，是有好处的，我们感情会起变化，影响几千万干部子弟。曹操骂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有道理的，只要大家拼命干，再过三年、五年，就搞起来了。

协作区不搞政治不行，要搞点政治。过去有人说协作区只搞经济不搞政治，我看还是要政治挂帅，思想一致了，才好搞经济。在政治挂帅之下抓计划，搞大公社统一计划，重点建设，枝叶去掉一些，就是政治。

毛泽东的讲话反复强调要抓工业、抓钢铁，强调统一计划、统一指挥、唯头头是问，反映了他的一种焦虑和担忧的情绪。他对上上下下忙定指标、定计划，却疏于抓生产、抓落实，以致于他最关心的钢铁产量的计划都完不成，心中十分不满，所以才要求“第一书记要亲自抓工业”。对各省由于原材料和设备供应紧张而自行调拨物资，甚至直接以物易物，也很恼火，所以才讲“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

毛泽东讲话的当天下午，会议继续讨论计划和工业生产问题。刘少奇讲话强调统一计划。他说：全国一盘棋、一本账，都应列入全国计划。我们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各地方要走向平衡。各地方一部分或大部分都能自给自足。应集中领导，集中调配，实行全面的计划经济。邓小平讲话要求确

定一个计划，保证重点，语言一致。

李富春发言说，今天上午主席、下午少奇指示，对我们计划工作的同志启发很大。根据主席、少奇指示，提出四点调整计划：（1）调整项目；（2）增加收入和投资，调整收入和投资；（3）保证重点；（4）预算外的各省要做计划。他谈了1959年计划的根据：（1）贯彻总路线和三个并举。（2）苦战三年，保证在“二五”计划内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3）“二五”计划内基本上要首先建成各大区的工业体系。（4）明年的具体要求：保证生产钢2700—3000万吨，1960年4500—5000万吨，以钢为纲，苦战三年，争取5000万吨钢。（5）对1958年的估计，农业大跃进带动工业大跃进，粮食、棉花基本上过关了；工业是四五月份才开始跃进的，因此，工业还要努力。钢1100万吨，一吨也不能少。全国收入700亿元，基建投资480亿元的方案，是积极的还是保守的？从财政收入上是不保守的，如果加上预算外（投资）的100亿元，就是580亿元，等于“一五”计划的全部投资。要布置大后方，西北西南的铁路干线。根据主席指示，争取七年时间，六〇年钢5000万吨，六二年8000万吨到1亿吨，六四年1.6亿吨。（刘少奇插话：是否设想搞个十年规划。）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第三个五年计划某些方面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可不可以设想，公社化了，粮食问题解决以后，吃饭不要钱；棉花问题解决后，穿衣、鞋子不要钱；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衣食住行都不要钱，就全面向共产主义过渡。李富春还说：统一计划，分级管理，保证重点，全面规划，多快好省。主席讲“三个元帅”、“两个先行”（钢、粮、机械，铁路、电力），六二年保

证 8000 万吨钢，扩大再生产能力就世界第一了。

## 8 月 21 日讲话和讨论钢铁、公社问题

8 月 21 日上午，毛泽东第二次在协作区主任会上讲话，主要谈钢铁和人民公社问题，保证重点，明年搞 2700—3000 万吨钢，50 万台机床，完成这些，就是胜利，因此，要拼命干。要一星期抓一次，还有十九个星期，要抓十九次。24 日开工业书记和厂党委书记会议，看有没有把握。1100 万吨钢，必须保证完成。经过三令五申，仍完不成任务，或者有铁拿不出来者，对搞分散主义的，就要执行纪律。纪律处分有六种：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任，四撤职，五留党察看，六开除党籍。不然反而不利。我看 1100 万吨钢有完不成的危险。6 月间，我问王鹤寿：钢是否能翻一番？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有些人不懂得，不完成 1100 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利益的大事。要拼命干，“拼命干”三个字下面要加着重号。上海有 10 多万吨废铁回炉。要大收废钢废铁，暂时没有经济价值的铁路，如宁波、胶东线，可以拆除，或者撤到重要地点去。首先保证冶金设备—高炉、平炉、轧钢机，以及发电机和重要铁路、重点工程、车床和吊车。要向干部和人民讲清楚，首先保证几件大事，才是万年幸福。冤各有头，债各有主，一省只能有一个头，看同意不同意。同意，一个人也准乱跑。在国家计划之外，各协作区之间，省与省之间，还可以互相调剂一点。还有 133 天 19 星期，要每星期抓一次，一定要抓好。

我们的人民是很有纪律的，给我印象很深。我在天津参观时，几万人围着我，我把手一摆，人们都散开了。河南对我的感动很大，修武县全县 29000 多户，13 万人，成立了一个大公社，分四级：社、联队、中队、战斗小组。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劳动力集中，土地集中经营，力量就不同了。秋收翻一番，群众就看出好来了。甘肃洮河引水上山，那样大的工程，就是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搞起来的。人民的干劲为什么这样大呢？原因就是我們向人民取得少，我们不要义务交售制，同苏联不一样。我们是一个党，一个主义，群众拥护。我们与人民打成一片，大整风以后，一条心。红安经验，就是一个典型。

要使同志们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三个部分关系，他们接触到了，但没有展开。我看经济学上没有讲清楚这一条。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也没有解决。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重要部分。搞生产关系，不搞相互关系，是不可能的。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中国如果不解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要大跃进是不可能的。

在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整风以来，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的人调动起来，共产主义精神很好。人活着只搞点饭吃，不



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取消薪水制，一条有饭吃，不死人；一条身体健壮。我在延安身体不大好，胡宗南一进攻，我和总理、胡乔木、江青等六人住两间窑洞，身体好了。到西柏坡也是一间小房子。一进北京后，房子一步步好一步，我的身体不好，感冒多了。大跃进以来，身体好了，三天到四天中有一天不睡觉。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耶稣教清教徒的生活很艰苦。佛教创教，释迦牟尼也是从被压迫民族中产生的。唐朝佛教《六祖坛经》记载：惠能和尚，河北人，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惠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西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人怎么办？他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思想无所寄托，大为流行。

马克思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是打成一片的关系。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没有做好，旧的法权（等级）制度没有彻底破坏，劳心与劳力是分离的，教育与生产是分离的。列宁曾说，要打破常备军，实行人民武装。有帝国主义存在，常备军是要的，但苏联军队中的等级制度、官兵关系，受了沙皇时代的若干影响。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需要找寻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我们的军官，向云南的一个师长学习，一年当一个月的兵，我看这是好办法。应该到处推广，这样，我们

的军队就是永远打不散的军队。

嵯峨山公社章程，红旗杂志要登出来，各地方不一定都照比办，可以创造各种形式。要好好吹一下，一个省找十来个人先吹。大社要与自然条件、人口、文化等各种条件结合起来。河北省刘子厚同志，找了十来个人吹共产主义思想作风，很有劲，你们回去也这样吹一下。进城后，有人说，我们有“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我们，把我们的一些好的东西抛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要打成一片，要说服，不要压服，多年如此，这些怎么都成了问题呢？原因在于脱离群众，在于特殊化。我们从来就讲：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拥政爱民、拥军优属。供给制比较平等，衣服差不多。但进城以后变了，经过整风，群众说，八路军又回来了。可见曾经离开过。城市恰恰要推行“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蒋介石的阴魂在城市中没有走，资产阶级的臭气染我们，与他们见面，要剃头，刮胡子，学绅士派头，装资产味，实在没有味道。为什么要刮胡子呢？一年剃四次头、刮四次胡子不是很好吗？湖南省委书记周惠说，在县工作时，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在地委工作时，还能接近群众；到省委三年，干部和群众就不好找了。去年整风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成百万的人，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成为群众拥护的共产主义战士。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共产主义不行了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贬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讲说服不

要压服也忘掉了。是不是由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华北老根据地搞过地道战，北方都经过战争锻炼，河北实行军事化是习惯这一套。南方有许多地方没有经过战争锻炼，那个地方生长的干部，生活习惯有些不同。

我们已相当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但还不彻底，要继续搞。不要马上提倡废除工资制度，但是将来要取消。要强调农村作风、游击习气，一年参加一个月的劳动，分批下去参加。列宁写过一篇文章，十月革命前夕，他到一个工人家庭作客，这个工人找不到面包，后来找到了，非常兴奋，“这回到底把面包找到了！”列宁从这里才知道面包问题的重要。我们的同志一年搞一个月劳动，与人民打成一片，对自己的精神状态会有很大影响，这一回要恢复军事传统——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传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那一套化掉，我们“粗野”一点，是真诚的，是最文明的；资产阶级好像文明一点，实际是虚伪的，不文明的。恢复供给制，好像“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

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产品十分丰富，粮食、棉花、油料实行共产。那时道德大为进步，劳动不要监督，要他休息不休息。建华机械厂搞“八无”。人民公社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的萌芽，是资产阶级法权制度的破坏。希望大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吹一下，把两本有关文件看一下，把实践中共产主义道德因素在增长的情况也吹一下，过去革命打仗死很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如果

做到吃饭不要钱，这是一个变化；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将来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如鞍钢叫鞍钢公社，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大学、街道都办成公社。乡、社合一，政、社合一，暂时挂两个牌子。公社中设一个内务部（行政科）管生死登记、婚姻、人口、民事。

有人问：统一以后，要不要有机动？机动还是需要的，在保证 1100 万吨钢以外，允许机动，如如果树、棉花要整枝，其他就不整枝。统一主要是钢铁、机械。准备 100 亿元冲击，使合作社的冲击力有东西可冲。国家保证 2500 万吨钢，剩下 500 万吨由省、地、县去安排，能超过一点更好。计划不可能搞得那样准确，不可能样样事先有计划，有些难于预料，盲目性是不可避免的，乱是有一点，成绩是很大的，空前的。过去我们没有管，现在全党要管这件事。第一书记右手抓工业，左手抓农业。各级党委都设几个书记。

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说过这个话：我就是抓钢铁，这件事与我有关。所以几次讲话，他首先讲的、反复讲的都是钢铁问题。为了实现 1958 年钢翻一番的目标，他到北戴河以后就找陈云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谈钢铁问题。毛在协作主任会议作第二次讲话的当天，陈云向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了毛关于钢铁问题的意见。

陈云说：头一天各省市同志到了之后，到主席那里去，他说少一吨都不行的，少一吨就失败，要你们当夜打电话。这是生产方面的情况，他很担心。主席有所批评，主席批评中央的一些领导机关，经济小组、国产计委、国家经委、中

央各部，现在都忙于搞计划去了，没有机关搞生产，这样不行。主席说如果发生这种现象要有纪律，这样大规模的建设，没有纪律不行。前天晚上搞了半夜，对钢铁情况的估计，7月份380万吨，主席指出很危险，要敲警钟，因为相差很远，380万跟1100万，差800多万吨。6月19日开各大协作区会议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了一些同志，王鹤寿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530万吨，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为什么不能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就布置了。所以是6月19日才决定搞1100万吨的，这样的指标布置下去都是很迟的。

8月22日，会议讨论钢铁问题。陈云说：今年的钢铁生产计划能否完成很担心，7月份只完成了380万吨，离1100万吨很远。钢铁第一本账620万吨，第二本账710万吨，第三本账是八大二次会议850万吨，第四本账是6月19日1100万吨。第四本账下达时间很晚，许多大工厂都没有完成任务，原因之一是从部起相当多的工厂偏重于搞计划，忽视搞生产。主席批评是很对的。二是调度不灵，一种是许多小高炉是农民搞的，掌握生产需要一定时间，生产不稳定。另一种是许多厂子的生产没有完成，原因是成都会议提出分成，工厂按分成比例留下使用了。再有一种是许多厂子是6月15日下放的，上下交接在过渡，同时冶金设备不能正常供应，不些厂子得不到原材料，不能迅速生产。

陈云说：向主席汇报后，主席有八条指示。一、抓生产，经委由薄一波负责，主要抓生产，王鹤寿、赵尔陆也抓生产。二、原材料的调配也要服从国家计划，分配钢材要照顾重点，又要照顾农民的需要，超计划部分地方还是分成。

三、抓设备，尽快地把设备安装起来投入生产。四、机械工业收到材料后，第一是制造炼钢炼铁和轧钢设备。五、各省、市委每个礼拜抓一次钢铁生产。六、冶金部的直属厂要加 50 万吨的任务，作为保险系数。各地也要有这个计划。七、调拨材料生产要有纪律：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任，四留党察看，五撤职，六开除党籍。八、开一个各省市工业书记会议，在北戴河开。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北戴河会议召开的同时，中央又从 8 月 25 日至 31 日在北戴河召开各省、市、区党委工业书记会议，除了工业书记外，各省、市、区的计委主任和有关厅、局长也参加了会议，专门讨论 1958 年的钢铁生产问题。

8 月 22 日和 23 日，会议还专门讨论了农村工作，重点是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谭震林对会议准备通过的有关农村工作的文件作了说明。他说：分六次召开了农业书记会，向中央作了汇报，在中央、特别是在主席的指示下制定的九个文件，比较大的二件：一是人民公社 一是积累与分配，一是储备粮；其余较大的是今冬明春社会主义教育，五几年的计划，至于水利、肥料、深耕是带技术性的。还有一个农、林大专院校备迁到农村去，这是主席指示的，准备讨论的。

谭震林说：人民公社，先要大，小了不行；另一个是由集体所有制度变为全民所有制，名称也有各种各样，有的叫国营农场，有的共产主义公社，有的还叫农业合作社，但规模很大。这个问题，我们向主席汇报了，根据主席的指示，写了这么一个意见，这个意见送到主席那里又改了一下。昨天晚上主席改了，文件先印了。这个东西产生的时间并不很

长，虽然以前也有大社，但并不太多。成都全议作了小社并大社的决定。会后各地方采取了一些行动，比较快点的是辽宁、广东，接着是河南、河北、江苏、浙江作了规划，其他省份也作了些规划。并得快的是辽宁，全省都并完，一个省并成 1400 个社；河南现在差不多也快并完了，全省原来是两千多个社，并成一千儿百个；河北估计 8 月底也完了，积累和消费问题，生活水准放在当地富裕中农的平均水平。五九年计划，第一步每人 1500 斤，第二步每人 2000 斤。

关于公社问题，刘少奇在讨论时插话说：大城市郊区再不要搞工业了，把农业和原有的工业结合起来。公社是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社的规模大小和快慢由各地决定，不要性急，不要强迫，要大鸣大放。建立公社有些地方要分两步、三步走，有的地方不必要。公社建立后商业就不要了，只要一个批发部。关于公社的问题，刘少奇早在四五月间同毛就议论过，而且意见相投，认为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形式，但在步骤上多少有些不同，刘主张更稳妥些。就我自己来说，当时关心的是工业，钢铁翻番持怀疑态度，电无法保证。公社问题可以说根本不关心。记得公社问题的决议通过后，黄克诚对中南组陶铸、王任重、周小舟几个人说过这样的话：公社挂个牌子算了。黄老遇事稳重，他很怀疑这种一窝蜂搞公社化的做法。

## 8 月 24 日讲话和会议讨论

8 月 24 日，毛泽东对各协作区主任作第三次讲话。

五九年粮食方针问题。劲鼓得比今年大还是同今年差不多？劲还是愈鼓愈好，明年还是要大于一年。现在不要愁丰收成灾，不要怕粮多就不鼓劲。但要有节奏的生产，现在劳动强度很大，要使农民有适当的休息。一个月休息两天，半月休息一天；忙的时候休息少些，闲的时候休息多些；离工地较远的可以在工地里集体吃饭、睡觉，这样可以节省来往时间，多得到休息。这个意思要写到文件里去，但不要讲得太多。

粮食多，油还不够。粮、棉、油都要增产。中心是深耕，去年是多数未深耕；密植也不够，太密了不通风也不好。深耕才能密植、蓄水、施肥、除虫。（陶铸插话：大面积密植要创造经验。）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有些问题要重新写。我们解决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先搞农业，同时搞重工业。赫鲁晓夫同莫洛托夫之争，就是说重工业多了。我们一反苏联之所为，先搞农业，促进工业发展；先搞绿叶，后搞红花。先搞绿叶后搞红花，有什么不好？看来有些问题，需要重新解释。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要有新的补充和发展。生产关系中的三个方面，所有制、劳动者的相互关系和分配问题，都未展开。苏联集体农庄、手工业合作社还是集体所有制，为什么不搞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不只是中央的，而是全民的；过去所有制表现为王鹤寿、赵尔陆所有，这就是苏联的办法。我们现在管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也管不了。无非是开开会，一年抓四次；从前管得更少，无非是发发指示，通报一些情况。现在 20% 中央管，80% 地方管，省也要向下分权，直到企业也要有一定的权限和独立性。石景山钢铁厂投资包干。可以从 60 万吨钢搞到



130万吨钢，第二期就可以搞到300万吨，这是什么原因？这里边有鬼，请大家好好想一想，是群众的积极性来了。王鹤寿管的时候，实际上是设计员在专政。这里有一个问题大家要想一想，我看跟民族独立有同样的道理，这联系到人民的问题，印度独立后比英国统治时积极性高。一独立就有积极性。当然，它是表现在阶级斗争上，街道工厂、民办学校、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所有制便发展了。

死、活斗争问题。死、活斗争一万年也有。控制“死”还是不控制“死”呢？没有死不行，统得太死也不行，一点不死也不行。五九年的钢如果是2700万吨，2500万吨必须卡死，200万吨是活的。如果3000万吨，就有500万吨是活的，如果超过3000万吨，还可以分成。食油多的多吃，少的少吃，这就活了。死者保证重点，活者重点之外不妨碍重点。大包干就是有死有活，大家都要管。死与活两方面就是统一与分散，兼而有之。包干制就是有死有活的矛盾统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就是这个道理。中央究竟谁当家？大权独揽到何处？只有经济建设委员会是否够了？可否分设工业生产委员会和工业基建委员会，总是冤有头，包工包下，使大家有奔头。我们说六项纪律，是搞神经战，主要是吓人，不坐班房，大家不犯法就是嘛！

历史唯物论关于上层建筑的问题，一是政权问题，已经解决了。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那里将会逐渐没有政权：人民公社是几百好人中夹一个坏人，这就自然专了政。六亿人口中只有130万劳改犯，不算多。军队过去说自己落后，会一开，相互关系一改变，就出现了新气象，各地军队都在开会，军队大跃进已经起来了，可以搞各种名堂。军队拿出三

分之一的时问搞政治、文化、劳动，影响不影响军事训练？不但没有影响，反而搞得更好。公安、法院也在整风。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大跃进以来，都搞生产，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时间犯法了，对付盗窃犯不靠群众不行。（刘少奇插话：到底是政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办事的参考。南宁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的决定，人家去办就是法。上海梅林公司搞“双反”，报上一登，全国展开。）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上是1400人的大会（按，指五八年军委扩大会）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个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是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90%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这是讲上层建筑部分。

意识形态、宇宙观、方法论、报纸、文化教育的作用大得很。资产阶级的自由破坏越多，无产阶级的自由就越多。苏联对资产阶级的自由没有彻底破坏，因而没有充分建立起无产阶级的自由。我们政治思想上的革命搞得比较彻底，干部参加生产，和群众打成一片，彻底改革规章制度，就是对资产阶级自由的彻底破坏，工人的干劲冲天。政治经济学谈到这些问题，几句话就过去了。

分配问题。苏联干部职工工资等级太多，同工农收入相差太悬殊，农民义务交售制，负担48%，限制农业40年不发展，我们只拿5—8%（间接负担除外），我们藏富于民，“民食足，军食孰与不足”。赫鲁晓夫来了，就是只说国家要搞多少粮食，不讲生产多少，我们就是讲生产的。人民知道我们反正是为了他们，积极性高。有人说，“大国人多难办事”，看用什么办法，只要办法对头，再有10亿人也好办。我们的方法，反正是大鸣大放，自己管自己。我们是服从真理的。真理在下级，就上级服从下级；兵高明，军官就服从兵；学生编教材，比先生编得好，先生应该服从学生，编教材要党、学生和教员中的积极分子“三结合”。一门一门的科学来清理，资产阶级霸占的情况必须攻破。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赵承嘏，他会提炼一种治高血压的药（蛇根草）始终不向别人讲，青年科学人员不服气，苦战了几天，也就搞出来了。因此，要抓研究员青年人，使这些教授孤立起来，这种斗争很激烈，因此还要几年。

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意识形态是客观实际的反映，关心基础，为基础服务。改革规章制度、开会就是搞意识形态，北戴河会议就是搞意识形态。去年三中全会，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大会，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起了很大作用。因此，才有大跃进。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危害很大，八股文章、孔夫子的思想传了几千年；达赖喇嘛的屎和土都有人吃了，蠢得不得了。张道陵每人五斗米的教，出五斗米就有饭吃，传到江西的张天师就变坏了。吃粮食是有规律的，大口小口一年三石六斗，放开量叫他吃，薛仁贵一天吃一斗米，总是少数。我们搞公共食堂，也可以打回去吃，

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五九年是否实行，明年再看；穿衣是否也可以不要钱。吃、穿不要钱，不一定要等到第三个五年。职工宿舍要搞搭配，大片宿舍比公馆好。资产阶级法权不能完全废掉，大学教授比学生吃好一点，河南搞 80 亿土方，粮食翻一番。河南能办到的，全国都应该办到。

明年建国十周年，宣传是大搞还是小搞？我们是为中国人民作宣传，对全国人民是鼓劲，不考虑影响外国的问题，实际上外国会受影响的，对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好的影响，对帝国主义国家是一个大的打击。如大搞，请不请外国人？请多少？

回去告诉军队同志，军官要当一个月兵，先从少数人搞起，一个人搞起来了，别人都要搞，一个十月革命，全世界都要革命；一个合作社搞千斤亩，全世界都要搞千斤亩，到底是少数服从多数，还是多数服从少数？历来都是多数服人少数，因为少数人反映了多数人的意见，你们来开会，还不是邓小平发了一个通知，把你们都找来了，这还不是多数服从少数吗？达尔文进化论、哥白尼太阳的理论都是一个人搞的，别人都服从。马克思、恩格斯是两个人，反映了客观规律，或者反映了多数人的意见。蛋白质的公式还未找到，活性染料 167 种，已经找到公式了，世界第一。沼气是四氢一碳，屁是二氢一硫，石膏是硫化钙。就这样一点来说，都是少数人的意见反映多数人的意见。

河北徐水县搞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这三个口号提也可以，不提也可以，组织形式不一定搞团、营、连、排、班，设大队、中队、小队，也可以。实际上是一个劳动组织

与民主化的问题。帝国主义为这件事造谣，但我们不怕它。强迫命令当然不好，但工作中有点强制也需要，这是纪律。大家来北戴河开会，也是如此。苏联的军事共产主义是余粮征集制，我们有二十二年的军事传统，搞供给制，是军事共产主义。我们是在干部中搞共产主义，不包括老百姓，但老百姓也受到影响。恩格斯说，许多东西都是从军队搞起的，确实如此。我们从城市到农村，和半无产阶级结合，组织党和军队，我们吃大锅饭，没有礼拜，没有薪水，是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一到城里来，自惭形秽，过去一套吃不开了。要穿呢子衣服，刮胡子，干部知识分子化，薪水制代替了供给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群众路线在城市也不充分了，解放后到五二年还好，五三年到五六年主要反映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第二是照搬苏联，过去我们不得不请资产阶级当参谋，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几亿农民、七百万生产工人、两千多万干部和教员，资产阶级的海洋把我们淹到胸口，有的人被淹死了，刘绍棠成了右派，姚文元不错，比流沙河好。

人民公社当作决议草案发下去，每一县搞一二个试点，不一定一下都铺开，也不一定都搞团、营、连、排、班。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去进行规划，现在不搞不行了，不搞要犯错误。自留地要增加，耕畜要私养为主，大社要变小社等几件事，是向富裕中农让步。经过这个过程是可以的，不算严重的原则错误，在当时条件下，还有某些积极意义，现有又否定了。头把猪，私人可以喂。社以大为好，人民公社的特点就是一大，二公，主要是许多社合为一个大公社。《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几个按语，都说办大社好，山

区也可以搞大社，多种经济综合发展，开始办一些也有好处。工资制度青年、妇女都高兴。增加自留地那一套道理，都是农村工作部出来的。1955年我就提倡大社。全国搞1.5万至2万个社，每社5000—6000户，二三万人一社，相当大了，便于搞工、农、兵、商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我看将来有些大城市要分散。2—3万的居民点，什么都会有，乡村就是小城市，哲学家、科学家多半要出在那里。每个大社都将公路修通，修一段宽一点的洋灰路或柏油路，不种树，可以落飞机，就是飞机场。将来每一个省都搞一二百架飞机，每个县平均2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各地不一定按徐水的办法去搞，三句话（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各地都有。卫星公社的简章要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大体可用，各地参照执行。

8月26、27日，会议再次讨论1959年和“二五”计划问题，主要是为了最后通过关于计划和工业生产的一系列文件。26日，李富春就计划的调整问题向会议作了五点说明：一、调整的结果：（一）项目的调整，重大项目增加148个，减少30个，净增118个；五九年重大项目643个，其中续建462个，新上马181个。（二）投资的调整，比原计划投资480亿元，增加21.22亿元，预算外的投资为100—150亿元。（三）财政的调整，增加22.5亿元，达722.5亿元，地方加了15亿元，中央各部加了7.2亿元；华东、西南、华中、西北四个区的增加，完全是政治挂帅，以虚带实增加上去的，中央各部也是此，找的各部部长（没有找财务司，财务司越算越少）。（四）生产指标的调整，电原来是520度，这次增加到580亿度，保重点，保生产指标，保新增生产能

力。二、1959年计划是空前宏伟的计划。农业，粮食、棉花要比1958年至少增长60%，做的结果可能翻一番；明年钢要达到2700万到3000万吨，增加的钢产量等于“一五”计划五年总和四倍；电机生产今年90万千瓦，明年1000万千瓦。三、关于方法问题，全党全民办工业，保证重点，分级管理。四、“二五”计划问题，1962年以1亿吨钢为纲的计划方案；粮食15000亿斤。五、计划的编制，各省市9月份把明年的计划搞出来。

除了计划、钢铁、人民公社等重点问题外，会议还讨论了教育、财贸、劳动制度等问题。这些讨论都是交叉进行，每一个方面又分成若干更具体的问题，形成若干相关的文件草案。所以开会也分成大会、中会、小会三种形式。大会当然是全体人员参加的会议，中会是中央领导人召集的系统（又称大口，如工交口、农林口、财贸口）或地方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小会是中央有关领导人就某一具体问题召集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

记得除了大会、中会外，我还参加过陈云召集的研究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小会。参加的人不多，有中科院张劲夫、二机部刘杰，好像还有一机部、冶金部、化工部的负责人。我是代表水电部参加的，因为当时上海计划建造一座功率为一万二千千瓦的原子能发电站，涉及到水电部的业务。会议期间，中科院党组形成了两个文件：《关于大家办原子能科学问题的请示报告》和《关于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的推广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两个件当时都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给了与会者。

## 最后一次大会和毛泽东的总结讲话

8月30日，举行最后一次大会。工业书记会议的代表也来旁听，所以人特别多，约有三百几个人。刘少奇主持大会。毛泽东讲话。

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倡的。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干起来了。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都未料到。共产主义本来是有群众自发的因素，先有空想社会主义，古典唯物论、辩证法，然后才由马克思那些人总结起来的。我们的人民公社是合作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是没有来由的。把这个问题条理化，需要我们去搞清楚。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大，了不起，人多势众。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养牲畜取消，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可以解放。实行工资制度，像农业工厂，每个男人，每个女人，每个老年，每个青年，都有工资发给每个人，跟以前分配给家长不同，直接领取工资，青年、妇女非常欢迎，破除了家长制度，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还有一个公的特点，是劳动率比合作社可以提高。

全国现有70万合作社，搞成万人、万户的大合作社最好。河南提出2500户左右一个，当然也可以。这是一个新问题，只要一传播，把道理一讲，可能只要几个月，一秋



冬一春可能就差不多了。当然，要实行工资制，吃饭不要钱，还要一个过程，也许一年，也许有些地方要三年。决议案上有一句，一二年或者四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所有制，同工厂差不多，即是吃饭穿衣住房都公有。苏联还奖励私人盖房子，我们将来废除私人房屋。

绿化问题：园林化，城市乡村都像中山公园、颐和园。中山公园不出粮食不好。中国刚建设，要想建设的怎样更使更合理、更好些。有人说，城市工厂占地更多，农村就不同，中国每人三亩地，我看有二亩就够了，几年后亩产提高了，可以拿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休息（土地也轮班）。假如亩产万斤，达到现在的“卫星”时，土地的概念就变了，一亩等于四十亩、八十至九十亩，还种那么多地干什么呢？每人几分（地）就够了。种树要有规划，有计划种地。法国人把街道、房屋、林荫搞得很好，资本主义能搞，为什么我们不能搞？应该把它搞得有秩序一点。康有为咏西湖的对联句：“如此园林，四洲游遍未曾见。”其实何必游四大洲，我们绿化起来，全国到处可以游，何必一定游西湖？西湖水浅，林也不好。房屋要好好安排一下，今年人搞还不行，有些今年开始，有些明年开始。如果搞到一亿五千万粮食（今年可能是七千五百亿斤，明年加一番）的话，我们可以搞规划，园林化、绿化、畜牧、住房等。河北、河南我看了一下，什么叫绿化？没有树，怎么叫绿化？真正绿化，我看每人有几千斤粮食，腾出三分之一土地来种树，才能大搞绿化。农、林、牧是互相结合，互相影响的。

人民公社还有许多问题，现在不知道，还需要继续研

究。已有了一个章程，河南卫星公社 24 条，它的“宪法”一公布，全国闻风兴起的就会不少。人民公社在两三年（明年、后年）内能不能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工资制、办农业工厂，有个文件写第三个五年计划向共产主义过渡，我加了第四个五年计划。（少奇插话：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过渡）讲开始过渡还可以。有个文件讲，明年是决定性的一年，这句话讲得好，粮食再翻一番，钢搞到 2500 万到 2700 万吨，争取 3000 万吨。这是一场大仗，这一仗是没有休息的，机器不能休息。今年还有四个月，我犯了错误，早抓一个月就好了。6 月 19 日出了题目，但没有具体措施，人家都抓计划去了。热情好的，但对今年的生产有所放松，我没有搞好，责任是我的，不是大家的。从 8 月 21 日起，还有 19 个星期，133 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现在又过了 10 天，相当危险。要紧急动员，能否完成，我有怀疑，我是“观潮派”。明年 1 月 1 日能不能搞到，我总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如果没有搞到，一是题目出错了，二是工作没有抓紧，是我的错误。冶金部汇报 900 万吨，我说，干脆一点吧，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搞 1100 万吨，问了许多人，都说可以，有希望。1956 年粮食增产轰轰烈烈，有人说，1957 年的粮食生产，比 1956 年更扎实，实际上增产不多，只增产 50 亿斤。今年 1100 万吨钢，到底扎实不扎实，我是怀疑的，拿到手才算数。“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明年争取 3000 万吨。粮食比钢少一半，搞三万五千亿斤。粮食产品要多样化，不要光搞地瓜。

共产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产品丰富；第二个条件是要

有共产主义精神，一有命令，每个人都自觉地去工作，没有懒汉。共产主义不分高低，我们有二十二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发薪水；与苏联不同，苏联叫余粮征集制，我们没有搞，我们叫供给制，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三大民主。我们原来分伙食尾子、津贴，进城以后，熬了三年，到五三年搞了薪水制，说资产阶级的等级、法权制度那样神气，把过去的供给制说成是落后办法，游击习气，影响积极性。其实是把供给制度变成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发展资本主义思想。难道两万五千里长征、土地革命、解放战争是靠发薪水发过来吗？抗战时期，二三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四五百万人，过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没有星期天，在一元化领导之下，没有什么“花”，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拥政爱民，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打败了蒋介石。打美国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花”。现在有了“花”，发薪水都要有等级，分将、校、尉，可是有的还没有打过仗，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这一点和国民党差不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工人、农民不喜欢我们，说“你们是官——党官、政官、军官、商官”。其官之多，怎么不出主义？官气多，政治少，所以出官僚主义。整风以来，就是整官气；政治挂帅，争等级、争待遇的就不多了。我看要打掉这个东西，薪水制可以不要马上废除，因为有教授，但一二年要作准备。人民公社搞起来，就逼着我们逐步废除薪水制。进城后受资产阶级的影响。我们搞运动，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民主作风，他们说我们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跟资产阶级、土豪劣绅搞在一起，正襟危坐，学资产阶级的样子，剃头、刮胡子，一天刮三次，都是从这里学来

的。解放初，五〇年、五一年扭秧歌时期，我们压倒资产阶级，后来秧歌吃不开了，梅兰芳出来了，《宇宙锋》压倒了秧歌。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套吃不开了。现在又恢复了，“农村作风”、“游击习气”，是马克思主义作风，讲平等，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没有星期天，所以老百姓说：“老八路又回来了”。

我请陈伯达编了一本书，叫《马恩列斯论军事》。我读了一二篇，有一条说，许多东西自古就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我们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先实行的。中国的党是个很特别的党，打了几十年仗，都是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八年抗战，四年自卫战争，群众看到我们的生活艰苦，群众支援前线，没有工资，粮食自带，打仗要死人，还能那样做。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二十二年，出了几个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有共同目的，为了多数人而辛苦。现在，对外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对内主要是向自然界做斗争，目标也明确。我们现在搞经济建设，全国一千多万干部，是为谁服务呢？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不是为少数人的幸福。现在发明一个东西，要给一百块钱，倒是会出懒汉，争吵，不积极。过去发明创造多得，哪里是钱买来的呢？计件工资不是个好制度。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了，创造发明就少了，积极性就低了，因为有几十年的经验，证明不是这样的。

人民公社，有的地方采用军事组织——师、团、营、连，有的地方没有；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这三化的口号很好。这就是产业大军，可以增产，可以改善生活，可以休息，可以学文化，可以搞军事民主。

似乎一讲军事就没有民主，恰好民主出在军事，即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战斗中才可以互助，官长压迫士兵在我们军队中才是犯纪律的，不名誉的。公社“三化”很好。这几年来，学了那么一套，一从资产阶级一本国上长的，二从无产阶级一苏联老大哥；好在时间不长，根未扎深，命还好革。整风以来，各种规章制度破得差不多了，资产阶级那一套，去掉不少。这回军委开会取消“花”。干部要参加劳动，写一个决议，中央委员每一年一个月，其他干部还要多，年老有病的除外。种试验田，何只一个月？云南有个师长，到连队当了一个月兵。我看所有的“长”——军长、师长等，都至少当一个月兵，那还不行吗？有些过去当过兵的，现在有多多年不当，再去当一下。文职干部，每年至少参加一个月的劳动。修十三陵水库时，许多部长都参加劳动了。一年学农，二年学工，轮番着学，总得学会两套本领。人民公社军事化，并不是资产阶级军事化，而是无产阶级军事化，有纪律，有民主，相互关系是同志关系，是说服不是压服。劳动要有严格的纪律。

全民办工业。暂时出一些混乱现象，界限未划清。这次会议，工、农、商、学、兵都有，重点是工业。全党全民办工业，从今以后，第一书记要偏到工业方面来；过去我们偏到农业方面，拿农业压迫工业，将它的军。农业搞起来了，农业上了轨道，工业还没有上轨道。工业要抓，有人说，睡到工地上，睡到机器旁边去，就可以搞起来，不到机器旁边睡觉不行。东北三省过去抓工业，但农业未搞好；东北要一面抓工业，一面抓农业。其他各省、自治区重点抓工业。明年是决战的一年，主要是指工业。要抓，还要抓紧，不是抓

而不紧，以后考就是考工业。六条纪律：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任，四撤职，五留党察看，六开除党籍，不坐班房，坐班房损失劳动力。这几条都是神经战，不可少，是属于惩罚一类性质的。几个指头是说服，靠政治，凭良心办事，一个指头是纪律。马克思主义不是靠惩罚，靠惩罚办事就犯错误。我们党历来靠说服教育和斗争，只有那么少数人，你说服不了他，就得惩罚。先警告，紧急的时候，一下撤职也是有的，这是说服与纪律的关系。

死与活的问题，不是死人之“死”，是统死统活的问题，世界上没有“死”是不行的。1100万吨钢，少一吨也不行，这是“死”的。明年2500万到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其中2500万吨是死的，是“死钢”，另外200—500万吨是活的，归地方支配。有些同志怕没有活命了，统统都活不行，要有死有活。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分级办工业，全民办工业，有重点，有骨干，有枝叶，树总有干，才有枝叶。

下次会议，两个半月以后再开，即十一月半在南方再开一次小型会议，时间不要这样长，因为那时还不能总结。十一月后，剩下个把月，还可以抓一下。也是第一书记、计委一起来开，十一月十五日开会。我就是抓钢铁，这个事与我有关。《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一书（斯大林的不好），请各省都印，广为散发，让大家看一下，很有启发；但又相当不足，因为那时受条件限制，没有经验，所论当然模糊不明确。不要以为老祖宗都放香屁，一个臭屁也不放；讲到将来，是一定有许多模糊地方的。苏联有41年的经验，我们有31年的经验，要破除迷信。

除四害。国庆节、阳历年、阴历年抓一下，我希望四样

东西越搞越少，越少越好，因为这些东西对劳动人民有害，直接影响人民的健康，要把各种疾病大大消灭。杭州市有个地方，去年只有一人害病，出勤率达到 99% 以上。医生没有事做，可以去种地，做研究工作。哪一天中国消灭了西害，要开庆祝会的，历史要写进去。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办到，他们所谓文明，可是苍蝇、蚊子多得很。

毛泽东的讲话，是对会议作的最后总结，不过，内容在前几次讲话中反反复复多已讲过。政治局扩大会议开过后，工业书记会议又开了一天才结束。工业书记会议由薄一波主持，陈云、富春到会讲话。这之前，陈云还讲过几次。在 27 日的讲话中，陈说，这次会议是生产会议，主席发现了问题提出来，非常严重地提出来，我们没有抓生产，他批评得很严重。特别是他提的，现在没有纪律，纪律像豆腐一样这不行，要马克思加秦始皇。29 日，陈谈了六条意见：一、搞好上炉子，主要的关键是上炉子，否则钢铁生产今年就完不成，像主席所说就是失败。土炉子成为今年的一个主要问题。二、机械工业的任务，首先是发动群众，挖掘潜力。江南造船厂用一个车间将一个车间军的办法，造一艘五千吨的船，从 18 个月减到 5 个月。三、目前存在的以物事物的现象有必须制止。从生产出发还是从分配出发，反冒进就是从分配出发，主要力量应放在生产上。四、已经签订的合同要遵守。五、中央和地方必须共同努力。六、要召集一次基本建设的会议。

毛对钢铁产量逼得紧，陈云不得不反复强调抓钢铁生产计划的落实，甚至说出了“土炉子是关键”的话，问题明摆着：“洋炉子”根本完不成翻一番的任务，硬是不准少一吨

的话，只有搞土炉子，各地分摊。其实陈 21 日的发言中说过，钢翻一番这样的指标布置下去都是很迟的。似是话里有话：变动了的计划本来就下达得晚，落实起来势必困难重重，怪不得下面。

可是，工业书记们还得在会议上纷纷作自我批评，检讨过去一个时期放松了生产的领导，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计划工作上，特别是放在基本建设的投资计划上，大家争投资去了。30 日下午，主要产钢铁区的工业书记当面向毛作保证，一定完成当年以钢为纲的工业生产计划。这个计划中钢铁和机械的主要任务如下：钢 1150 万吨、（对外宣布为 1070 万吨），生铁 1700 万吨，冶金设备 35 吨，发电设备 90 万千瓦，机床 8 万台。为了在年底前完成任务，会议还排了一个生产时间表：9 月份完成生铁 200 万吨、钢 200 万吨，12 月份生铁 350 吨、钢 220 万吨。

31 日，薄一波在工业书记会议上作总结发言，传达了毛泽东一个惊人想法：要破除迷信，美国算不了什么，用不了一二十年，苏联可以变为两个美国，我们可以变为四个美国。到这时，使人感到，一般地赶超英美已不够气魄了，中国人民要有这个志气，美国不在话下，于是一个美国变成“四个美国”。而且隐含着这样的意思，你赫鲁晓夫只不过变成两个美国，我比你多一倍，所以我是英、美、苏一起超过！

这里附带说件小事，即上述陈云说的上海江南造船厂那艘五个月造成的船，我去看过，只是一个船体，空壳壳，内中既无机器，也无其他设备。就在北戴河还是回北京后的基建会议上，我向他谈过。后来经过了解，陈认为我反映的是



事实。

## 会议通过的文件

北戴河会议讨论的问题很多，会上印发的文件也很多，有百多份，正式讨论通过后下发全国的也有 40 份，比成都会议通过的文件还多 3 份。这些通过的文件是：

一、计划和工业生产方面：

- 1、《关于 1959 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
- 2、《1959 年度国民经计划的主要指标》；
- 3、《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
- 4、《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意见》；
- 5、《关于物资调拨问题的意见》；
- 6、《关于改进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审批办法的意见》；

7、《关于经济协作的几项规定》；

8、《关于纺织机械企业领导问题的决定》。

二、农村工作方面：

- 1、《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 2、《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
- 3、《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
- 4、《关于肥料问题的指示》；
- 5、《关于 1959 年农业生产安排的决议》；
- 6、《关于储备粮食问题的决定》；
- 7、《关于农业社积累与消费问题的指示》；

8、《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

9、《关于改进农村大专学校教育的指示》

三、财贸工作方面：

1、《商业部党组关于召开商业厅局长会议向中央的报告》；

2、《关于进一步改进财贸管理体制和相应改进银行信贷管理体制的几项规定》；

3、《关于粮食、棉花、油料的收购计划》；

4、《关于对外贸易必须统一对外的决定》；

5、《李先念、程子华同志关于物价问题向中央的报告》；

6、《关于发展中药生产问题的指示》；

6、《关于做好薯类抢收、保管和加工干制和使用工作的指示》；

7、《商业部关于棉、麻、烟收购的意见》

四、教育、卫生方面：

1、《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

2、《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陆定一的文章）；

3、《关于继续展开除四害运动的决定》

五、劳动制度和其他问题：

1、《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

2、《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

3、《关于劳动制度问题的决定》；

4、《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

5、《关于技术保密问题的指示》；

6、《中央国家机关和事业、企业单位职工宿舍冬季取暖补贴问题的意见》；

7、《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公报》。

这里将主要的文件内容作一简单介绍。

关于1959年计划和“二五”计划的三个文件，主要是确定了自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几次加码的计划指标。这里将这两个计划的主要指标列表如下：

项目	1959年计划	比1958年预计数 增长	1962年产量① （“二五”计划）	1957年增长 （“一五”计划）
1. 农业总产值（亿元）	3516—3706	68%	8000—8200 9000	5—5.1倍 5.7倍
财政收入（亿元）	722.5	68%	5200② 5600—5800	2.9倍 3.1—3.3倍
基本建设投资（亿元）	501.22	118%	3850③ 4300	6.8倍 7.1倍
钢（万吨）	2700—3000	145—173%	8000 10000	13.9倍 17.1倍
生铁（万吨）	4000	135%	9000 10000	14.4倍 18倍
钢材（万吨）	1900—2000	144—156%		
煤（亿吨）	3.779	80%	9 11	5.9倍 7.4
发电量（亿吨）	550		3000 3500	14.5倍 17.1倍
新建铁路（万公里）	1.05			
原油（万吨）	800	281%	5000 6000	33.2倍 40.2倍

① 1962年产量计划均为两本帐，上面的数字为第一本帐，下面的数字为第二本帐。

② ③ 财政收入和基本建设投资的数字，均为“二五”计划五年的总和

化肥（万吨）	530	231%		
机床（万台）	30	288%	50 60	16.7 倍 20.2 倍
棉纱（万件）	1000	58%	2600	46 倍
粮食（万亿斤）	1-1.2	33%	1.3 1.5	2.5 倍 3.1 倍
棉花（万担）	9000 10000	45%	15000	3.6 倍

《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大型的综合性的人民公社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在若干地方已经普遍发展起来，很可能不久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一个发展人民公社的高潮，并且有不可阻挡之势。《决议》对人民公社发展的主要基础，是这样说的：在农田基本建设和争取丰收的斗争中，打破社界、乡界、县界的人协作，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成为群众性的行动，进一步提高了五亿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室、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等，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进一步培养和锻炼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所有这些，都说明几十户、几百户单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关于人民公社的规模，《决议》提出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为合适；也可数乡一社，六七千户左右；万户以至两万户以上，也不要反对。这样的规定弹性必

然很大，从两千户到两万户相差 10 倍，导致后来不少地方建立了五千户、一万户以至两万户以上的大公社。《决议》提出，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所有制。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着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决议》最后说：“建立人民公社首先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而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地做好准备。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探索出一简要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公报》是会后第二天由新华社发表的，题目富有鼓动性：《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 1070 万吨钢而奋斗》。公报说，1958 年粮食作物总产量将达到 6000 亿至 7000 亿斤，比 1957 年增产 60—90%；棉花产量将达到 7000 万担左右，比 1957 年增产一倍以上。公报公布了经过修改后的 1958 年钢产量计划指标，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 1958 年生产 1070 万吨钢（即比 1957 年 535 万吨钢增加一倍）而奋斗。公报还肯定了建立人民公社的意义，既认为它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组织形式，又预言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 高潮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狂风巨浪的“大跃进”运动，北戴河会议是最高潮的标志。如果说这以前的一系列会议，形成了“大跃进”的几次洪峰，那么北戴河会议就是洪峰的最高峰。

首先是会议正式确定了年中才修改提高的钢铁计划指标，使钢铁生产由会议前的行业行为骤然升级成为会后的全民运动。从50年代前期开始，毛泽东就有一种“钢铁情结”，把钢产量作为国家强盛与否的标志。这同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生产的思想不无关系，马克思认为，社会再生产过程，总是生产资料部类的生产优先于消费资料部类的生产。毛把生产资料又简约为钢铁和机械，并以钢铁为龙头，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为纲”，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概念：“纲举目张”，即纲一举目必张，是一种主导关系，一抓起钢来万事都好办了，这也是毛的哲学思想：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自迎刃而解，因此就要用“全力”抓住主要矛盾。我在《酝酿总路线的成都会议》中写过，毛对国务院的工作久有不满：“那么多干部，都干些什么；尽事务主义，抓不住主要矛盾。这大概是大跃进时期‘以钢为纲’、‘三个元帅、两个先行官’等等方针的最早由来。”“钢”同“目”正符合这样的哲学思维：“目”受“纲”支配，“纲”对“目”起决定作用。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所谓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也决不是如此简单的决定作用或主次关系，事物都是非常复杂的，经济建设中更难运用此种思维。何

况，人们在工作中，还难搞“单打一”，只抓纲不抓目；可是，当时有六条纪律在，谁都怕戴“不抓纲”的帽子。后来九千万人上山，影响到许多地方收粮食，丰产未能丰收。

当然，毛历来重视粮食（消费资料之首），把它作为同钢铁、机械并列的“元帅”之一，历史如此作弄人，1958年上半年大放粮食“卫星”后，毛相信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于是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甚至讲“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反过来，钢铁生产成为他的心病，因而宣布六条纪律，要以“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权威，搞出1070万吨钢，直到1958年，毛才认真抓起工业来，关于生产一吨钢尤其是一吨好钢，需要哪些条件，即相应的先炼成铁的各种原材料，以及动力，电力，设备等等，在如此紧迫的时间（19个星期）内，能否办到？所有这些前提条件，应当说，他远不及专业部门那样具有感性理解，否则，他怎么可能轻易树立这样一个雄心壮志？他似乎也看到此事的难处，于是在会上说到：钢翻一番，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这是多少有点坦露心声的话，生产不了1070万吨，板子最后要打到自己身上。对发展战略的思考和对个人尊严的维护，交织在一起，构成动员“全党办钢铁”、“全民大炼钢”的动力源泉。

北戴河会议后，从中央到地方，炼钢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其他各项工作与炼钢发生冲突者均“停车让路”。在“土洋结合”的方针下，一方面拚命“挖掘”各大中钢厂的“潜力”，一方面大力推广“小”（小转炉、小平炉以及遍布全国的小炼铁炉）、土（土法炼铁炼钢）、群（群众运动）”

的炼钢“经验”。各地党委以第一书记挂帅，广泛动员社会各行各业炼钢。9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钢铁生产必须快马加鞭》的社论，称北戴河会议公报公布14天里，各省、市、自治区投入钢铁生产的大军已达2000万人以上；9月上旬全国平均每天的钢产量较8月上旬提高了33%；到9月10日，全国建起小土炉、小高炉35万多个，比1至8月份的总数剧增11万多个。说是卷起狂潮，一点不过分。

作为“大跃进”高潮的标志和影响进程的大事，北戴河会议更重要的是做出了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如前面所说，人民公社同毛泽东1955年设想办的大社，同成都会议决议提出的小社并大社，都有明显的质的不同。它不仅在规模上比大社还大，而且在性质上比大社的公有化程度更高，在社会意义上被赋予新的内容，如果说大社还是被作为一种农村的经济组织，那么人民公社已经超出这个范围，政社合一，被当作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甚至被当作“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过一些基本的思想，简要说来，这样一些原则是明确的，即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才可能开始，这一过渡必须是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以及人们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准的条件下，才可能实现。当然，到底还要具备哪些具体条件，才能开始过渡，这是需要依据社会发展的进程不断探索的，需要实践已经向人类提出这个问题时才能开始解决的。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轻率地提出这个问题，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简化为“产品丰富”和“共产主义精神”两条。认为中国已经具备或正在具备这两



条件，竟以为在不久的将来甚至几年内就可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毫无疑问是一种空想。

如果说，人民公社是从“立”的方面找到了急于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桥梁，那么，毛泽东号召“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则是从“破”的方面，为实践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打开了道路。最先响应这个号召的是柯庆施的笔杆子张春桥，他写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发表在1958年9月16日出版的上海《解放》第6期上。文章赞成实行供给制，而把薪金制看成是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产物。10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时，前面有毛泽东写的编者按：“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张春桥因此文而得宠，以后柯庆施参加中央的会议，就必带上这个“笔杆子”了。在两三个月之内，全国报刊发表了讨论这个问题的几百篇文章，《人民日报》即达四、五十篇。上海市社科联为此组织了6次座谈会，并将发言稿辑成专集，计有七、八十篇文章。由此可见当时这个问题在全国影响之大。

“资产阶级法权”一词翻译上有错误，应译成“资产阶级权利”。当时从毛泽东起，绝大多数人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也是错误的。这个概念是马克思最早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来的，以和封建特权这一概念相对立，他把按劳分配中的等量劳动交换的原则叫做“资产阶级权利”。他使用的这个概念并不具有资产阶级的剥削属性，并不是指剥削者的权利。因为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

义社会)，已经不存在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和阶级差别。他只是认为，这个原则和资本主义商品的等价交换中的等量劳动决定等量价值的原是同一原则；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性质改变了，但形式还存在。马克思还指出，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的交换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包含着在劳动者中间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如劳动者工作能力的不同，家庭负担的不同，等等；这些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实现按需分配时，才能完全消除。恐怕马克思使用这个概念也不甚确当。马克思是在抽象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他并没有否定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没有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同资本主义的商品混同起来。

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把按劳分配、工资制等列入社会主义要取消的对象，是对马克思原意的误解。其一，他把按劳分配中等量交换劳动原则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似乎按劳分配本身就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权利，把马克思在特定的抽象意义上使用的、不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权利”，同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混为一谈，从而模糊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同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的本质区别。其二，他把消费资料分配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几乎全部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都存在“资产阶级权利”。其三，他把对共产主义社会来说应当否定的按劳分配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是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破除的弊病。至于毛泽东把脱离群众、争名夺利、搞特殊化、等级制度以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等统统视为“资产阶级法

权”的表现，这更是对马克思原意的附加。他所说的这些现象无疑应该防止和消除，但它们主要是作风问题和体制弊端，而不是“资产阶级权利”。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误解，在理论和实践上造成的混乱和严重后果，到“文革”后期，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更是达到顶点。

1958年春夏大放粮食高产“卫星”；一些地方（如河北徐水）在农田水利建设中采取某些组织和协作的方式（其中有一些显然很不对头），拔高为“军事化”的经验；还有的农村因农忙而建立的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理发室等，被视为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表现。这股热浪烘托出毛泽东久已心向往之的空想社会主义蓝图。在他看来，1958年出现的这些情景，同他对中国未来社会的设想正相吻合。这两者产生了某种互动：本已有些浮夸和被曲解的实践场面，为毛泽东的空想提供了“实证”；而毛泽东的空想，又给这些实践场景赋予某种理论色彩。

北戴河会议作出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后，人民公社运动顿时在全国形成铺天盖地之势。各省、市未经充分准备，就争先恐后匆忙地并小社转公社。会后仅一个月，全国农村就基本实现了公社化。历史常常出现这种现象：一种事物当它上升到峰顶时，也就开始了向低谷下滑的过程。北戴河会议就具有这种性质，它把“大跃进”运动推向最高潮时，隐伏在这场运动中的危机也即从此开始一天天显露出来，并且日甚一日。

## 人民公社好

1958年下半年，紧跟着“大跃进”高潮，在全国农村又出现了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北戴河会议后，一个月之内，迅速地实现了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化，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几乎全部地转为“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大跃进”已经是生产力“发展”的疯狂冒进，而人民公社化运动更是在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的变革方面，来了一次大大的盲目冒进。从本质上讲，在当时这是急于将中国社会带到共产主义的一次规模极大的尝试。

### 来自苏联的影响

向共产主义过渡，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直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列宁曾经设想，共产主义就等于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他估计，通过电气化道路，有可能在为期不下10年或10—20年的时间里，使俄国走向共产主义。1920年10月2日，他在俄国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

说：“现在是 15 岁的这一代人，就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身建设这个社会。”“再过一二十年就会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列宁选集》第 4 卷 359 页）十月革命初期，苏维埃俄国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当然，不久又实行过新经济政策，以弥补以往的失误。）斯大林 1936 年宣布苏联社会主义已经建成，1938 年开始第 3 个五年计划时提出：在 5 年内，“完成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并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1952 年又宣布，“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已处在“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到 1957 年 11 月，赫鲁晓夫在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提出，在今后 15 年内苏联赶上和超过美国。与此同时，又在内部确定：从 1959 年算起，用 12 年时间达到共产主义。1959 年 1 月，苏联宣称进入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 127 页）

苏联这一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形势，对社会主义阵营一员的中国是一个很大的促动。1953 年公布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毛泽东就原则地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4 年 6 月 14 日，毛泽东说：“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 3 个五年计划，即 15 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 50 年即 10 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象样子了。”1955 年 3 月，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他又把“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具体化为“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10 月 11 日，在中共七

届六中全会上，他把中国未来的发展进程同赶超美国、过渡到共产主义联系起来。他讲过，大约 10 年左右，即 3 个五年计划左右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大约 50 年到 70 年左右会出现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到 1957 年 7 月，他又设想：10 年至 15 年之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着逐步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 8 个至 15 个左右五年计划在经注上赶上并超过美国。这些超前的理想设计，虽然对当时的工作有影响，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形势还没有形成。1958 年 5 月八大二次会议及其以后，认为超过英国只不过是 7 年、5 年和两年，赶上美国也不过是 15 年、10 年便可实现的事，于是就出现这样一个链条：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拼命追求工农业生产到生活甚至文化教育事业的高指标、高估计；由此而构想出人民公社这种将每一个人从生产到生活都管起来的准军事组织，或者说是一种便于很快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组织形式。

## 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小变大

1955 年夏秋，围绕农业合作发展速度问题，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毛泽东发生了争论。邓主张发展速度适当放慢一些，巩固现有的农业合作社，老区停止一年，新区小发展或适当发展。毛则严厉指责邓，“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去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

的清规和戒律。”同年10月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以更加猛烈的攻势，发动全会批判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并说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

这样一场争论的实质，是如何理解与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之间关系的问题。应当说，这是一个有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邓子恢认为生产关系的改造一定要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要有利于达到增加生产的目的。毛泽东则侧重于强调通过人和加快生产关系的改造来发展生产力。为此，他可以不顾生产力的现实状况，而急于改变生产关系。七届六中全会上他说过：“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纯而又纯的，不允许有一点杂质，不允许有一点小生产，这样生产就发展了，社会就进步了，人民就安居乐业了。但是，“水至清则无鱼”何况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不可能只有单一公有制，由于各种原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地区、行业、阶层、集团之间，不可能是平衡的，非要把生产关系搞成清一色，生产就会窒息，就会停滞。

毛泽东批判“小脚女人”，批判农业合作化中的“右倾保守思想”，直接的后果是人为地大大加速了合作化的进程，更深层的后果是这种脱离生产力现状的“唯生产关系论”，成了占居统治地位的“天经地义”的指导思想，成为后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等一系列急于过渡的改造生产系实践的滥

筋。办大社就是搞人民公社的最初的预演。

1955年12月，毛泽东主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即提出了搞大农业社的思想。他为《大社的优越性》一文写的按语中指出：“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为了易于办成，为了使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结果，普遍办高级社，时间偏快，规模偏大。安徽有16个社规模在3500户以上，河南千户以上的大社有495个。这就给生产和分配带来不利影响，部分社员开始闹退社、分社。据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1956年12月，向辽宁、浙江、江西、四川、陕西、河南、河北等省了解情况后向中央的汇报：“今年秋收分配前后，在一部份农业社内，出现社员要求退社的情况。退社户，一般占社员户数的1%，多的达5%；思想动荡想退社的户，所占的比例更大一点。浙江省的宁波专区，已退社的约占社员户数5%；想退社地占20%左右。广东全省已退社的约7万余户，占社员户数1%，并已有102个社垮了台。辽宁省，今年是丰收的，也发生了社员的现象。”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中央农村工作部分析认为：1、收入减少。各省一般都有10%到20%的社员户减少收入，减少收入较多的户，多半是富裕中农、小商贩和有技术的手工厂等，他们的收入减少，而且一般社的生产水平一、二年还将赶不上富裕中农的水平，他们便积极想出去单干。减



少收入不多的户，情绪也有些动摇。特别是合作社成立时有些干部的许愿落了空，社员很失望；2、农业社对社员劳动时间控制过死，劳动过分紧张，引起不满，社员没有时间搞家庭副业，零用钱困维；3、干部作风不民主。4、对社员入社的生产资料处理不当，特别是将社员的零星树木、果树和小块苇塘等也入了社，社员最为不满。5、农村自由市场开放之后，有些社员，特别是一部分富裕农民，要求入社搞自主经营。等等。

1957年，中共中央针对合作化运动过急过粗、遗留问题较多等情况，对合作社进行了整顿。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针对1954年以后，生猪生产连年下降的情况，提出继续贯彻“私有、私养、公助”方针，给社员分配适当的饲料地，还将生猪收购价格提高13.6%。3月，中央共中发出《关于民主办社几个事项的通知》，要求各合作社，按时公开财务开支，社队决定问题要同群众商量，干部要参加生产，减少社员负担等。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农业合作社的指示》，内容包括：（1）整顿干部作风，改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2）调整社队的组织，合作社规模过大的、不适当的，可根据群众意见划小，由社自负盈亏；（3）统筹安排，使社员各得其所；（4）改善管理，拟定生产规划。文件中强调，要发挥社员集体劳动的积极性，合作社规模大小应照顾技术、经济、居住、历史条件，允许有各种差别而不要千篇一律。一村一社较合适，……但现在部分合作社组织规模过大的不适当，应根据群众的要求合理调整，或把社划小，或保持原社，下设分社，自负盈亏。以二十户左右为宜。而且应长期稳定下

来。这个《指示》抓住了当时农业、农村工作的关键，如果照此执行下去，中国农业、农村工作可能是另一番景象。

但是，在毛泽东督促下，1957年1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修正草案）》，指示各地执行。这个文件是在八届三中全会改变八大对国主要矛盾的提法、批判反冒进的情况下发出的。这个《纲要草案》下发后，全国农村又开始大辩论，掀起兴修水利和积肥的高潮，形势又发生剧变。1958年1月，毛主持召开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严厉批评纠正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正确作法，认为一反冒进，人民就泄气。这是政治问题，以后永远不许反冒进。听说广西出现并社现象时，毛说：“可以搞联邦政府，社内有社。”会后，他似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并写了前言。前言中说：“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1956年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1957年发动整风运动，又在思想战线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就在这一年，又超额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样，就产生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因此，他强调提出“不断革命”的问题，提出“苦战三年”，“争取在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的口号。

3月，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认为：“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更小，在生产的发展和组织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

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这份文件不切实际地分析了农田水利建设等对于扩大合作社规模的需要，由此提出把小型农业社合并成一乡几社规模的大型合作社的意见，这一意见的提出，反映了在农业合作社问题上的盲目贪大情绪，直接促成了1958年上半年部分农村大办大型农业合作社，并且成为1958年夏天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先声。3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河北省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苦战三月，改变全县自然面貌》的文章，还配发社论，肯定和推荐了徐水“基本上消灭了水灾和旱灾”，“从一个工作很平常的县一跃而为先进县”的所谓“又快又好的典型”经验。4月12日，又在头版头条，以《联乡并社发展生产力》为题，报道了福建闽侯县在3月间，把城门、下洋、龙江3个乡合并为1个乡，把23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1个社的消息，并以《编辑的话》的形式，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的主要观点予以发表。随后，小社并大社工作在各地普遍展开。5月间，辽宁将9272个社合并为1461个社，基本上是一乡一社，平均每社约2000户左右，最大的为18000多户。河南由38286个社合并为2700个社，平均每社4000户左右。河南嵯峨山卫星社是4月份由4个乡27个社合并起来的，合并后，有9369户，43263人。河南信阳地区于7月间，将5376个小社合并为208个大社，平均每社8000户，河北徐水商庄农业社由40个小社合并，达56000多人。北京郊区农村，由原来的1680个社合并为218个社，平均每社1600户。各地在并社过程中，又出现了大办工业、公共食堂、幼儿园、敬老院的形势。这些“大办”，已经突破了原有农业合作社名称所包含

的内容。这些并起来的大社，名称不一，有的叫联社，有的叫集体农庄，有的叫人民公社。

### 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好”

农村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已经来临，“大跃进”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发展。一时间，农业方面浮夸成风，似乎粮食会多得吃不完。当时报纸上报道一些农业社放高产“卫星”的消息。如河南西平一个社亩产小麦 7200 斤，湖北麻城放一颗早稻亩产 36900 斤的“卫星”，广西环江的“卫星”更大，中稻亩产 13 万斤。农业部发布 1958 年夏收粮食作物生产公报，宣布夏收粮食作物比上年增长 69%，其中小麦增产数字比过去 5 年增产的总和还多一倍。《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认为，“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决定了”。工业方面也开始浮夸，追求高指标，似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真是处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形势下，人们不能不关心如何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1958 年 2、3 月间，毛泽东和陈伯达谈过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的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4 月，刘少奇同周恩来等人谈过公社、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问题。在广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谈到几十年后我国的情景时讲到：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

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

1958年6月，中宣部编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7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陈伯达的短文《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赞扬湖北省鄂城县旭光农业社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陈伯达在这里透露了人民公社的名称。

6月底7月初，在晋冀鲁豫陕京农业协作会议上，谭震林讲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变革问题。他第一次把河南遂平县嵒嵒山卫星农业社称为“共产主义公社”。他说：“农业大丰收，在农村已开始了新的变革，在合作社组织上和合作社的经营管理上、规模上开始了变革，它已经不能按照原来那些方法、那一套制度、那一套形式来发展了，需要有所改变了。”像遂平县嵒嵒山卫星社已经不是农业合作社，而是“共产主义公社”。他还讲到，合作社需要过渡，由现在的状态过渡到更高级，办法是直接到国营农场，有些地方搞公社。

嵒嵒山卫星农业社是1958年4月20日由27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共6566户，30113人，《红旗》杂志责任编辑李友九于当年7月17日到这里来时，已改名为卫星人民公社。8月8日，他在给陈伯达的信中写道：“他们这里并大社，原来也只是为了并大一点，好搞建设。”后来听了谭震林“工农商学兵”办“公社”的道理，才把卫星农业社改为卫星人民公社的。“公社”这个名词，群众还不习惯，有写“共社”的有写“工社”的，李友九随信给陈伯达寄去《嵒嵒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单（第二次草稿）》一份，并说

明这是他和河南同志“大汇合、大研究”之后写成的。陈伯达收到后，即将《简单》草稿的复制件和李友九的信转报毛泽东。毛当即对《简单》作了修改，批示：“请各同志讨论，似可发到各省、县参考。”

7月16日，《红旗》第4期刊载了陈伯达“七一”前夕在北京大学的讲演稿：《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明确地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一种新的社会基层组织的构想：“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篇文章为以后成立的人民公社的性质和特点，定下了基调。

8月上旬，毛泽东到河北、河南、山东农村视察。在河北徐水县，他称赞“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讲到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可以考虑让农民一天干半天活，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在大寺各庄，他问农业社社长李江生，这里的农业社叫什么名称，李江生回答说：“叫第八瀑河农庄。”毛泽东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在河北安国县，毛泽东对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说：是不是一乡一社，是不是搞万人公社。说在平原地区八千人搞一个公社不要紧，社里工农商学兵都有。要搞全民武装，给民兵发枪。还说，县也要并大一点，并到几十万人的大县。

8月6日下午，毛泽东到达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在公社办公室门口，看到8月4日刚刚挂出来的公社的牌子，随即说：“人民公社名字好，包括工农商学兵。它的特点一

曰大，二曰公。”在视察公社棉田时，对陪同视察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吴芝圃说：“有这么一个社就不愁没有更多这样的社。”

8月9日，毛泽东到山东省视察。当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 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的到来

毛泽东视察冀、豫鲁三省后，《人民日报》将“人民公社好”5个字用大号字登在显著位置，中央领导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就尽人皆知了，随后就出现了各地农村积极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毛离开徐水的当晚，大寺各庄即成立人民公社，为纪念领袖视察，取名“东方红八四人民公社”，宣布一切房屋、树木、猪只、羊群、大车、牲畜全部归集体。8月5日，徐水县委就宣布全县248个农业社全部转为人民公社。到8月底，河南全省已经人民公社化了，在原有38473个农业社、平均每社260户的基础上，建成大型人民公社1378个，平均每社7200多户，入社农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99.8%。

8月17日至30日，中央中共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时，会议议题共有17个，关于人民公社问题是其中之一。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将事先准备好的《关于在农村

建立人民公社的意见》的文稿和陈伯达转送的《崂崂山卫星公社试行简单（草案）》印发给与会人员。8月23日，讨论农村工作，大家都同意在农村办人民公社。29日，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决议》认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很可能不久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一个发展人民公社的高潮，且有不可阻挡之势”。因此，“在目前形势下，建设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快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关于人民公社的性质，《决议》一方面决定：“人民公社建成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但同时又认为，这个过渡时间不会太长。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同时还认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决议》还预言：“共产主义在这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8月29日，即通过建立人民公社决议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还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充分发扬“拔白旗、插红旗”的共产主义风格，就农业社如何分配和是否建立人民公社问题进行鸣放辩论，引导农民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来解决这两个问题。”

9月1日，《红旗》杂志第7期发表《迎接人民公社化高潮》的社论和崂崂山卫星公社简单（草稿）。9月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从“卫星”公社简单看如何办公社》，赞扬嵯峨山卫星公社“在若干方面突破了集体所有制的框框”，“取消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

9月10日，《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公开发表。《人民日报》同日发表社论：《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11日，《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指示》也公开发表。全国范围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迅即来临。据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9月底的统计：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西藏除外）共建人民公社23397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原90.4%，其中有12个省、市、自治区达到100%，10个省、区达85%以上，4个省、区（浙江、贵州、宁夏、新疆）在国庆节前基本实现公社化，云南一省计划10月底完成。到10月底，全国原有的74万多个农业社改办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人民公社的农户1.2亿多户，占总农户的99%以上。1980年我到青海龙羊峡水电站工地出差时，听到青海的同志说，当年青海有一个偏远的县（似是玉树）未办人民公社。全国农村不出一两个月，全部人民公社化了。

由于指导思想存在着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左”的偏向，在实际工作中又未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传统作法，急于求成，一轰而起，一两个月即实现了公社化。而新闻媒介又不适当地介绍和推广某些错误的甚至假造的所谓典型，使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开始，就伴随着许多重大弊病。强调一大二公，几千户，上万户并为一个公社，实行统一核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起来。徐水县是中共中央确定的共产

主义试点单位，其制定的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是，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出名的山东省寿张县，计划两年实现共产主义。浮夸更严重的山东省范县（今属河南省），居然在1958年10月28日的万人大会上宣布“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还用诗一样的语言具体描绘了进入共产主义的美好图画，这在当时已经成一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

这个时期，全民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大办交通运输、大办文教事业等等群众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这些运动在农村无一不是凭借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依靠大规模地甚至是无偿地调用农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实现的。1958年下半年，各地动员了数千万社员大炼钢铁、大办工业。据17个省的不完全统计，共建炼铁、炼钢炉60多万个。炼出上铁240多万吨、土钢50多万吨；煤窑5900个，小型发电站4000多个，水泥厂9000多个，农具修理、制造厂8万多个，还有大批土化肥厂、粮食加工厂、榨油厂、制糖厂、缝纫厂等。这一年，全国新建公路15万公里中，由人民公社修建的约占2/3。仅在京广、津浦铁路沿线的人民公社，前后就发动150万人参加复线工程，完成2700多公里。各地先后动员7000万人（最高时达1亿人以上），搞“水利化”，经过半年时间，完成土石方580亿立方米，新增灌溉面积约4亿多亩。（因盲目施工，实际真正见效的估计不到5000万亩。）还大办教育，在校学生人数，1958年小学生增加了2200万人，比上年增长34.4%。这些，无一不助长农村中“共产风”的泛滥。

这场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来势之猛，速度之快，规模之

大，远远超过 1955 年下半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与农业合作社相比，人民公社已有了不只是量的方面而且是质的方面的飞跃。

第一是“大”。人民公社化前，全国有 74 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每社平均约有 170 户、2000 多亩土地和 350 个左右的劳动力。人民公社化后，变成了 2.65 万个人民公社，每社平均约有 5000 户、6 万多亩土地和 1 万个左右的劳动力。全国平均 28.5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为一个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基本上是一村一社、一乡数社，人民公社则一乡一社甚至数乡一社，规模扩大了 10 倍以至几十倍之多。山西省平均 44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成 1 个人民公社。全国平均 4500 多农户 1 个公社，1 万到 2 万户的大社有 532 个，2 万户以上的社有 51 个。河南、吉林等 13 个省至 9 月底还建立了 94 个县人民公社或县联社，作为一种基本的生产单位，这种人民公社的规模已经超出了当时干部的管理能力。

第二是“公”。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及其他公共财产全部转归人民公社所有，实行全社统一核算。原来由社员经营的自留地及个人拥有的林木、牲畜收归人民公社经营或归人民公社所有，使所谓生产资料私有制得到消除。国家把粮食、商业、财政、银行等部门在农村的基层机构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经营，使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增加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这种所有制方面的改变，使“共产风”泛滥：把经济条件不同的社拉到一起统一核算，穷社共了富社的产；消灭所谓生产资料私有制残余，集体共了个人的产；把全民所有制的部分企业下放给人民公社，公社共了国家的产。事实上，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

全民所有制的区别。

第三是“政社合一”的领导体制。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实行乡社分立的管理体制，乡是基层政权，社是农业经济组织。人民公社建立，实行政社合一、分级管理体制，人民公社既是一级政权，又是一种经济组织，在人民公社内部，将公社分为若干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又分若干生产小队，实行三级管理，由公社统管全社的生产安排、劳力调配、物资调拨和产品分配，生产大队负责生产管理和部分经济核算，生产小队则只是具体组织生产的基本单位。这样，就使公社领导往往用行政手段直接管理经济，违反经济规律，侵犯生产单位应有的自主权，造成生产经营方面的瞎指挥。

第四是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实行的基本是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制度，而人民公社普遍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制主要有粮食、伙食和生活基本需要的供给；工资制则是在供给之外，按照多劳多得原则支付社员一定数额的货币。实行最为普遍的是所谓“吃饭不要钱”的粮食和伙食供给。1958年底，全国农村共建立公共食堂340多万个，各种托儿组织340多万个，幸福院15万所。相当一部分人民公社实行儿包，即包吃饭、穿衣、居住、生育、教育、就医、婚丧、烤火、理发、看电影看戏等生活费用。河北徐水县甚至包下了社员的一切生活需要，叫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显然超过了当时的经济负担能力。这种办法套用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反映了小农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是平均主义，不是“共产主义”，严重混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

第五是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劳动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把人民公社的男女劳力编成各种军事建制，在各种“大办”中实行统一的军事指挥；还要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幸福院等公共事业，变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生活方式为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生活方式。其结果又造成干部对群众的强迫命令；实行战斗式行动，使群众经常处于紧张劳累状态；全体人民吃食堂，造成生活质量的下降

第六是过分强调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以为成立了人民公社，就能够促使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结果在粮食产量上虚报浮夸。按照当时公布的统计数字，我国人均粮食拥有量已达到 1000 斤以上，许多地方甚至超过 3000 斤，以至于发出粮食数字多了怎么办的感叹。河北安国县、山西长治地区、陕西长安县和山东单县在当年秋种时实行耕地 1/3 种庄稼、1/3 种树草、1/3 休闲的“三三制”。1958 年根据各省、市、自治区压缩上报的数字预计，粮食总产量高达 8500 亿斤，比 1957 年的 3700 亿斤增加一倍还多。高估产又引起高征购。1958 年的粮食实际产量为 4000 亿斤，比 1967 年增加 2.5%，而粮食征购量却由上年的 960 亿斤增到 1175 亿斤，增长了 22.23%，粮食征购量占实际总产量的比重，由上年的 24.6% 提高到了 29.4%。在大办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把夏粮吃尽的情况下，秋收时的高征购导致社员口粮短缺。同时，为了筹集办工业、炼钢铁的资金，银行将以前发放给农村的各种贷款，不管是否到期，一律收回，极大影响了农村正常生产和生活。在公社化过程中，还采取了辩论和斗争等政治工作的方法。如：安徽凤阳县在 1958

年9月《办人民公社总结》中写道：全县共辩论和斗争722人，其中贫农96人，下中农58人，上中农438人，富农63人，地主32人。这样，从1958年秋后开始，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各种问题和恶果逐渐显现出来了。

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来看，人民公社实质上是建立在半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带有浓厚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的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模式。而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质上企图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依靠提高公有制水平，来达到建成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目标。这场运动，从产生、形成到高潮，一方面受到苏联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错误实践的影响；同时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所谓巨大成就，使领导者误以为具备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过分地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变革生产关系的作用，对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长期性认识不足，缺乏耐心，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急性病和革命空想。这就决定了早晚躲不过必然失败的命运。

## 公共食堂始末

全国开始在农村大办公共食堂，是 1958 年下半年的事情，北戴河会议之后，随着人民公社的遍地开花，兴起一种共产主义将要到来的情绪。吃大锅饭办公共食堂，如大海来潮，势不可挡，不仅农村到处砸锅拔灶，全村老少凑在一起吃饭，有些城市也一时宣布要办人民公社了，北京有的胡同传来集中锅碗瓢盆之声。

前面提到，公共食堂出现于大办公社之时，是那种集体化、军事化劳动过程中，搞供给制、吃饭不要钱的必然产物。当人民公社最终成为毛泽东心目中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想模式之后，公共食堂便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不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成为闪烁“共产主义”色彩的象征物。1980 年初，在一篇毛泽东晚年的文章中提到毛泽东早年的思想初恋，似乎在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之情。这里的意思是说，毛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和实践，同他早年思想中一些萌芽状态的东西，有一定的联系。一旦时机和条件趋于成熟，萌芽就会破土而出。他在 1958 年对未来社会组织的构想中，就同他青年时期接受过的康有为的中国式“大同”思

想有直接关系。康氏在《大同书》中就设想“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等等范式。另一位对他有过影响的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他曾经一度想同新民学会的朋友们予以实践。新村在雏形上显然也同人民公社有亲缘关系。

我这样说，并不是肯定毛就从康有为等人处全盘接受了某种东西，因为事实上，毛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兴办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思想要复杂得多。我只是说，公共食堂等等“新生事物”，在毛看来是共产主义的象征，是一种未来社会的雏形之物，在他看来，人民公社出现的种种情况，早在战争年代就存在过，那时都过供给制的生活，都吃大锅饭，发点津贴费，没有什么工资等级，但人人都精神抖擞，不怕牺牲，全心为公。现在这许多新生事物，其实早就出现过，是合理的，美好的。因此予以礼赞，爱护备至，始终予以保护。如果不明白这层道理，就难以理解后来毛对公共食堂倾注的情感，以及为捍卫它而表现的气度。历史上最初的公共食堂，是以“农忙食堂”演化而来，是集体生产、集体劳作的产物。早在互助组时期，已经有了这种“集体吃饭”的作法，它是一种在农忙时节，农民为不误农时而自发组织起来的互助形式。记得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就有过青年农民的集体吃饭。

在中国农村，农民们在农忙时一向有集体吃饭的习惯。互助组时期，为了早出工，出工齐，多做活路，通常实行吃“转转饭”，也就是在张家干活就在张家吃饭，在李家干活就吃李家饭。伙食费用或从换工的报酬中扣除，或由就食者凑米凑菜在一起举炊。到了合作化时期，特别是高级社以后，由于公有程度有了进一步提高，生产规模也扩大了。农忙季



节劳动力紧张，于是便实行“吃集体伙食”，“吃劳动饭”，即出工劳力在一起吃饭。这样慢慢演化为“农忙食堂”，但不是常年性的，仅在农忙时开饭十几天或几十天不等。

“大跃进”开始后，“农忙食堂”最初是作为扩大生产力的重要方式而得到推广的，例如湖南桂东县群强社为解决劳力不足问题，提出搭伙煮饭的办法。结果这个办法不径而走，不到一个月就普及了好几个乡。乡领导要求县委表态。终于得到了支持，于是便在全县范围内推广了起来。

这时的“农忙食堂”还基本了“因地制宜”，形式多种多样。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一、自愿结合统一煮饭（称为“钵子饭”，各自备菜；二、菜饭集体煮，按时分开吃；三、食堂制，即粮菜入伙，集体吃大灶。）一般说来，农民比较喜欢第一种形式，因为有较大的自由，吃多吃少自己掌握，又可以自我调剂，吃到可口饭菜。桂东县委曾撰文总结经验，肯定了“农忙食堂”的三大优点：一、提高出勤率和劳动效率，以群强农业社参加集体饭劳力占98%的情况为例，在未实行集体煮饭前，经常出工的占70%；集体煮饭后，能达到97%；大大提高了出勤率，改变了早上不愿意出工，中午、下午早收工的现象，同时还节省燃料。二、增强计划用粮。据统计一乡全年可节省粮食一万斤。三、增强了社员的集体主义观念，逐步养成农村中新的社会风气。

农民根据农活安排，在农忙时节自愿组织起来，集体做饭吃饭，本来是中国小农经济分散劳动中，尤其是共产党提倡互助合作过程中，久已行之有效的一种传统，不过是一种自愿的暂时性的吃饭方式而已，并不包含某种政治意义，更称不上代表了什么什么方向。可是在“大跃进”和公社化的

大潮中，人们却对那些略带“集体”性质的事物别敏感，并且习惯于造声势加以过份宣传。

当然事情也有另一面，原来的“农忙食堂”只同生产需要相联系，并没有正式固定的房屋炉灶，也没有专人管理。但由于“大跃进”尤其公社化一来，农业大上，突击性大规模的活路越来越多，军事化的劳动生活随之而起，农忙农闲之分渐渐地没有了，“集体煮饭”便自然向常年食堂过渡。也就是说，“集体性”程度的提高，促使农村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不管大家有无思想准备，这种变化却蓦然而来，而且是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活所未曾出现过的，于是被认为这是向更高级社会结构的上升，具有无限广阔的前途和生命力。

事实上，即使是对“相对延长”的农忙食堂，农民也并不都由衷地支持。道理很简单，中国农民千百年来始终是个体生产者，家庭结构是最为稳固的（按，中国历史上并未出现过欧洲的“大奴隶”制，早在秦汉以前，中国即已盛行租佃式的封建地主制生产关系）。几千年来，“家”和“族”一直发挥着“绳索”的功能，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从而不断再生产着落后的社会生活结构和家庭结构。要在中国农村中扒掉某户人家的锅灶，那就无异于宣布取消某某在当地生活的资格，是对该户人家最大的惩罚，也是极大的侮辱。电影《我们的牛百岁》中那个无赖型的人物，砸了牛百岁家的锅之后，牛百岁的家人简直痛不欲生的情景，就是这种传统伦理观念的逼真反应。此外，在现有经济态下，集中起来吃大锅饭的方法，必然涉及到参加者的经济纠葛，张家短的问题势不可免，而且处理起来极为烦难，甚至就根本无法解决。

这种现实决定了，要么根本不搞什么长期型的“农忙食堂”，要么就干脆实行“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

较长期的“农忙食堂”普遍推广后，立即出现了不少问题，引起群众不满。以江苏省的常熟为例，意见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平均主义引起恐慌。由于办食堂的动机已有求公求大的苗头，因而要求农户将存粮一律集中于食堂。这自然引起群众的猜忌与惊慌，特别是余粮户反应更大，认为“共产了”，“吃大锅饭”，于是趁还未集中存粮之时，把原来每天吃两稀一干改为三顿干饭。还有的怕粮食被外人吃光，四处邀请亲戚、朋友一起上门，先敞开肚皮吃几顿。更多的连夜把粮食转移到外村、外地、以免被集中。甚至一些粮食不富裕户，也起存粮来了，二、强迫调剂，造成不满。在办食堂之际，有的户闹缺粮。社队领导采取简单办法，在存粮多与少的户之间进行调剂，而且带有强迫性质，类似“吃大户”，自然招来群众反感，也助长了闹缺粮户的依赖思想。三、把食堂改成永久式，占用资金房舍，增加了额外开支，例如有的队要拆旧房盖新房，砌新灶买大锅，这些钱都分摊在各家各户，尽管钱不是很多，但毕竟是一种铺张，农民也照样啧有烦言，这些弊端对上是有反映的，当地也曾要求加以纠正，可在人民公社化的大形势下，问题很快就被冲得无影无踪了。

现在看来，“农忙食堂”尽管多少带有集体的性质，但确是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它同后来“共产风”中的公共食堂是两码事，有质的差别。不过作为公共食堂的某种基础，也起过重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很大程度上是人有意推动的结果。

毛泽东关注的是人民公社建立后，正式办起来的公共食堂。这时的食堂，已经成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组织的一部分。它同后来大力宣传的实行“供给制”以及“消灭家庭”密切联系在一起，成为三位一体的东西，牢固地附着在人民公社化的“共产主义实践”中。

早在1958年4月左右，以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为中心的生产高潮掀起以后，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层中的许多人，已在开始思考和酝酿新的农村基层组织结构问题。4月底，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在去广州的火车上，就谈到未来社会远景问题，“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认为“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为共产主义创造一切顺利条件。”他们想到的是从空想社会主义者构想中汲取一些东西，比如托儿所，养老院和生活集体化等等，并决定命人编写一本空想社会主义的材料和马克思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的资料。

1958年1月南宁会议，3月成都会议之后，到5月八大二次会议，毛的急于求成的情绪已达到高潮。他提出，不要怕知识分子，不要怕教授，不要迷信，甚至不要怕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也不要迷信盲从，总之一要敢于创新，凡立新学派者都是年轻人。这种“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风，感染了与会者，也吹向全党全国，刘少奇在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时，回顾上面火车中谈话的情景，用了一个“吹”字，正是当时人们心态与情绪的反应。

向共产主义过渡，除去不得不涉及到的生产问题外，人们很自然想像到的，就是如何组织社会生活，而战争年代驾轻就熟的“军事化”和“集体化”，终于成为人们的首选之

途，即只有克服个体的，私有的生活方式，以公共形式取而代之，才有共产主义的样子。

陆定一在八大二次会议发言中，第一次比较具体地讲到了中国未来社会的面貌。他说：“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这段话已经将中国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都点到了，其中便包括公共食堂。

刘少奇当时是公共食堂的积极拥护者和鼓吹者。他在一些讲话中着重谈到建食堂的问题，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当年中央决策者的某些考虑。1958年6月14日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中，刘说：八大二次会议上，河南代表、青年团代表都讲了公共食堂问题，江苏常熟普遍办了农忙食堂，可见大家趋向共产主义。毛主席讲三无，无政府，无国家，无民族，这将来会统统实行。毛主席讲过两次，家庭要消灭的。……当然家庭消灭不是现在的事情，而是将来的事情。在中国，康有为最早提出消灭家庭，他主张男女结婚不得超过一年，他说这样一来，六十年后人人没有家族了，他是从消灭私有财产想的，他认为家庭占有私有财产，消灭了家庭就可以消灭私有财产。因此，他主张消灭家庭。毛主席讲，家庭是历史上产生的现象，也会消灭的；家庭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生产的单位、教育的单位、消费的单位，它的社会职能有这

么多，现在家庭已不能成为物质生产的单位了，物质生产的作用很小了，只剩下此家庭副业，但家庭还是个消费单位。

刘少奇还说，现在社会上的劳力也有很大浪费。现在家务是各个家庭操作的，家家作饭，家家洗衣，家家带小孩，家家补衣服、作鞋子……农村还有磨面等，在没有想出新的办法之前，只有这么做，但进到共产主义社会，应该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因此，我有这么一种设想：要建立很多的托儿所、公共食堂，办很多的服务性事业。河南有一个农业社，有 500 多户人家，其中 200 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作饭了，组织起来之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二百多人作饭，现在只要四十人作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最大的好处是二百多人作饭，变成四十人作饭，同时把煮饭的事业变为集体的事业，变为大生产、大经济。

刘还讲到，不只在农村，城市里也要把生活组织起来。他说，在上海职工宿舍参观，小孩子多得很，像蚂蚁一样，哇哇叫。家属每天带孩子、煮饭、洗衣服，情绪不高。问她想什么，她想找点事做，可是没人带孩子、煮饭。

刘最后设想说：组织起来搞，怎么搞法？组织形式是什么？是是是也叫合作社，或者叫服务合作社，或者叫消费合作社。规模少许搞大一些，互助组已经搞了这么久了，是不是可以提升一下，高级化一下，有那几百家，没有几百家不好办，要有个几百家、千把家。大的食堂，大的洗衣房，有这样大经济生活的单位，不是一家一家生活的，这是比较有点规模的生活单位。至于以什么为单位，乡村以社为生产单位，同时也就是消费单位。城市可以工厂、街道为单位。有

了一定规模，就有许多工作做，要推广洗衣、烧饭等先进经验。可以搞很多的事，象空想社会主义所说的，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的，可以达到这种境地。完全可以设想，将来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十五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由此可见刘少奇当时的心态，也是对那些“共有”形式颇为向往的。

刘的这番话是 1958 年 6 月中旬讲的，当时对于设想中的未来共产主义的具体组织形式，还没有定型的意见，人民公社的提法还没出现，但大致的设想已经有了，这就是陆定人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那个描述。后来陈伯达在《红旗》杂志发表《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又以毛泽东谈话的形式对此加以肯定，并使之定型化、权威化。从上述构想共产主义“远景”的谈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毛还是刘，或是其他中央领导人，都相当“自觉”地沿用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材料，去“摸索”和描绘所谓共产主义的组成形式。而所有旧式空想论和我们自身意识的一个最主要特点，就是在这种组织形态中，彻底铲除属于私有化的部分，扩大“共有”的成分。然而在社会组织中，家庭却是最基本的一个私有细胞，或是私有制的最后营垒。只有攻破这一个营垒，共产主义的现实才可能真正到来。无怪乎以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如莫尔、康帕内拉、马贝夫、傅立叶、欧文，到中国的康有为，都不约而同地设想出一个封闭性的“新村”或“公社”，其中一切设施皆为公共，如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抚育系统等等，当然最重要的公共组织，

则是食堂，因为吃了大锅饭，家庭私有制也就最终瓦解了，就这一点而言，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们，确实有他们的“先见之明”。成都会议期间，我记得毛泽东在3月22日的会议上，特别谈到家庭将来的命运问题。他当时说，家庭是原始公社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康有为的《大同书》曾看到此点。可见他对康氏的观点记得很清楚，是很赞同的。

当然，我们不否认公共食堂的倡导，当年的这种自以为是，是解放妇女、增加人力、促进生产这一方面的政治和经济意义，但这些意义应该说是浅表的、形式的、直接的东西，深层的则是社会革命方面的意义。这一点，当时在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的李友九《河南信阳来信》中表露得很清楚。信中这样说，“来这里一年，麦收以来有一个大变化，农忙食堂普遍办起来了，一办起来，大受欢迎，群众要求老办下去。除了少数上中农以外，都把锅台拔了，家里的存粮也交给食堂了。……干部和群众说，公共食堂（不叫农忙食堂了）有十二大好处：一、解放妇女；二、节省劳动力；三、改善伙食、节省粮食；四、节省柴禾；五、节省灯油；六节省家具；七、免得失火；八、免得家里吵嘴；九、好除四害；十、好监督二流子；十一、便于开会，便于领导；十二、好割掉私有尾巴，我觉得最大的好处是头一条和末一条。”李友九的来信和他汇同河南省委、地委领导人起草的《崆峒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使毛泽东感到很大兴趣，他在该文件上批示说：“似可发各省、县参考。”实则是一个推荐。因此这两件东西对兴办人民公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毛的决策也发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举办公



共食堂和割私有尾巴一条，是颇得毛的关注。

然而，公共食堂一经兴办起来，它的意义又有重要延伸，这就是同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密切联系在一起，《嵎岬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第15条规定：“在粮食生产高度发展，全体社员一致同意的条件下，实行粮食供给制。全体社员，不论家中劳动力多少，都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粮食供应标准，按家庭人口得到免费的粮食供应。”同时，《简章》也规定了在公社内部实行工资制。粮食供给制和工资合起来，构成了人民公社的理想分配制度。事实上，初期人民公社的架子基本是按嵎岬山这《简章》搭起来的。此后“好事者”们“大步往前闯”，搞出了更多五花八门的东西来。

粮食供给制说通俗了，就是“吃饭不要钱”，最早发表这个创见的是柯庆施。1980年讨论第二个《历史决议》时，夏衍回忆说，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亲耳听到柯向毛说：“明年上海可以试行吃饭不要钱了。”毛听了非常高兴地说：“做到吃饭不要钱，在全世界的影响，可比苏联放一颗卫星大得多。”

吃饭不要钱的载体就是公共食堂，也即是说粮食不再作分配，都集中于集体食堂，然后实行“敞开肚皮吃”。在“大跃进”年代，这被崇奉为极高的理想境界。毛在北戴河会议上几次提到“吃饭不要钱”。他说：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又说：“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这已把话讲

得非常简单明确了。为什么毛泽东以及中央其他一些领导人，会对诸如吃饭、穿衣等简单的“共有”形式发生如此大的兴趣，以至不约而同地（当时可能是真心的）“鼓吹”它们，这其中可能有一个深刻的理论根源。而这个理论根源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就是要破除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中存在的所谓资产阶级法权。”毛就是这样看的，实行粮食供给制和“吃饭不要钱”就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填补社会鸿沟或差别，以建立真正平等的最有效方法，毛在北戴河会议上说：进城后，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把薪水制说得神乎其神。于是，按等级发薪水，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坐椅子有等级，办分桌也有等级，这样一来，脱离了群众，战士不喜欢军官，农民不喜欢区乡干部，城里的工人也不喜欢我们。他认为：等级制度，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这是资产阶级法权。“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东西，因此，光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整风反右，反对官僚主义，干部下放，将军当兵，种试验田，已经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法权，人民公社的建立，就是进一步的破坏。公社工资发给每个人，不发给家长，实行粮食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开展大协作，不要计件工资，这就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继续破坏，从这番话看来，毛晚年试图在中国缔造一个共产主义模型的思路，已相当清晰可辨了。在夺取全国政权，进行必要的经济恢复和政治斗争，特别是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之后，他开始把思考和实践的着重点放在进行共产主义的“大实验”之上（许多外国学者也持这样的看法，他们置身事外的观察，有时似乎更客观一些，至少这样

的说法并非从偏见出发)。尽管 1956 年以后，社会的物质生活比建国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建立了一套保证经济运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但毛内心却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深刻矛盾，在他看来，社会的发展距理想不是近了，反而是越来越远了。官僚主义、等级差别，以及脑体、城乡之间的差别，使人们之间的距离拉大了。社会生活难以变得平均、和谐，有可能使一部分人变成另一部分人的统治者。此外，人的私有观念随着生活的富足反而变得越加严重起来，总而言之，不平等、不公平和私利欲望增强了。可以说，这同毛的革命初衷和理想愿望背道而驰。

毛泽东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现行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制度，在事实上保护了资产阶级法权也就是不平等的存在。他在 1958 年之后，多次提到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如工资制，军官肩上的“花”（军衔），以及各种各样的等级问题。后来在 1975 年的垂暮之年，他更加明确地讲到八级工资制和按劳分配中存在的资产阶级的东西。”至于张春桥 1958 年《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一文，也是在揣摸毛的想法之后，抓住所谓“等级”问题而大加鼓噪的。一方面，毛认为资产阶级法权保护了不平等，生出了许多看不顺眼，难以容忍的东西；另一方面，又对战争年代长期保持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方式倍加向往，这就促使他寻找一种又一种的措施和方法，在中国现阶段进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试验。人民公社的出现，使他感到终于找到一种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形式，正如他后来诗中提到的那样，是“高路人云端”。

实行粮食供给制，即吃饭不要钱这件事，在毛看来意义特别重大，它不仅是农民自身，革命精神——向几千年私有

观念、生活方式的挑战，而且还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既是对人的世界观的改造，又是在制度上推动更高级公有形式在中国得以实现的尝试。当年我注意到，毛在讲话中每提及于此，都显得兴致勃勃，浮想联翩，直到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人民公社已经暴露出了那么多明显的问题，尤其是徐水那一套不过是昙花一现，他仍然在随后的武昌会议，谈到三国时期张鲁在四川置义舍（吃饭不要钱）的故事，对之赞赏有加。

时下有人将毛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后一件，按自己的理解概括为：始终不渝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这样一个说法，我总感到有可商榷之处，首先，毛本人并不这样认为，他说这后一件大事，是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少，反对的人多，而且，这样概括也并没有反映毛晚年思想和实践活动的实质。从三面红旗坚持到底，到“文革”初期的“五七”道路，要说“探索”的话，全部用心所在，就是敢为天下先，在中国进行以“跨越”和“赶超”为特征的共产主义试验，为此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不惜写第一张大字报，打倒一切，怀疑一切，发动惊天动地的“文化大革命”。我认为只有这样说，才比较符合他的思想实际，也才能在较深层的意义上，理解他为什么要发动这样一场政治性的“大革命”。前面说过，从1958年起，毛就已经有意识地在中国进行共产主义的试验了。当时设想，最多几十年，中国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了。人民公社正是这种社会制度的雏形，它体现或代表了许多未来共产主义因素。当时苏联也曾几次三番地订出进入共产主义的时间表，但毛泽东更为“激进”，他曾讥讽赫鲁晓夫要实行类似“吃饭不要钱”

的公社制度，却又瞻前顾后”，“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他决心先在中国实行起来，虽然，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公共食堂坚持到 1961 年，也最后不得不取消，但并没有放弃原来的想法，三面红旗必须坚持，转而在“继续革命”的理论，狠抓阶级斗争，去推动中国迈向他所设想的蓝图，由于党内外，国内外许多复杂的原因，使某些客观存在的分歧和大量虚构的矛盾尖锐起来，使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也以所谓“阶级斗争”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而实质是毛泽东内心理想化的东西和现实难以实现之间的深刻冲突。

于是毛泽东终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其主旨还是在人们灵魂深处进行一场“革命”。不能认为这是历史的偶然。毛在发动“文革”之初，提出了著名的“五七”指示，这同 1958 年“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所构想的共产主义模型，有着惊人的一致；后来又在垂暮之年号召全党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而其核心仍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这就是说，毛的最后岁月，萦绕其怀的还是那个早在“大跃进”时代就提出的理想和原望，尽管他认识到，这些理想和愿望不能一下都实现，八级工资制和法权“不能都取消”，还要在现阶段加以“保留”，但他却始终没有放弃这个想法，并尽一切去加以实践，甚至不惜“打烂”这个党，然后再去重建。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是毛泽东为实现理想而进行“斗争”的继续，它是一种造就“中国共产主义”的实践，而绝不简单地是一场所谓“反修防修”的斗争，我认为，毛泽东将“文革”看作是他一生所办两件大事之一，有其深刻意义，也是极为确切的，决无任何“探索”之意，但是毛泽东的“探索”（如果可以用“探索”二字的话），同我们目前

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比较起来，显然远离国情，也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更远，因此更带有“空想”的成分，这是无可回避的历史，不必为尊者讳。后人有责任深入思索，正确总结其教训。这正是第二个《历史决议》的精神。如果能在上述意义上理解毛泽东空想式的追求与斗争，那么对于人民公社兴起时大加宣传和实行的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等等，恐怕就能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公共食堂大面积铺开以后，由于舆论声势和人们心理上的某种攀比欲、新鲜感，温度急剧升高，许多极端的事情都作了出来。比如说当时农民中有这样的顺口溜：“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这是形容人们敞开肚皮吃饭的情景。当时有的地方开出“流水席”，来了就吃，吃了就走，一天不断，有的地方甚至模仿张鲁的“义舍”，对来往过客提供免费食宿，真如到了“大同”之境。1958年10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吃饭不要钱以后……》，该文报道了江苏省江阴县马镇人民公社，在国庆节前开始实行吃饭不要钱、不限量的情况，贫农尹积福在开始实行吃饭不要钱时，还有点不相信，开头两天不敢吃足，怕最后还要算账。听了有关政策的宣传和鸣放辩论，心里才踏实了。他激动对家人说：我们真是到了天仙佛国了。共产主义才沾了点边，好日子还在后头哩。这个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一般农民，特别是生活困难的农民，对于初始阶段公共食堂的作法，往往是由忧而喜，最后欢呼雀跃，成为主要的拥护者。因为在直接利益上说，平均主义对他们最有利，使他们成为受益者。在理想层次上，贫穷农民亦易于产生空想。人民公社这种空想成分极浓的实践，能一时之间轰轰烈烈地搞起

来，是有深刻的思想和社会基础的。一时人们为它鼓舞，不少人确出于真诚。而这种落后经济形态所造成的社会意识和群众基础，是短时期内不易改变的，必得经过充分的商品经济与现代化思潮的洗礼，才能有所改观。

根据中央农村工作部 1958 年 11 月 27 日的报告，到 10 月底，全国农村已基本公社化，共建立人民公社 26576 个，共举办公共食堂 265 万多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 90%，报告说这还是不完全统计。按上述数字计算，大概每个公社有 100 左右个公共食堂，平均起来不只每个生产小队一个，这个数量可就十分惊人了。每个食堂要有专人做饭，即占用壮劳力，还要占用房基地，要专门建造房屋，（当时是把食堂作永久考虑的），置办锅碗瓢盆，这无疑也是一笔数量可观的开支。此外，大锅饭总没有小锅菜好吃，众口难调，三天新鲜劲一过，人们不免生出牢骚。其实，所谓来了就吃，吃了就走的“流水席”，是根本维持不下去的。凡是在食堂干过的人都知道，哪里有不按钟点供应伙食的食堂呢？这要有多少厨师才能应付川流不息而来的食客呢？相反，公共食堂必须按点开饭，这倒限制了农民的生活习惯，甚至与紧要农活发生冲突。农民吃饭时间本来就是以农活长短早晚决定的。家里做饭自然要方便得多，起早贪晚，担到田间地头，汤水干粮，很实在的就解决了。而冬闲时，自家可以以稀代干，减少顿数，自我调剂，显然这些都是公共食堂无法办到的。因此可以说，当年极力宣传的，办公共食堂节省人力、方便群众这两条，根本就站不住脚。

当然，更重要的是，食堂作为平均主义“共产风”的一项内容，在根本上决定了它难以为继的命运。劳力多、家底

厚的社员，本应多劳多得，现在不仅劳而无获，而且还把存粮剩米也归了公，因此马上就有吃亏的感觉，尽管在所谓实现“共产主义”的口号下，人们不敢公开说出来。劳力少、人口多的社会员自然乐于吃大锅饭，无形中他们占了别人的便宜。这两种人的心态造成一个相同的结果，这就是大家都放开肚皮吃饭——家境好的以此来补损失，家境差的则想多占便宜，于是粮食消费大大超过了正常状态。本来兴办公共食堂的一个重要依据，是“粮食多了没处放”，但当年实际粮食打的远远没有那么多，只是略有增产而已，而且各地很不平衡，这当然离“放开肚皮吃”的境界差得很远。因而很快出现了上月吃下月，寅年吃卯年的窘况。况且，许多行为不端的社队干部，趁机谋取私利，开小灶，多吃多占，更使食堂乌烟瘴气。到1958年12月底，首先是由于粮食发生紧张，公共食堂越办越糟。

1959年四五月间，在四川、贵州几省出差来往水电工地时，在成都附近一个村子，特意去看过公共食堂。那是一个下午，饭堂很干净，几个食堂人员坐在那里无精打采。我同他们闲聊起来（我可以打一点川腔），得知没有油水，食油定量太少。见到一个小伙子在一个小锅里炒十几条小鱼，一问是附近河沟里抓来的，特为青年突击队“打牙祭”的。我住在成都的一个巷子里的招待所中，省委书记阎红彦请北京来客吃饭（记得金明在坐），于是我就谈起食堂缺油之事，引起阎的注意，他说要想办法解决。在贵州去乌江渡水电工地的路上，看见地头有一大群农民在吃饭，我停车看了一下，是食堂送到工地来的。吃玉米面窝头管饱，没有什么菜。五月经过长沙时，同周小舟长谈，他很不赞成办公共食



堂，说劳民伤财，浪费柴禾，没有优越性。

据我接触到材料，由于办公共食堂，1958年年尾到59年初，河南、山东、安徽、云南、湖北、江苏等省不少县，凡五风刮得厉害，粮食又超征购的社队，已发生浮肿病和饿死人现象。有的食堂每人每天粮六两，由于有人多吃多占，十天里有八、九天喝薯粉汤或吃萝卜喝开水，已开始吃各种瓜叶、野菜。

大约至1958年10月左右，大办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荒诞剧已闹得有点不成样子了。特别是在那些宣称某月某日就进入共产主义的地方，“共产风”已经刮的人们目迷五色，不仅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而且产生了严重的破坏作用。于是，所谓“纠左”的进程亦开始了，这种情况就是毛泽东后来所说，人民公社“乱子出了不少，与秋季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

从1958年11月初开第一次郑州会议，至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纠“左”或称“纠乱”的意向是明确的，但没有从根本上认识人民公社、“大跃进”是犯了严重的违背客观规律的“左倾”错误。因此在发出各条指示，讲种种道理的时候，有许多矛盾的东西，有很大的保留性。庐山会议的后半期，主要由于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的发言，意见提的比较尖锐，纠“左”一夜之间发生逆转。在这一过程中，非常值得注意的就是毛泽东对公共食堂的态度。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起，毛希望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怎样划定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另一个是如何解决集体所有制内部社与社，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关于这两个问题，我已在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及八届六中全

会的篇章中，作了探讨，不再赘述。总的说，这些会议都集中议论了上述两个问题，作出了若干规定。当然这都是在毛发现了严重“共产风”所导致的混乱局面之后，才不得不加以制止和纠正的。

但是对于体现共产主义因素的公共食堂，他却似乎不愿意这样看待。例如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这样说道：第二个过渡，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现在已开始准备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苏联也吹，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我们吃饭不要钱是各取所需的萌芽。我们现在吃油太少，一般不到四两，有一两、二两、三两、四两、五两，一般是三、五两，营养取自粮食，故吃饭多，可以转化。不要冒险，凡是可做的必须逐步去做。这不能不说是共产主义因素。又说：供给制是便于过渡的形式，不造成障碍。建成社会主义，为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可见，对吃饭不要钱还是由衷肯定的。

在半个月后的武昌会议上，毛又讲了一段颇为负气的话。他说：北戴河文件有个缺点，就是年限快了点，是受河南的影响……北京大学有一个教授到徐水一看，他说：“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徐水发薪也不过一、二、三元。现在就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的错误，吴之圃（河南省委第一书记）脑子也活动了，认为长一点也可以。这段话分析起来，似是责备冒进，担心“快了”，但并没有对公共食堂作法的本身表示任何怀疑，甚至有“反义”在内的。因此，同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讲话的意思并不相悖。

十几天后，在八届六中全会上，毛又多次提到公共食堂，这次又讲得十分明确了。他说，食堂吃冷饭，有饭无菜，也会垮掉一批，认为一个不垮，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搞得不好而垮，这是很合理的，总的来说，垮掉是部分的，暂时的，不垮是永久的，总的趋势是发展和巩固，又说：我是到处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规律管着，不管怎样，我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少次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12月10日，他又批印《三国志·魏志》中的《张鲁传》，供参加武昌会议的各同志阅读。在批语中说：“张鲁行五斗米道，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大受群众欢迎。”12月7日还有一则批示说“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

这里的引经据典有两重意味。其一，是做宣传。人民公社的形式，公共食堂的存在，在中国老百姓中，在民族和古老传统中，有深刻的内在根据，因此人们心向往之；其二，是辩护。既然有实行的根据，人民也奉为理想，那便不是盲目瞎干，不是胡作非为。这后一点似乎更有加以说明的必要性，因为10月以后，人民公社乱子闹得很多，议论之声沸沸扬扬，这就造成人们某种程度上，对一些作法的怀疑（当然这种怀疑还是非常浅层次和感性的）。同时，经过几次会议，在制度上逐渐明确提出两种所有制的差别，和核算单位的相对固定化，这都是对前一段作法具有某种否定意味；何况，毛还批评了徐水“急急忙忙往前闯”，号召大家不要学徐水，也是刹住脚步的姿态。此外，西方人如美国的杜勒

斯，社会主义阵营中如赫鲁晓夫，都显然在那里怀有敌意或不怀好意地讥讽，咒骂人民公社，看人民公社的“笑话”。这是毛泽东不能不有所回答的。自然坚定信念是最重要的任务。正如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所说：在一个新的，像人民公社这样的缺乏经验的前无古人的几亿人民的社会运动中，人民和他们的领导者们都只能从他们的实践中逐步地取得经验……谁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他就不过是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账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必须估计到，一方面，那些观潮派、算账派将会出来讥笑我们；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将会进行破坏。但是我们要告诉干部和群众，当着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对于我们丝毫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应该沉得住气，在一段时间内，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顶住，让那些人去充分暴露他们自己。

“硬着头皮顶住”，是一句人们耳熟的话，反右时也讲过。这表明毛泽东知道人们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基本态度。同样惯用的语言，所谓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也是以形象的语言作出的答辩。关于公共食堂，毛在12月23日接见军政工会议代表时，说了如下一段话：武王伐纣，实行三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那时恐怕还是奴隶时代。为什么公共食堂军队能搞，农村就搞不得？……公共食堂一不死人，二不瘦人，甚至还胖一点，这总不会犯原则错误吧？于此可见，他对那些“风言冷语”是很不服气的。

作为暂时体制上的规定，1959年4月上海会议议定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提出：各地人民公社，根据

自己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分别实行了伙食供给制（包括油盐菜蔬等）。人民公社实行的供给制，符合于绝大多数农民群众的要求，得到他们的拥护，因此必须坚持下去。为了约束农村中的二流子和懒汉，人民公社应当作出一些具体规定，使供给同按劳分配结合起来。这个文件比较肯定地讲到了粮食供给制要同按劳分配、不劳动不得食原则结合的问题，较之以往有了进步。1959年1月，田家英受毛的委派到四川新繁县农村实地调查。新繁地处成都平原，一向物产丰富，可经过半年来的折腾，此时已显得各业凋零。每到吃饭时间，食堂外面便排起长队，按家按户去领饭，村里几乎无了炊烟，说明绝大之数社员家里无粮，只能凭借食堂里那点有限的饭菜果腹。加上生产的退化，家英感到问题不少。4月，他到上海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由他为主起草了这个称为“十八个问题”的文件，据说毛比较满意。

使人难以意料的，是庐山会议发生的那轩然大波。表面上看，庐山的争论乃至后来演变为严肃的批判斗争，似乎是一种偶然因素促发的，而实际上却映了深刻的历史必然。“大跃进”人民公社这种全面的失误，尽管时间不长，自然容易引起党内的不同意见。即使1959年不暴露，1960年也会表面化，1962年果然激化，这体现了事物发展的必然性一面。如此说来，庐山对公共食堂的议论，以及它后竟成为反右倾斗争的焦点之一，也就不足为奇了。

上山前期神仙会，大家议论“大跃进”的得失，是比较放得开的，其中公社和公共食堂问题提得较多。7月6日上午，朱老总在中南组讲了如下一段语重心长的话：“要认识

农民还有私有者的一面。对农民私有制要看得重些，办公共食堂，对生产有利，但消费吃亏。供给制是生产制，工人还得发工资，农民就那样愿意共产吗？食堂自负盈亏，公家吃总亏，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全垮掉也不见得是坏事。家庭制度应巩固起来，否则，有钱就花光。原则上应回到家庭过日子。如不退回到家庭，粮食够不够？食堂要吃饱，吃好，人心才能稳定。”朱老总这个说法显然是极有见地的，说到了问题的根本。老总在“大跃进”及以后年代，始终持论公允，这同他能作到真正实事求是地看问题有关。但他的看法从来得不到重视，甚至被说成是“老右倾”，其中原因自不难洞见。记得神仙会阶段，连当时最激进的谭震林，也讲了解散食堂的话。仍旧唱赞歌者当然不少，比如吴芝圃，一面作检讨，一面还说现在河南全省食堂一个未散，90%可巩固下来。河南共产风刮得最严重，还要显示食堂的“巩固”，显然是作违心之论。

彭德怀在1958年12月的武昌会议之后，曾到湖南他的家乡作过调查。他当时看到大办人民公社中的许多问题，其中就注意到仍实行供给制和公共食堂等“左”的作法，对人民生产和生活妨害极大。因此在上庐山时，很多话在他胸中已积郁了许久。1959年7月3日至7日10日，彭德怀在西北组，会上共有7次发言，问题提得已很尖锐，比如说人民公社办早了等等。此外在毛主持的一次中央常委会上，他特别讲到，要高度重视粮食问题，东欧人民生活水平比中国高得多，还出了匈牙利事件。7月12日，周小舟找彭谈话，希望彭能多同主席谈谈反映一些实际情况，在这次谈话中，周向彭反映了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现在农民在公共食堂吃大

锅饭，就要大锅大灶，烧柴禾也不节省。不锅小灶，妇女，弱劳力都可以煮饭，现在非强劳力不可，搞了公共食堂，家里用点热水也不方便，群众对公共食堂很有意见。

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对于纠“左”或纠“乱”还是注意的，他希望继续纠正一些过火甚至“瞎胡闹”的行为。但对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动机，却守之如玉，不容“冒犯”。因此，纠“乱”也罢，提意见也罢，中间的确存在着一个无形的“度”，过“度”即得咎，在所难免，包括他左右的人，同他历史上无隔阂的人（如谭震林）都未能理解其中深义。

事实上，毛泽东当时对各地反映的食堂问题已相当容忍了。在刚上庐山的7月2日常委会上，毛讲了19个问题，其中第五个即是有关食堂的。他说食堂按人定量，分配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在这几个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哄而散，能保持30%也是好的，形式可多种多样；太分散的户不办，吃饭基本要钱，一部分不要钱，供给部分要少，三七、四六。供给制不要否定，食堂与供给制是两回事。按月发工资，大部分办不到。毛这段话说到几个限度，如按人定量，分配到户，自愿参加；如形式可多种多样；如食堂与供给制是两回事等等。都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上一年的想法，“退”得比较实际一点了。但对公共食堂要加以保留，这一点是不变的。

这当然同整个纠“左”的大形势有关。1959年4月间，中科院经济所昌黎调查组写过一个报告，题目叫做《农村食堂究竟有无优越性》。这个报告问题提得很尖锐，分7个方面说公共食堂没有什么优越性：（一）食堂并没有解放妇女

劳动力。这是指办食堂劳动强度大，必须抽壮劳力去做，结果妇女仍不下地，反而削弱了劳力。（二）浪费粮食。其根本原因是“放开肚吃饭”。（三）影响社员不能养猪、积肥，实际上泔水也归了公。（四）烧些紧张。（五）占用房屋设备，增加社员负担。（六）只有大集体，没有小自由。这是指生活集体化，一律到食堂排队用餐，难合口味等等。（七）缺乏管理食堂经验，账目不清，伙食办不好，毛泽东很重视这个报告，5月2日即作了专门批示，指出，昌黎县的情况有普遍性，各地各级党委应该注意解决，越快越好。上面提到19个问题中的食堂问题，就是采纳了调查组的意见的。当然毛的想法是对食堂加以整顿，而不是否定，后来他在7月23日的批彭讲话中，又否定了中科院的这个报告，说它对公共食堂“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取否定态度。由此可见，他对公共食堂的执着在本质上，这是符合他的向共产主义过渡思想的。

当年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由于食堂办得很糟，有的地方干脆散伙了之。如5月中旬，四川泸州地区在地委书记邓自力的指挥下，解散公共食堂。湖南慈利县于5月底风闻整顿食堂的指示后，几天之内就散了1366个食堂。山西省、青海省也“刮了解散食堂的风”。最厉害的要数安徽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于7月初到无为县检查工作，发现最突出的问题是公共食堂不能再办下去了。7月9日在新民公社王福大队，向队干部和群众宣布了“三还原”政策，即吃饭还原，住房还原，小块地还原。当晚就要县委书记予以贯彻。到7月15日，全县6000多个食堂就“一风吹散”。其它县如青阳散掉99%，贵池散掉100%。可见民心之所向。



庐山会议前发生的这些事，性质不能说不严重，只是出现在基层，究属个别。而一旦由彭德怀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提出尖锐批评，这四面八方的情况就变为一股合力，冲破了毛泽东所能容忍的“度”，是于形势立即逆转。

在彭总7月14日信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一条下面有这样的话：“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饭……都是·一种‘左’的倾向。”须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一语，是后来批斗追查彭德怀过程中最敏感和最要害的问题之一。记得陈正人在一次会后曾把我拉在一边，问：“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指谁？说，大家都怀疑是指毛泽东。可见把“吃饭不要钱”和“一步跨进共产主义”等等归入“狂热性”的范畴，是何等的引人注目，对毛的刺激相当之大。（后来毛在讲话中多次用了这个词，以反唇相讥。）

在张闻天7月21日的发言中，也谈到公共食堂问题。他说：我们不能搞平均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社会主义要贯彻按劳分配，就需要强调保护消费品个人所有权，这到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存在的。这番话针对性极强，既尖锐又深具理论色彩，这正是招人忌恨的所在。无

独有偶，张闻天也不留情面地讲到刮“共产风”恐怕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上面我谈到一个“度”的问题，当然，“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超过了这个“度”。不过，这句话如果出我们这样的小人物或者如周小舟这样的“中”人物，问题还不大，即不致开展一场反右倾运动。问题即在出自彭德怀、张闻天之口，而他们都是历史上有过“旧账”的人，都犯过路线错误，有种种恩恩怨怨或未解开过的“疙瘩”。是可忍孰不可忍！在《庐山会议实录》中，我说过样一句话：促使毛泽东作7月23日反击讲话的原因很多，但张的这个尖锐发言，可能是最后一付催化剂。庐山悲剧如果说有偶然性的话，就在彭、张发言如此合拍，使得毛泽东本来已经达到了的认识和纠“左”决心，来了一个180度的变化。真是令人无限遗憾，心痛无已。

23日毛讲话后，形势一面倒。批判讨伐之声日高一日，这里不再赘述。有一点需要提及的，那就是在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全面进攻”之中，反对公共食堂（实则是反对平均主义大锅饭）成为重要罪状之一。下面这两个文件都是毛在会上所批，我们很可以对照起来看，以便了解他对公共食堂，从而也就是对人民公社的认识。

8月5日，在《湖南平江县谈岑公社稻竹大队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情况》上，作如下批语：“此件很值得一看。一个大队的几十个食堂，一下子都散了，过一会，又都恢复了。教训是：不应当在困难面前低头。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的事情，是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当的，也不可能的，某些食堂可以一风吹掉，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办起来。或者在几天之后，或者

在几十天之后，或者在几个月之后，或者在更长时间之后，总之又要吹回来的。孙中山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类。困难是有的，错误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这段批语多么语重心长，胸襟坦荡，作高瞻远瞩之谈。可5天后的另一段批语，却情况大变。其措词之严厉，其上纲上线的程度，使人感到惊心动魄。批语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们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时，他们是乐意参加的，有革命性……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因为他们具有反动与革命的两面性。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要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的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这段话批在安徽省委《关于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报告上。张恺帆在这里也被当作庐山军事俱乐部的一伙，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全面进攻”，这个批语的调子高得吓人，不容分辨，这是作者痛恶之极的情绪流露。它批在“撤销公共食堂”这样一个文件上表明，毛对其性质与彭的信和张的发言同等看待，

这就使全党对公共食堂问题的认识严重起来。

庐山会议下来挨批斗，我被双开除之后，1960年5月下放北大荒劳动，地点是虎林县兴华村，当时此村归850农场管辖。右派分子在农场集体劳动，我属于“右机”，蒙农场领导照顾，单独安排在这村子的“老头排”劳动。村子里所有的劳动力都吃食堂，家属儿童仍在家中举炊。最初的定量记得是每月20斤，后来减到15斤。实际上这个定量，食堂中人并吃不到，我亲眼看到的，村干部还有食堂工作人员，他们都有办法，因此脸色都比较好，没一个饿死的。开始还有炒豆饼吃，后来连豆饼也很少了。菜是谈不上的，只有一小碟咸菜。那点小米正粮用来熬很稀很稀的“稀饭”，有一次下工回来，我一口气喝了六大碗那种稀汤。后来稀汤中掺磨碎的玉米芯，或者掺南瓜叶、豆叶，红薯叶是好东西。有一种用野菜、各种磨碎的叶秆或者还掺了点土豆粉做成的干粮，一小块一小块，黑糊糊的，每个人还定量给。开初一个阶段，常常半夜起来拉稀，人当然很消瘦，后来就浮肿了。北京家中寄来过粮票，被村干部没收了。长沙的大姐、沈阳的二姐知道这个情况，她们自己尽量节省，托人给我捎来一些饼干等食物，同住在一起的老汉要分食一些。当时在850农场分场劳动的熟人右派王怀安（现在我们同住一栋楼），来看我时，也分尝过这种美食，但数量究竟有限，还是天天在可怕的（必须用这三个字）饥饿中熬煎。当时我自己确实有一种恐惧感，因为不知道此种生活何日能够结束，村中农民一般总还有点办法，不过有一夜村干部突击挨家挨户搜查粮食后，情况也就更紧张了。白天在地里干各种农活，人们当然顶不住了。当年秋收前后，村中就开始死

人，有一个同我一起驾牛车拉草回来的老汉，第二无没有起来，躺在炕上走了。有一个同我很谈得来的老头，去世前只说：“我只想喝一碗稠稀饭”。同我一起劳动的老头们，无不乐意回忆伪满时期过的好日子。说当年喂牲口的东西也比现在好的多，真是人不如畜。

当年在北大荒劳动的北京送去的右派分子。到1960年尾时，已经饿死了不少人。北京知道这个消息后，于1960年年底将他们全部撤回北京，王怀安临走时，还到兴华村来同我辞过行。

1961年年初，田家英等关心我的人知道我的困境后，向李富春作了反映，于是先将我从兴华村调到西岗850农场场部，这里不再参加体力劳动，而且多少有正经粮食可吃，同时还可到虎林县自由市场，买到高价的鸡蛋了。《龙胆紫集》中有一首七绝，说明我得以结束这一段“生死”之缘：

打起精神学打场，忽然意外转西岗。

长安故旧多关世，不忍其人葬大荒。

我离开兴华村时，村中已经饿死了二、三十人，兴华村这半年多的日子是难以忘怀的。当年有很简单的日记，现将1960年9月份的几天，摘录如下，以见一斑：

9月16日

仍捡土豆，老头排去七人。下午在野地里捡到一个没长大的小绿瓜（非南瓜，本地叫窝瓜），生吃了，亦如野人也。

9月17日

整天跟犁杖捡土豆，甚累。觉得抬不动腿，全

身发软。上午吃生土豆一枚，下午又捡食小绿瓜一个。晚喝完稀饭后，胃痛发作。

9月22日

整日捡土豆。中午野菜窝头，野菜越来越多，喝开水，颇顶不住。无可奈何。

9月24日

早晨甚冷，场院打荞麦，实感无力。中午野菜豆面窝头，晚喝稀饭六大碗。人生最根本问题，劳动与吃饭，对我真是太实在的经历，每天只此二事。

9月25日

捡一天土豆。在地里吃了一个没被扳掉的小玉米。除食草外，亦如六畜矣！今天煮的窝瓜叶，许多人不吃，我仍吃来可口。

9月28日

中午随郭大爷到南村草甸中水沟捉老头鱼，烂泥没膝，花一个多小时，捉了小半桶，这种鱼没什么肉，晚上一个个收拾，用盐腌好。

9月29日

中午与郭大爷去南村水沟捉鱼，不如上次顺利，捉的人太多，成“抓鱼运动”。

9月30日

村东捉鱼人太多，村里有了反应：不能误工，捉了交食堂。

庐山会后，批判追查自是在党内紧张进行，舆论宣传上

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声浪也非常强大。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公共食堂前途无量》的社论，指出当前“围绕着公共食堂，”正展开一场斗争。说“一些死抱住习惯势力不放的人们，借口某些公共食堂的暂时的缺点，指手划脚地议论起来。”“有些农村工作人员甚至下令解散公共食堂，可是，群众坚决不散，或者散过之后很快又把公共食堂办起来。”其原因除了节省劳力，改善生活，解放妇女等等外，就是说它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是“顺乎天理，应乎人情”，代表了共产主义的“幼芽”。

9月22日，《人民日报》一版刊载了特号字标题的“河南三十多万个食堂越办越好”的报道；副题为“全省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在食堂吃饭，称颂它为‘幸福堂’、‘如意灶’、‘大家乐’。”两千多字的报道分以下六个小标题：“一堂多灶，人人称便；自办副业，改善生活。”“六百多名妇女解放出来，积极参加农业生产。”“三分之一的食堂实现了炊具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生产任务愈紧张，伙食搞得愈出色”。“以人定量，按量发票，凭票用饭，节约归己。”“经受了考验，显示了八大优越性。”这所谓“八大优越性，”是河南省委总结的：解放了妇女劳动力；适应了公社化后的集体组织形式；节约了燃料、粮食和用具；便于搞集体副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能进行基本建设，实现炊具革命；大大改变了社员环境卫生，养成社员的集体主义精神和良好的生活习惯；特别是过去由于繁琐的家务劳动而引起的家庭关系上的不合，争吵不团结等，现在都消除了

河南这篇报道说明，庐山会议后产生的巨大政治压力和斗争氛围。使各地兴办食堂又出现高潮。据国家统计局统

计，至 1959 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达到 391.9 万个，在食堂吃饭的约有 4 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 72.6%。其中有 6 个省市（河南、湖南、四川、贵州、上海、安徽）参加人数超过 90%。

到了 1960 年春天，公共食堂的弊端已经相当明显了，毛泽东还是坚持要继续办下去。贵州省委于 24 日写了一份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给他。报告中虽也透露了有些地方“个别的已发生外逃、肿病和死人现象”，但能从政治上着眼，认为公共食堂“巩固地树立了贫农、下中农的领导优势”，“办得好的食堂”，已成为生产小队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巩固了人民公社，“有的还提高了集体化的程度，形成了较大的居民点，为建设新村创造了条件”。这份报告还提出了今后的打算：“食堂势必是适当扩大规模”，“口粮由基本核算单位定期发给食堂”，“每个生产小队就办一个食堂”。

这份报告正合毛泽东的心意，他即于 3 月 4 日亲笔写了批语：“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不久之后，毛泽东又在黑龙江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电话汇报的记录上，如江西时期的习惯，写下了一段四言告示体裁的文字：

“加强领导，全民食堂，猪菜丰富，计划用粮，指标到户，粮食到堂，以人定量，凭票吃粮，节余归己，按月算账，明明白白，帐单上墙，生产生活，两样都强，人心振奋……”



3月15日，他又批发了几个关于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写了批语和许多按语，提出：“就全国说来，能够争取占全体农村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到食堂吃饭，就很好了，像河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上海、安徽七个省市争取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到食堂吃饭，当然更好。”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到食堂吃饭呢？

由中央办公厅整理的《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一文，推广“统一用粮，指标到户，实物到堂”的作法，即是说，农民的口粮指标分到各户，而把粮食分到食堂。文章引述山西、山东的看法，认为这样做比现粮分到户，参加食堂吃饭向食堂交粮食，更利于巩固食堂，实质上，这种做法带有强迫的性质，如果粮食分到每户手里，如果没有强大的政治压力，谁还再搬粮食去人伙，吃不合口胃又很可能被经办者侵吞的的大锅饭呢？中办同一文还提到河北的做法，即对社员自留地“采取限制和逐步削弱的方法”。其措施是：一、严格控制自留地数量；二、现有自留地划一部分给食堂，作为食堂种菜和饲料地；三、小片开荒和零散闲地由生产队统一规划，适当分配给小队经营，一律不许社员开荒。很明显，这是个“割尾巴”的办法，尽量扩大共有或公有，视农民一点点生活必须的小私有为异物。通过公共食堂达到或迫使农民走向“共产主义”，正是当年目的所在。从这个意义上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食堂问题，会受到如此重视，会引起那么多的政治波澜。它作为一种简便“有效”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手段，的确为始作俑者留恋，行动上如此，心理上更是如此。当然，这同1960年1月间再次提出，“要分期分批地采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完成人民公社由基本上生产队所有

制到基本上公社所有制的过渡，并开始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口号有关。是庐山会议后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巨大的反作用效应。

到1961年，公共食堂终于办不下去了。第一位的原因是全国性饥荒，没粮可吃，还怎么办食堂，再把群众硬聚在一起，已经做不到了，据公布的统计数字，1960年粮产2870亿斤，比1959年减产530亿斤；人口净减1000万人。其次，食堂本身的弊端也无遗了。最典型的莫过于刘少奇在湖南蹲点时说的那番话：“以前我们不清楚，讲食堂有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动力，解放妇女。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专人做饭，专人炒菜，专人砍柴，专人挑水，专人舂米，一个食堂占用三分之一的劳动力，甚至半数的人都去做饭去了。”“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其实他还没有说到相当重要的一条，就是某些干部趁机多吃多占，引起社员强烈不满。公共食堂已经完全失去了群众基础。

1961年6月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凡是要办食堂的都办社员的合伙食堂，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这就是说，中央已经放弃了原有的想法，即不是将公共食堂当作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标志来办，而是作为社员生活的一种组织形式，不带任何政治的、强迫的性质了。在实际上按照当时农民的状况与心态，这等于宣布食堂可以停办。这应该看作是人民公社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条例》还规定：“生产队对

于社员办的食堂，应该给予可能的支持和帮助，但是在经济上不应该有特殊的待遇。对于参加和不参加食堂的社员，生产队都应该同样看待，不能有任何的歧视。”这实质上是给社员解开了束缚，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兴办人民公社的过程中或在更早的一些“运动”里，农民的权力是得不到尊重的，他们的种种小私有基本被剥夺，许多事情是强迫而为。表面上看，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但在超出人们自愿的限度之后，“群众运动”就变成了“运动群众”，对广大农民造成很大伤害。《条例》该款最后规定：“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口粮分配到户的办法，可以在收获后一次发，也可以分期发。”这是最实质性的一条，它意味着否定了所谓“供给制”和“口粮到堂”的作法，农民终于又有了属于自己的粮食。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农民的眼光并不那么远大，家家户户一年到头都盯在自己的粮囤子上。囤子满，则全家欢乐；囤子空，则愁眉难展。这种状态直到今天，恐怕在全国相当的范围内也还没有改变。东南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的农民，大约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广大的内地尤其穷困山区，可能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有的农民还在温饱线上苦挣苦待。农民对粮食“有无”的感受，既是实实在在的，又是心理上的。办公共食堂使农民吃了亏，也就引起了恐慌，因此什么荒唐事都做得出来，这一大历史教训，在中国这样生产力落后的国家，是极其深刻的。改变落后的办法，不是人为地去拉平或提高觉悟，搞所谓精神上的东西，而是扎扎实实提高生产力的水平。

1959年以后，我以一个戴罪之身，在批斗、劳改、下

放以及秦城八年临狱中，渡过了 20 年，无缘再接近老人家了，但我有时不免思忖，他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陷于困顿后的心绪，必是极度沉闷和失望的。可以想象，1958 年夏季把中国的事情一度想得那样美好——人民公社、供给制、取消家庭，向共产主义过渡；可是不到两年时间，这一切几乎成了水中月。这当然是令人心碎的事情。乌托邦的胜境是美好的，但这种美好只有以纯精神状态存在时，才能显现出高远、伟大，才使人愉悦。而一旦诉诸现实，特别是运用强大权力去推行它的时候，美好可能就成了残酷。这是因为它毕竟离现实太远，是虚幻的东西。以虚幻的东西为理想，去奋斗，而又得不到它，其心境必然是孤独的。从公共食堂的兴起与衰落，我们大概可以窥测到毛泽东晚年心态之一斑。

## 全民炼钢翻一番

说到“大跃进”过来人最先想到，恐怕就是“大炼钢铁”这件事了，大炼钢铁在整个“大跃进”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使它足以成为“大跃进”的标志之一，事实上，不少人的确是把大炼钢铁作为“大跃进”的代名词的。

炼钢少不了电，“大炼”更是需要电，而当时电力部门即使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满足那种超高指标的钢产量对电的需要。于是冶金与电力两个部门便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我这个参与管电的也就免不了同炼钢的瓜葛。当然，在那个年代，那种土炉林立、火光冲天、伐木毁林、砸锅炼铁的景象，我更是耳闻目睹的。只是因为上述那层关系，比起一般的过来人，我还知道一些大炼钢铁中的决策过程。

### “钢铁情结”

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就比较注意钢的问题了。据薄一波说，那年2月听取重工业部（当时没有冶金工业部）汇

报时，毛泽东就主张钢产量每五年翻一番，今后就采用“一番加一番的增长法”。这是在小范围内说的，而且是就钢的生产谈钢的生产。如果说这还看不出毛对钢的特别注意，那么，这年下半年以后的一些正式讲话，就很清楚地表明他对钢是情有独钟了。

1958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讲话，谈到国家建设时说了一大段话：“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二十二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是四百多万吨，明年突破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一千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两千万吨。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虽然世界上差不多有一百个国家，但是超过两千万吨钢的国家只有几个。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你六亿人口干什么呢？在睡觉呀？是睡觉应该，还是做工作应该？如果说做工作应该，人家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美国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上它。这是一种责

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又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这段话有自省：看到中国还很落后；也有雄心，要在五六十年里赶超美国。不过，毛把赶超的标志集中在钢产量上，钢要上不去，不算是赶超。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又谈到钢的问题：“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生产力的发展一直是非常缓慢的。解放前五十多年间，全国除东北外，钢的生产一直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是九十多万吨。在1949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但是全国解放不过七年，钢的生产便已达到四百几十万吨。旧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而这些现在都建立起来了。这是说明生产力在旧中国发展何等缓慢，而在新中国得到了较快发展，他又特别突出地举了钢产量前后变化的例子。

还是在这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再三表明了他对钢生产的希望和信心，他说：“我们预计，经过三个五年计划，钢的年产量可以搞到两千万吨，今年是五百二十万吨，再有十年大概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了。印度一九五二年的钢产量是一百六十万吨，现在是一百七十几万吨，它搞了五年只增加十几万吨。我们呢？1949年只有十几万吨，三年恢复时期搞到一百多万吨，又搞了五年，达到五百二十万吨，五年就增加三百多万吨。再搞五年，就可以超过一千万吨，或者稍微多一点，达到一千一百五十万

吨。然后，搞第三个五年计划，是不是可以达到两千万吨呢？是可能的。众所周知，1957年夏秋正是反右派斗争急风暴雨狂烈之际，到这次讲话时，毛认为反右派要告一段落了；反右派刚告一段落，他又马上想起了钢产量。

就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而言，当年毛泽东魂牵梦绕的，一个是粮食，再一个就是钢铁了；而且对钢似乎看得更重。看重粮食，这比较好理解。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几亿人的吃饭问题自是天下第一大事。靠进口很难满足需要，主要还是靠自己解决。看重钢又因为什么呢？这恐怕还得从马克思那里开始找原因。

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认为，社会资本再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是生产资料的生产，第二部类是生活资料的生产。要实现社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其条件必须是第一部类一年内所生产的生产资料必须多于两大部类一年内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以便第二年有多余的生产资料用于扩大再生产。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生产的原理表明，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以及各部门之间，都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一旦这种正常的比例关系被破坏，再生产过程也就必然出现危机。

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的分析。从理论上讲，这些分析对于描述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也是适用的。当然，马克思没有面临过社会主义的现实，因而没有也不可能对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作多少阐述，更不可能对两大部类生产之间的关系作出具体论证。

最早将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生产的分析，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并据此提出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方针的，是



苏联的斯大林。斯大林在 20 年代阐述苏联工业化问题时说：“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是按照斯大林所主张的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方针制定的，整个计划的重心都在生产资料生产（也就是重工业）方面，实际上，从这时开始，苏联国民经济始终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轨道上运作。

中国当年自然沿袭了苏联的发展道路，从“一五”计划开始就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毛泽东在重工业（也即生产资料生产）中特别注意钢，而且强调提高钢产量，把优先发展重工业逐渐变成了优先发展钢铁工业。50 年代中期，苏联经济建设中的许多弊病包括片面发展重工业的问题暴露出来，毛泽东提出要“以苏为鉴”，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发展农业、轻工业。事情好像有些蹊跷。当毛泽东看到了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弊病，告诫人们要“以苏为鉴”的同时，他自己的意识中却萌生出一种“钢铁情结”，对钢产量的提高最为关注，甚至把钢产量的多少作为中国能否保持“球籍”的标志。这里的结果似乎同动机正好相反：毛泽东希望能够避免重蹈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的覆辙，但过分关注钢产量却更片面。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还注意重工业内部的平衡，钢铁、石油、煤炭、电力、机械等均衡发展。只注意钢产量，则重工业内部的平衡也忽略了。

这里也许可以从毛的哲学思想——抓住主要矛盾来求得理解，即想通过优先发展钢铁工业来带动其他工业的发展，然而事情并不这么简单。首先，钢铁工业是原材料工业，在

社会产品序列中钢铁是初级产品，离最终产品是比较远的，这就决定钢铁工业只能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对钢铁原料的需求日益增长时，它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其次，钢铁工业生产过程涉及到机器、采掘、燃料、电力、化工、石油、电子等工业及交通运输业，这一系列行业不发展，钢铁工业自身也不可能“单枪匹马”前进。可以说，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深刻理解国民经济内部尤其整个工业、交通之间的这种彼此相联、互为条件的关系；他片面地理解了钢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程度标志的作用，把这种标志作用误认为领导作用，似乎可以由它来领导其他工业的发展。这就在思想认识上走入了误区。毛泽东要亲临前线搞“大跃进”，抓钢铁翻番，就是认为国务院领导没有抓住这个主要矛盾。

50年代中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阵营的赶超浪潮，使毛泽东的“钢铁情结”更加强化了。在结束了战后恢复经济、重建家园的工作后，世界各国纷纷开始实施大规模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这种发展在各国之间均具有某种竞争的意味。在不同意识形态体系的东西方之间，这种竞争更是还带有某种“火药味”，甚至干脆被称为“冷战”。

## 提出赶超英国的口号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庆典，随后又参加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弥漫着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气氛。在庆祝十月革

命 48 周年大会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出：通过和平竞赛，“15 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目标。此前，苏共中央已通过一个“在今后几年中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牛奶、牛油和肉类生产赶上美国”的口号。64 个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接受了赫鲁晓夫实际上也就是苏共关于和平竞赛的提法和主张，会议通过的《和平宣言》宣告：“让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今后在发展和平科学、和平技术方面彼此展开竞赛吧，让它们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争取进步、争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竞赛中来证实自己的优越吧。”

毛泽东不能不被这种赶超气氛所鼓舞。在莫斯科期间，他同英共领导人波立特、高兰谈话中，再次谈到了中国的钢产量目标。毛说：苏联在十五年后，将在总产量方面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方面超过美国；中国在十五年后将超过英国。毛还具体谈了中国的钢产量计划：我们今年的钢产量是 520 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 1200 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 2000 万到 2500 吨，第四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 4000 万到 4500 万吨。11 月 18 日，毛泽东在 64 个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上发言，向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宣布了上述目标。这是“赶超英国”的口号第一次公诸于世。

同毛泽东原来所预想的计划相比较，他在莫斯科宣布的计划有两点发展：第一，“二五”计划期末的钢产量由 1000 万吨提高到 1200 万吨，“三五”计划期末的产量由 2000 万吨提高到 2500 万吨，所提出“四五”计划期末的产量为 4000 至 4500 万吨；第二，明确提出“十五年超过英国”的口号。

在毛泽东以往的讲话中，赶超的目标是美国（例如他说

“五、六十年赶超美国”)。现在目标变为英国，而且时间变为十五年，其原因恐怕在于赫鲁晓夫已公开提出十五年赶超美国，就中国当时的实力而言，最现实的赶超对象也只能是英国。这一点，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多少可以作为佐证。

他说：“我国今年有了520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1000万到1500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3500万到4000万吨钢。”“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钢2000万吨，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3000万吨。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超过英国吗？”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毛泽东在发表之前征得了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的同意。这个赶超思想，也反映了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反冒进、要求跃进思想的一种发展，最终成为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一个指导思想。

当然，强化毛泽东“钢铁情绪”的，不只是莫斯科会议的赶超气氛，更重要的还有他同赫鲁晓夫较劲的心理。斯大林去世后，在国际共运的阵营里，毛泽东并没有瞧得上赫鲁晓夫。在理论上，毛不把赫鲁晓夫放在眼里，而且认定赫鲁晓夫把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都丢掉了。在经济实力上，毛一方面不能不承认苏联要强于中国，另一方面又不服输。既然苏联在十五年内要超过美国，中国在十五年内也得有举世公认的成就。其实在没有说出来的潜台词中，毛泽东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欲同“老大哥”试比高。因此，中国的赶超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同西方大国竞赛；二是同苏联竞赛。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的话就说得更明白

了：苏联将变成两个美国，中国将变成四个美国。

十五年赶超英国的口号很快就在国内公开宣布。1957年12月2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致词，第一次在国内公布了“十五年赶超英国”的口号，李富春在这次大会上作了《关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和今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方针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特别讲了钢产量的问题，他说：“当我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并且进一步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我国就有可能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根据大体计算，我国到1972年，钢的产量有可能达到4000万吨左右，即比1957年的产量增长6.6倍左右。英国在1956年钢的产量已经达到2100万吨左右，但是根据英国工业发展速度慢，资源有限和市场难以扩大甚至日益缩小的情况，即使抛开必然要发生的经济萧条和经济危机不说，1972年钢的产量也不易达到我国同年的水平。”李富春接着说：“而在煤炭、机床、水泥、化学肥料等工业品的产量方面，十五年后我国肯定能够超过英国的水平。在十五年后把我国的工业从现在远远落后于英国的状况改变为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状况，这是我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一个伟大的光荣的而且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基于十五年赶超英国的需要，对中共八大提出的“二五”计划建议草案，李富春在报告中提出了调整的意见，钢产量到1962年要争取达到1200万吨左右。

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乘风破浪》，进一步宣传了用十五年左右时间赶上或超过英国。英国1870年产钢22万吨，1957年达到2099万吨，预计到

1972年，可能达到3600万吨。中国1949年产钢15万吨，1957达到535万吨，据设想，1972年可达到4000—5000万吨，这意味着，中国用23年走完英国102年走过的路。

自从公布在钢铁工业生产上赶超英国的消息后，钢铁行业率先在全国兴起赶超浪潮。1958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消息，国家经委已向国务院建议；今年我国钢铁工业计划生产732万吨生铁，624万吨钢和482万吨商品钢材。按照这个计划，1958年生铁比上年增长24.1%，钢增长19.2%，钢材增长13.1%。冶金部提出计划，1958年将新增103.6万吨钢和138万吨铁的生产能力，等于“一五”计划期间新增炼钢能力的43%、新增炼铁能力44%。这个增长速度显然已经不低了。用《人民日报》的语言说：“钢铁战士们开始十五年赶上英国的长征。”

国家经委向国务院提出的1958年钢产量计划，不久以后就在2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正式通过。尽管这是在南宁会议大批“反冒进”、赶超英国浪潮兴起的背景下提出的，它还是在考虑了各项生产条件并进行了综合平衡之后形成的，因此同后来不断加码的指标相比，还算是慎重的。正因为这样，这个指标很快就被一浪高一浪的“大跃进”高潮所突破。

## 从“三本帐”到“以钢为钢”

1958年1月南宁会议提出要搞计划的“三本帐”。所谓“三本帐”，是指中央有两本帐，第一本帐是必成的计划，这

本帐公布；第二本帐是期成的计划，这本帐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帐，第一本帐就是中央的第二本帐，这在地方是必成的计划；第二本帐是期成的计划。

南宁会议后大批“反冒进”，鼓干劲、争上游，促使各行业、各地方纷纷修订原定计划，给原指标加码。钢铁工业自然首当其冲。这年3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鞍钢第二炼钢厂青年团结炉，在2月份创造了大型平炉炉底利用系数（即每一昼夜一平方米炉底面积的出钢吨数）达到10.64的全国最高纪录，走进了世界先进平炉的行列。这个纪录比目前本厂其他平炉的炉底利用系数平均高出3.03，超过了著名的鞍钢第一炼钢厂青年友谊炉去年创造的10.22的纪录；接近了苏联最先进的平炉——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17号平炉去年创造的10.77的纪录，报道说，如果鞍钢所有平炉都能达到这样的成绩，就可以在完成今年增产计划的基础上再增产120万吨钢。在这种形势下，冶金部在3月上旬修订了一个月前通过的钢产量计划，提出当年产钢700万吨。这个指标比原定指标提高了77万吨多。

冶金部不仅提高了1958年钢产量计划指标，而且对钢产量赶超英国的整个计划作了修订。在前述的3月成都会议上发的文件，冶金工业部长王鹤寿写的题为《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更快一些》的文章中，谈到钢铁的跃进计划：最近部党组根据主席的指示，又研究了钢铁工业的建设情况，认为钢铁工业苦战三年，超过“二五”计划指标（也就是超过1050—1200万吨），1962年达到1500—1700万吨是有把握的，2000万吨可以争取。十年赶上或超过英国是可能的，即争取1962年达到2000万吨左右，1967年达到4000

万吨左右；二十年或多一点时间赶上或超过美国，即争取1972年达到7000万吨，1977年超过1亿吨以上。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很赞赏，在会上热情地表扬了冶金部，冶金部副部长高扬文在他的回忆录《三十年的足迹》中，对此这样谈到：如果我们经济正常发展，每年钢的生产平均增产200万吨是可以做到的，十年是2000万吨，加上原有的535万吨的基础，就是2500万吨左右，可以赶上英国（当时估计英国1967年钢产量为2400万吨）。至于20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则是说得太冒了，没有什么根据。后来的“大跃进”破坏了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钢铁工业大上大下，1962年跌到667万吨，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高还在文中这样评说：钢铁工业没有在十年（1958—1967）赶上英国，不是做不到，而是耽误了，这是“左”的指导思想造成的后果。

成都会议后，国家经委汇总各地上报的当年钢产量计划指标，总计为711万吨。4月14日，由国家经委上报党中央，这样，1958年钢产量的计划已经有了两本帐：第一本帐是624万吨，第二本帐是711万吨。不到3个月，指标已经比原来提高了87万吨，比1957年的产量提高了近33%。

当计划指标层层加码的同时，钢铁行业的生产也在不断“跃进”。据5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我国钢铁工业基本建设工人发动了“速度快一倍、投资一当二”的竞赛。现有厂矿的生产工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断地创造“多快好省”的新纪录。1958年施工的钢铁工业基本建设项目有49个（不包括为数众多的地方小型钢铁工业），预计年内开工投入生产的项目，将使国家增加年产157万吨生铁和103万吨钢的新设备，几乎达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加的全部设



备能力的一半。当年开始新建和扩建的湖南、太原、石景山、马鞍山、重庆等5个中型钢铁联合企业，打破了过去的施工常规，打算以前所未有的新速度着手提前施工。仅仅这5个中型企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全部建成后的钢铁年产量，就超过1957年全国的总产量。上海第三钢厂去年平炉平均利用系数10.88吨（注：高于鞍钢和苏联），今年的大跃进指标为12.345吨，达到这个指标，生产潜力就可增长44%。

同一天该报在《让高炉转炉满布城乡，让铁水钢水全国奔流，二十四个省区大办钢铁厂》的标题下，还报道说：目前已经动手筹建的地方小型炼铁厂和钢铁厂约有60个。河北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几乎没有地方钢铁工业，现在正动工兴建7个钢铁厂，共25座小高炉，有5座已投入生产。最近河南工业厅组织7个专区、3个市、49个县筹建钢铁厂的人员，到苏州炼铁厂去观摩学习，拟定了一个建设小高炉100多座、土炉1000多座的具体计划。贵州省第一座钢铁厂已经在贵阳动工兴建，这是一个包括高炉、炼钢和轧钢的联合企业，建成后年产大型钢材4万吨。铁矿资源丰富的内蒙古自治区，今年7月份就有40座小高炉可以投入生产。石家庄钢铁厂第一批建设的3座小高炉，有1座已在4月13日出铁。

风急浪高的生产“大跃进”，反过来推动了钢指标的再度提高。

毛泽东4月下半月曾找冶金部党组几位负责人谈话。他说：你们不要怕钢铁生产多了没地方放，可以放到我的院子里嘛！1956年投资多了一些，工业生产快了一些，就有人

害怕，慌慌忙忙出来反冒进。旧的平衡总是要在发展中被打破的，然后，又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平衡，这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就是不懂这个辩证法。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现在才能生产几百万吨钢，太可怜了，工业不发达就要受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一个省就有欧洲一个国家大，光论人口和面积都比欧洲的一个国家的人口多、面积大；欧洲没有统一，欧洲的各国都发展起来了；而我国从秦始皇时就统一了，统一当然有好处，但中央集权也限制了地方的发展。你们应该对一个省像对一个国家那样考虑它的发展。当时冶金部负责人曾表示，1958年钢产量肯定可能超过624万吨，达到700万吨，最多可能达到800万吨。

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讲话中提出了超过苏联的问题。他说，苏联是二十年加半年，把钢产量从400万吨（1913年的产量）搞到1800万吨。1957年是5100万吨，我看，我们搞到5100万吨，不需要这么多时间。我们的老底子足90万吨（1949年的产量），到1962年，十三年间将搞到3000万吨，可能是3500万吨，也许进4000万吨。从1949年算起，只要7年搞到4000万吨，再加一年，就可能搞到5100万吨。

这次会议讨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二本帐。李富春在会上作了《赶上英国，再赶上美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关键》的发言。他说，这次提交大会讨论的“二五”计划第二本帐，是以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为目标的。王鹤寿在大会发言时说：冶金部再次同各省、市、区研究了钢产量的发展速度后，认为1959年可以达到1200万吨，1962年3000万吨，1967年7000万吨，1972年1.2亿吨。五年可以

超过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

会后，5月26日至3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将1958年钢产量计划指标提高到800万至850万吨。这样便出来了1958年钢产量指标的第三本帐。这个指标比第一本帐提高了32.6%比1957年的产量提高约59%。也就是说，第三本帐已比1957年翻了半番还多。

6月7日，冶金部向中央报送《一九六二年主要冶金产品水平规划》。规划预计，1958年钢产量为820万吨、1962年产钢6000万吨的新指标。中旬，国家计委、经委、财政部对格部向中央汇报的指标作了研究、汇总，经中央财经小组讨论后，由李富春向中央提出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要点》认为，1958年钢产量可能达到850万吨到900万吨。“现在看，以钢铁为主的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有可能不用3年赶上和超过英国”。对于这个《要点》，6月17日毛泽东批示：“彭德怀、黄克诚：此件即刻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读一读，可以大开眼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一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但是毛泽东对这个翻半番的计划仍觉得不满足。我在前面谈到，他在中南海游泳池同我谈话时，提出当年钢产量要比上年翻一番。这时冶金部对此还毫无精神准备。6月17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薄一波《关于1958年计划执行情况和1959年设想》的汇报。在钢铁生产上，薄谈到，预计

今年钢产量将达到 900 万吨。18 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和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廖鲁言、黄克诚、王鹤寿谈话。谈到钢铁生产，毛表示赞成提高钢指标。经研究，1958 年的钢产量的预计完成数改为 1000 万吨，1959 年的钢产量指标改为 2500 万吨，其间，毛泽东对薄一波说：工业就“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吧！这个口号反映了毛以钢铁来带动其他工业的思想，因而颇受他欣赏，当即表示肯定。此后，“以钢为纲”的口号风靡全国。在第二天的谈话中，毛泽东又问王鹤寿：去年五百三（指钢产量），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由于听到了我的预告，王只得说：布置一下看。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冶金部党组几经讨论认为，就当时的炼钢设备能力看，达不到翻一番的目标，但是从以下几个积极因素计算，争取翻一番是可能的。这几个积极因素是：第一，毛主席的威望和号召工农业大跃进，毛主席要求钢铁工业和其他工业大大加快速度，这是很大的一种力量；第二，各省市积极性极高，这就有可能保证翻番的指标；第三，虽然当前全国炼钢的设备能力不够，但是可以增加一些小的炼钢设备，国内即可制造，不需国外进口，这就可以争取更快地增加钢铁生产能力；第四，全国各大中型钢铁厂，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鼓舞下，生产能力会大大提高。冶金部决定按 1958 年钢产量指标 1070 万吨执行，并报告给国家计委和毛泽东。冶金部在向中央报送的《产钢计划》还第一次提出 1959 年产钢 3000 万吨，1962 年产钢 8000—9000 万吨的指标。6 月 22 日，毛泽东将冶金部的这份《产钢计划》批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国家机

关各部委及中央军委会议各同志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以钢为纲》的文章。从此，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进入高潮，与前一段的“大跃进”不同，批后的“大跃进”把钢铁摆在一切行业最为突出的位置。

“以钢为纲”这种“为纲”的历史词汇，其含义在“纲举目张”，这合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抓住主要矛盾，才能办好事情，解决问题。可是，所谓主要矛盾与事物中的其他矛盾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只有不违反联系与制约的关系，才能发挥其主导作用。当年强调的“为纲”违反了辩证法常识，片面地强调“纲”的作用，以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只要把一个部门、一种产品搞上去了，其他就一定可以带动起来，可以齐头并进。似乎只要一马当先，万马必定奔腾。这种唯意志论是违反客观发展规律的。当年各个部门“万马齐奔”，上上下下争先恐后，纷纷向钢的高指标看齐。结果破坏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协调，“元帅升帐”了，只好“小鬼让路”，造成各行业间严重的比例失调。一方面重工业的基建战线越拉越长，不仅一般项目投资不足，撒胡椒面，许多重点工程也多年不能投产造成集中浪费；另一方面，许多重点工程也多年不能投产，造成集中浪费；另一方面，民用急需的轻工业难以上马，且压缩消费品的生产，使人民生活长期不能提高。“一五”期间，轻工业投资占工业总投资的11%，而“大跃进”时急剧下降（1958—1978这20年间降到平均8.7%）。

## 为 1070 万吨钢而奋斗

8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土洋并举是加速发展钢铁工业的捷径》的社论,指出:“一个以钢为纲、带动工业全面发展的工业建设的新高潮已经形成。转炉高炉遍地开花,钢水铁水到处奔流的日子,即将到来。”社论用问答式的写法向全国传达了毛泽东的钢铁翻番的构想:我国的钢铁工业能不能以最高的速度,比如说,每年产量的增长率不是百分之几、百分之十几或者百分之几十,而是百分之百甚至更高的比例发展呢?答曰:可能性是存在的,问题是我们想不想、要不要高速度?我们想要,就有;不想要,就没有。也许有人会说:“要高速度就有高速度,是否有点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味道呢?”我们说,这里一点也没有唯心说,而是完全从实际出发,是有根据的。根据是什么呢?第一是我国矿产资源丰富。炼铁需要大量的煤,而在我国两千多个县中,就有一千五百多个县有煤;钢铁的原料——铁矿石,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探明的铁矿已达56亿吨。第二,就是毛泽东同志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指出的:我们有党的领导和6亿人民,这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是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人多力量大,人民是这样形容自己的力量:“我们一跺脚,大地就震动;我们吹口气,滚滚河水让路;我们一举手,巍峨大山胆寒;我们一迈腿,谁也不敢阻挡;我们是劳动人民,我们的力量无敌。”(上钢一厂民歌)可是有了资源和豪言壮语还不能最后解决问题,依靠现有大

企业挖潜也有限度，必须还要有具体的措施，才可以确保目标的实现。于是社论提出了“我们赞成以‘小’和‘土’为主的主张”，并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讲述一个复杂的工业道理：“一个小炉子炼出来的钢和铁虽然不多，但用一万个、几万个小炉子炼出来的就可以汇成滔滔的钢铁生铁洪流。例如，河南省依靠群众力量，今年可以达到400万吨，相当于现在鞍钢的生铁产量！我们不说每个省和自治区都建成这么多小炉子，只说有四分之一的省和自治区做到吧，那不就等于我国多有7个鞍钢了吗？我国钢铁产量赶上英国的日子，不就可以大大提前了吗？”

在如此逼人的形势下，各地方、各企业纷纷再次修改计划，提高指标。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鞍钢，于6月份将原计划在1962年达到630万吨钢的指标取消，改为1959年就要达到生产800—1000万吨的生产能力。1957年鞍钢只生产了290万吨，1958年就要增产130—140万吨。6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华北区协作会议提出：全区1962年钢产量将达到2000万吨，比国家计委原定的1962年华北区钢产量高出700万吨。会议还确定了1959年全区生产600万吨钢的指标，其中北京120万吨，山西160万吨，河北250万吨，内蒙古70万吨。华东区则报出了两年中赶上日本，四年超过英国的设想；华东区的钢铁厂集中在上海，1957年上海仅产钢50万吨，1958年就要生产100万吨，1959年生产钢600万吨并要达到生产1000万吨的能力。到7月底，全国已建成小土高炉3万余座，仅湖南一省就建成炼铁炉14936座。8月，河南一省建成简易小高炉14300多座。

大炼钢铁所需的主要燃料和原料煤和铁矿的情况如何？

5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我国煤炭产量明年就可能赶上英国。”“1957年中央和地方的煤炭产量是13000万吨，1958年争取达到18000万吨。到4月份止，煤灰工业部所属各矿（不包括地方）已经生产煤炭3902万吨，比去年同期多1077万吨。”“目前，中央和地方企业平均日产量已达50万吨，根据这个数字推算，每年可以增长5000万吨，到1959年达到23000万吨，而且还有可能大大超过。”“而英国1959年只能达到23040万吨。由此可见，我国煤炭产量完全有可能在最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在原料问题上，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著文说：“我们初步规划，在第二个五年探明铁矿储量94亿吨，连同第一个五年探明的56亿吨，到1962年底，全国铁矿累计工业储量可达150亿吨，可以保证年产1亿吨钢铁的50年左右的需要。”

来自各地、各部门“跃进”的消息，无论是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是对未来的种种“计划”、“设想”，似乎给人一种印象，既定的目标是一定能够如期实现的。

实际情况却远不令人乐观。按照1958年产钢1070万吨的计划，平均每个月需要产钢89万吨多。但是这个指标是6月下旬才布置下去的，而1至6月全国累计产钢才310多万吨，这就是说后6个月必须月均产钢126.67万吨才能完成全年计划。可是翻一番计划布置下去以后的7月份，仅产钢70万吨。这时离全年计划要求达到的目标还相差甚远。毛泽东感到钢的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心急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下死命令，落实全年计划。

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全民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为主要标志，把



“大跃进”运动推向了最高潮。这次会议，不但各省市领导同志参加了，各钢铁厂领导也参加了，会议开得很紧张，中央领导同志一个省一个省、一个钢厂一个钢厂地征询意见，问能不能翻番，生产1070万吨钢，最后，关于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会议认为，“根据当前全国人民对于钢铁巨大需要和对于钢铁生产的巨大努力，根据钢铁冶炼设备正在逐月增加和迅速投入生产的情况，钢铁生产的飞跃发展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因此，今年2月一届人大五次会议确定的1958年钢产量达到620万吨的指标，是不够的，5月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年产800—850万吨的指标，也仍然嫌低。会议决定，把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正式提高到1070—1150万吨（宣布为1070）万吨。这样，会议就正式确定了毛泽东6月提出的1958年的钢产量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的指标。会议期间，通过电话传达，各省市，各大钢铁企业都作了紧急动员，要求不管有多大困难，也要实现钢产量翻番。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全力保证钢产量》的社论，提出“生产1070万吨钢，是我国人民当前的一项头等重要的任务，我们必须为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全力以赴，只能超额完成任务，而决不能少一吨钢。”当时，只剩四个月了，于是有人说，不抽鞭子是不行的。

这种片面性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当时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要有了人的精神，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在急切地赶上发达国家的愿望驱使下，以政治口号、宣传口号代替对经济规律的探索；大部分人注意了政治上保持一致，以为这是一种真正的责任感，也是一种组织性、纪律性的表现，而忽视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认识不到不

实事求是的责任感不是真正的责任感；有的则是在大的政治气候下不敢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在民主作风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听不到不同意见。这是后话。

北戴河会议一声号令，“苦战四个月，为钢产量翻番而奋斗”的口号响遍全国，生产任务变成了政治任务，事实上，为此目标而奋斗所面临的严酷现实，大家也并非不清楚。

在北戴河会议确定钢产量翻番任务时，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才完成了450万吨，要完成1070—1150万吨的任务，在今后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内必须产钢600—700万吨。在钢铁工业早已开始“大跃进”的情况下，全年2/3的时间才完成1/3多点的任务，要想在余下的1/3的时间内完成将近2/3的任务是不太可能的。就连提出钢产量翻番指标的毛泽东本人，在北戴河会议上也发出过“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叹。

到1957年底，我国的钢和铁的生产能力分别为648万吨和696万吨，虽然，原先确定的1958年基本建设项目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钢铁工业，北戴河会议又在原有基础上确定全国新建小高炉12507座，中型高炉142座，各种转炉设备205套，各种电炉44台，但是即使这些项目在当年全部建成投产，加上原有的生产能力，在四个月内也不可能完成预定任务。

全国大部分地区存在着供电紧张问题，特别是东北、西南和山东等地更为严重。电力不足，成为工业生产“大跃进”中的一个严重的薄弱环节。6月份华东协作区开计划会议，柯庆施请中央有关部委派人参加。各路人马均为华东的

钢铁高指标捧场，只有我以电无法保证而表示难以实现。会后我给毛写信，力陈指标不可能完成的意见，在那种头脑发昏的形势下，他自然听不进去。煤炭方面，按钢产量翻番的要求，1958年必须完成22080万吨。但1-8月生产了12097万吨，只完成全年任务的55%，尚有近1亿吨的煤炭，要靠剩下的4个月时间完成。交通运输方面，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等部门都已出现异常紧张局面，仅以铁路为例，截止8月底，全国积压物资达650万吨，使许多车站、专用线发生严重堵塞。采矿方面，勘探、开采等能力普遍不足。

但是，既已夸下海口，当然不能食言，难以完成也得硬着头皮上。“1070”这一赶超英国的指标，它的制定和公布，在当时看来，更有着不同寻常的政治和经济意义，非完成不可。北戴河会议召开的同月，8月25日至31日，中央即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分管工业的书记会议。在北戴河召开的这两个会议，提出了强行完成1070万吨钢产量指标的一系列措施。

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从现在起，必须首先注意工业的领导，必须亲自挂帅，大抓钢铁和大抓机械。9月1日，《人民日报》在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会议公报的同时，还发表了题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的社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必须把领导钢铁生产当作首要任务，每个星期检查一次生产进度，采取最有效的办法，调动各方面的力量，组织各方面的协作，解决生产中的一切困难问题。”北戴河会议后，中央曾先后4次召开电话会议催促。在9月4日的电话会议上，

谭震林传达说：主席提出，明年粮食再翻一番，又提出今年1100万吨钢一吨也不能少，少了就是失败。彭真说：主席要求在9月15日钢铁有一个大跃进，因为9月是要命的一个月。9月24日中央书记处召开电话会，要求到30日，要达到日产钢6万吨、铁10万吨，“否则是不行的”。9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召开电话会议，更进一步提出了从省、地、县到乡，各级党委第一书记都要亲自挂帅、亲临钢铁生产现场、日夜不停地指挥作战的要求。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分管冶金工业，并担任钢铁大跃进领导小组组长，多次主持召开钢铁工业会议，组织各有关部门的协作会议。周恩来也说过：“世界各国的工业发展历史表明，有了钢铁就能够有机器，而有了钢铁和机器，也就能够有工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一让钢铁工业先行。机械制造、主要制造、主要原材料、电力、交通运输的工业生产排队原则，要求首先满足冶金设备和冶金工业增产的需要，其次满足制造发电设备的需要，再次满足主要机床的需要，然后才可顾及其它工业部门。规定，除供机械铸铁所需的生铁外，其余全部拨给钢厂炼钢。9月5日，《人民日报》《全力保证钢铁生产》的社论，进一步提出了“停车让路，首先为钢”的号召。要求“各部门、各地方都要把钢铁的生产和建设放在首要的地位。当钢铁工业的发展与其他工业的发展，在设备、材料、动力、人力等方面发生矛盾的时候，其他工业应该主动放弃或降低自己的要求，让路给钢铁工业先行。”“不管哪一个地方哪一个部门，有材料、有设备、有交通运输工具，必须首先让给钢铁工业；有制造能力，必须首先为钢铁工业而生产；

电力必须首先输送给钢铁工业；煤炭及其他燃料必须首先满足钢铁工业的需要；有劳动力和技术力量，必须首先调给钢铁工业。”

——下达死命令。北戴河工业书记会议确定：铁，9月200万吨，10月280万吨，11月320万吨，12月350万吨；钢，9月120万吨，10月100万吨，11月200万吨，12月220万吨。在地区上，钢铁工业薄弱的山西省也要生产68万吨铁，55万吨钢。几乎没有什么钢铁工业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一五”期间总共才生产出17000吨生铁）也必须生产20万吨生铁。9月5日晚上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电话会议，再次强调，北戴河会议确定和下达的钢铁工业指标，只能超额，不准完不成。不但一吨不能缺少，少一斤也不行。

——大搞土法炼铁。中央对八大二次会议后大办地方工业形势下出现的土法炼钢特别是土法炼铁很感兴趣，在北戴河会议上就要求各地大搞小高炉和土高炉，以生产炼钢所需的大量生铁。9月底，毛泽东向记者发表谈话时，强调发动群众大炼钢铁的重要意义，批评了“不正规”、“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等说法，要求在工业战线上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人民日报》也发表了《土洋并举是加速发展钢铁工业的捷径》、《关键在于大搞群众运动》、《开展炼钢的群众运动》和《让土法炼钢遍地开花》等社论，极力宣传土法炼钢对于钢产量翻番的意义。冶金部等单位还组织召开土法炼铁、土法炼钢的现场会议，以推动全国范围的土法炼制钢铁运动，使“小土群”（由群众自办的小型土法炼铁、炼钢）同“大洋群”（在原有大中钢铁企业发动群众突击炼铁、炼钢）配合起来完成任务。

——设法解决运输问题。要求各地成立强有力的运输指挥部，统一指挥当地的交通运输，调动机关、学校、部队等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调集大车、汽车、轮船、飞机、人力车、兽力车甚至小汽车等一切交通运输工具，投入全民搞运输保证出钢铁运动。

此外，中央及有关部门还相继发出了全民大办煤炭、大办电力、大办地质等指示，要求采取各种紧急措施，保证钢产量指标翻番任务的完成。

## 九千万人上山

由于采取以上非常措施，北戴河会议以后，全国范围的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迅速掀起高潮。如《人民日报》社论《关键在于大搞群众运动》所说：“要使钢铁产量猛烈上涨，关键在于在全国范围内认真贯彻办钢铁工业的群众路线，真正形成一个全民办钢铁的群众运动。”“切实有效地把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和昂扬的斗志组织起来，就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度的前进。”办法是，组织大辩论，成立指挥部，书记亲自上前线，组织战役，全党全民各行各业编成钢铁师、运输营、采矿队等各种野战军、后勤部、昼夜突击突破一点，创造高产纪录，开现场会议，推动大面积丰收。

各地党委纷纷搞动员，抓措施，力保钢铁元帅升帐。河北省委成立大炼钢铁指挥部，指挥长由省委书记亲自担任，要求第一抓领导，第二抓组织，第三充分依靠群众，第四抓生产。山西省组织了工作团、技术指导团、内蒙古自治区党

委采取了“五抓”（抓生产、原料、设备、技术、运输）的办法，山东省要求所属各级党委把钢铁生产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江苏省委要求上炉建设要普遍实行“五定”（定型、定群、定量、定员、定制度）。浙江省委要求领导同志上山下乡，“不流铁水不离炉、不见铁矿不下山”。安徽省委成立了把机械、电力、交通、建筑、物资、商业等有关部门统一组织起来的冶金工业指挥部。福建省各地党委第一书记亲自带领干部群众上山下厂猛攻钢铁。冶金部抽调各方面的技术力量派往各省、市、自治区。

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一路南巡，亲自督战。他首先视察了湖北。到武汉的当天，他听取了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关于钢铁生产情况的汇报，接着视察了一批钢铁企业，如武汉钢铁公司、大冶铁矿区、大冶钢厂、武昌第一纱厂小高炉等。视察过程中，他和上述企业约4万名职工见了面，赞扬了他们在大办钢铁中所表现出的充沛的革命干劲和创造精神。毛泽东非常兴奋，对陪同视察的王任重说：许多事情看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全国也一样，过去9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要吨。你看怪不怪。王任重回答：主席一再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很重要，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样一来许多发明创造出来了，许多奇迹也出来了。（见《七一》，1958年第5期）

全民大炼钢铁，动员了广大工人、干部、学生、居民直至乡村农民。9月24日《人民日报》曾介绍湖南邵阳专区的经验：“他们组织全民大辩论，驳倒了‘农民炼不出铁来’的‘怀疑论’、‘条件论’等右倾保守思想……，在全区组织

了万余干部、93万群众投入炼铁运动。没有矿，他们说：“把地球挖穿，也要挖出矿来”。仅一个湘乡县，就发动了7万多人找到120处铁矿和51处煤矿。焦煤运不及，他们自己去挑，去搬。仅一个涟源县就发动2万多人排成长蛇阵，从山上运下6000多吨焦煤。”据统计，7月底，全国用在钢铁战线上的劳动力已有几十万人。8月底，增至几百万人。9月底，猛增到5000万人。10月底，又增到6000多万人。1958年末，达到了9000多万人，加上其他战线直接和间接支援的，全国投入大炼钢铁运动的劳动力超过了1亿，占全国人口的1/6。

在当时情况下，完成指标单靠大中型企业已不可能，便把希望寄托在小高炉和“小土群”上。8月底以前，全国已建成一批年产钢在10万吨以下的小高炉。9月以后，新建了几十万个，这种小洋高炉，到1959年春仍保留了10万个。“小土群”的上高炉，在全国更是无处不在，几万、几十万，成百万个一哄而起。不但工厂、公社，而且部队、机关、学校，甚至外交部、安徽省委机关也建土高炉，办炼铁厂。这种高炉，大的不过几米高，小的容积仅一立方米多，不但砖瓦窑、瓷窑改成了土高炉。就连侵华日军和国民党军留下来的碉堡、炮楼，也都改成土法炼钢炉具。为了解决钢铁战线煤炭不足的突出问题，煤炭部提出，一方面，原有的大煤矿进一步加紧生产；另一方面，全民大办“小煤窑”，采取“小土群”的运动，“用分散的小煤窑对分散的小土群”，仅小煤窑开挖10万多个。煤炭不足，各地还大量砍伐树木烧成木炭代替。商品位的矿缺乏，就用低品位矿石代替，没有矿石，甚至把家庭用的铁锅砸碎当原料，有的家庭



许多年之后仍只能使用铜盆、铜勺（大炼钢铁时留下的）。在办地质方面，全国上千万人进山找矿；在大办运输方面，组成了数以千万计的运输大军，各行各业男女老幼，既用现代化车辆，也用原始运输工具，昼夜不停，抢运大炼钢铁所需的各种物资。

这种用“小土群”的办法，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实际情况究竟怎样呢？我不由得想起“高扬事件”。在庐山会议前期，黄克诚在小组会发言，就赞扬高扬实事求是的精神。高扬当时任中央工业部副部长，1958年9月率该部工作组到河南禹县、方山、鲁山等地了解大炼钢铁的情况。初到方山一看，的确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与高扬同时去禹县采访的人民日报编辑夏景凡，曾描写当时的情形：“来禹县四五天，看了一些群众大炼钢铁的场面，很受感动。这里群众大炼钢铁的劲头，真是大得无可比拟。通往山区的大路上，日日夜夜都是拧成绳的人群、马牛群、牛车群、小土车群、自行车群……所有可以用来运输的东西都用上了，大汽车也很多，公路上经常发生拥挤和等路的现象。山沟里的景象更是壮观：满山架岭的人堆，一片片的土炉群，狼烟冲天，人声嘈杂，加上千万风箱、风葫芦、鼓风机抽动的声音，真是热闹极了。这景象有点像庙会，但要比庙会热闹百倍。在这里占人最多的工作除运输外，要算是作鼓风的人了。少数国营厂有极少数电力或柴油机带动的鼓风机；公社办的厂，则多是用人力绞动的风葫芦和无数的大小风箱；原来在家里用来做饭，庙会上用来制水煎包子和炸油馍的风箱，都拿来用上了；前几天在方山‘三八妇女炼钢厂’，还看到许多从三里、五里、十里、八里赶来支援的老太太和孩子们；他们一个个

都拿着在家煽火做饭和夏天拂暑用的芭蕉扇和鸡毛扇，目的是想为炼铁鼓风的。说起来这可能是笑话，但群众这种热情实在动人。特别是看到那些老太太一手扶着拐杖，一手拿着扇子，踏着雨后的稀泥向山上爬行时，真是激动人心！”

这的确是“小土群”大炼钢铁一个比较典型的场面。记者写这些当然是想赞美它，但有一句话是说对了，这景象的确像庙会。同那种规范的大工业相比，这种男女老少齐上阵，锅碗瓢盆一起来的场面，不是太像庙会了吗！

透过这种热热闹闹的场面，高扬一行很快就发现了问题。禹县的山区聚集了本县及来自许昌以东各县村庄成千的男女青年，他们炼铁用的所谓“铁矿石”，谁也说不清含铁量是多少，甚至很难说是铁矿石，所用的燃料也不是焦炭而是煤。炼铁是用土砖砌成的窑或利用旧砖窑，放进煤和铁矿石用柴点火，等煤燃烧完或灭火了，所谓“炼铁”就算告成。高扬亲眼看到炼出来的根本不是什么铁，只是一些熏得乌黑的石头。后来有人说是“烧结铁”，其实根本就没有烧结。他当时就向禹山县委书记刁文指出，这里有严重的弄虚作假现象，上报的数字90%以上都与实际不符，全县很少有一类铁，有的厂甚至根本没有一类铁，也报了许多一类铁的产量。全县平日没有什么日产量，只有放卫星时集中报一下，而且许多是把铁矿石装进大土炉便上报了产铁量。对这种弄虚作假的情况，高扬无法容忍，当即向中央工业部写了考察报告，并向中监委写了报告（他当时还是中监委委员）。

在这里采访的夏景凡从高扬处了解了上述情况，还从当时也在禹山调查的冶金部几位技术干部那里又知道了不少弄虚作假的情况。冶金部几位干部认为：这里对什么是一类

铁，什么是二类铁，各厂划分全不一样，有的厂上报一类铁的产量大大超过实际产量。如方山镇卫星社炼铁厂9月15日第一次放“卫星”时，上报一类铁日产量210吨，实际上并不是一类铁；从该厂建立到9月28日上报铁产量共计1860吨，其中一类铁212吨，实际上所能生产的一类铁不超过一吨，二类铁不超过两吨。在计算产量时是把几天的产量算成一天的产量，如上述卫星社9月15日和23日两次放“卫星”上报的产量，实际上是平日产量没有报，分别集中到这两天报的。

冶金部的干部还把方山区两次放“卫星”的上报产量与实际产量比了一下。两次放“卫星”，方山区各厂共上报17816吨，其中一类铁1335吨；据他们实地调查和报表计算，实际完成一类铁不超过200吨，前面提到的“三八妇女炼铁厂”上报产量总计587吨，其中一类铁11吨，二类铁80吨，三类铁496吨。这些产量除调走二类铁2吨外，其余全部存在厂里。冶金部的人到厂里实地调查发现：一类铁仅0.8吨，与其上报数相差12倍；二类铁不超过3吨，与其上报数相差27倍；三类铁不超过80吨，与其上报数相差6倍。

夏景凡自己也作了实地考察，他在各厂除了看到人山人海，很少看到流出铁水，很难找到一座正常生产的土高炉。

然而就在高扬率领的工作组及冶金部和人民日报的同志调查期间，禹山县于9月30日又放了第三次“卫星”。本来这天下雨。土高炉生产受到影响，但晚上县委书记刁文宣布第三次“卫星”的产量为6022吨，其中一类铁200—300

吨。高扬及工作组、冶金部的人都对这个产量抱有疑问，可是第二天县钢铁办公室上报产量提高到 35000 吨，而且报到了中央，在报纸上公布了这个日产铁的“记录”。

高扬给我的回忆资料谈到，他们一行在河南调查期间，地方领导的态度由热变冷，最后转为“敌视”。因为当高扬指出禹山大炼钢铁弄虚作假时，河南省委正向中央报捷，并在报纸上公布日产铁 3 万吨的“成绩”。高扬的意见被县委、地委立即反映到省委，他还没到省委汇报之前，中央工业部部长即来电话，命令立即率工作组回北京。高扬向河南省委吴芝圃、杨蔚屏介绍到禹县、鲁山等地考察的所见所闻时，吴、杨等人态度极为冷淡。

他回到北京便受到部长的批评。庐山会议后，高扬自然免不了大挨批判斗争，上纲上线，到 1960 年 7 月，结束批斗，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到贵州一个工厂。1962 年 7 月，他才得到平反复职。

## 鞍钢“拔白旗”

北戴河会议之后，报刊不断报道各地大放“钢铁高产卫星”的情况。9 月 14 日，贵州省首放“卫星”宣布生产生铁 14000 吨，提前超额完成了 9 月份的 9000 吨生铁生产计划。曾在农业方面“名列前茅”的河南省不甘示弱，马上宣布仅 9 月 15 日一天，全省产铁 11894 吨，日产生铁千吨以上的县出现了 8 个，其中禹县日产生铁高达 4396 吨。9 月 29 日，是中央确定的放“卫星”的日子，全国日产钢近 6

万吨，铁近 30 万吨，出现了 9 个日产生铁超过万吨的省、73 个日产生铁超过万吨的县，和两个日产 5000 吨钢、一个日产 4000 吨钢的省。10 月 15 日到 21 日是中央确定的高产周，10 月 26 日《人民日报》称：“一周内钢的平均日产量比以前 14 天的平均产量增加了 85%，其中钢的最高日产量曾达到 10 万多吨。”在此期间，毫无钢铁工业基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后来居上”，连放几颗特大卫星。环江县产生铁 6300 吨，忻城县日产煤炭 67 万多吨，鹿寨县日产生铁竟然“高达”20 万吨。

作为我国钢铁工业的主力军鞍钢如何？1958 年以前，鞍钢的钢产量占全国钢产量的 41.1%。根据钢产量翻一番的计划，鞍钢的年产钢任务为 450 万吨。因此，鞍钢生产直接关系到全国钢铁翻番任务能否完成。1—8 月，鞍钢产钢 233 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 29.8%，只完成跃进计划的 51.9%。照此速度生产下去，不可能完成任务。辽宁省委、鞍山市委认为鞍钢生产进度上不去，是鞍钢有“右倾保守”思想在作怪，在鞍钢大搞“拔白旗”运动，炼铁厂厂长蔡博就在运动中被拔了“白旗”，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

蔡博是蔡和森的儿子，曾在苏联留学，是留苏学生成绩最拔尖的，是冶金工业方面的专家，回国后分配到鞍钢任炼铁厂厂长。他一直主张建立“一长制”、严格企业管理，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介绍炼铁厂实行区域管理制的经验。在生产中，他重视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大胆使用技术人员。八十年代中期，蔡博找我谈过他当年的这段历，并将有关资料给了我。“大跃进”运动开始以后，蔡博对在炼钢方面脱离实际、违背科学的做法表示怀疑。经过反复计算，

他认为鞍钢“顶多能完成 435 万吨，完不成 450 万吨。”9 月 25 日，鞍山市委召开 3 万人大会，动员为完成 450 万吨钢而奋斗。李富春在大会讲话：“谁有更多的共产主义思想，谁就会创造奇迹，谁不打破常规，谁就要失败。”“不要被某些事故吓倒，也不要被大的企业和现代化的技术所吓倒，更不要被怀疑派所吓倒。一次失败，再来第二次、第三次，一定要把红旗插起来。”

鞍钢“拔白旗”首先从炼铁厂开始，蔡博被指责为“墨守旧的规章制度”，“压制群众”，有“保守思想”，在厂党委常委会、常委扩大会以至全厂职工大会上多次受到批判，并被宣布停职，反省检讨。1959 年 4 月，他调离鞍山到冶金部钢铁研究院。11 月 10 日，《鞍山日报》发表文章：《大砍一长制，为彻底翻身而斗争》。鞍钢的“拔白旗”39 人，科级以下干部被“拔白旗”106 人。厂级领导干部被“拔白旗”运动历时两个多月，公司厂处级领导干部被“拔白旗”的是青一色的管技术的行政领导干部，其中 33 个名老干部都是转业多年，已经成为内行的专家。“拔白旗”一方面扼止了真理的声音，另一方面则是放开了假话的喉咙。鞍钢党委在一份《插红旗、拔白旗，大搞群众运动》的报告上说：“炼铁厂在这次大搞群众运动中，领导干部下决心，高举红旗，明确了要用革命的办法，而不是用改良的办法，大胆点出白旗思想的代表人物，放手发动群众，大搞、快搞、彻底搞，上下一齐发动，造成排山倒海的声势，把斗争迅速展开。这样被长期压抑的积极因素就会得到发扬，新的政治局面就会迅速出现。”

究竟是什么是“白旗”？当年并不见诸正式文件。《辽宁

日报》1958年11月1日社论为所谓“白旗”画了像：“见物不见人的保守主义；迷信洋人的‘贾桂’思想；固执‘一长制’，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总路线；按常规办事，满足于微小进步；只能听表扬，不能听批评，不以革命精神来衡量自己工作；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这些，统统都是“白旗”。

鞍钢“拔白旗”则有所侧重，主要围绕以下4方面的问题进行：一是把管生产、技术的干部抓生产、抓技术看成政治不挂帅，脱离党的领导，不相信群众，看不到群众的“首创精神”，是“一长制”的残余。二是把按客观实际、实事求是地安排生产、组织生产，称为“右倾保守”，“是只算经济帐，不算政治帐。”从而提出“人有多大大胆，炉有多大的产”。三是把按规章制度办事，说成“洋奴哲学”、“贾桂思想”。第一炼钢厂把全厂的规章制度拿到平炉台上，像土改时烧地主地契一样，付之一炬。四是把实行物质奖励，说成是“要钱票，不要红旗”，是把工人变成“人民币的奴隶”。提出要“为共产主义工作，不为人民币工作”。

鞍钢“拔白旗”运动虽然历时只两个多月，但对生产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许多干部不敢抓技术、抓管理，群众的积极性受挫。违反规章制度，生产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由于超负荷，炉体事故时有发生；高炉连续工作，缺少维修，发生漏钢事故；平炉因等钢模，钢水在炉内呆得时间过长，对炉体侵蚀过大，造成炉体事故。浪费严重，成本上升，质量下降。1957年全公司因公死亡43人，1958年这个数字上升到65人，1959年达到124人。炼钢设备事故1958年比1957年增加4.6倍，1959年比1957年增加19倍。平炉

冶炼时间 1958 年比 1957 年平均每炉延长 32 分钟，1959 年则延长到 1 小时 23 分钟；炉龄逐年下降。每吨铁成本 1958 年比 1957 年增加 13%。生铁合格率 1958 年比 1957 年下降 4.09%，1959 年比 1957 年下降 0.45%，1959 年比 1957 年下降 1.37%。钢材一级品率 1958 年比 1957 年下降 3.67%。

由于取消计件工资和必要的奖励，极大地挫伤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大家都有意见，据当时调查，有 30% 的党、团员思想不通。工人积极性不高，生产效率很低。如第一炼钢厂小修炉子，实行计件工资只用 40 个小时；取消后，要用 80 个小时。第三炼钢厂修大罐，实行计件工资仅用一至二小时；取消后，有的长达 12 小时，工作效率大大降低。

直到 1959 年 7 月，鞍山市召开党的第二届代表大会，确定跳出第一本帐 525 万吨的圈子，把钢的生产指标提到确保 532 万吨。代表大会认为右倾保守思想和松劲泄劲情绪，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倾向。第一书记杨士杰在会上批判了对 1958 年大跃进中“某些问题的一些不正确看法”。认为 1958 年的大跃进是经过伟大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以后，空前地加强了党对企业领导的结果。各级党组织根据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实行“大权独揽”，讨论和决定企业中许多重大问题，采取一杆子插到底的方法，直接召集干部大会或群众大会进行部署，组织执行，是完全正确的。他说，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对改变企业面貌起了决定性作用。钢铁厂在批判蔡博的技术指导思想时，一度有不够确切的地方，斗争中区别对待不够，但成绩同缺点比较起来，仍然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甚至不到一个指头的问题。“拔白旗面宽了”，“对待知识分子政策”‘左’了”的看法是片面的，忽视对“犯错



误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长期性、艰巨性，放松对他们进一步的教育和改造，必然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认为大跃进中鼓励群众破除了—些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对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促进生产大跃进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59年7月31日，正在庐山主持中央会议的毛泽东，在鞍山市委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批示直接联系到正在进行的反彭德怀的斗争：“必须抓紧八、九两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情绪，厉行增产节约。无论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都是如此。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看不到这点是瞎子。在庐山会议上提出反冒进，大泼其冷水，简直是罪恶。”8月27日，鞍山全市10万人大会响应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反对右倾思想。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鞍山市委对“拔白旗”运动中被打击受处分的对象，进行了甄别平反。

全国范围内经过四个月的突击蛮干，加上相当程度的虚报浮夸，钢铁产量迅速增加。1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一年间钢产加番，在世界钢铁史上写下了辉煌一章，1070万吨钢——党的伟大号召胜利实现》。到年底，则宣布完成钢产量1108万吨，生铁1369万吨，超额完成了1958年钢产量翻番的任务。

## 惨重的代价

1958年下半年的全民大炼钢铁，从表面数字看，“完

成”了北戴河会议确定的钢产量指标翻番的任务，似乎保住了“大跃进”的面子；但在实效方面，从短期内的情况看，已经暴露出它对于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危害，其代价是惨重的。

强调群众运动作用，强迫追求产量，从而忽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在大型企业尤其突出。由于忽视大型企业管理的特點，领导只是号召职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而不尊重科学技术，否定遵守规章制度的必要性，不按经济规律办事，造成许多恶果，如上述鞍钢出现的情况，虽然有些企业在群众运动中提出了一些合理化建议，改革某些操作法和工具、设备，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大多数企业在大搞群众运动中，片面追求产量，盲目拚设备、不顾质量，管理陷于混乱，导致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被白白浪费，不少设备因超负荷运转遭到损坏。1958年10月以后，在基本建设中，发生了许多工程质量事故，倒塌了不少新建的厂房，事故的数量、伤亡的人数比历年大增（1958年工伤事故共死亡5万人）。面对钢材等物资紧缺，一些建筑工地因陋就简，用木材、竹材代替钢筋，用砖木结构甚至砖拱结构代替钢筋混凝土结构，并将这些做法当作节约的经验加以宣传推广。片面理解快速施工，不顾开工前的准备程度，苦战几昼夜、人海战术、急于“放卫星”等现象，在全国普遍发生。

全国“小土群”炼铁中，到底搞了多少小土炉？据《薛暮桥回忆录》记载，他当年对“大跃进”是有看法的，1959年他作过统计：“一股风建成了200万个土高炉”。当然“小土群”的效果奇差，后果严重。1958武昌会议前夕，就全

民炼钢发生的问题，毛泽东让王鹤寿写一个报告（其他工交各部也都同样受命），经毛批示：“此件很好”，作为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印发。王在报告中肯定这场“政治挂帅”、“真正的革命”的全国办钢铁路线时，也谈到“小土群”存在的问题：“就是有不少地方，在放高产卫星的时候，所生产出的生铁，有很大一部分是烧结铁，而不是可以用于平炉、转炉炼钢的生铁。”钢的生产“目前要过的关有两个。一是洋炉（平炉、转炉）用上铁炼钢的技术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有时虽然能炼出钢来，但是转炉不能维持正常的寿命，影响正常的生产。”“另一个关是土法炼钢如何提高。大部分的上钢，只能锻打成不大的体积，而不能铸成较大的钢锭，再由钢锭轧成各种钢材，因此就限制了它的用途范围。”1959年8月26日，周恩来在《关于调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进一步开展节约运动的报告》中，曾讲到土钢、土铁在钢铁产品中的比重：1958年1108万吨钢中，合格的好钢只有800万吨；在1369万吨生铁中，土铁占416万吨。这些土钢、土铁质量差，含硫量超过冶金部的规定，很难加工使用，有些完全是废钢、废铁。用小高炉和土高炉炼铁、炼钢，成本费用高，1吨生铁的成本费，大高炉是100元，小高炉是345元，而1吨生铁的国家调拨价只有150元。据国家统计局估算，1958年土法炼钢、炼铁的亏损达50亿元，国家花费了大量补贴。为生产这些土钢、土铁，又过量开采矿石，砍掉大量树林，砸掉大量铁锅铁器，破坏了矿产和森林资源，影响了人民生活。直到1959年春，才停止了这种土法炼铁的“小土群”运动。对于这场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全民炼铁”，当年大家还难以正面承认，还得自圆其说。

如 1959 年 1 月 15 日，王任重 in 湖北省四级干部会议上说：“大办钢铁运动的收获，是炼铁炼人，一举两得，出了 80 多万吨铁，锻炼了几百万人。即使有些地方上山的人很多，出的铁很少，或者白跑了一趟了，挖了些黑石头回来，也是胜利，等于全民探矿嘛。我们不要单纯从经济上看，经济上的收获很大，政治的收获更大。”

为保证实现钢产量翻番指标，钢铁工业本身的基本建设规模增加了，与钢铁工业有关的煤、电、运输等部门的建设项目同样增加，拉长了 1958 年的基本建设战线。据《中国统计年鉴》介绍，1958 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由原计划的 1135 个猛增到 1587 个，比 1957 年增加 595 个。基建投资由 1957 年的 138 亿元增加到 279.06 亿元，增加 84.5%，积累率由 1957 年的 24.9% 增加到 33.9%。这是当时国力难以承受的。同时，由于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全民大办工业的需要，使全国职工总人数由 1957 年底的 2451 万人猛增到 4352 万人，超过了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负担能力，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支出和商品粮销量，扩大了社会购买力，加剧了社会商品的供需矛盾。

由于大炼钢铁，“元帅升帐”，生产指标脱离实际，急于求成，忽视经济效益，引起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首先是工农比例失调。1957 年和 1958 年国家用于农业投资的金额分别为 12.7 亿元和 28 亿元，在经济建设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9.2% 和 10.5%，但是，由于工业发展过急，影响了农业的发展。一方面，在大办工业、大炼钢铁过程中调用了农村中大量青壮劳力，参加农业劳动的多为妇女老弱等半劳动力。农业与工业劳动者的比例由上年的 13.8:1 下降到 3.5:

1。正值秋收季节，为完成钢铁翻番任务，约有 9000 万人上山采矿炼铁，不少庄稼无人收割，不少地区，粮食、棉花因无人收割而烂在地里，以至当年丰产未能丰收。根据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保守看法，1958 年农作物估计有 10% 未收回，其次是工业内部与工交之间比例失调。在工业内部，一方面重工业内部比例失调，铁、煤、有色金属的供给满足不了钢的高指标需要，来不及新建大企业，就逼着老企业拼命增产，大量兴办耗料大、质量差的小企业，造成资源被强化开采；设备因超负荷、“带病运转”而大量损坏；又因煤铁等原材料品位、质量下降，需要更大的开采量，加剧了供需矛盾，竭泽而渔，造成巨大损失和浪费。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每新增 1 吨炼铁能力，相应要增加 4 吨铁矿开采能力、1 吨炼焦能力；而 1958 年每新增 1 吨炼铁能力，只新增 1.5 吨铁矿开采能力和 0.3 吨炼焦能力。工业内部比例失调还表现为轻重工业比例失调。强调工业生产“以钢为纲”，其他工业“停车让路”，调配给轻工业部门的原料和燃料大大减少，设备得不到应有供应，大量职工被调到钢铁生产大军。如：8、9 月份，东北三省电力不足，减去轻工业电力负荷的 2/3，使纸张减产 10 万吨左右。工业与交通运输的比例失调表现为交通运输跟不上工业的高速发展。1958 年交通运输货运量作很大努力才增长 40%，而同期煤炭增长 107.7%，生铁增长 130.5%，因而到了年底，仍有大量煤炭、矿石运不出去。以铁路为例，有三、四千万吨货物滞留在产地。在 1958 年的货运量中，正常的运输能力只占 80%，其余 20% 靠全民搞运输，特别是发动农民搞突击才达到的，“以钢为纲”没有带动全局，却成了拖垮其他。

谈到大炼钢铁的惨重代价。还不能不提及开国后首次遭到的森林大破坏。1958年12月，武昌会议同毛泽东谈话时，我就特别提到毁林炼铁的问题，谈到森林植被是要几十年才能恢复的，他当时似没能听得进去。

1959年庐山会议后，我曾先下放北大荒劳动，1963年后又南迁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地处霍山县大别山中，当地公社书记等人同我谈到大炼钢铁时，寿县大军来到山中，将大树砍光烧炭等情景，不胜感慨。（后来才知道，当年安徽共动员100万人进大别山伐树木。）曾做过一首绝句（未收入《龙胆紫集》）：

昔日满山双抱树。今朝举日秃童头；  
只因寿县大军到，挥斧创夷燃土炉。

1979年到1982年初，我回到水电建设岗位，仍常出差工地或去察看选定的坝址，又亲眼目睹森林被破坏的情况如福建山区公路两侧过去的密密杉林，已很少见到了。1988年4月因事去湖南，作武陵源七日游，过索溪峪到水绕四门处，见到残存的炼铁小土炉两座，陪同的地方主人说，张家界许多合抱大树当年多毁于小土群炼铁炉。因此吟得一绝，题“湘西公路所见”，刊《湖南日报》一组“还乡”诗中（《龙胆紫集》新编）：

时见童山少树林，当年炼铁战三军。  
土炉破败当风立，到此游人欲断魂。

我先后从事过11年水电建设，深知上游森林破坏后，水土流失，泥沙俱下对下游河床（尤其已建水库）淤积的危害。“森林情结”“环保情结”使我留意当年这种惨重代价。八十年代出版的省志、县志、《当代中国》有关丛书，以及

一些报刊和个人《回忆录》，常常零星载有这方面的情况。

我是湖南人，多引用些湖南的资料。1958—1961年，全省共消耗木材10436万立方米，而全省森林蓄积量仅18463立方米；此外还消耗楠竹约41757万根；1950—1957年，湖南林区为国家提供商品木材7905万立方米。另外一个统计数字：五十年代全省森林蓄积量为2.83亿立方米，到七十年代下降为1.87亿立方米。这几个数字对比，可以给人一种概念。湘西凤凰县1967年普查统计，全县森林面积为35.7万亩，比1957年下降61%；木材积蓄量为51万立方米，比1957年下降86%。古丈县是桐油的主要产地。人民多以产销桐油为生，“一担桐油下江，十担粮食上山”，1935年桐油产量达350万斤，1960年只产25万斤。我的老家平江县，1958年采伐木材178100立方米，其中用于烧木炭42万担，约占一半多；1959，又采伐80800立方米。有关记载中多留下这样的叙说：由于全民大办钢铁，屋前屋后和交通方便的公路、铁路两旁树木砍光之后，便组织“大兵团”到深山老林砍树。砍下来的木材因交通不便运不出，大部分烂在大山中。

有些地方县志，关于大炼钢铁时的砍树毁林，也有些统计数字：山东阳谷县，树木株数减少70%，木材蓄积量减少80%以上。贵州纳雍县，毁林28万亩。浙江淳安县，烧炭68万担，损失木材34万立方米。四川灌县砍伐的成材杉树就有10万株，被砍的杂木数量更大。广西全省烧炭炼钢铁，砍伐了1750万立方米的木材。还有一些是笼统的概述：河南修武县，全县成材树被砍伐殆尽。沈丘县，全县成材树，砍伐殆尽。广西阳朔县，近10万人伐木，不仅毁去山上林木，路旁风景树也几乎被砍光。四川全省境内的“平坝、丘陵地

区和部分山区，大片林木被砍伐殆尽。”等等。

旧《宁乡县志》曾有这样的记载：“宁乡县西与安化、湘乡接壤，层峦叠嶂，林产颇丰。光绪以前，所至弥望青葱，其一色成林者，松为最，杉次之，竹又次之，八、九、十都，松尤茂，大者作梁栋，时复运销县垣、清港……。野兽去来不测，十都大山素多虎豹，近山山彪大如鼯鼠，成群而游。”这种状况，五十年代初仍是如此。1958年全县大树砍伐殆尽，葱翠树林变为濯濯童山。1962年，谢觉哉写信给林业部说：“我的家乡—宁乡，以前有不少大树，现在全县只有三颗大树，我很伤心。大树清泉俱已杳，只留情景在心头。”

1982年，时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的高扬访问他40年前住过的村子时，记得村里有棵黑枣树，结的果没有核。问村里老人才知道，这可棵树1958年砍掉了。

《当代中国的林业》一书中，有一节专门谈到“大跃进”时期林业所受到的影响，以“一次全国性的林木大破坏”为小标题，有如下的叙述：

这次林木大破坏不仅范围广，规模大，而且时断时续，此起彼伏，从1958年开始，前后一延续4年之久。林木破坏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各地大炼钢铁，大办社队食堂，大修水利和大搞工具改革，砍伐了大量林木；二是在木材生产中的高指标，瞎指挥，造成乱砍滥伐，集中过量采伐；三是困难时期毁林开荒，生产救灾，毁掉不少林木，其中以第一方面的破坏最为严重，遍及全国各地，毁掉的林木也最多。不论天然林或人工林，不论防护林或经济林，不论村前屋后、路旁、水旁的散生林木，还是风水林，风景林，



都程度不同地遭到了破坏。据中共中央办公厅调查组 1962 年在福建、广东、广西、湖南和江西 5 省、自治区调查结果，当时破坏最严重的是丘陵和浅山区，有些地方的林木被砍光了。毛竹破坏情况更为严重。湖南省洞口县从进入山口到雪峰的路程为 100 里，1957 年以前公路两旁的森林很多，到调查时已所剩无几。据洞口县估计，木材资源减少了 60%，毛竹资源减少了 80% 以上。广东省乐昌县由县城到坪石，沿京广铁路西侧 100 里的山地，1957 年以前有很多杉木林，调查时变成了荒坡和灌木丛。对防护林的破坏也很严重。辽宁省的彰武、康平、新民等县的农田防护林被砍掉 70%，豫东防护林被破坏了 80%，使开封县的 40 万亩耕地因此撂荒；冀西防护林被砍掉 4 万亩，占防护林面积三分之一以上；河北省固安县境内的永定河下游防护林被破坏了一半；陕西省榆林、横山等县毁林、刨沙蒿达 200 万亩；甘肃省的河西防护和固沙林被砍掉 22.4 万亩。各地经济林也遭到大破坏。全国油茶林减少了 10%，油桐林减少了 20%，经过这次破坏，有些地区的森林资源减少很多。湖北省 1957 年林木蓄积量为 4122 万立方米（不包括神农架林区），经过几年破坏后，仅剩下 2733 万立方米，减少了 34%，广西 1958 年因烧炭、炼钢砍木材 1750 万立方米，相当于当年国家计划自治区收购木材 127 万立方米的 10 倍以上。

## 水利化运动及其灾难

在前面《农业“大跃进”的前奏水利化运动》一章中就谈到，1957年开始的群众大办水利，可说是“大跃进”的开台锣鼓。由中央有关领导部门肯定并经毛泽东赞同的治水“三主方针”：“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或社队自办）为主”，成为水利“大跃进”的指导思想。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水利化运动的灾难后果，尤其从时间的延续性说，比全民大炼钢铁更为严重。1982年3月，我调离水电部时，曾向中央写了一份近万字的意见书《对水利工作的意见》，经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曾作为当年召开的水利讨论会的文件之一，这个会议有国家计委、国家经委等中央12个有关部门参加。意见书开篇即说：“二十二年来，水利工作中‘左’的思想和做法相当根深蒂固。”其中也提到“大跃进”中的问题。现在从“三主方针”谈起。

## “三主方针”淮河流域的危害

“三主方针”是治理淮河中首先提出来的。

由于历史上黄河多次夺淮入海，尤其从 17 世纪到 19 世纪，曾经鹊巢鸠占，捣乱 600 余年。淮河没有人海口，是一条特殊难治的河流。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在治淮初期确定的“蓄泄兼筹”方针，对山区、丘陵区 and 淮河干支流防洪的治理，经过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但对平原地区的治理应如何贯彻“蓄泄兼筹”的方针，是一个新问题。黄淮海平原地跨冀、鲁、豫、皖、苏、京五省一市，这一地区跨省河道多，上下游排水矛盾大，农业上以旱作物为主，存在着洪、涝、旱、碱、淤、潮等多种问题，既怕洪涝，又怕旱碱，滨海地区还有淤、潮，情况很复杂，在治理方针和具体措施上，各种地区不尽相同，应当因地因时制宜。

1957 年 8 月，河南在总结沂河治山、治水经验的基础上，召开了沙颍河治理工作会议，会议批判治水的“右倾保守思想”，批判“排、大、国”（以排泄、大型、国办）为主的思想，制定了“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三主治水方针。中央同意了这个方针，并向全国推广，也推广到平原地区。直到 1962 年，在北方五省一市平原地区水利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蓄泄结合，排灌兼施，因地制宜，全面规划”的指示，制定了“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社队自办为主”的水利工作方针后，才得到纠正。

在“大跃进”时期“三主方针”指导下，在黄淮海平原及海河、黄河下游、淮河流域，坚决贯彻以蓄为主的方针，各种瞎指挥盛行，做了许多不该做的工程。有的工程虽然是必要的，但由于前期工作不够，施工质量差，大搞一平二调，留下了许多后患。下面谈谈淮河流域当年的情况。

关于山区丘陵区治理的主要问题：一是推行了“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方针，使许多水库仓促上马，缺乏必要的足够的前期工作，修建了许多病库、险库，给工程遗留了后患。二是在修水库时，为了执行“群众自办为主”，水库移民淹地不予补偿或是给很少的钱，敲锣打鼓把移民送走，出现了严重的“一平二调”。三是由于大炼钢铁时，山区丘陵区滥伐滥砍森林、林木后，破坏了生态平衡，破坏了水土保持，加重了山区丘陵区的水土流失，造成水库的严重淤积。

淮河流域在 1958—1959 年共开工修建了 22 座大型水库，占全流域现有大型水库的 65%。在河南省有宿鸭湖、昭平台、白龟山、石山口、孤石滩 5 座；在江苏省开始修建安峰山、小塔山、石梁河水库；在山东省修建了会宝岭、日照、唐村、许家崖、田庄、小仕阳、陡山、尼山、岩马、跋山、岸堤、马河、西苇、青峰岭等 14 座大型水库。由于前期工作不够，施工质量差，留下许多后患。这一时期还修建了中型水库 90 余座，占全流域现有中型水库的 60% 左右，其中山东、河南、安徽都在 20 座以上，江苏省 10 余座。它们同大型水库存在同样的问题，小水库和塘坝则不计其数，其中最突出的是安徽省皖南地区的淠史杭灌区，完全依靠农民出工，开挖了人工运河和众多的小水库和塘坝，真正起作

用的恐不及半数。

淮河流域平原地区是受害最严重的地区，当时在“三主方针”的指导下，提出了许多错误的口号，如“水不出村，水不出户”；“一块地对一块天”；把能蓄的水全部蓄起来，做到“沟满壕平碗上尖”（意思是要把所有的沟渠都利用起来蓄水，蓄水要蓄得满满的，象用碗盛饭一样，不仅要盛满，还要带尖）。甚至提出在黄淮海平原要从海边到太行山麓，节节修围堤，像修万里长城一样，修到太行山脚下，把天上降到黄淮海平原上的雨雪全部拦截起来，蓄水改种水稻，使干旱的北方赛过江南鱼米乡。在这种错误口号指导下，加上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作怪，借“三主方针”之名，把害水（洪水、涝水）拒之门外，把利水（可用于灌溉的水）统统拦截起来，结果在“以蓄为主”的口号下，把沟渠作为挡害水、蓄利水的武器，造成了冀、鲁、豫、皖、苏、京五省一市的严重水利纠纷，为排水、争水的械斗不断。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国务院从1961 - 1964年先后用了四年时间，处理黄淮海平原五省一市的水利纠纷，废除了许多盲目工程，拆除了阻水工程，恢复其自然流势，以消除严重的涝灾和盐碱化灾害。

“大跃进”时，淮河流域平原区治理上的主要问题，可分地区来说。

其一、河南豫东平原的治理。沙颍河以东的豫东平原地区，大搞蓄水工程，修建平原水库和周商永运河（从周口经商邱到永城）；大搞引黄灌溉，只灌不排，使盐碱地大量增加。在贾鲁河上修建引黄综合治理工程，兴办了9个梯级的综合开发枢纽工程，造成泥沙大量淤积，全部工程报废。周

商永运河拦腰切断当地自然河流的自然排水，加重了涝灾和盐碱化。1962年开始，废除平原水库，停建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平废周商永运河，拆除阻水工程，停止引黄灌溉，才使豫东的涝碱灾害逐步减轻。

其二、安徽省平原区治理。安徽省淮河流域平原区主要为淮北地区，包括阜阳、宿县两专区的全部和蚌埠、淮南、淮北三市的部分地区，1958年在安徽平原区进行了淮北河网化和淮河干流上修建临淮岗水库工程，这两项工程都遭到了失败和挫折。在除涝、蓄水和改种水稻的思想指导下，最初提出的是淮北沟网化，后来发展为淮北河网化。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河网化、水稻化，变淮北为江南”。淮北河网化的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大河网。计划在淮北原有河道的基础上再开挖十条新河，组成河网，并在这些河道上修建节制闸，以控制蓄泄。十条新河中，基本建成的有界甫新河（界首至阜南接颖河与淮河）和阜蒙新河（阜阳至蒙城接通颖河与涡河）；部分建成的有界洪新河（界首至洪泽湖接通颖河与洪泽湖）、淮涡新河（润河渠至蒙城境内接通淮河与涡河，是临淮岗水库的灌溉渠道）和符怀新河（符离渠至怀远接通濉河与淮河）。二是小河网。由淮北各县根据安徽省颁布的淮北河网化十条规划进行，其中有大、中、小沟规划。但这些大中小沟不是为排水需要，而是按蓄水灌溉和航运的要求进行规划。如、沿公路挖大沟，沿大路挖中沟，沿小路挖小沟，结果挖成了不少只能蓄水不能排水的大中小沟。另外各县也选择了低洼地进行网化试点，如宿县的紫芦湖和濉溪的卧龙湖，挖成高标准的小河网（每平方公里挖河网25万立方米），并改种水稻，当时成为淮北河网化试点。

1959年在不具备足够灌溉水源和缺乏提水工具和动力的情况下，改种了500多万亩水稻。这一年淮北大旱，所种水稻基本无收。全淮北河网化土方工程按每平方公里挖土方20万立方米计算，总土方量达60余亿立方米。在“大跃进”刮起浮夸风的情况下，错误地认为淮北河网化工程可以在3年内完成，结果是既脱离实际，又脱离群众，事与愿违，劳民伤财，使淮北人民遭受了很大损失，大大挫伤了群众治水的积极性。1959—1961年淮北地区连续三年大旱，人民生活极度困难，饿殍遍野，到处逃荒。淮北河网化工程终于在1960年起停止。

其三、江苏省平原区治理。江苏省淮河流域平原区主要为苏北平原区，包括盐城地区的全部，淮阴、徐州、扬州三地区的大部和连云港、南通两市的部分地区，受“大跃进”的影响较少。主要问题在里下河地区。苏北里下河地区，东临黄海、西靠里运河，北至灌溉总渠，南达通扬运河，面积18000平方公里；地形四周高，中间洼，呈碟状形。“大跃进”时期贯彻“三主方针”全面推开大面积、高标准河网化工程，联圩并口，深沟密网，增加蓄淡、滞涝库容。同时推行沔改旱，旱改水，改一熟水田为水旱两熟田，改旱田为水田。由于过分强调蓄水，带来因蓄而溃、因蓄而港口（通海口）淤积等问题，以致里下河洼地渍害更为突出；当时修建的通榆运河，也因战线太长，只完成射阳河以南部分。60年代初，接受教训，改变政策，里下河地区才逐步改变面貌。

其四、山东省平原区治理。山东淮河流域平原区以南四湖、湖西地区为主，包括菏泽地区的全部，济宁地区的大部

以及临沂地区和枣庄市的小部地区。当年在这个平原区修建了许多防洪、除涝和灌溉工程，引黄灌溉的太行堤平原水库，和原属河南省后因五爷庙平原水库问题划给山东省的范县地区，发生大面积的涝碱灾害，工程全部报废。在山东西部修建了太行堤平原水库灌区，当时山东省与河南省共同修建三义寨引黄闸灌区，利用废黄河道与太行堤之间的盐碱洼地，修建了串联的七个太行堤水库，蓄水库容 9 亿立方米，并在各库修建了引水闸和灌溉渠系。在 1958—1960 年进行了三年春灌，最大灌溉面积达 100 万亩，因水库未建防渗工程，灌区未建排水工程，使沿库地区和灌区地下水位升高，涝碱灾害严重，不得已于 1961 年起，水库不再蓄水，废库还田，平毁灌溉渠系，不再进行灌溉。

荷泽地区原来采用井灌，也因引黄灌溉，废井灌改渠灌，使灌区涝碱灾害加重。

1958—1960 年，在南四湖湖腰修建二级坝工程，全长 4113 米，坝顶高程 38.2 米，使南四湖分成上下两级湖，目的是为了蓄水发展灌溉。二级坝修建后，对发展灌溉起了一些作用，但对南四湖防洪带来不利影响。因为南四湖湖腰狭窄，筑坝后壅高了南阳湖的洪水位，需要增大二级坝的泄洪能力。此外，在南四湖出口的商家坝闸和韩庄引河，也造成了江苏与山东的水利纠纷。

淮河流域洪涝灾害中，50 年代以洪灾为主；60 年代以涝灾为主，这主要是由于“三主方针”以蓄为主造成的。全流域涝灾成灾面积在 3000 万亩以上的，有 1962—1965 年 4 年；旱灾成灾面积在 3000 万亩以上的，有 1959、1961、1962、1966 等 4 年 1962 年是淮河流域水旱灾害交替发生的



一年，既有涝灾又有旱灾。全流域水灾面积达 4080 万亩，旱灾成灾面积 3530 万亩水灾成灾面积以江苏为最大，达 1487 万亩，其次为安徽的 1243 万亩，河南又次之，山东最小。旱灾成灾面积以河南为最大，达 1230 万亩，其次为安徽的 1128 万亩，再次为江苏，山东成灾面积最小。这一年全流域粮食产量 321 亿斤，比丰收的 1955 年减少 151 亿斤。其中以安徽减产 54 亿斤最大，其次为河南的 41 亿斤，再次为江苏，山东减产最小

1963 年淮河流域涝灾最为严重，夏秋两季同时受灾。全流域受灾面积达 10124 万亩，是 1949 年以来淮河流域成灾面积最大的一年。其中安徽成灾面积 3800 万亩最大，其次为河南的 3422 万亩，再次为山东的 2010 万亩，以江苏成灾 892 万亩最小。这一年全流域粮食产量 279 亿斤，比 1955 年减产 192 亿斤，也是全流域粮食产量最低的一年。其中以安徽减产 70 亿斤最大，河南减产 61 亿斤，山东减 33 亿斤，江苏减 28 亿斤。

1964 年继续内涝成灾。全流域成灾面积 5532 万亩，其中以河南成灾 2540 万亩为最大，依次为山东 1425 万亩，安徽 1331 万亩，江苏 235 万亩。这一年全流域粮食产量为 369 亿斤，比丰收的 1955 年减产 103 亿斤。其中以安徽减产 44 亿斤最大，河南减产也达 39 亿斤。

1965 年继续受涝成灾。全流域成灾面积 3809 万亩，其中以河南成灾面积 1299 万亩最大，依次为安徽 1172 万亩，江苏 1014 万亩，山东 338 万亩。这一年全流域粮食产量 426 亿斤，比 1955 年减产 45 亿斤，其中以安徽、河南减产较多，江苏、山东减产较少。

修大水库装洪水，这一直是水利部从 50 年代起坚持的主要防洪方针。当年防治淮河洪水，除了在许多支流上游修了防洪水库外，也有一个在干流上修建临淮岗大水库方案。临淮岗水库位于安徽省境内，安徽省可以拦挡淮河上游河南省的洪水，还可以利用水库蓄水发展灌溉面积 1000 万亩；其中水稻田面积 500 余万亩，因此安徽主张修建临淮岗水库。淮河上游的河南省，因水库淹没淮滨、固始等县几十万亩耕地，须移民近百万人，表示反对。淮河下游的江苏省因修建临淮岗水库将减少洪泽湖来水，也不赞成修建。于是这个工程成为一个悬案。1958 年中央武昌会议期间，由安徽、河南两省省委书记与水利电力部党组书记协商后，曾同意修建临淮岗水库，兴利蓄水位定为 25.55 米，但防洪水位未能取得协议。在资金、材料和规划方案尚未最后确定的情况下，安徽省从 1958 年开始动工修建，因钢材供应不足，利用拆毁淮河润河集拦洪闸获得的旧钢材，作为临淮岗之用。1960 年曾一度利用已建成工程，将淮河堵断蓄水，当年汛期即被洪水冲开。因水利投资减少，1962 年 3 月终于停工。临淮岗水库工程被废弃后，至今再也没有续建。

## 引黄灌溉的失败

1958 年前，黄河下游引黄灌溉按自然条件和技术要求行事，效果比较好。“大跃进”时期，这两方面都不讲求了，从 1958 年到 1961 年，为了加快引黄灌溉面积的发展，引黄口不建或少建沉沙池；把除涝排水沟河占用为输水渠道；只

考虑引水，不管排水；所谓“一块地对一块天”，节节拦蓄，只是统计引了多少水，灌了多少田。为了增加引黄的成绩，实行人小漫灌，边灌边排，以增加灌溉水量和灌溉亩次。1959年引水量曾达到166亿立方米。结果泥沙大量淤积了灌溉渠道和排水河沟，地下水位恶性上升，加重了内涝，造成大面积耕地次生盐碱化（按：次生盐碱化，是指原来的好地变成了新生的盐碱地；所谓次生盐碱地，是指由于灌溉不当引起的新盐碱地）。

1958年至1961年三年，盲目大量引黄灌溉之后，打乱了水系，淤积了河流、沟渠。于是，自1962年到1965年连续四年发生大涝灾。前面已谈到淮河流域成灾情况。1963年出现了建国以来成灾面积最大的一年。

由于连年不断的大涝灾和大面积盐碱化。深刻地教训盲目性，不得不关闭引黄闸门，停止引黄灌溉（只保留1951年开始兴建的河南省人民胜利渠灌区20多万亩灌溉面积）；全力以赴转向除涝治碱，国家不得不耗费大量资金，来开挖被引黄淤废了的排水河道和骨干河道，打通排水出路，使地下水位迅速下降；并大力开展防治土地盐碱化的试验研究，盐碱地才逐年减少。

在引黄灌溉高潮时期，在黄河下游动手修建花园口、位山、洛口和王旺庄四大拦河枢纽工程，准备把黄河下游河道拦腰斩为几节。当时花园口和位山枢纽已经合龙，洛口、王旺庄也已做了不少工程。由于引黄灌溉失败，花园口和位山枢纽终于拆除废弃，洛口和王旺庄也中途停工。造成巨大的浪费。

在引黄河期间，黄淮平原地区在一五计划时期耗费巨大

人力物力修建起来的井灌工程，被全部废除，即所谓“废井兴渠”。引黄灌溉失败后，又由国家资助发展机井灌溉来代替引黄灌溉，“废渠兴井”，以恢复农业生产。

“大跃进”时，水利部门还有“引江济黄济淮”的大计划。当时长江水利委员会所作三峡工程的总规划中，有一项由三峡水库引水至丹江口水库的引江济黄济淮的方案。从三峡坝址起，沿鄂西山区边缘通过，经当阳、甫漳、谷城而至丹江口，引水渠道长 426 公里，其中隧洞长 19 公里。渠道跨越大小河流 40 余条，高 50 米以上的拥水坝有 43 处；渠道大都是切岭工程，挖深一般在 20—70 米之间；总开挖石方 9.3 亿立方米，土方 2.25 亿立方米。此项工程所估投资约 58.8 亿元，比三峡工程 43.3 亿元还大。加上从丹江口至黄河引水渠长 480 公里，还需 7.8 亿元。这些预算当然是当时最低估价。这个“南水北调”方案的依据，是 1958 年所作的三峡工程方案，蓄水位 200 米，装机 2200 万千瓦。初步设计中安排的施工进度为，1959 年开始准备，1961 年大开工，1965 年开始发电，1967 年 2 月全部建成，这样神速与想像的方案，就是在“大跃进”年代，也是难以接受的。

关于引江入黄，1958 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曾经提出过长江上游的方案，即从金沙江引水入黄河。引水线总长 6800 公里；引水流量 4500 秒立方米；全线渠道开挖长度 6710 公里；高坝 5 座，皆在 150—250 米之间；隧洞总长 57.2 公里；高 300 米、长 1 公里的渡槽 1 座；总开挖量为 964 亿立方米。这当然更是“天方夜谭”了。

## 半途而废的引洮工程

1958年11月，我到甘肃参加刘家峡水电站开工典礼时，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特别嘱咐，定要我去看看正紧张施工的引洮工程。于是我来到岷县的工程总部，并到工地去看了看那热火朝天的施工局面。民工们多住在山坡上挖的仅能容身的小窑中，都吃馒头，兴高采烈，穿着单衣干活。我看了一段在黄土山坡开挖的渠道，对这种高边坡的稳定与黄土防渗等等问题，心中很是疑虑。地方上有十个工交部门的设计、工程单位前来支援，似没有听到有争论意见。工程局负责人是延委熟人，他告诉我朱老总来过并题了词，让我也题词。我当然不敢题，婉言谢绝了。洮河是刘家峡以上黄河流量最大的一条支流，将洮河水引走，将严重影响水电站的出力，自己也觉得不便于表态。

早在1958年3月4、5、6日连续3天，《人民日报》记者热情地报道了《充满革命精神的甘肃水利事业》。甘肃地处高原，平川地区海拔也在1500米，气候干燥，平均雨量300公厘左右，素有“三年小旱，五年大旱”之说。全省水地和水浇地不及耕地十分之一。这篇报道有一节“打垮右倾鼓励革命”，在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甘肃落后”论，树立了人定胜天的思想后，1956、1957两年连续出现水利事业的两个高峰；1958年计划新修水地1330万亩，这个数字等于解放前两千年来修水地数字的近两倍，等于1957年实际完成的14倍，等于1958年原计划的4倍。提出的口号是：

“全省3年实现水利化，10年所有山区梯田化”。文中报道了将于7月动工的引洮工程。

引黄河水上山，解决甘肃中部干旱问题，省委负责人早有过考虑。省水利局确定引洮工程的线路后，1958年1月开始察勘工作。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于2月11日正式作出决定，“引洮河水董志塬的计划”。总的灌溉范围，西至洮河、北至黄河、东至马连河、南至渭河泾河，东西长约320公里，南北宽约200公里，包括甘肃中部和陇东广大地区所辖的岷县、临洮、渭源、会宁、靖远、天水、镇原、环县、庆阳、兰州市及以后划归宁夏的西吉、海原、固原等27个县市，灌溉耕地共1500万亩。其工程规模初步规划为：总干渠引水150秒立方米，由海拔2250米的岷县古城水库起始，经临洮、渭源等县，到达海拔1400米的庆阳董志源，全长1150公里；又干渠道15条，总长约3500公里。全部工程包括古城水库（坝高41米）、野狐桥水库（坝高70米），估算土石方近20亿立方米，浆砌石和混凝土约273万立方米。两水库和总干渠投资框算为3.5亿元。在1958年8月全国水利工作会议上，这个工程的报告称这条总干渠为“山上运河”，水面宽40米，渠底宽16米，水深6米；比苏伊士运河长6倍，比巴拿马运河长13倍多；50吨到100吨的船可以自由航行；利用落差可建几十座大中型水电站，总装机34万千瓦；这20多县市的山区，“旱地变水田，山顶稻花香，米麦堆满仓，绿荫遍山岭，牛羊成大群，鱼鸭满池塘，电站林立，电灯齐明，机声轧轧，汽笛呜呜，船只如梭。”并称这项工程“技术的复杂性确是史无前例，在政治上，技术上都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引洮工程于 1958 年 6 月 12 日正式开工，采取“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和“分段测量、分段设计、分段施工”的办法。“民办公助”，先后动员定西、天水、平凉 3 个专区将近 20 个县的干部和民工参加工程修建，职工达 3000 余人，民工达 10 万人，施工高峰时达 16 万人。

如此艰巨复杂的工程，采取三边方针。土洋并举上马，领导上要求 4 年半完成，自然困难重重，挫折累累。

如古城水库的两次截流失败。第一次是 1959 年 4 月中旬，由于导流槽尚未开挖到设计断面，合龙处抛石质量不高，土石围堰全部被冲。第二次于 6 月下旬，两天半奋战，断流成功。可是由于围堰并未按设计作够，又值汛期（此为截流大忌），加以导流洞口为漂流物堵塞，终于在 8 月 11 日，为保堰体，洪水从“人工决口”处冲下，全功尽弃，而且造成下游两岸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第三次才于 10 月中旬截流成功。

又如两次通水大营梁计划的落空。当时全部工程计划分两期完成，第一期从岷县古城水库至西吉县赤土岔，第二期从赤土岔到董志塬。第一期又分三段，第一段从古城至漫坝河，第二段从漫坝河至大营梁，第三段从大营梁至赤土岔。从古城到大营梁渠线 600 公里，计划通水时间，第一次是 5 月，因土石方开挖量相差太远而落空。第二次定于 7 月 1 日，“向党的生日献礼”。张仲良书记亲自到工地开会作报告，提出战斗口号：“修成千里河，水通大营梁，灌地百万亩，打好第一炮。”他要求这一口号不仅在全体民工中深入大讨论，还要传达到 3 个专区所有的人民公社，也开展讨论。“这样一讨论，就能产生出更大力量。”可是这时 600 公

里渠线上，还有很多渠段尚未开工，故城水库又第一次截流失败，大坝基坑也没有开挖。“通水”终于成为空话。于是又改变计划，为1960年五一节“通水漫坝河而奋斗”。《甘肃日报》并为此于1959年12月12日发表社论，号召全省人民“人人为引洮贡献一臂之力”。在无情的事实面前，这个口号又落了空。

引洮工程经过两年半艰难施工，截至1960年底，据当时统计，平均日投劳力，1959年11.2万人，1958年10.6万人，1960年8万人；投资1958年1900万元，1959年8500万元，1960年6500万元。两年半总计，投入直接工近6000万个工日，投资1.69亿元。完成的工程量，古城水库为计划的74%；自古城至大营梁渠渠段总干渠工程，也仅完成计划的23.7%。按这个数字统计，如继续施工，实现通水大营梁，最快也还要6、7年时间。

到1960年，由于过去3年粮食虚报浮夸过甚，甘肃全省面临极其严重的粮荒，引洮工地8万多民工，已很难正常施工。1960年12月，甘肃省委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整。新的省委终于作出决定，引洮工程于1961年6月全线停工，随后又决定1962年3月8日工程彻底下马。

关于引洮工程问题，1961年8月17日至22日，水电部在张含英副部长主持下，召开过一次部内外有关负责人员的座谈会。会议认为“这一工程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和目前我们尚不易克服的困难。正如引洮工程局总结与检查中所指出的：（1）工作量大，工期长，原规划中对引洮效益估计偏大、工作量估计偏小。即按偏小的来讲，总干渠、干渠工作量即达20亿立方米；如按灌溉地1000万亩做到农渠以上计



算，约需 12 亿工日。（2）技术问题未过关，两年多已提出较大问题，如高边起坡稳定问题，滑坡问题，坡积地区的防渗、防破坏问题，黄土的防渗和湿陷问题等，都还没有解决。因此，会议同意引洮工程局认为这个工程的主办是十分盲目的检查。”

关于“大跃进”时期“水利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这里只谈了以上影响较大的三个事，其他种种就从略了

从 1960 年结束“大跃进”30 年之后，1991 年淮河流域发生严重和洪灾害。可是并非“百年一遇”的大洪水，而是 10 至 20 年一遇的洪水，各水文站水位却普遍高于 1954 年特大洪水。洪水虽被大堤锁住，干流水位居高不下，向支流倒灌，于是形成空前“关门淹”，涝灾面积竟占整个受灾面积的 80%，达五六千万亩。这就不免使人想起，这几十年来水利工作尤其是治淮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呢？1992 年 1 月 13 日、16 日、23 日，《人民日报》刊载了该报一篇长文，1991 年淮河洪涝灾害之后的反思，淮河难治原因何在，审视治淮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其中说及：“不久前，多年治淮的决策者和指挥者之一，全国政协副主席、前水利部部长钱正英在一次讨论治淮的会上说，回头看，对于怎样根治淮河，我们还没毕业。”记者于是接着赞扬道：“这种坦诚、真实、深刻的反思，将会成为进一步治淮的宝贵财富。”

我要提的问题却是：既然近半个世纪的治淮主管人自称还没有毕业，那么，你所付出的学费究竟有多少呢？为什么不一一数来呢？

## 全民办电与昙花一现 的“水主火辅”

“大跃进”时期提“以钢为纲”的口号，当年我就是很不赞成的，还想过，如要提什么“纲”的话还不如“以电为纲”。作为能源，电力关系到全部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是一个现代社会无所不在的东西。按照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不论西方和苏联，在全部工业中，电力必须先行，比其他部门有个超前系数。从1937年至1956年近20年间，美国工业。增长：1.35倍，钢1.05倍，煤基本持平，电3.66倍；苏联工业增长4.13倍，钢1.74倍，煤2.36倍，电4.27倍。苏联电的超前就远不如美国。电力生产的特点是生产、分配和使用在同一个时间，产品不能储存，也不能进口；发电能力受设备本身的限制（1万千瓦设备容量只能发出1万千瓦电力，即“铭牌”出力），本身无潜力可挖，节约能源要靠用户；还不可能一年到头（8760小时）毫不间断运转，必须有备用容量作机组检修时使用；而且年、月、日不同时间，用电有高峰、低谷之分，设备必须满足高峰时的需要，等等；按此规律，发电量的增长同发电设备的增长（即电量与电力），后者也必须超过前者。苏联有过长

期的教训，如五五计划电量增长 0.8 倍，设备增长 1 倍，影响了经济发展速度；于是六五计划分别改为 0.88 倍、1.2 倍。苏联这方面的增长比例仍远不如美国，美国的用电是卖方求买方，电价低而平稳。电力的充分供应，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关系至大。这个问题，当年电力部门的领导是经常坚持向上面反映的。1956 年 2 月，电力部部长刘澜波向中央的汇报（口头向刘少奇那次汇报我参加了）就谈到“电力工业需要先行一步，这一点已为世界各国经验所证明。”“近两年来，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电源紧张的局面就暴露得更加明显；目前全国有 21 个地区存在程度不同的缺电情况。不少供电地区经常出现‘捉襟见肘’现象。”汇报中还特别谈到发电设备增长得很慢的情况。近 4 年来，发电量年增长平均 21%，而发电设备只增加 16.5%。西方和苏联都是后者增长大于前者。这个汇报后来刘澜波写成文章，题为《把电力工业向前推进一步》，发表于 1956 年 10 月 11 日的《人民日报》。可是，不仅当年未能解决，几十年来，限电拉闸变成一个老大难问题。这可能是过去那种集权的计划经济中的一个瘤疾。

一五计划期间，工业增长 1.32 倍，电量增长 1.43 倍，表面看来电的增长速度似乎走在前面，但实际情况正与此相反，电力发展速度慢了一年，因为五年计划是四年完成的。1957 年，工业总产值超过原计划 15%，电力设备超过原计划不过 3.6%。所以一五期间，电力工业的主要教训是基建速度慢了，应当先行而未先行。当年计划部门机械地搬用了所谓负荷平衡论，认为有多大负荷修多大电厂，负荷不定就不能修。造成的后果是：工业一增产，电就不够；负荷一

来，电厂赶不上。于是实际上电不是一马当先，而是牛车后行。刘澜波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中，这样谈到这个问题：“这就正好像有人等着吃饭，才开饭馆，要先计算好有多少顾客，才开多大的饭馆；不要说上坐多了，就是客人的饭量一增，就不够吃了。”“特别是水电站和区域性火电站，它们的位置、规模、特性等往往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有些工业的部署和进度就有必要同它们作适当的配合。不这样办，较大的电站项目就不易定案，最终的结果是大家的建设一齐推迟。从第一个五年的经验可以看到，实际生活常常是这样的：原以为负荷不足的电厂，等建成之后，电很快就用完了；有了电，工业也就跟着来了。这就是电力平衡工作中的辩证法。”

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刘澜波的书面报告中，这样谈到当时全国电力紧张的情况：“比我们预料的要来早和来得严重。缺电严重的还是东北、江南和京津唐三个主要电网，目前已出现降低周波运行的情况。东北电网已限制用电10%—15%。全国36个供电地区，到年底估计将有2/3的地区缺电。”低周波运行这是电厂一大禁忌。一般火力发电机转速是每分钟3000转，发出的电力周波是50周波。当电网电力不足时，发电机就不能维持3000转，周波随之下落，用户动力设备的转速也会降低，就会影响产品质量，如棉纱就会不均匀。

1958年到1960年这三年，电力工业确实“大跃进”了一阵。当然，最初也梦游超赶，在计划数字游戏中过一把瘾。1956年八大通过的二五计划指标，1962年发电量为400—430亿度（1957年为193亿度），设备容量为700万千瓦

(1957年为402万千瓦)。不算小的变动，正式上报过的二五两种指标，1957年12月、1958年2月、3月、6月、8月，共5次，最高达到发电量3000亿度，设备容量7000万千瓦，涨过7倍和10倍。

这三年中，电力工业的发展得到过实惠，但也吃过大苦头。

1958年的发电工程基本建设投资，从1957年的9.22亿元增加到16.4亿元，增长78%，相应的投产容量由1957年的74万千瓦增为180万千瓦，即净增106万千瓦，增长幅度之大，为在此之前历史上所未有；1959年投资增到22.1亿元，增长35%，投产容量324万千瓦，创历史最高纪录；1960年投资24.6亿元，又比上年增长11%，投产容量248万千瓦。三年中共装机752万千瓦，超额完成了“八大”通过的“二五”规定的指标。1960年设备容量达到1192万千瓦，发电量达到594亿度，三年中平均年增长速度，前者为37%，后者为40.5%。由于这是在采取了过高的积累率，不顾国力可能的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就难以为继，并带来一系列不利的后果。1960年之后，被迫采取了调整方针，使随后几年的基本建设和装机容量大幅度下降。1962、1963年的装机容量低于1953年（该年装机27万千瓦）。

当年的苦头之一是，在反保守运动中，人为地要求降低电力建设的造价，火电要降低30—50%，实行所谓“设计节约”，包括减少备用设备，降低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以及降低建筑标准等等，而且有节约指标和明确的削减对象。基层的设计单位和工地，更是大鸣大放大字报，有重点地猛

攻。大批判的内容包括：“求大、求全、求新、讲排场、讲阔气、缺乏勤俭思想”；“重技术、轻经济的单纯技术观点”；“片面强调安全，过大的安全系数”；“机械搬用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思想”，等等。其恶果为有 210 万千瓦设备，属于结尾未完、简易发电或原设备质量缺陷，而发不了电，后来用了 6、7 年时间才完成填平补齐任务。

在全国的运行单位发电厂，则在“大破陈规、粉碎枷锁”的口号下，大破各种技术和管理的规程制度。虽然也有工人和干部加以抵制，不赞成“轻举妄动”，但顶不住这般狂风。如下花园发电厂提出“苦战一周，克服保守，革新规程制度 200 项，精简报表 50%”的口号，规程制度破除了 76%，报表减少了 60%。于是全国运行单位在这里开现场会议，推广这种“敢想、敢做、敢独创”的经验。在全国电源紧张的形势下，当年发电厂最严重的后果在提高设备出力，即“超铭牌”出力。东北缺电最严重，鞍钢发电厂率先把出力提高了 18%；1958 年 10 月，石景山发电厂提高到 24%。12 月初，召开全国性的香山会议，推广石景山的经验。会议开始时有人不赞成：“这样不科学的超铭牌运行，弄不好汽轮机会飞出去。”由于上面的压力很大，而且传出了这样的话：“飞出一台也不要紧。”当时的电力主管单位国家经委水利电力局为这次会议写了一篇文章：《揭开电力工业生产技术革命的序幕》（载《水利与电力》1959 年第 1 期），认为提高出力有三大意义：“（一）从政治上看，这是一场思想上的革命，又一次证明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伟大胜利。”（二）从经济上看，“平均可以比铭牌出力提高 20% 到 25%，这就是说全国可以增加 82

万到 108 万千瓦的发电能力。这个数字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实际投入生产的发电设备能力的一半。”（三）“从技术上看，这是电力工业及其相应的制造工业技术革命的开端。”这篇文章还提出必须打破三大顾虑：一怕降低经济效益；二怕影响设备寿命；三怕发生设备和人身事故。最后要求“把提高出力的红旗插遍全国。”这篇文章是领导电力生产的内行人写的，1959 年：1 月在天津召开全国电力会议，部长刘澜波在讲话中说：“我不赞成这种拼设备杀鸡取卵的做法”要求各电厂不能再这样蛮干了。这股歪风才开始逐渐减弱。

由于这种“破除迷信”的超铭牌运行，加上规程制度与技术管理的废弛，使得 1958 和 1959 两年电力运行事故频繁，连续发生汽轮机掉叶片、隔板断裂、锅炉水管断裂、发电机绝缘劣化甚至烧毁等。到 1960 年底，全国发电设备损坏近 100 万千瓦。

电力“大跃进”也同大办钢铁一样，大搞“小土群”全民办电运动。在短短两个多月内，辽宁省办起电力动力共 20 万千瓦，旅大市共办起 10 万千瓦，已发电的 5 万千瓦。1958 年 11 月 11 日，《人民日报》二版以“向风火水气要电”大号标题，对此作了报道。“自 8 月以来，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辽宁展开了一个全民办电的群众运动。厂矿、机关、商店、学校、军队都动手办电，抚顺市新抚区工业、财贸、文教、卫生 4 个系统 37 个单位，到 10 月初，办起水、汽、畜力、瓦斯各种动力的电站 35 个，发电量占全区用电的 18%。一个小学校的师生用自己回收的废钢铁，换一台水车和一头小毛驴，建立起一座‘畜力电站’。广大群众办的各

种小型电站，正在带动着各种设备进行生产。有力地驳斥了‘怀疑派’认为群众办小型电站，只能用来点灯，不能解决什么大问题的看法。沈阳市手工业系统职工用土法办的千百座小电站，发电能力达3千多千瓦，使得许多工厂和合作社，不仅没有因缺电而停产，而且使全市手工业系统的生产总值有了增加。辽阳纺织厂、营口造纸厂、锦州造纸厂等许多厂矿，都提出‘用电全部自给。抚顺市木工社的职工，甚至让阴沟里的污水也来发电，建设起来一座‘污水电站’。”

“旅大市已有上万个土电站、小电站或土洋结合的电站。决心到年底办电13万千瓦。现在走在马路上，人们可以看到工厂、机关、学校、商店的建筑上边，有无数的风车叶轮迎风旋转，它们带动着大小不等的发电机，各企业单位废弃已久的柴油机、蒸汽机、内燃机和电动机，都被搜集起来加以检修，拼凑成自备的小型发电站。化工厂的工业废水和自来水管的自来水也被利用起来，修成了几千瓦到几百十瓦的水电站。根据旅大市三面临海的特点，许多地方还利用大海潮汐建成了几十千瓦的潮汐电站。在很短的时间内，旅大市人民采用了16种办法，向风、火、水、汽等一切可能利用的物质索取电力……旅大市委在运动过程中连续召开了三次有数十万人参加的办电比武广播大会，发动群众批判部分人对办电的神秘观点，消极等待情绪，和重大轻小、重洋轻土的错误思想；并且成立各级办电指挥部，组织了大批技术力量，搜集了各种发电的资料和设备，帮助条件较差的部门和街道办电站。”

电力工业的领导同志还以《如何解决电力紧张问题》为题，在《红旗》、《水利电力》两刊发表文章，向全国介绍辽



宁省、旅大市“大家动手，全民办电”的经验。文章说：“一切可以利用的动力资源被挖掘出来了，水（包括海水、工业用废水、上下水道、自来水等）、火、风、气（沼气、煤气、取暖蒸气等）、油以及人力脚踏车也都用来发电。各种积存的、备用的、坏了的蒸汽机、内燃机、柴油机、锅驼机、旧汽车头、坦克头、飞机头都修修改改发了电或提供了动力；简易的水轮机、上汽轮机、土锅炉、不用矽钢片的土发电机，也都造出来了。”

这种不讲经济核算，不计经济效果，大量浪费资源的“全民办电”，当然是不可能持久的，即使在当时，就有人提出，“小土群的办法技术关难过，燃料浪费大，设备寿命不长，特别是上透平问题更多，得不偿失。”“有的上透平由于加工太粗糙而不能用，有的能用而寿命太短。有的发一度电消耗十多公斤煤，”等等。而实践的结果，从1958年12月份以来，“小土群”发电设备出现停顿的多，开动的少，其原因是：设备破损率大；运行人员技术不熟练，缺乏必要的管理制度，机器易于损坏；缺乏走期的检修制度，容易磨损的部件又缺乏必要的备品，设备一坏就要停机；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用汽油、柴油作燃料，因缺油，一半以上停下来了，总之，根本原因还在于燃料不足。“小土群”办电运动是当时严重缺电的形势逼出来的，其本身由于违反科学，因而没有生命力，当年的“全民办电”，除结合农田水利建设办起的小水电站以外，其他成果得以巩固下来的基本上没有了。用群众运动的方法而不遵从科学规律、经济规律，其结果不过是昙花一现，欲速则不达。

在“全民办电”前后，结合广大农村动力和用电需要发

展起来的小水电站，历史证明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几十年来长盛不衰发展下去。在一五计划期间，小水电站在地方上就有些发展。这方面有传统又办得较好的是福建省，在华侨的倡导下，1929年就开始出现小水电站，到1949年已建有11座，共518千瓦。到1957年，全省已发展到83座，3246千瓦，1958年第一季就建成了35座，529千瓦，年底共计达2万千瓦，这是一个飞跃。永春县不仅在全省，在全国也是一直发展小水电最好的县。当年一般都是社队经营，较大的也有地方国营的，从几千瓦到几百千瓦不等，更多的还是水力站。1958年，福建新建小水电站154座，水力站则达2838座。这就便利农副产品的加工，促进了农村小型工业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大大节省了劳力和燃料。安溪县1958年办起小水力站1404座，小水电13座，水能利用共达8千多马力。福建的古田溪中型梯级水电站正在开发，因此全省一般都注意到水力的综合利用和统一规划，使之在防洪、灌溉、发电、航运各方面都收到效益，莆田太平陂水利工程，利用落差沿干渠建成18级水力、水电站，进行灌溉、办工、发电、养殖和航运，兴办了43个工厂和部分田间小动力站。

1958年5月15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有关水电的“大跃进”报道中，谈到1957年农村发电能力只有2万多千瓦，1958年准备兴建的农村水电站将超过90万千瓦，走在前面的除福建外，还有四川、安徽等省。”各地建设农村小水电站，都本着就地取材、因陋就简、从简到繁的原则。四川各地群众用竹、木代替钢材，用竹筒代替瓷管、生树代替电杆，安徽大量采用木制水轮机。绝大部分农村水电站都是

由群众自筹资金，国家只发放了很少的贷款。四川各地兴建的小水电站，绝大部分采取先建成水力站，加工粮食、饲料，待积累资金后再逐步安装发电机，开展多种经营。这种几千瓦到几百千瓦小水电站的造价，大体从四、五百元到三四千元不等。

1958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平原小型水电站五天开花”大标题，报道了天津地区静海、任丘、霸县等县，利用平原灌溉渠道的低落差建小水电的试验。静海的试点在北五里庄，这是新挖的一条渠道，有1.2公尺落差可利用。没有现成的图纸，地方干部和技术员就同当地的铁、木、瓦匠一起动手，边设计、边建设，结果只用了五天时间，就在元宵节晚上发出了光明。这一能发10马力的电，除了晚上可供400户照明外，还可以带动两个小钢磨和一个铡草机，每天加工面粉1.2万斤，铡草1万斤，还可以轧花、灌溉。在发电那天晚上，汇集了周围5个村庄4千多人来庆祝。北五里庄建站以后，静海县的平原小水电站就一个接一个建立起来了。

1958年8月14日《人民日报》二版头条，继续报导了“天津专区向电气化迈进”，全党全民动手，半年兴建2千多个小水电站。

南宁会议确定电力建设“水主火辅”的方针之后，从上到下确实出现了一个大上水电的热潮。1958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我国开始向电气化迈进”的大号标题下，全面报导了当年水电建设“大跃进”的形势。首先是：今年计划兴建的限额以上的大型水电站，已由原定的

20座增加到27座，目前正准备增加的还有9座。这样，全国将有36座大中型水电站进行建设。这36座中有16座的主体工程正在施工；其余有的已开始敷设交通轨线、调拨材料或其他设备；有的正在组织施工力量，建立筹建机构。预计今年冬季枯水期间，这些水电站都可以开挖坝基或建设厂房。这批水电站分布在浙江、四川、安徽、湖北等19个省、区。其中除河南的三门峡、甘肃的刘家峡、辽宁的桓仁、湖南的柘溪、广东的新丰江、广西的昭平等9座水电站，属于发电能力20万千瓦以上的大水电站以外，其余多数是几万到十几万的中型水电站。有5座水电站还计划利用原有的或即将建成的水库（属原水利部门）发电，这些中型水电站工程量较小，在明年就能发电。各水电建设工地都开展了“缩短工期、争取提前发电”的竞赛。根据各地提出的跃进计划，浙江的新安江、湖南的柘溪、四川的紫坪铺、尚未开工的桓仁等十多座大型水电站，都可以比原定计划提前一到二年开始发电，建筑造价也将大大降低。

这篇报道中还以“水电为主、火电为辅”的标题，专门介绍了1958年进行勘测设计的大中型水电项目共有114个，其中除了36个为当年施工的项目外，其余都是为二五和三五计划期间大力发展水电准备的。三峡在外，这些水电工程总容量在2000万千瓦以上。湖北的丹江口、贵州的乌江渡、江西的万安和湖南的柘溪、五强溪等水电站，今年也都要进入坝址选定阶段，其中丹江口和柘溪的初步设计今年可提前完成。黄河综合规划确定的46个梯级，除正在施工的三门峡以外，有12个正在紧张进行勘测设计，刘家峡上半年可以完成初步设计。三门峡下游的任家堆、包头附近的万家

案，明年也可比原计划提前一年完成初步设计。除此以外，还有 90 个大小项目争取列入今年勘测设计计划之中。所有这些项目分布在广大国土的 60 多条河流上。南自珠江，北到黑龙江，东从富春江，西达新疆的喀什河，最小的发电能力只有几千千瓦，最大 150 万千瓦以上。这些水电站建成后，同时还有防洪、灌溉、航运等效益。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勘测设计的水电站全部建成后，全国灌溉面积可扩大 2 亿亩。

为了实现这一重大计划，目前水利电力部已经制定一系列具体措施，原属于水利和水电两方面的勘测设计力量，将统一调整使用，以保证重大工程项目的进度，同时拟将一部分中小型水电站，交由地方的勘测设计部门完成。在勘测设计的方法和程序方面，也加以改进，主要是缩短时间，如 50 万千瓦以上大水电站的勘测设计，原来需要 4 年多才能完成，现在缩短至 15 到 17 个月，10 万千瓦以下的不超过一年。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水电勘测设计院院长会议还作出决定，要大胆地采用技术革新，使二五期间勘测设计的水电站，平均每千瓦造价要比一五期间降低 50%，也就是说，原来只能建设一座水电站的费用，今后可建设两座。1953 年接受黄坛口水电站地质勘探教训后（被迫停工 2 年），水电系统从勘测到施工建立起来的严格程序和务实作风此时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在“大跃进”初期发动的双反（反保守反浪费）运动中，一向非常注意施工和设备质量的电力系统，也不能不受影响。为降低电力建设的平均造价，提出了水电降低 15—20% 的指标，从而首先从设计上找办法，这股风越往基层刮

得越厉害，有的工程大砍大减，不顾质量，后果十分严重。这里举一个典型例子，即下马岭水电站，这是我1979年复职后，才从电力部编辑的当代电力工业基本建设史料中得知的。

下马岭位于官厅下游，装机容量为6.5万千瓦。1958年5月开工，由永定河工程局负责施工。正逢“大跃进”高潮，地名也改为上马岭。为了降低造价，设计一再修改，每千瓦造价经过6次降低，由1070元—757—750—565—558—401（双反后概算）—382元（审批概算），最后实际决算为1164元，同原设计预算相近。如果不是盲目蛮干造成大量返工，是不会超过原预算的。盲目修改设计的结果，不但没有达到降低工程造价的目的，而且使建设工期拖长，投产后暴露出许多重大缺陷，被迫停机修复达数年之久。具体恶果如下：

1) 引水隧洞的混凝土降低了抗裂安全系数。设计中未考虑地下水压力与灌浆压力，而且使用了不合格的自制水泥。投入运行后发现洞内裂缝、漏水。

2) 全长207米的高压管道，只一半安装钢管，另一半用混凝土衬砌代替。充水运行后渗漏很大，且于1964年3月9日，钢管与混凝土接头部分产生裂缝，致使混凝土衬砌开裂，厂房后山坡严重漏水，被迫停止发电，在原直径5.4米的高压管道内加了一根直径4.2米的钢管，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才予以修复。

3) 尾水桥和防洪堤由于降低了设计标准，以致顶高降到洪水位以下。在加固工程中，只好在原尾水桥上面又抬高加设了一座桥，在原防洪堤外侧又加高加厚，形成了桥上

桥、堤外堤。

4) 为了节约钢材，大坝五扇溢洪道弧形闸门及两扇尾水闸门都代以混凝土闸门，由于运行中操作不灵活，机构卡涩，止封不严，弧形闸门木面板腐朽，混凝土支腿开裂等原因，投产后先后改为钢闸门。

5) 继电保护屏、操作屏、动力屏都采用了钢骨架木面盘，不符合防火标准，1962年7月2日无瓦斯保护的电力变压器事故着火，将盘全部烧光，中控室烧毁，全部重建。

6) 此外，在调压井、蓄电池室等工程中，都发现很多问题，进行了加固修理。

总之，由于盲目节约，造成工程质量很差，下马岭水电站不得不于1961年2月至9月、1964年3月至1966年4月，两次被迫停机处理，造成巨大的浪费和经济损失。

1959年5月，我到岷江紫坪铺水电站工地时，正遇上导流明渠塌方，后被洪水冲垮。这也是降低设计标准造成的恶性事故。后改为隧洞导流，施工中遇瓦斯，死伤民工数人。这是当年四川在建的最大水电站，位于鱼嘴上游，装机30万千瓦，混凝土坝高93米，长360米，具有防洪、灌溉综合效益，将增灌农田近百万亩。1958年正式开工。后终因坝区地质构造过于复杂，几经争论，于1960年停工。坝区位于有名的“龙门山地槽褶皱断带”和三叠纪煤系地层，而且地震裂度较高。在苏联专家指导下，成都勘测设计院的地质人员做了三、四年的细致调查后，曾经肯定了坝区并非活动性断层，并经过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谷德振等专家的肯定，可是，苏联专家内部的地质专家等，前后两批人持两种不同意见，同中国的地质和工程专家一起几次开会讨

论，两年中经过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的过程，最后由中央有关领导部门负责据持否定派的苏联专家的意见作最后结论，导致停工。此事值得叙述一笔的是，两位持肯定意见的成都院地质负责人，都因先后被打成右派分子和“右机”分子，当年即失去为自己所持肯定意见的辩护权。尤其是当年我熟悉的新中国第一代优秀的工程地质专家陈家珍（1958年被授予全国劳模称号），还被判罪服刑，莫须有的罪名是：“篡改”紫坪铺电站初步设计地质报告关键技术指标数据（摩擦系数）；回避地质问题严重性，报喜不报忧等。直到1980年，在电力部工作组的协助下，陈才获得昭雪平反。这时他已患严重的结核病，吐血不止卧床不起，由于各种慢性病缠身，出差途中，一病不起，于1992年6月27日在成都去世，时年63岁。紫坪铺的悲剧中包括着陈家珍的悲剧。

“大跃进”中大小工程的盲目上马之风，由于“水主火辅”的宣传，水电自然也大刮了一阵。由于中国水力资源条件优于世界各国，确实可以做到多快好省，不论造价、工期都可以同火电一比高低。1960年前后，新安江、柘溪两大水电站的建成，已得到证实。因此，不论“大跃进”当年和现在耄耋之年，我自己一直坚持中国必须优先发展水电，几十年操觚鼓舌，坚持这一观点，坚持这一真理。

浙江新安江水电站，共装机66.25万千瓦，库容220亿立方米，土石方586万立方米，浇混凝土175万立方米。1957年丛月开工，全部设备国内制造，1960年4月第一台机组发电。“大跃进”中保证了工程质量，造价没有超出预算，尚低于火电。新安江还起了很好的防洪作用，水库现已成闻名



国内外的旅游区千岛湖。

湖南资水柘溪水电站，装机 43.5 万千瓦，1958 年 7 月开工，1962 年 1 月送电，也只三年半。每千瓦造价 350 元，大大低于火电。采用上洋结合施工方法，保证了工程质量。

1958 和 1959 两年，全国共上马大中型水电站（从 3 万到 100 万千瓦以上者）共 24 座（其中 3 万到 10 万左右的中型水电站都是地方安排的），总容量约 868 万千瓦。另一种统计包括 1960 年，“大跃进”三年中新开工的水电站，凡由电力工业投资，只计投资已花 100 万元以上的大中项目共 53 座，总容量为 1070 万千瓦。这后一种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1) 开工后建成的 20 座，有柘溪、新丰江（广东）、盐锅峡（黄河上游）等，总容量 213 万千瓦，占总开工规模的 20%，这些水电站都在六十年代基本如期完成。

2) 在三年调整期间曾停缓建，以后又复工的有 15 座，总容量 371 万千瓦，占开工总规模的 35%。如刘家峡（黄河上游）、富春江（浙江）、桓仁（辽宁）等，于 1962 年暂停工，1964 到 1965 年复工，其它在六十年代后期相继复工，在七十年代前后建成的。

三) 在开工后不久或在三年调整期间停建的，共有 18 项，总容量 486 万千瓦，占开工规模的 45%，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工程绝大部分都被废弃，造成经济损失约 4 亿元左右。

这两年中，我主要精力放在已经开工和计划开工由水电部属的大水电站，尤其关心浙江和福建的几个工程，都是亲自去察看坝址，安排关键事项，同地方负责同志联系。华东

水力资源相对不丰富，而用电负荷增长很快，江南电网最为紧张。新安江和瓯江电力可以送上海，福建建溪可以接力送浙江，远景可以联成华东大电网。这里举出瓯江青田和福建建溪两大水电站情况，以说明我至今耿耿于怀的遗憾。这两大水电站的淹没损失等困难并不大于新安江，而发电能力都比新安江大一倍还多。现在华东大地只有新安江和后来兴建的闽江两大水电站。

1958年，工业系统的管理和基建权力基本下放给地方。水电上马风刮得最厉害的是四川。四川水电厅提出“先上马，后加鞭”这一口号，并经报刊的宣传，在全国发生了影响。四川是全国水力资源最丰富、开发条件也最优越的省份，加快水电是完全必要的，这时以狮子滩为第一级的龙溪河梯级水电站已建成，有勘测、设计和施工的力量。1958年，四川电力系统曾按上级要求提出了二五计划用电负荷为450、550、650万千瓦三个方案，相应装机700、850、1000万千瓦的不切实际的规划选点报告。在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政策指导下，全省同时上了鱼咀、紫坪铺、兴文坪、富林、铜街子、大洪河、罗江口、武都、东西关寨、大桥、小高桥等16个大中型水电工程。其中除大洪河水电站建成外，其余都因缺乏调查研究，单凭主观愿望仓促上马，盲目蛮干，以致在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之后，被迫停建，其中紫坪铺和雅砻江的铜街子为水电总局掌管，紫坪铺的问题前面已经谈到。铜街子装机60万，后于1994年建成。鱼咀的上马更是荒唐之事，这破坏了公元前250年修建的都江堰古代水利工程；混凝土坝的残骸现留作纪念。直到1984年，四川的电力设备容量还没有达到500万千瓦。对于

那些高指标，当时四川省主管经济的书记阎红彦还是有所察觉的

1958年的8月份（中稻收割季节）的一个晚上，阎红彦通知水电厅两位负责人去汇报工作。阎问到电为什么要搞那么多？水电厅的同志回答说，是各行各业要那么多的电，都是经过省计委提出的，他们将这些规划指标及所需电量，逐一予以说明，从而谈到这些指标都比较高，现在有许多说不清的问题，如粮食过去谁能相信亩产几千斤、几万斤。阎于是说：“不要去听那一些。我下午才到了个生产队，看他们收割，过秤。实际情况是把临近的快成熟的水稻搬过来，插在一块田里再收割，就这样也没有上万斤，你们不要去看那些照片，它反映不出把十几亩田的水稻搬到一起的情况，哪有水稻长得人可以躺在上面的？”当年四川省提出“超中国”的口号，即要在五年内实现各项主要产品产量指标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家知道，“大跃进”时无人能够力挽狂澜，包括头脑比较清醒的阎红彦在内，他怎么能拗得过一把手呢！

1959年春，我在四川水电工地奔波时，北京正在召开全国水电设计工作会议。5月19日我从重庆向北京打了一个长途电话，总局副局长季诚龙接的电话，他整理了一个较详细的记录，印发给参加会议的人。从中可以了解我当时对有关水电“大跃进”中一些问题的认识，这个印件也是庐山会议后批斗我的“罪证”之一，因此得以在档案中保存下来。下面即电话记录全文：

我明天从四川去贵州，对设计工作会议提出几点意见：

1、肯定成绩。成绩是主要的方面。把成熟的经验肯定下来，不成熟的不要勉强。

2、会议以讨论修订规程规范为中心也好，但中心要把设计思想整顿一下。紫坪铺的明渠坍了，陆水的明渠也有问题，这与设计思想有关。设计人员应主动了解全面情况。要了解工农业发展情况，要了解重工业、轻工业、建筑材料工业的情况，把情况弄清楚，设计才能与当前国家的能力相适应。当地材料坝也再研究一下，一个不要勉强；一个是当地条件许可，也有人不愿搞。

3、关心工业的布置，特别是设计要与地方取得联系。去年有的项目盲目上马。设计落后于形势不好，走在前面太远也是不适宜的。水电同志要研究电力发展情况，过去对煤炭工业的生产情况了解也少。

4、跃进中发生的问题，主要是轻敌思想。对自己估计高了，对客观则估计不足。再加上施工节约，“边缘政策”。新的单位还知谨慎，老单位特别大胆。

5、装机容量偏大，现在已经在注意。还应该讲一讲，现在少算开挖工作量（坛罐窑少算了五、六十万方）；压低造价；水库淹没损失过大相当普遍，将来要挨骂。概算不要扣得太紧，工作量不要算得太少，宁可多算一点，不要少算。

6、过分简化的思想。把几个初步设计要点，好的差的，比较一下，哪些可以采取，哪些不允许。

7、不要过分追求“长远合理”。重庆电厂有个大水泵房，不从实际出发，按60万千瓦火电设计的，用了一万多吨水泥。刘家峡设计21万千瓦机组，国内制造究竟有无把

握？要摸清楚，设计人员回过头来再考虑。苏联还在试制，卡普兰专家建议我们三大件（主轴、转子，蜗壳）到苏订货，比较稳妥（按：刘家峡机组全部由国内制造）。

8、各地中小型工程多谈一下。我们过去不大过问，要在会上自我批评。出了乱子归口还在水电部，要强调帮助地方。

9、去年解放思想以来，干部的表现不一，好的和坏的典型都有。大家心里有数，有的顶住了，有的顶不住，怕戴右倾保守帽子。去年工程上能顶得住的人要表扬，不好的投机性的要批评。

10、继续批判保守思想，但要强调保留余地，保险系数一走要，什么都不要的劲头要扭转过来。规程规范就是要留有余地，不能不留有余地。

11、对施工单位的意见也要提。不要设计，施工违反设计的要指出来。出了乱子的要指出来。设计与施工结合是永久性的问题，四川对成都院很有意见。新安江结合得好，好的表扬，不好的要批评。

12、水利与水电结合的问题，也要认真讨论一下。

13、学校参加设计的问题。要学校作规划有困难，但可以作具体工程设计。总结清华大学作密云工程设计的经验。

14、中型工程。这次到大洪河（规模3万千瓦），今年9月土建可完成，重庆市委正设法解决机电设备。这类工程，基本上是一年建成（\* 罐窑也如此），各地应多注意。认真解决设备，可很快发电。

15、木材过坝。紫坪铺围堰降低高度后，今年木材可以下来。各地应注意漂木问题，森林航运要求太高，我们则应

主动注意解决过坝设备。

16、最重要的是思想问题。现在设计人员思想动荡，要整顿。实事求是马列主义。新老干部都要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长办的问题同罗西北（时任成都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谈过，乌江渡搞30万千瓦机组，他们总是不切实际（好大好远，不求实际，对眼面前工作不关心，在会上让大家讲一讲。长江规划，他们只是考虑大的，中小的他们不大关心。陆水工程垮得很惨，要派检查组去检查。告沈信祥（时任总局副局长），把陆水的大型施工设备调出来。总局领导思想也有问题。去年你和沈都到四川鼓吹上马，四川现有意见。最后意见，希望新老干部能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以上意见，告刘，钱部长。

瓯江青田水电站装机83万千瓦，坝高120米，技术上较复杂的问题是河床复盖层较深。1958年8月正式开工。到1961年底，已完成投资4519万元，土石方340万立方米，两条施工导流隧洞的顶拱开挖，房屋14万平米（其中永久性1万平米），公路40公里等等。由于淹没损失太大，移民20万人，难以安置，国家财力不足，1962年正式决定停建。

福建建溪水电站，装机105万千瓦，勘测设计工作做得很充分，坝址地质条件好，可建重力高坝，坝高147米。1958年10月开工，上游混凝土永久性围堰已建成（现仍在河床中，对航运不利）；导流隧洞已打通并加衬砌；已完成投资8875万元，关键问题在将淹没建瓯、建阳两县十几万人，谭震林给总理和国家计委要求停建的建议说：“建溪水电站，从实际上看来，十年到二十年内也无建设的必要，就是坝高降低到130米高程也要淹地15万亩，这在福建来说

是很不合算的，”工程于1962年正式下马。

早在1959年4月中央上海会议之后，国家计委已在安排大大压缩基本建设的项目，水电项目也首当其冲。5、6月间我奔波于西南各省水电工地时，已知道这一严重消息，于是在6月上旬到长沙时，给李富春并陈云、薄一波写了一封长信，说明我的看法；6月23日，关于建溪、青田等几个水电站下马问题，在北京又为水电部党组拟了一个报告。这是我为一生热爱的水电建设事业中断了20年，在1979年复职之前所写的最后两个报告，现录于后。第一个报告写给当时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建委主任陈云、经委主任薄一波。是1959年6月7日自长沙寄出的。

## 第一个报告

李副总理并陈、薄副总理：

出差到广西时，听到北京电话，计委准备要十三个大中型水电项目下马，其中有建溪（福建）、青田（浙江瓯江）、昭平（广西桂江）、沙尖子（桓仁下一级）等。去年上马的水电项目是多了些，但各地实际上早已作了调整：有的已完全停下；有的只作了点修路等准备工作；有的只保留部分力量作导流等开挖工程。这种情况对钢材、木材、水泥的紧张并不发生影响；对地方劳动力也影响不大或关系甚小。例如去年四川上马大中型水电工程曾达十五、六处，现只留下五处继续施工，全部劳动力只三万五千人，约占目前全省钢铁大军的百分之二、三，省委意见，水电劳动力还可适当增

加一些。计委提出的这十三个项目，大体也属于这三种情况，如建溪、青田、昭平、沙尖子、任家堆等，建议仍维持现状，以待情况的发展，可进可退。在全国计划落实之后，有的地区负荷已大起变化，即原来考虑的电力用户大大缩小了，有些水电项目似已失去供电对象。关于这一情况，有几点小意见，特提出供您们参考：

(一) 第一个五年电力的教训是搞慢了、少了些，特别是水电。如果五六、五七两年多有几个水电上马（如桓仁、朽溪等），当前供电情况就会好一些。水电建设时间比较长，那些在二五末、三五初起作用的项目，应当使之稍放慢速度，继续施工下去。否则，第一个五年的教训还会重复。

(二) 水电工程在初期主要是修路、盖临时房屋，以及土石方开挖；水泥、钢材是在中期、后期使用（如果是当地材料坝，水泥、钢材用料很少）。例如昭平（装机45万千瓦，电量21亿度，坝体混凝土58万方；丰满为20亿度和220万方），继续施工下去，六二年初可发电；明年所需水泥不超过一万吨，钢材不超过一千吨。我们在想尽一切办法节约水泥、钢材。六〇年和六一年水电一共需用多少水泥，以适应国家可能为原则。水电工程上马稍多一些，相信不致给国家背上包袱。

(三) 今后相当时期，煤炭的紧张难以缓和。这对火电发展影响很大。水电推迟必将更逼着增加火电，煤炭和火电设备就更加紧张。水电建成之后，不同于一切工业产品，它不再需要任何原材料和燃料了。石油井的油有枯竭之日，而水则是用之不尽的。我国的工业特别是合金钢、铝、铜、化



肥、化工等产品的发展，有赖于水电的发展；水电比重大了，可以促进整个工业尤其耗电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可以促进现代技术的发展速度。水电与大跃进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应当放到战略上来考虑，我曾不赞成三峡快上马，就是感到国家力量不够，问题太复杂，条件不成熟，三峡也快不了；而在一年两年内顶多二年可以建成的大、中型水电站，经过去年一年的实践，为数是很多的。例如广东新丰江（29万千瓦）、甘肃盐锅峡（45万千瓦）等，都是在一年半左右土建建成，有设备即可发电。希望计委和建委对此有充分的考虑。

（四）关于电力发展，自然需要计算负荷，但也不要重复过去死扣负荷的教训，例如贵州铝的发展条件很好，只差水电，而贵州不易很快建成较大的水电站。为什么不可以将铝氧运到柳州去利用昭平的水电呢？这总比从山东运铝氧到抚顺冶炼为合理。如果能立即给以必要的条件，昭平可以在明年年底或六一年上半年发电。像建溪的用户，也可以作打破常规的考虑。三门峡起来之后，任家堆有可靠电量27亿度（任家堆是土石坝），三门峡系统中就可摆大用户，也可将电多送一些到陕西去，以减火电负担。总之，水电用户应更灵活一些处理。

（五）发展水电的关键仍在设备。一机部已表示水电比火电好赶一些（主要是很少用优质钢和合金钢。钢材用量也少一些，配套也简单得多）。国外进口水电设备也比火电便宜。现在火电比重大，一机部的注意力不能不主要放在火电设备上。这次出差四川，到德阳水电设备厂看了一下，这个厂今年只发了维持费，但利用已到的设备和一个半完工的车

问，今年就可制造一万五千千瓦的机组。四川省委是积极支持这个厂的。现在国家只有哈尔滨厂有年产 100 万千瓦水电设备的能力，这无论如何不足以应付目前形势的发展，听说计委同志对德阳厂的尽快建成，有不同看法，这件事关系水电发展很大，希望能重新考虑一下。该厂筹备负责同志谈，只要明年能调给钢材、水泥各一万吨，该厂即可达到 100 万千瓦的生产能力。如果明后年一机部供应不上，是否可以考虑水电设备从国外进口一些？现在有许多工程都是只等设备。

我是五月初离京到四川的，然后到贵州、广西，现在刚到湖南。北京一些总的情况不了解，但从这四省所了解到的有关情况，感觉上述几点意见是值得再次提出来的。

## 第二个报告

### 关于建溪、青田、任家堆、昭平、乌江 五个水电工程不宜完全停工

李副总理并计委、建委、经委：

最近计委调整 1959 年基建计划时，决定停建 17 个大、中型水电站。为了缩短战线，保证重点，缓和器材供应的紧张，停建一批水电工程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其中有五项工程，即建溪、青田、任家堆、昭平、乌江，我们意见可放缓建设进度，不宜立即停工。主要的理由是：

1、从满足地区负荷来看，这几个水电站都是需要的；停下之后，势必很快又要上马。

2、从材料来看，这几个水电站今年不需要什么材料。

明年除部分导流工程需要很少量水泥、钢材外，其余均为准备工程，基本不需要材料。

3、从水电施工力量的平衡来看，今明年有一批大中型水电站将基本完成土建工程（如新安江、三门峡、西津、古田、猫跳河以及密云水库等），这样便于力量的安排。

4、建溪、青田、昭平等水电站的临时房屋和内外交通已基本完成，并已做了相当部分导流开挖工作，立即停工，将造成很大损失。

现将这五项工程的简况报告如下：

（一）建溪水电站。按原设计，初期装机 84 万千瓦，年发电量 46 亿度。主要供给闽北（南平、福州、三明等地）炼铝、化工、钢铁等工业用电。估计该地区 1963 年需要 60 万千瓦（仅南平铝厂 1963 年将达 7.5 万至 10 万吨，用电约 25 万至 30 万千瓦），古田溪几个梯级全部开发后，尚差 20 至 25 万千瓦。同时可考虑向浙江送电（浙江水电送江南电网），因此，即使不修建溪水电站，也要在闽北另建其他电站。

古田施工力量已向建溪转移。现建溪工地已有一万人，施工准备工作大部完成。建溪可以放慢进度，也可考虑推迟建设进度；今明年不进行大坝等主体工程，63 年仍可发电；今年只给少量投资，不给材料，即可维持。

（二）青田水电站。初期装机 84 万千瓦，年发电量 39 亿度。主要满足杭州、衢州、兰溪地区炼铝、化工、钢铁等用电，并向上海送电。估计浙江 1963 年约需 60 万千瓦，除已安排的七里垅水电站及部分热电站外，尚缺 30 万千瓦。从江南电网 1962 年电力平衡来看，也需要青田向上海送电。

40 万至 50 万千瓦。二者合计共约 70 万至 80 万千瓦，与青田初期装机相符合。

青田工地现有八千人，新安江上建工程大体完成后，今年下半年将有一部分陆续转移到青田。现工地已完成土石方 107 万立方米，准备工程已基本完成，正进行导流工程。今年给部分投资和很少量材料，可维持施工；明年年末再开始进行主体工程。青田为堆石坝，用水泥很少。

(三) 任家堆水电站。装机 60 万千瓦，发电量 24 亿度。主要供电郑州、洛阳等地的有色金属冶炼和机械、纺织等工业。估计到 1963 年，郑州、洛阳、三门峡电网负荷将达到 90 万千瓦（包括山西、陕西 20 万千瓦）除三门峡及部分火电外，尚缺 17 万千瓦，需由任家堆担任。这个工程的施工力量将由三门峡转移。任家堆工程量不大，堆石坝仅 220 万立方米，今年明年可只做准备工作，1961 年后大开工，62 年仍可以开始发电。

(四) 昭平水电站。装机 45 万千瓦年发电量 21 亿度。距广西柳州、桂林、平桂、合山、梧州等工业地区约 80 至 150 公里，主要供电钢铁、煤炭、锡矿等。预计该地区 1962 年负荷为 18 至 20 万千瓦，除增加火电 8 至 9 万千瓦外，尚需由昭平供电 10 万千瓦。为了充分利用昭平廉价电力，还可以考虑在该地区多安排一些耗电工业。昭平坝体混凝土仅 58 万立方米，工程量最小（丰满大坝 220 万立方米），电量比丰满还多。昭平水电站所在的桂江是西江的一条主要支流，为珠江上游的暴雨中心。昭平水电站 40 亿立方米库容，有一定的防洪作用。如果明年不开始进行主体工程，1962 年仍可发电。施工力量明年下半年由西津转移。今年可只给少量

投资，不给材料。明年主体工程不开工，用材料也很少。

（五）乌江水电站 原计划在乌江渡建设，由于地质等条件较差，电站规模也较大（80万千瓦），拟改在乌江上游三岔河修建梭筛水电站，装机20万千瓦。贵阳炼铝和遵义铁合金等工业，估计1962年用电需40万千瓦。梭筛水电站地方去年已作了些准备工作，可于明年开工。

关于全国水电、水利工程所用钢材，1958年为10万多吨，1959年分配11万多吨；所用水泥，1958年为61万吨，1959年分配101万吨。明后年当能按一定比例增长。从现在开工的规模来看，以上五个水电站，大体还都可以根据今年下半年及明年国家的财力、物力、人力情况，前进或暂缓，不会造成被动；估计明年需钢材不过几千吨，水泥不过三、四万吨。鉴于水电站建设一般需要时间较长，希望能同意将这几个项目维持下来，不要立即下马散伙，以免造成损失。

此外，陕西石泉水电站，装机54万千瓦，年发电量25亿度，距西安约150公里，距汉中药约100公里，从西安、汉中工业区1962年用电来看，也是需要建设的。石泉在汉水上游，还能帮助丹江口水库调节流量。工地现有工人四千人。这个项目最好能够保留下来，放缓施工进度。如果一定要停，也希望把现有力量转移到附近河流修建一个较小的工程，以免将来负荷上涨造成被动。

关于其他十一个项目，我们同意基本停下来。但其中有的项目可能还有上述问题。地方上或者还有不同意见，就不一一列举了。

以上意见，也还联系考虑到整个二五电力安排，水火电

发展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教训等方面。是否有当，请予批示。

这份我所拟的以水利电力部党组名义的报告，其中除乌江渡水电站后来建成以外，其他工程都因种种原因下马了。回顾历史，如新安江水电站不是及时上马，以三年半的时间建成发电，也可能发生问题，“大跃进”时期，水电建设也有急于求成的教训。1959年庐山会议后我个人20年厄运事小，而批判被斥为犯了“三反”（反水利、反火电、反三峡）错误的“李锐反党集团”，造成整个水电建设的停滞局面，以致“文革”十年对水电建设机制造成的破坏，实在是太严重了；“水主火辅”这个本来可以对中国水电优先发展的方针，就这样昙花一现，立即夭折，实在是太令人遗憾了。

中国水力资源世界第一，开发条件也极为优越，但是直到现在，水电却未能优先开发，其间教训极多，这里就不来论述了。

## 教科文大跃进

“大跃进”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它是一场包括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的大运动。当工业、农业、商业“跃进”狂澜迭起的同时，教育、科学、文艺、卫生、各界也无一不在涌动“跃进”的浪潮。

就建设而言，毛泽东很早就认为文化与经济是并重的，开国前夕，他曾说：“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1955年底，当农业合作化运动经过批判“小脚女人”打破原定设想而加速发展掀起高潮时，毛泽东就认为包括工农商、教科文在内的各项事业都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他说：“（农业合作化高潮，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1955年12月27日）。毛泽东说得很清楚，经济和文化都必须加速发展

“大跃进”一开始就是以经济和文化同时高速发展为基本内容的。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中，解释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点时，特别指出，“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刘少奇说：“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革命，发展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它的主要任务是：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逐步地做到一般的乡都有中等学校，一般的专区和许多的县有高等院校和科学研究机关；完成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和改革，积极地进行汉字改革；消灭‘四害’讲究卫生，提倡体育，消灭主要疾病，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振奋民族精神；开展群众的文化娱乐活动，发展社会主义的艺术；新知识分子，改造旧知识分子，建立一支成千上万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其中包括技术干部的队伍（这是数量最大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此旨在改变中国文化落后面貌的文化建设的任务，当然还是反映了人民的根本愿望和要求。但在“大跃进”气氛中提出的文化建设的任务，对完成这些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却被大大忽略了，所设想的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也被大大缩短了。刘少奇在报告中就作了这样过分乐观的估计：“我们的六亿多人口在革命觉悟高涨和革命斗争胜利的速度方面，已经远远地超过了西方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在经济文化发展的方面，也必然地远远超过它们。”

革命的速度超过了西方，建设的速度也必然超过西方，这是当年普遍流行的一个逻辑。人们很少去分析革命与建设



进程的根本不同之处，从而认识建设是远比革命复杂长久的过程，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异常落后的农业大国，搞建设更是困难重重。相反，当年上上下下确是比较普遍地迷信历史经验的力量，迷信主观意志的力量，以为有了革命的经验，有了鼓足的干劲，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就如《人民日报》1958年6月9日社论《文化革命开始了》所说，我国就可以在十年二十年以后，“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文化“大跃进”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展开起来的。这一点，同经济方面的“大跃进”是一样的。

但是，文化“大跃进”又有与经济“大跃进”不同之处。“大跃进”初起时，反击右派之声余音未绝。从而，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文化界的“大跃进”，同工农业“大跃进”比较起来，有一个后者不曾有的重要内容，即“兴无灭资”、改造思想。“兴无灭资”、改造思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二是批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包括观念、学术、理论等等，以建立“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插红旗拔白旗。他在八大二会议上说：“无产阶级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一定会插白旗；与其让资产阶级插，不如无产阶级插。不要留空白点。资产阶级的旗子，我们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在毛泽东看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建设社会主义尤其是“大跃进”运动地障碍，这种障碍一是来自他们的“右倾保守思想”，二是来自他们的学术和艺术权威。因此，除了批判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外，毛泽东还对知识分子表示了种种藐视。在发动“大跃进”的过程中，他多次说过不要怕教授，怕权威。在成都会议3月22讲话中，他说“怕

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我也有一点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很少，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源于奴隶制度‘谢主隆恩’的残余。”藐视知识分子，当然是为了进一步冲破“大跃进”的障碍。毛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反复讲学问少的人可以胜过学问多的人。归结起来是要人们“不要被大学问家、名人、权威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被某些东西所束缚，要从这种束手束脚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要发挥人的创造性。”

自1949年以来。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批判电影《武训传》，到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直到反右派斗争。知识分子几经风雨，一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千斤重的帽子，压得他们抬不起头伸不直腰，他们背负精神枷锁参与“大跃进”的。一方面他们日复一日地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另一方面他们看不到被“改造”成“无产阶级”的希望；一方面他们是科学与知识的载体，怀有科学良知，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去制造那些违反科学的“大跃进”的“神话”（当然其中不乏出于某种动机面心甘情愿者）。因此，知识界的“大跃进”显得心理沉重面行为畸型。1958年2月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上，一位知识分子代表的发言就很典型。他发言的题目是：《打掉知识分子的臭架子，甘当劳动人民的小学生》。他说：“解放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党的教育之下，经过了屡次的社会改革运动，认识上虽有了一定的进步，但其资产阶级性的本质的改变。还不能说是很大的，旧的习气还保留得不

少。”“知识分子好摆架子，除有其阶级根源，历史根源和由于知识分子所受的教育；生活和工作方式的影响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知识分子本人对知识产生的根源和自己知识的局限性有错误的认识。”（张国藩代表的发言，1958年2月5日。）

## 教育“大跃进”

教育“大跃进”最早是从三件事上开始的。第一件事是勤工俭学，第二事是群众办学，第三件事是扫除文盲。

1958年1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长葛县第三初级中学和贵州仁怀县群力农场业余初级中学勤工俭学的情况。长葛三中在学校内开垦了38亩可耕地，分6个试验区，全校18个班组成18个生产队，各队为自己的耕作区，每年按季节耕种。一方面解决经费不足的困难，一方面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和劳动技能。仁怀群力中学则是一所边耕边读的初中，以生产为主，在保证生产自给的前提下，三年完成初级中学的教学任务。这所学校是半天读书，半天生产，晴天少读，雨天多读；学校课程与普通中学一样，学校的生产管理与农业社一样，干活评工记分，按劳取酬。《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两个好榜样》，认为：“在各级学校中推行勤俭求学的办法，是革新学习风气，进一步促进我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一件大事。”社论还说：“实行这种一面劳动、一面读书、勤工俭学方法的更主要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通过劳动养成牢固的劳动观念和劳动习惯。增加学生的生产知

识和生活能力，并进而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在校学生参加勤工俭学活动有积极的意义，但它应该是在保证以课堂教学为主，不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的前提下开展的，学生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劳动者，不可能像一般劳动者那样承担生产任务。此外，普通学校与职业学校也有区别。如果说对后者要求更多地进行一些与本职业相关的实践的话，那么对前者还是应该以传授书本知识为主。然而，《人民日报》的社论说：“有些持有资产阶级教育观点的人，强调什么参加体力劳动会影响学校的‘正常秩序’和影响‘学生的学习’。他们不支持学生勤工俭学，而是指手划脚地多方面指责；他们只注意知识传授，忽视思想教育，只注意课堂教学。忽视同实际生产劳动的结合。”这样一来对待勤工俭学的态度就变成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教育方面的一个分界线，教学问题被上升成为政治问题。《人民日报》2月10日一篇《是彻群众办学、勤工俭学的方针》社论说得更严重：“资产阶级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青年成为自高自大、轻视劳动、轻视工农群众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这显然是我们的教育事业的性质相违反的。……我们的学校，应该培养忠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采取勤俭办学、勤工俭学的方针是提高学生政治品质和学习质量的最有效的办法。”

与勤工俭学相联系，还兴起了一股群众办学之风。由于勤工俭学能自我解决一部分办学经费，因而各地纷纷发动群众，自己办学。这本来也是一件好事，在国家财力、物力不足的情况下，是发展教育事业的一条可行的途径。可是，群众办学也被纳入了求多求快的轨道，终于形成了一场大规模

的运动，完全不顾条件，不讲质量，一哄而起。据 15 个省、市统计，1957 年群众自办的小学有 25600 多所，而 1958 年 1 至 6 月仅半年，全国各地自办的中学有 68000 多所。在“大跃进”的浪潮中，不仅自办小学，中学，而且自办大学。前述《全面发动“大跃进”的八大二次会议》一节写到过，柯庆施在会上发言就提出每个县都办大学。在广大乡村办高等院校。果然，“大跃进”中各地竞相办起大学。河南禹县在人迹罕至的古老山寨办了一所鸠山红专大学。被称为“建设山区的先锋。”这所大学男女学生 104 人，多是初中文化程度，只有少数念过高中。教师是下放的科技干部，还有本省河南大学的助教和学生。这个“大学”提出的方针是：思想要共产主义化，学习战斗化，劳动军事化，生活农民化，行动集体化，组织纪律化，技术革新先进化，上课、工作制度化。这个省登封县委发出“全县办大学”的号召，仅仅两天，全县办起了 44 所“红专大学”。入学的干部和群众达 11.7 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1/3 以上。这些红专大学设了马列主义、行政、工业技术、农业技术、宣传卫生科学、财经、政治 7 个学院和 38 个系。8 月 12 日《人民日报》报导说，他们“学习的办法是集中学政治，分系学技术，分班学文化，分系建立试验田；能者为师，不能者为徒，师徒相帮，互教互学，政治、文化、技术同时并进，形成了热火朝天的学习高潮。”在最早建立人民公社的河南遂平县，在两个月内改变了以前的教育体制，搞了“三级办学”的“新体制”。这个“新体制”令登封县都相形见绌：全县 10 个基屋公社共办红专综合大学，半耕半读红专大学，水利、工矿专科学校，业余农业大学 570 余所，学员 10 万多人，基本是

每个社员同时又是学员。实际上是社学一体，公社即大学。所谓“三级办学”的“新体制”，就是基层公社办红专综合大学。生产大队办半耕半读红专大学。生产中队办业余农业大学。下面是这个县第七基层公社“三给办学”体制表，很值得“载入史册”：

表 1：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第七基层公社生产领导形式和文教体制一览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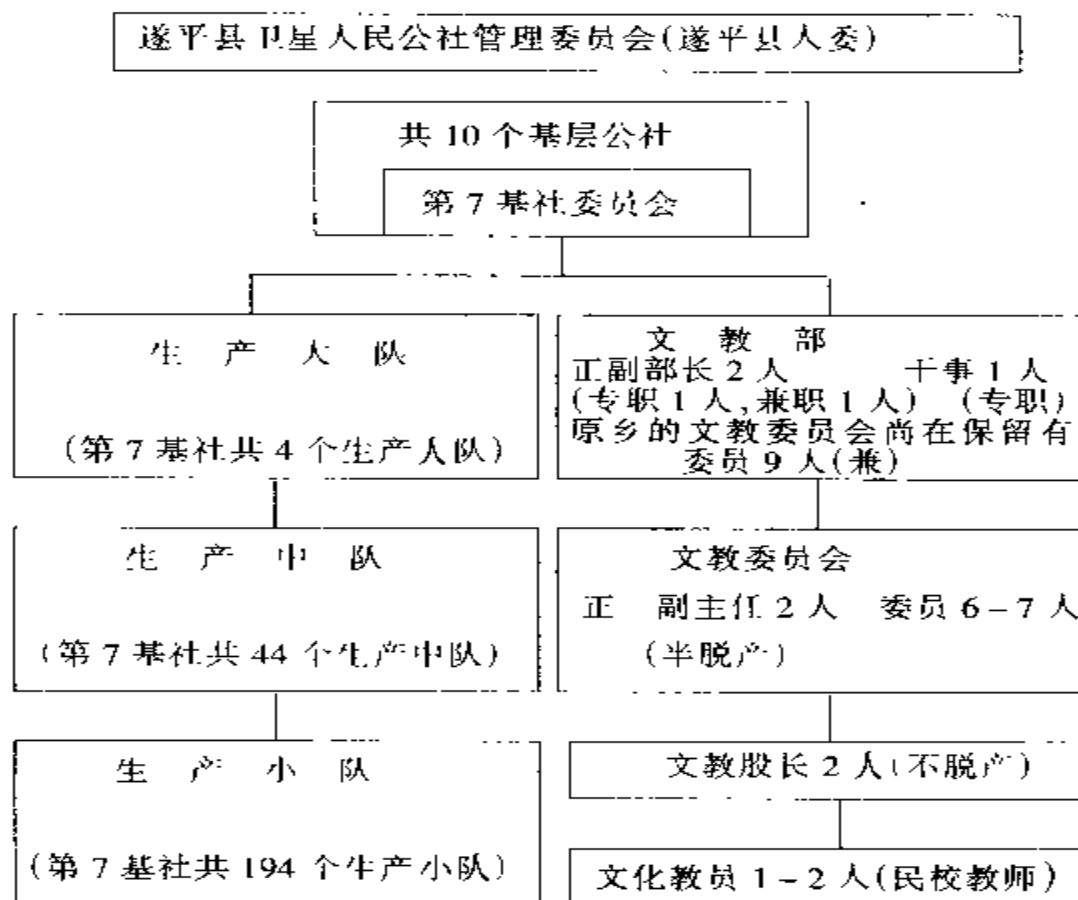


表 2：遂平县人民公社 第七基层公社 各类大学分级管理一览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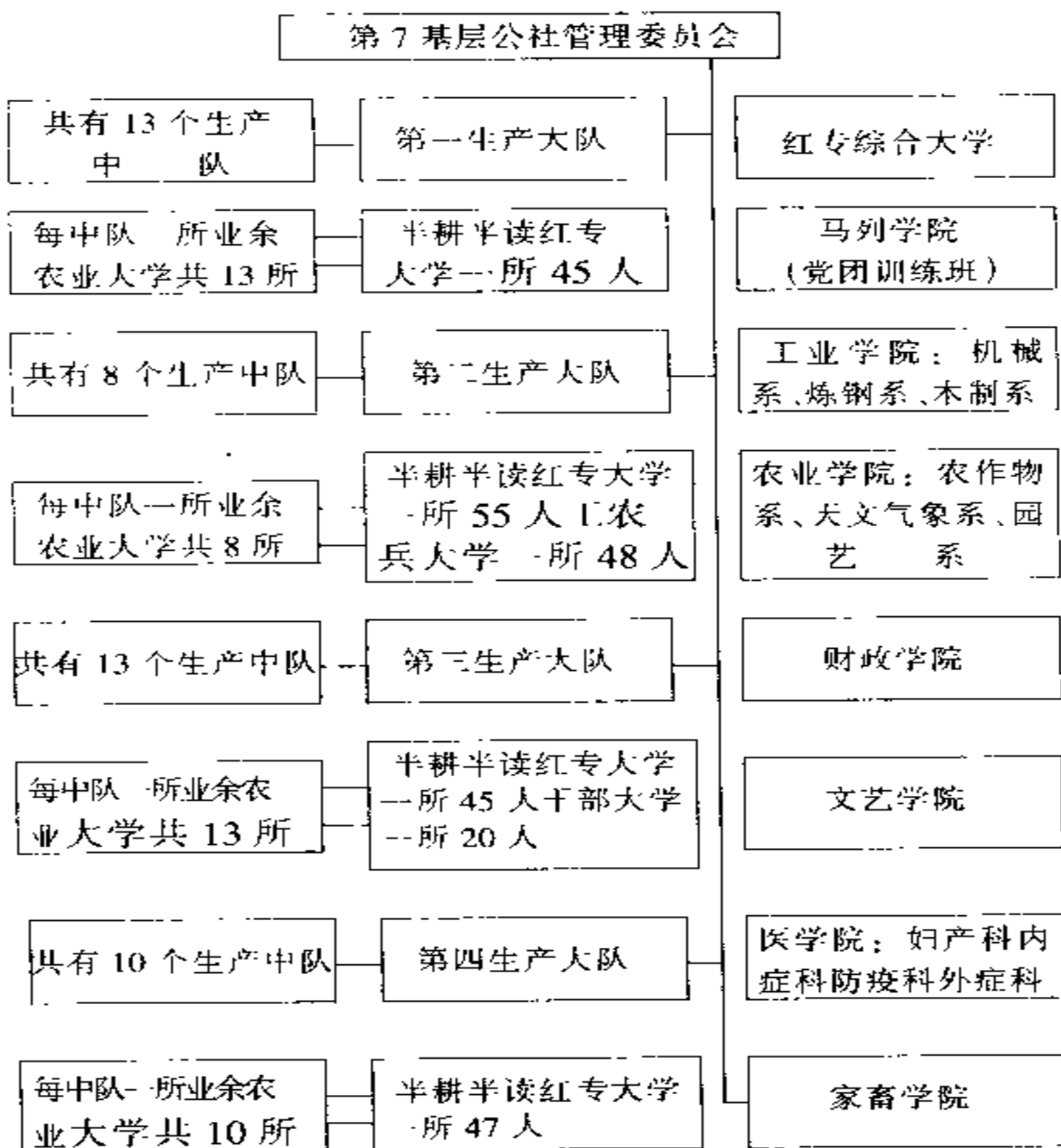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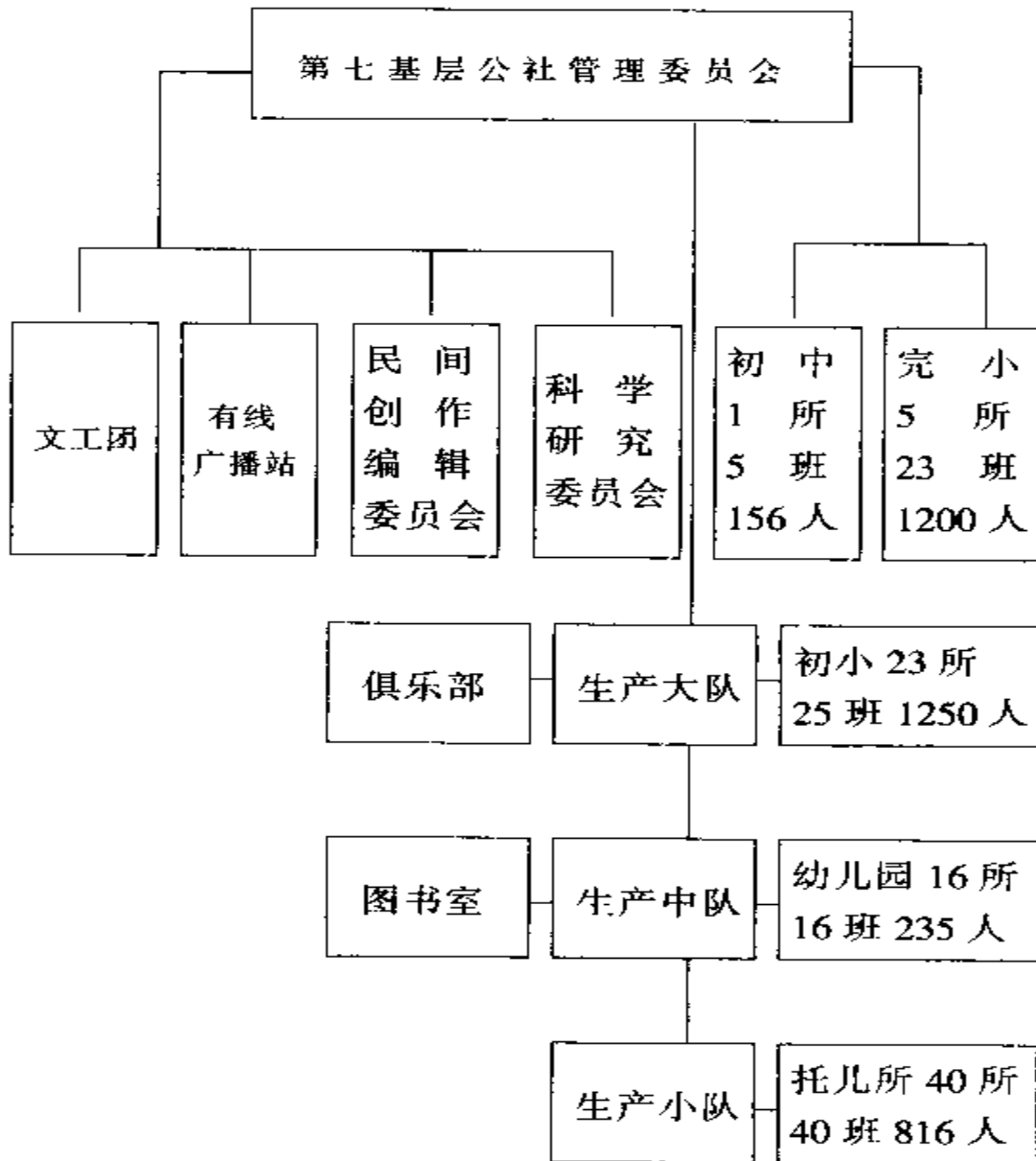


表 3：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第七基层公社科研、文化、学校教育（幼儿教育）一览表





遂平县所谓的“大学”其教师是“聘请社内较有威望，具有实际生产知识的丰产能手、劳动模范和老农”，或是抽调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担任。

山西平遥县办了一所“平遥综合大学”，实际上是由原来的县第一中学和县动力机械厂合并而成，上增大学班，下带小学班和幼儿园。挂牌的那天，全校师生参加了冶炼钢铁的劳动。作为开学第一课。这种不伦不类的“大学”，竟被新闻媒介称为“普及大学教育的一条新途径。”（《光明日报》1958年11月9日）

1958年2月《人民日报》报导黑龙江宁安县两年扫除了全县文盲的消息，并配发社论《掀起规模壮阔的扫盲大跃进》。社论说：“当前障碍扫盲工作大踏步前进的，是保守思想。几年来扫除文盲工作中，曾经反对过消极保守，也反对过盲目冒进，今天又提出了跃进，是不是在盲目冒进呢？肯定的回答，不是盲目冒进，因为今天提出扫除文盲的跃进，是根据几年来扫除文盲的经验，当前扫除文盲工作的条件和我国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需要，绝不允许人们以反对冒进作为保守思想的护身符。”

2月27日至3月6日，在北京召开的18省市扫盲先进单位代表会上，兼任全国扫除文盲协会会长的陈毅号召来一个文化上的“原子爆炸”。他说，中国的文盲是完全可以在五至七年之内扫除掉的，我们的工农业建设发展得很快，扫盲、文化、科学等方面的工作不能拖后腿。工业前进了，农业前进了，扫盲也要前进，来一个齐头并进，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全国各方面的大跃进的形势。这次会议提出，在“二五”期间基本上扫除青壮年文盲，在两三年内基本上扫除职

工和干部中的文盲，五年内基本上扫除农民和市民中的青壮年文盲。这个指标比农业“四十条”规定的12年内基本扫除青壮文盲的时限提前了7年。此后，全国兴起“扫盲大跃时”就远远不是这个会议所能预料的局面了。不到两个月，就传出消息：全国已有137个县基本上扫除了文盲，黑龙江省已在全省范围内基本扫除了文盲。（《人民日报》1958年5月7日社论《用革命精神扫除文盲》）。

这种勤工俭学、群众办学、扫除文盲运动，迅速推动了整个教育界的“大跃进”。1958年夏天，“大跃进”运动进入高潮时，《光明日报》报道说：从1月至8月，我国扫除了近9000万文盲，比1949年到1957年扫除文盲总数的2797万人多两倍；全国2257个县、市中，已有1516个县、市基本扫除了文盲，占县、市总数的67.2%。学龄儿童入学率已达到93.9%，1977个县、市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当年新建小学40余万所，新学年小学生已达9200余万人，比1957年增长了43%。当年新建普通中学26000余所，全国普通中学在校学生达924万人，比1957年增长了47.2%。当年新建农业中学和其他职业中学75000余所，共有学生422万余人。当年中专学校达6000余所，为1957年的数倍，学生总数达171万余人，比1957年增长了220.8%，当年新办高等学校800余所，招收新生37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总数达70余万人，比1957年增长了66.8%。业余学校发展最快，共有6000余万人在各级各类业余大学学习，比1957年增加了5.5倍；业余学校中数量最大的是红专学校和红专大学。共有34万余所，学生有2000余万；有61万余人在5000余所夜大学、函授部学习。150万余人在3万余所业余

中专学习，400余万要人在新办的9万余所业余中学学习，3100万人在新办的68万余所业余小学学习。《光明日报》还宣布：“现在，在我们国家的许多省份，不仅基本上扫除了文盲，普及了小学教育，大大发展了中等学校，而且初步建成了自己的包括综合大学以及工、农、医、师范等等高等学校在内的高等教育体系。”《光明日报》报导还透露：有很多省份已经决定，一定要在中央所号召的15年内普及大学教育。（《我国教育事业百花齐放万马奔腾》，《光明日报》1958年10月1日）。

以成倍、成数倍甚至十数倍的速度发展教育，这是与农业“高产卫星”一样的“神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任何人为缩短这个过程的作为。要么会失败，要么就是浮夸。当年的教育“大跃进”这两条占全了：既是浮夸，又是失败。

教育“大跃进”远不只是勤工俭学、群众办学、扫除文盲，而涉及到从教育方针、教育政策、教育制度、教育方法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一系列问题。

毛泽东对现行的教育及其体制一直不满，经过反右派斗争后，他更是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教育”的情况必须改变。“大跃进”正好可以实现他改造教育的意愿。1958年8月在对陆定一所写《教育必须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文章作修改时，他加写道：“我们应当根据我国自己的特点，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来规定我国的教育方针、教育政策、教育制度、教育方法等等”这反映了毛泽东对现行教育实行大改造的意图。

对陆定一的这篇文章，毛泽东十分赞赏。他在上面批示

说：“很好，登红旗。题目特大，全文宜用较大字型，例如四号或五号，不用新五。”并亲自写了编辑部按语：“陆定一同志这篇文章，是根据党中央召集的教育工作会议的结论写出的，党中央对这个问题即将有指示发给各级党委。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在讨论党的指示的时候，结合陆定一同志的文章予以讨论。在学校党委讨论此事的时候，可以吸收非党的教授教员参加。”他还对文章亲笔作了一些修改增补。

1958年第七期的《红旗》杂志刊载了陆定一的文章。文章对教育方针、教育政策、教育制度、教育方法等一系列问题作了阐述。

文章说：“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向来就是，教育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必须由共产党领导。这个方针，是同资产阶级的教育方针针锋相对的。资产阶级的教育，是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即为资产阶级专政服务的。是同无产阶级专政不相容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资产阶级不敢直接地公开地提出要教育受资产阶级政治家的领导，要教育成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只能提出‘教育由专家领导’、‘为教育而教育’的虚伪的骗人的主张，来达到反对教育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目的。所以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的教育方针表现为：为教育而教育，劳心与劳力分离，教育由专家领导。”

文章说：“几年来教育工作中的争论，归根到底，集中地表现在‘什么是全面发展’这个问题上而。……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常常谈全面发展，这是好的。但是，对于‘全面发展的’理解，却有原则的分歧。从我国九年的教育工作的

经验来看，资产阶级教育学者并不直接地反对全面发展，他们甚至似乎是‘积极拥护’这个方针的，但是他们主张把全面发展片面的了解为使使学生具有广博的书本知识，同时却既不上主张学生学习政治，又不主张学生参加生产劳动。这就实际上把全面发展庸俗化，使它等同于资产阶级的所谓培养‘通才’的教育方针。我们共产党人，对于全面发展的了解，同资产阶级教育学者的了解是根本不同的。全面发展，包含着这样一个根本内容，就是使学生们有比较广博的知识，成为多面手，能够‘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的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我们主张工人在工业生产中成为多面手，农民在农业生产中成为多面手，并且主张工人兼农民、农民兼工人，主张公民服兵役，军人退伍又成为生产者，主张干部参加劳动，生产者参加管理，这些主张已经在逐步实行。

文章说：“全面发展所包含的另一个根本的内容，是学生所学到的知识，须是比较完全的知识而不是片面性的不完全的知识，这就必须实行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红旗》1958年第7期）。

这篇文章实际上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教育的一些根本性想法，比如“工人兼农民”、“农民兼工人”等主张，同后来毛在《五七指示》中提出的各行各业亦工亦农亦武亦文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它表明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教育培养人材的标准的看法，而且把能否坚持这些标准当作“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教育思想之间的斗争”。从“两个阶级斗争”的高度，文章提出要进行一场教育革命：“实现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必须经过斗争，而且将会有长期的斗争。为什么

呢？因为这是教育工作中反对几千年的旧传统的一个革命。……现在，在教育工作中，正在进行着大破大立的过程。资产阶级思想和教条主义思想正在被破除，新的适合于我国情况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理论、教育制度、教育方法、课程、学制等等正在被创造出来。这个教育革命是有深厚的经济基础的。”

教育革命是教育“大跃进”更重要的内容，对教材、课程、学制以至整个教育制度都要实行大改造。各学校普遍掀起教学改革运动。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搞“教学改革”运动，学生和教师共同编写教学大纲和讲义。全校 10 个系的高年级学生共成立了 256 个教学改革小组。学生和教师发生不同意见，学生就采取所谓“打擂台”的方式，和教师分头准备提纲，然后讨论，共同制定新的大纲；有的采取“唱对台戏”的办法，学生和教师各自制定教学大纲方案，然后两方面摆出来，进行评比，展开辩论。物理系电工组的学生觉得教师编的大纲“空”，就去工厂找工人，提出电工课新内容。中文系学生收集历代大量民歌和民间文学资料，同教师展开九次辩论，“终于推倒以剥削阶级文学为正宗的旧教学大纲。建立了以人民文学为的新大纲。”据报导，该校这样由学生提出的教学大纲共 169 份，教学计划 47 份，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了 127 门课的教学大纲的改革工作。（《北师大实行党委、专家、学生三结合制定新的教学大纲》，1958 年 7 月 17 《人民日报》）。

学生编教材这件事，受到了康生的赞许，康生说：“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动手集体编教学大纲也是了不起的好事情，是教学工作上走群众路线的创举。这件事情即使有缺点

甚至失败了，但这方向是对的，精神也是好的，可以在编教学大纲上来个三结合，即在党委领导下，教研室和学生一齐动手，各人编出来，相互展开辩论，最后经过评比达到一致的团结。这就可能比教研室关门编选更好些。”

北师大的学生不只是新编教学大纲，还编了一部 100 万字的《中国文学史》和一部 60 万字的《中国民间文学史》。北大中文系三年级的五十多个学生也新编了一部七八十万字的《中国文学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大量印制发行。一时受到很高评价，后来报刊上陆续发表了一些批评文章，单独看一篇文章，不过是就书中的某一缺点提出意见，但把这些批评文章综合起来看，就几乎把这部书完全否定了。当时我曾翻阅了一下，确实给人面目一新感觉。同旧说大不相同，只是此刻已无法找到一本。无从具体说明其情况了。这种集体创作的文学史没能保存下来。也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它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教育革命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大中学校大办工厂。据 7 月 23 日《光明日报》报道：北京大学物理系半导体专门化四年级的 110 多名学生，为筹集建设半导体工厂的资金，参加了到车站卸煤、到工地挑土等各种劳动。哈尔滨工业大学工程经济系办的工厂，除了学校拨给三台破旧的机床以外，所有铸工车间、机械加工车间、手锻炉等，都是师生们自己搞起来的，房架是勤工俭学所得换来的。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的学生用芦席搭成了几个厂房，利用旧机器，改装了茶炉房的炉灶，生产出了很好的药品。石家庄医上学校办起了一年产 5 吨细菌肥料厂，得到了中共石家庄地委的奖旗。这篇报道还列举了各地一些学校办工厂数字：合肥的 4 所高

校已办和在办的工厂就有 150 多座，长春的汽车拖拉机学院已办大小工厂 120 多座，山东大学从 6 月底到 7 月 13 日已建和在建的工厂有 58 座，不仅理工科办工厂、文科也大办工厂。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系和中共党史系的学生，两天内就开办了包括炼铁、炼钢、化肥、造纸等小型工厂 50 多座。山东大学文科各系学生办起了钢铁厂、金属加工厂、农场、捕鱼大队十五六个。学校办工厂、办农场也是为了配合当时的工农业“大跃进”。据 1958 年 7 月 3 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在首都学校青年红专跃进广播大会上，北京农业大学的青年代表豪迈的说，他们学校的青年已经成立了破除迷信小组，提出要让母鸡一天下二三个鸡蛋，母猪一年生三窝小猪，要用电波耕地，声波松土。

教育革命不仅有“立”的一面，还有“破”的一面。“破”，在学术界的反映之一就是大批判。1958 年，仅仅《光明日报》就发表了 250 多篇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约一百万字，批判了 80 多人，数学界有齐民友、华罗庚、吴文俊；心理学界有彭飞、朱智贤、唐钺、曹日昌、潘菽；哲学界有冯友兰、贺麟；经济学界有马寅初；史学界有陈寅恪、周谷城；文学界有林庚、王瑶、游国恩、刘大杰、郑振铎等人。当时影响较大的批判有：对数学特殊论的批判；对马寅初的“团团转理论”和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对资产阶级心理学的批判；对文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这些批判文章，大都是随意硬扣政治帽子，例如郑振铎认为中国文学受印度文学的影响很深，批判文章就说他是“民族虚无主义者”，“是服务于帝国主义向外侵略的”，说他的《中国俗文学史》“大量地贩卖了胡适的那些毒



货”，是对劳动人民“恶毒的歪曲和诬蔑”。对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纲》，批判文章给它扣上了“不遗余力的抹煞党的领导作用”这样的大帽子。这些被批判者，只有马寅初发表了两篇答辩的文章，其他的人都慑于人批判的声威，无一人发表一字答辩的文章。马寅初的答辩文章说：那些的人说，“已经把我驳得‘体无完肤’了，既然是‘体无完肤’，目的已经达到，现在何必再驳呢？但在我看来，不但没有驳得‘体无完肤’，反面驳得‘心广体胖’了，更帮助我把我的几个理论弄得益加完整和坚固。”马寅初说：“我们要‘快’，人口多就是个人负担。最近印度尼西亚排华，我们要让华侨回来，印尼的华侨约三百万，试问这些人回来如何安排呢？这些写文章的人，就是不了解中国情况，批评的人说我是唯心主义，他们是唯物主义，我的理论是从中国实际情况中的大量材料得来的，却成了唯心主义，而他们是从头脑里随便想出来的，却反而是唯物主义，真是千古奇谈。”

这种批判还扩大到了自然科学领域。1958年1月出版的《考古》杂志（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出版）上，发表专文批判著名的考古学家裴文中，说他“由于忽视了政治挂帅而造成了严重的学术脱离政治的倾向，他自然是考古学上的一面资产阶级的白旗，那么就应该把它拔下来。”

教育革命还破了学校的学衔制度，大学里就取消了学衔。1958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开学典礼大会上，党委宣布：根据中央北戴河会议的精神，进一步改革教学制度，破除对资产阶级教授的迷信和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所有党员的学衔一律取消，全校助教、讲师的学衔也一律取消，非党员教授、副教授的学衔是否取消，视本人自愿申请而定。这一宣

布引起全校师生很大震动。朱智贤、萧璋、陆宗达等 21 位教授副教授向党委书面提出申请，要求取消自己的学衔。

## 武汉大学“拔白旗”运动

对于知识分子来讲，当年有没有教授之类的学衔已经不重要了。在教育“大跃进”中，他们面临一场比取消学衔更严重的运动——“拔白旗”。

所谓“拔白旗”，就是批判所谓“资产阶级专家典型”，不仅在政治上批倒，还要在业务上批臭。武汉医学院在“拔白旗”运动中总结了一条“经验”，很典型地说明了为什么要展开“拔白旗”运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承认政治上立场反动，学术思想上唯心主义，就是不肯承认业务上不学无术，这是他们的命根子，是他们翘尾巴的最后本钱。因此，必须在业务上也完全把他们斗倒，才能取得斗争的彻底胜利。这条“经验”的确多少抓住了知识分子的某种心态。具有“打蛇打七寸”的功效。看得出是比较“内行”的人总结出来的。无怪乎。这个仅有 500 余名教师的单位，竟有 79 人被拔了白旗，其中教授、副教授约占一半左右。

就全国范围讲，武汉大学是较早开展“拔白旗”运动的单位，武昌也是“大跃进”中跟得较紧的单位。北载河会议后，陈伯达宣扬取消商品和货币的主张。为了证实这个理论，武汉大学曾经组织教员学生二三百人，到人民公社去了几个月。他们不是真搞调查，而是专门搜集有利于这个观点的材料。不曾料到，调查报告刚定好，毛泽东就在第一次郑

州会议上讲，还是要搞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过武汉当时还是被新闻媒介大加宣传的。武汉大学前身可以追溯到1893年张之洞创办的新式的湖北自强学堂，武昌主等师范学校于1913年创立，以后为武昌大学、武昌中山大学，1928年改名武汉大学，到1958年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是全国知名学府。武大是我的母校，其有关消息我本来就比较留意。1949年刚解放不久，徐懋庸主持校务时，就犯过乱批斗教授的严重“左”的错误，当年影响很坏。反右派斗争时，武大也是严重受灾单位。“文革”结束后，有些老同学、老校友陆续给我一些有关武大的校史资料，使我更多地得知武大的“大跃进”情况，其中有些被“拔白旗”的教授，是我的老同学。

当年湖北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了一本武汉大学党委办公室编的《拔掉白旗，插上红旗——武汉大学教育革命经验》，收集了24篇武大“拔白旗”的文章，有社论，有评论，有体会，有经验。王任重为这本书写了篇几百字的序言，序言不长，是一篇堆砌起来的政治标语，不过态度十分鲜明：

高举红旗把教育战线上的革命进行到底。

为了建设共产主义的战士，为了培养新社会的  
新人，必须坚决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  
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为了培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大鸣大放辩论，从根本上铲除资产阶级的教育体系、肃清教育战线上的一切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拔掉资产阶级的白旗，插上无产阶级的

红旗，

把马列主义作为一切学科的指导思想，把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

加强党的领导，用群众路线的方法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

大专学校采用半工半读的制度将变成锻炼钢铁战士的大高炉

书呆子将从我们这一代绝迹。生龙活虎，多才多艺的人才一批一批成长起来。

这本书给我们今天回顾武大的“拔白旗”运动提供了难得的史料。

说到武大的“拔白旗”运动，得先从武大的“教育革命”说起。武大的“教育革命”是从1958年5月开始的，经历了教学大检查，大办工厂、课程改革和半工半读四个阶段。

所谓“教学大检查”，是检查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方向，斗争锋芒针对着资产阶级教授的教育思想和学术思想。用当年的话说，斗争的方式是放手发动群众，以党的教育方针和辩证唯物主义来武装群众，检查教学计划，检查教授编写的教学大纲和讲义，同时鼓励教授自己进行检查，然后进行大鸣大放，大争大辩。据武汉大学党委11月16日给上级的一份报告说，通过大检查，“揭出了资产阶级教授的业务底，还了他们业务上的本来面目。原来许多所谓有真才实学的教授仅仅具有书本的知识，十分缺乏甚至完全没有实践的知识，因而他们的知识是片面的知识。”在大检

查中，物理系的学生对他们的教授有这样的评价：长处有两条，一是有一定的书本知识；二是编讲义、写论文时，知道从哪里去抄书。缺点也有两条，一是没有最新的科学成就方面的知识，或者对这方面知识一知半解；二是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些教授对工厂同志登门求教，总是推托敷衍；有些教授长年以来总是绕着试验室走，因为他们做实验也不能动手。这次大检查的最大收获是，“初步破除了对资产阶级教授的迷信，使党内党外的思想获得了初步解放。”“群众当中的积极分子认识到理论联系实际的需要，他们就迫切要求行动起来，大办工厂。”

从6月底到7月底，进入“大办工厂”阶段。据当年《长江日报》7月9日报导：武大各系规划要办的工厂有100多个，已经办成和即将办成的有28个。物理系金属物理教研组负责建立一座年产钢铁1.5万吨的钢铁联合工厂。争取在“八一”出铁。这个系已开工的金工厂和无线电厂，将要扩大成为精密仪器机械厂和电子仪器厂。并将在当年试制出电视机、微波探测器等精密仪器。化学系拟定按专门化建立10个工厂，有机化工厂已经建成，电解食盐、矽胶、吸附剂3个工厂正在筹建；另外还要修建一座东湖水草综合利用工厂，利用学校附近东湖里的水草，制造酒精、人造纤维、沼气、化肥等产品。生物系决定全系办一个大型综合农场，按生物系的专业，农场将分粮作物场、植物园、果树园、畜牧场、鱼场。办工厂也是“大跃进”的办法，物理系和化学化只用三天三夜的时间，就建成了一个无线电厂和一个物理化学工厂，这两个工厂称已制造出第一批新产品，其中48对的热电堆已超过国际水平。根据武大党委《关于我校

教育革命运动的报告》，从6月底到7月底全校共办工厂138个、农场8个（后调整合并为33个）。

在前面两个阶段“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开始了教学课程改革，提出新的行动口号：“把教育革命推向新的高潮，争取门门课程插红旗。”内容包括制定新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采取三结合的方式，即在党的领导下，教师和学生相结合的方式编写教学大纲和教材。具体做法是“摆擂台”，教师和学生背靠背准备，然后双方提出报告，面对面开展辩论评比。评比的结果，往往是学生编写的教学大纲和教材被认为胜过老师。其是认为。一是学生思想解放比较彻底，政治挂了帅；二是学生亲身参加了生产劳动，取得许多实践知识；三是学生发扬了民主。而教师则被认为只会照搬几本参考书，关起门来抄书。

最后一个阶段是半工半读。半工半读首先在化学系试行。对半工半读，学生存在很多疑虑，认为这会降低教学质量，但这种担心被作为落后思想受到批判。学校提出，要根据教学、科研和劳动锻炼的要求，调整生产体系，强调与专业结合，并联系尖端科学的研究；把试验室一律改为生产单位，给以生产任务，所有生产单位建立起产、供、销的管理制度；文法科则以下乡下厂为主，一面教学，一面劳动锻炼。根据半工半读的要求，改革教学机构、制度和办法，在各系改组教研组成立结合小组，理科把工厂交给教研组成立结合小组管理，文科的农场和工厂仍由系里管理。教学方法确定课堂教授、整风学习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提倡在教学中走群众路线。

1958年9月12日傍晚，毛泽东亲临武汉大学，参观了

化学系和物理系办的 7、8 个“小土群”厂，有炼焦、空气电池、硫酸、硅胶、卡普隆、炼铜、砂钢片等，这些厂的厂长大都是二、三年级的学生，他对学生和学校当局大加鼓励，肯定了大学“半工半读”的办法。这次参观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十天后，9月23日，《人民日报》报导了武汉大学实行半工半读的情况。报导这样描写了武大校园的情形：

走进珞珈山区，远远可以看见成群的厂房，机器的轰鸣响彻山头，年老的、年轻的教师和学生辛勤的劳动着。昔日幽静沉闷的学府，今日成为人人参加生产劳动的生气勃勃的学校和工厂区了。在这里，有着生产钢铁的钢铁厂和围绕着发展钢铁生产而建立的成群的工厂，形成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也有着密切结合各种专业而建立的化学工业体系、无线电工业体系、原子核工业体系，等等；还有着文、史系举办的铁工厂、木工厂等。这些工厂每天都进行生产。但人们知道，实际上，产品合格者不多。

据《光明日报》7月21日社论，武汉大学在教学为政治服务，教学结合劳动生产等方面都取得良好的效果。社论指出，“武汉大学教学改革所以能取得很大的成绩，还在于坚决地相信群众的多数，相信群众路线一定胜过专家路线。”“依靠专家办学，还是依靠党、依靠群众来办学？现在武汉大学教学改革所造成的新局面，令人信服地证明党在教学上完全能够领导，而且领导得很好。”社论还得出结论：“武汉大学经验证明，党能够领导教育和科学研究。外行可以领导内行，这是一般规律。”

在武汉大学的教育革命中，并不是没有不同声音。数学系党总支书记齐民友就对当时的所谓“教育革命”提出一些

不同看法，对当时广泛宣传的教育方针表示了异议。因而引发了武大的“拔白旗”运动。

在关于“数学能不能联系实际”的问题上，齐民友认为，数学有它的特殊性，联系实际首先要懂得生产，或者是物理力学。如果只懂得一些数学的话，去联系实际是很困难的，这一点与物理、化学系不同；其次，现代数学的产生是和大工业相联系的，数学要联系实际，就要联系尖端。理论联系实际、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在数学系不太好搞。比如到现在为止，工厂很少向数学系提出问题来。第三，数学中不是每一个分支都能联系生产。有些分支能够直接跟生产相联系，如计算数学，微分方程，但有一部分诸如抽象代数中的一些问题并不是直接为生产某一种需要而产生的。数学的构造好像金字塔一样，塔的底层和中层直接或间联系生产，但他的顶端有些数学的抽象分支是不能与生产联系的。

在“数学能不能走群众路线，办学靠谁”的问题上，齐民友认为，数学是一门严格的科学，只有经过按步就班、严格训练才能掌握。因此，数学领域谁最有知识，谁最有发言权。

齐民友的意见得到一些人的赞同，他们都对片面的机械地把理论联系实际简单套用到数学教学表示了异议。有的学生认为：“关于数学如何发展的问題，不懂数学的人是无从谈起的。”还说：“关于数学的发展和联系实际的问题，这本来是数学家的事，党只能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进行领导。”

这样一些不同意见，虽然不合“大跃进”的时宜，立即招致严厉批判。教学系400多名师生组织了40多个辩论团，系、年级、班共开大小辩论会100多次，称之为“百团大



战”。说是辩论，实为批判。齐民友被指责为“一面资产阶级帅字白旗”，“资产阶级‘专家’代表”，在数学改革中反对党的教学方针、办学路线和办学方法，坚持资产阶级教学观点，走着资本主义老路。批判者说：齐民友是党内“专家”，又是党委委员兼总支书记，党内外对他的迷信也很大；他的思想观点和他的一套作法不但受到资产阶级专家们的欢迎，而且也为一时迷信他的青年学生所拥护。这样，就在数学系形成一种与党相对立的齐民友思想，这种思想象一阵巨风，席卷了整个数学系。批判者还说：齐民友走的是专家路线，否定党在业务上的领导，看不起广大群众，这是根本错误的；那些所谓最有知识的资产阶级专家，只能使理论脱离实际，使数学系背社会主义之道而驰。

一顶顶“否定党的领导”、“背社会主义之道而驰”、“反对党的教育方针”、“走资本主义老路”的帽子，几置被批判者于死地，除了低头认“罪”、俯首就擒外，别无退路。齐民友不得不作自我检查，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用各种论据维护了资产阶级教育体系，与党的教育方针相对抗。”（齐民友：《检查我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一个赞同齐民友观点的学生在检查中说道：“这些论点经过集中火力的攻击，跨台了，连我们自己也不信了，我们失败了，但我们也胜利了，因为我们战胜了资产阶级的一套，找到了前进的正确道路。”按批判者的说法：“经过20多天的激战，真理终于胜利了，反对理论联系实际派的论点被彻底地粉碎了。（引自《驳倒数学教学的唯心论》，《人民日报》1958年8月20日）

这场被称作“百团大战”的大辩论，在《人民日报》作

了公开报导。《人民日报》8月20日为此发表评论员文章《拔掉教育战线上的白旗》，文章说：“武汉大学在拔白旗的斗争中集中批判了以党委委员、数学系总支书记齐民友为代表的党内外不少专家一套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这些具有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专家，认为数学是一门抽象的科学，有它自己特殊的发展道路，不能联系实际，有的教授甚至公开讲，数学也要联系生产、联系实际是毁灭数学，不是发展数学。因此，他们归纳数学发展的道路，只能是实践、理论、理论，或者是理论—理论—理论。陷入主观唯心主义而不能自拔。他们认为：党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不能领导数学系，也无权过问。在武汉大学党组织的领导下，政治挂帅，展开了两条道路的斗争，真理愈辩愈明，群众觉悟提高，思想解放，终于拔掉了教育战线上资产阶级白旗，插上无产阶级红旗，在数学系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出现了社会主义大跃进的新气象。”文章指出：“我国教育事业要走社会主义的路线，还是走资本主义路线？走专家路线还是走群众路线？这是一场尖锐的严重的斗争。从武汉大学最近开展的教育方针大辩论、拔白旗斗争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个斗争说明，必须坚决克服右倾思想，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办学方针，使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两条道路斗争，拔掉白旗，插红旗。党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贯彻，必然会遇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抗拒和抵触，这不仅是思想斗争，也是阶级斗争；这个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武汉大学拔白旗的斗争就充分说明这一点；”“这个斗争也说明了，必须加强党对教学的领导，把资产阶级思想的老根子挖掉，坚决走群众路线，反对专家路线。

思想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然去占领，没有也不可能有真空地带。”文章还提出：“所有高等学校必须放手发动群众，拔白旗，插红旗，展开两条道路的斗争，保证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切实贯彻，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从此，全国各高校掀起更大规模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武汉大学更是走在这场运动的前列。数学系的“拔白旗”经验，迅速推及全校，全校范围内都展开大辩论，纷纷找各系的“白专典型”予以批判。物理系开展大辩论，分“大鸣大放”、“大争大辩”、“拔白旗插红旗”三个阶段进行。据物理系党总支负责人的总结：拔掉的白旗占参加运动的学生总数的13%，灰旗占3.3%；在灰白旗中团员占63.7%，在白旗中团支委、班委以上干部8人，占15%，运动中撤换了有严重右倾情绪的团支部书记3人。红旗学生的力量迅速增长，开始时只占学生总数的13%，后来占到40%。“拔白旗”还特别重视“白旗”的阶级成份。物理系党总支负责人总结说：该系被拔掉的白旗、灰旗，剥削阶级出身的占52%，反革命家庭或亲属被杀、关、管的占10%，本人被划为中右或漏网的右派占18%。化学系党总支号召党、团员带头向资产阶级教学思想宣战，团组织以课程为单位成立了20个战斗司令部，提出的口号：“苦战七昼夜，攻下资产阶级的最后堡垒，不放过一个问题，不漏掉一角落。”由此可见，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各种名目的“造反司令部”，其名称还真有点历史渊源。

时任武大党委第一书记、副校长刘仰峤在《一场富有教育意义的大辩论》的文章中说：“现在在数学系社会主义教

育新方针的辩论已经结束了，数学系要走什么道路定下来了，但如何具体贯彻执行新的教育方针，仍然还会有尖锐复杂的斗争。”刘谈到这场辩论的三个“教训”：一是要特别加强对党内专家的思想工作，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二是理科的理论部分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肃清唯心主义的问题，理科理论课的指导思想主要的还是唯心主义，如何在理科理论课中确立马列主义的思想还是一个严重的；三是参加生产劳动要成为人人都上的一门必修的课程，下厂下乡要作为人人都上的一门必修课程，对教职员工除继续贯彻下放劳动锻炼的方针外，还必须在校内和学生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并要有计划的和学生下乡下厂接触实际，参加劳动。

武汉大学的“拔白旗”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全校共有391人在“拔白旗”运动中受到批判，其中教师84人，约占教师总数的14%；教授、副教授32人，占其总数的40%；讲师19人，占其总数的30%；助教33人，占其总数的7%，学生305人，占当时在校学生总数的9%。1962年1月式大党委在《“拔白旗”甄别工作总结》中承认，“拔白旗”运动基本是搞错了的，首先是政治界线 and 政策界线不清，不明确红白问题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把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生活作风等问题一锅煮了。虽然当时把白旗当资产阶级思想来批判，便一概扣上白旗帽子是不对的。其次是方式方法简单粗暴，大会、小会批判，大字报、小字报、黑板报、画漫画、演话剧，等等，压力大，没有充分说理，一味强制压服，甚至把三反和反右派的那一套做法都搬出来了，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加深了隔阂，使人际关系更加紧张。第三，批判以后不了了之，没有什么

善后工作，没有负具体责任的人。

《总结》说，“拔白旗”运动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引起了党群关系、师生关系、青老关系、干部关系的紧张，受批判的人思想不舒畅，影响了工作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民主空气不活跃，一些人不敢讲真心话；助长了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化，工作作风缺乏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生物系戴伦焰教授被“拔白旗”后，十分消沉，说“几年来对我精神刺激最大的就是拔白旗”。中文系教授胡国端的讲义被说成是从头至尾“贯穿一根黑线”，全系师生开了几次大会批判，胡认为自己受批判后好似“惊弓之鸟”，缩手缩脚，顾虑重重。物理系教师保宗梯、周如松（周鲠生校长的女儿，1936年毕业后即留校任教），被拔白旗后，感到“前途暗淡、希望不大”，想离开武大，对工作漠不关心。教研室主任找周如松商量工作，她只用点头表示自己的意见。保宗梯则很少发言，偶尔发言遭到否定就不敢再坚持。物理系一个叫肖子平的学生，因为听到团支书批评有人劳动不好，说“有些人不自觉革命，会自绝于人民”，以为是说他，夜晚梦中惊叫，整天愁眉苦脸，心事重重。《总结》说：所有这些都影响了党的政策的深入、正确地贯彻，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给党的工作带来较大损失。“主要是对待党的政策态度不严肃，学习不够，领会不深，掌握不准，因而在贯彻教育方针、知识分子政策、双百方针方面出现了过‘左’的偏差，强调劳动重要，忽视了以教学为主；强调红，忽视了专；强调了斗争，忽视了团结；强调了批判，忽视了继承；在学术问题上强调自由争论，互相探讨不够，往往主观片面地理解党的政策。”

当年的甄别平反还是有很大保留的，认为“拔白旗”运动的目的是为了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教育战线上开展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即便如此，在甄别平反时仍指出了这些运动的种种过火问题，可见“拔白旗”运动造成的后果之严重。

## 新民歌运动

几乎与工农业“大跃进”兴起的同时，文艺界也展开了“大跃进”。

南宁会议之后不到一个月，中国文联及各协会、各研究会分别召开会议，讨论进一步发展文艺创作以适应全国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会上，不少作家、艺术家发言，以表示对“大跃进”的热情。老舍说：党中央指出，对各种建设事业成效的估计，应该是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我们文艺创作也应该这样。1958年是“二五”计划的第一年，又是建国9周年的前一年，文艺界一定要有一股热情和干劲，拿出一些较好的东西来，欧阳予倩说，剧作家应当多写，题材、风格要多样，在艺术创作上也要力求多、快、好、省。赵树理批评文艺界为工农兵服务太不够了，应当切实改变文风，使新文艺作品真正能够接近老百姓。周扬说，要文艺创作来一个大跃进，就必须使它在更大规模和更深程度上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作品不但在量上而且在质上都能突破过去的水平。为此，文艺工作者必须坚持下乡、上山、下厂、下部队，长期和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这应成为我们对文艺工作

的根本方针。周扬还希望下乡文艺工作者除积极参加体力劳动以锻炼身体外，还应尽力帮助当地群众提高文化和进行业余艺术活动。作为全国文联副主席，作为主管文艺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讲话虽然带有号召性，它绝不只是周扬个人的意见，而至少反映了党的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主张。

文联的这次会议推动了文艺“大跃进”的展开，不久以后，中国作协向全国的作家发出了题为《作家们！跃进，大跃进！》的一封信。

信中充满激情地说道：“六亿人民的社会主义大跃进的高潮已到，人人兴奋，个个当先，随时随地出现奇迹。一天的奇迹就够写成许多部史诗、对剧和小说的。作家、理论家、翻译家同志们，我们怎能不高兴，不狂喜，不想变成三头六臂，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双管齐下，快马加鞭，及时报道，及时歌颂，鼓舞更大的干劲，叫前人所不敢梦想的每一天，一小时，每一分钟，都实现在我们眼前呢！”这封信要求作家们：“修正补充原定计划，把量力而为，从容不迫变为全力以赴，即刻杀上前去，叫我们的计划成为作家队伍中的‘急先锋’的计划，每个计划都必须增补上反映和鼓舞当前大跃进的短小精悍的作品若干篇。原定的长篇一定要按计划而行，既快又好，保证质量。同时，也必定写些短的，随时发表。我们舞长枪，也要短棒，不论长短，一概要有所创造。”不仅数量上要“跃进”，而且创作形式上也要求“跃进”。作协的信还特别提到诗歌：“在修正补充原定计划的时候，要注意到：学习新的技巧，充实写作本领，使我们的思想跃进，本领也跃进。没写过诗的，试试看；诗能更快地反映当前现实。没写过歌词的，试试看；全国到处都迫切需要

配合跃进的新歌，大家都唱起来，干劲就更大。写评论的试试创作，创作的也试试评论。同样地，试试相声、鼓词，以至各种戏曲。要叫我们的计划凑在一起就是文学的百货供应总站，要什么有什么，而且具有新的风格，和有普及而提高的特色。”

继文联、作协之后，文化部也很快作出关于促进影片生产大跃进的决定。决定提出，各制片厂必须继续鼓舞群众对大跃进的热情，在电影制片工作中全面的贯彻多、快、好、省的总方针，大力争取完成并且超过各厂的生产计划。为了实现电影大跃进，文化部电影局提出，在摄制影片、放映发行、机械生产等方面，都鼓足干劲，实现大跃进，实现“奋斗三年改变面貌”的口号。还提出了具体的跃进指标：当年摄制的各种影片将较上年增产一倍，甚至一倍以上。当年生产的大型影片（包括艺术片）将达100部，成本降低30%以上；摄制的时间缩短1/3以上；放映场次大大增加，观众人次将达30亿人次，比上年增长10亿人次；电影机械工业生产总产值将增加60%。

推动文艺“大跃进”的，不只是文化部、文联、作协这些专业部门，一些地方领导人也十分积极。《文艺报》曾刊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中国作协武汉分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题目是《作家和生活》。王任重说，作家要下决心到工人农民中间去。还说创作也可以像在农业上、工业上、理论上那样打破迷信，来个大跃进。创作跃进怎样跃进法？同样也是要打破迷信、解放思想、鼓足干劲、发挥创造，不然不能跃进。王说，工人、农民，一面劳动，一面也能写东西。他们自己写自己，写自己周围的同伴，将



来的音乐家、作家、诗人，我看最优秀的、最大量的是他们。（《文艺报》1958年第13期）

在这一要求之下，各地文化部门下达了放艺术“卫星”的指标，于是相当普遍地产生了盲目追求数量和摊派任务的现象。有些地方提出了“消灭空白点和空白人”，要求把小孩和老人都组织到文艺活动中来。湖北应城红旗人民公社几十个老太婆扭秧歌、唱歌，还跳蚌壳精舞。八十多岁的老太婆扮演沙和尚。河北丰润县理弄出了个万诗乡，据下乡干部反映：诗并不全是群众创作的，而是几个下放干部连夜赶出来的；徐水人民公社画的壁画，是花钱从天津请人画的，冒称群众创作因为发动群众写诗，影响业务造成事故的事，我就知道一件：水利电力部北京修造厂的学徒李振宏因值班只顾写诗，延长了开电闸的时间而引起火灾，财产损失达70万元。

文艺“大跃进”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当时的新民歌运动。“大跃进”中出现了很多个“全民大办”：“全民大办水利”、“全民大办钢铁”等等，在文艺方面还应该提到“全民做诗”。所谓的“诗”，其实是些充满政治气氛的标语口式的顺口溜，叫民歌都勉强，更说不是诗了。可是当年为了体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为了鼓起群众的“大跃进”干劲，也在广大群众中号召做诗，兴起了一个“新民歌运动”。

这种新民歌最早是出现在1957年冬至1958年春的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中。我在《农业‘大跃’的前奏水利化运动》一节，曾经引用过一些。这些生产中的顺口溜，颇为毛泽东所重视。1958年成都会议上他说：印了一些诗（指会议印发的一些古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请

各位同志负点责任，回去以后搜集点民歌。各阶层的人，青年、小孩子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点试办，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搜集。这样，会收到大批旧民歌，下次会印出一本来。毛还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古典。在这个基础，两者结婚产生出第三个新东西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的主义的对立统一。搜集民歌的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民歌，这不费很多的劳力，比看杜甫、李白的诗舒服一些。

于是，成都会议后，搜集民歌的工作立即在全车范围内铺开。许多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宣传部专门发出搜集民歌的通知。4月14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的社论，社论说：“从已经搜集发表在报刊的民歌来看，这些群众的智慧和热情的产物，生动地反映了我国人民生产建设的波澜壮阔的气势，表现了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的高涨。‘诗言志’，这些社会主义的民歌的确表达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尚志向和豪迈的气魄。”社论还引用了几首民歌：“要使九百一十三个山头，一个个地向人民低头”“不怕冷，不怕饿，罗锅山得向我认错。”“笼子装得满满，扁担压得弯弯，娃的妈呀你快来看，我头挑着一座山。”并极为称赞地说：“这些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好诗。在农业合作化以后的大规模的生产斗争中，农民认识到劳动的伟大，集体力量的伟大，亲身地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们就能够高瞻远瞩，大胆幻想，热情奔放，歌唱出这样富于想象力的、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杰作。农民的形象在这些作品中早已不是呼天抢地的杨白劳

了，而是足智多谋的‘鲁班仙’、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以及治水的圣人‘大禹王’。他们否定了曾经世世代代压在他们头上的‘玉皇大帝’和‘海龙王’，而自豪地说：‘我就是玉皇’，‘治水龙王社员当’。他们深信能够使‘万水千山听调动’，使自己家乡的粮食增产的水平迅速地‘跨黄河、过长江’。”社论说：“这是一个出诗的时代，我们需要用钻探机深入地挖掘诗歌的大地，使民歌、山歌、民间叙事诗等等像原油一样喷射出来。”

各地很快就编出了一本本“新民歌”集，因为“新民歌”绝大部分反映的是“大跃进”的内容，因而“新民歌”集子中不少就叫“大跃进民歌集”。为了编这些民歌，各地发动群众编歌“作诗”，当作任务布置下去，甚至规定硬指标，上自六七十岁的老翁，下至八九岁的孩童，人人都要作诗。这里不妨抄引一些“新民歌”：

如今唱歌用箩装，千箩万箩堆满仓；  
别看都是口头语，搬到田里变米粮。  
种田要用好锄头，唱歌要用好歌手；  
如今歌手人人是，唱得长江水倒流。

干劲真是大，碰天天要破，  
踩地地要塌，  
海洋能驯服，大山能搬家，  
天塌社员补，地裂社员纳，  
党的好领导，社员力量大，

钢水红似火，能把太阳锁，  
霞光冲上天，顶住日不落，  
干部能拿梯，我们能上天，  
干部能下海，我们能擒龙，  
干部能翻山，大海我们填。

千条龙，万条龙，首尾衔接上高峰，  
张口喷出江海水，满山遍野响漂漂，  
天干也要吃饱饭，乾坤掌握人手中。

山歌一声吼，万人齐动手。  
两铲几锄头，大山被搬走。

抡起斧头，能把铁山劈开；  
挥动风钻，能把地球钻穿。

说到就能做到，请记住我们的誓言：  
七八年不赶上英国，算不得英雄好汉。

炉膛钢水沸腾腾，条条火龙往外奔  
千度高温算得啥，不及工人火热心。

锤头一举火花溅，奇迹犹如春潮泛。  
一锤一个新记录，五年计划三锤完。

撇开艺术方面的问题不说，仅就思想内容而言，新民歌

大都反映出浓厚的唯意志论色彩，并不是浪漫主义的，而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泛滥。但是“大跃进”中，这些新民歌却受到极大的肯定和推广。

周扬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言，专门谈新民歌的问题，题目就是《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周扬说：“最近，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倡导，全国各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搜集民歌的运动。这是我国目前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周扬还说：“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全国各地涌现出了不计其数的民歌，真是有‘千箩万箩’之多。解放了人民在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所显示出来的革命干劲，必然要在意识形态上，在他们口头的或文字创作上表现出来。不表现是不可能的。大跃进民歌反映了劳动群众不断高涨的革命干劲和生产热情，反过来又大大地鼓舞了这种干劲和热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民歌成了工人、农民在车间或出头的政治鼓动诗，它们是生产斗争的武器，又是劳动群众自我创作、自我欣赏的艺术品。社会主义的精神浸透在这些民歌中，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民歌；它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纪元，同时也开拓了我国诗歌的新道路。”周扬还展望说：“群众诗歌创作将日益发达和繁荣，未来的民间歌手和诗人，将会源源不断出现，他们中间的杰出者将会成为我们诗坛的重镇。民间歌手和知识分子诗人之间的界线将会逐渐消泯。到那时，人人是诗人，诗为人人所共赏。这样的时代不久就会到来的。”在这里，新民歌不只是被当作鼓舞生产热情的号角，而是被赋予了取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意义。人人能作诗，人人能赏诗，这正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新人”亦工亦农、能文能武的理想。

为新民歌而欢呼的，不仅有周扬这样的党的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负责人，还有闻名中外的艺术家。郭沫若就写了《为今天的新国风，明天的新楚辞欢呼！》的文章，其热情于言表：

民歌民谣在古时候称为国风。

我很喜欢这个“风”字。它把民歌民谣的性质说得很形象化。民歌民谣真象风一样，不知从那里吹来。一下就传遍四方。

因此，今天的民歌民谣，今天的新国风，是社会主义的东风，这风吹解了任何可能有的冻结。人民的心都开出繁花，吐放芬芳。

古时候有过采风的制度。今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也正在大量采风。中国的新国风，将来的首数恐怕要以亿为单位计算。这同时是文艺生产上的大跃进。

我预见到继采风之后会有选风的阶段，从全国以亿计的民歌民谣中每年或每五年选录出最好的三百首。这将是文艺矿藏中的无比珍宝了。

像楚辞是在国风的基础之上创化出来的那样，新时代将会有从新国风的基础上创化出来的新楚辞。

当然，这新楚辞是大欢乐、大和谐的交响曲，而不是像“离骚”那样悲愤的绝叫了。（《中国青年报》1958年4月16日。）

在为新民歌“吹呼”的同时郭沫若对那些持有异议的则予以指责。

在一次接受《民间文学》杂志采访时，他谈到收集民歌时，说：“谁在踌躇不肯收集，那就表明他走的道路有问题”。

可能他们也有些‘道理’，但那是另外一条道路上的‘道理’——‘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我们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用多快好省的方法来采集和推广民歌民谣，不仅不允许‘踌躇’，一定要鼓足干劲！”（《人民日报》1958年4月21日）

郭沫若和周扬共同署名，编了一本《红旗歌谣》，的确是“毫不踌躇”，“多快好省”。其中一首是：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诸如此类的豪言壮语，还有：

“我一头挑着一座山。”  
“莫嫌箩筐小，泰山不够装。”  
“大红旗下逞英豪，  
端起巢湖当水瓢，  
不怕老天不下雨，  
哪方干旱哪方浇。”

当然，的确也有“踌躇”者，也有反感者，不过，在那个年代，大多只能在心里“踌躇”，不能言传，否则会被指

责为“走另一条道路”而惹祸的。不少人即便反感，也还不得不奉命作“新民歌”。聂绀弩的《散宜生诗·自序》中就这样道：

“1959年某月，我在北大荒八五〇农场第五队劳动，一天夜晚，正准备睡觉了，指导员忽然来宣布，要每个人都做诗，说是上级指示，全国一样，无论什么人都做诗。说是要使中国出多少李白、杜甫、多少鲁迅、郭沫若。这个要求一传达，不用说，马上引起全体震惊和骚嚷。但也立刻每人炕头都点上一盏灯，这房里是两条几十人一条长炕，一时自来盏灯点起来，满屋通明，甚至白昼。并且都抽出笔来，不知从何处找出纸来。甚至有笔在纸上划得沙沙作响。但另一方面又几乎全体在嚷不会做诗，及至自己又是文盲半文盲等等。”绀弩还作有《集体写诗》七首，对此一活动作了生动的描述：

整日田间力已疲，下工回屋事新奇。解衣磅礴床头坐，万烛齐明共写诗。

旧诗难做做新诗，一句一行排列之。谁说一遭诗便好，做诗从此奠初基。

笔于纸上沙沙响，气在口中虎虎吹。得句何须皆诗意，集体吟诗事便诗。

人物风流最此时，江山至美占无之。社会主义歌难尽，一夜须吟万首诗。

低头笑向老头儿，我本文盲做甚诗。你替胡诌三两句，明朝任务我完之。

诗人舍你更为谁，枪杆政权豆麦诗。唯大英雄甘木讷，是真风雅不吹嘘。



诗歌只是你家私，藏在胸中白不知。今日文盲勤学习，有朝开口便成诗

当年绌弩奉命写作的那些诗，有些在《散宜生诗》“北荒草”一一集中存留下来。胡乔木在序言中称这些诗为“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

“新民歌”无疑是当时“大跃进”在文艺界的产物。“大跃进”时期刮起的浮夸风、高指标风、“共产风”等，无不在“大跃进”新民歌里反映出来。有这么一首新民歌：

跃进歌儿唱一年，大瓮小瓮不空闲；  
跃进歌儿唱两年，大囤儿流小囤满；  
跃进歌儿唱三年，粮食堆得像高山；  
跃进歌儿唱十年，粮食堆堆超过山；  
万丈高山不能比，粮食堆堆堆上天。

事实上，“跃进”歌儿只唱了一年，粮食就相当紧张了，许多地方发现饿死人的现象。这里讲句玩笑话，如果真要唱上十年，恐怕不会再有能够唱歌的人，而只能够是“万户萧疏鬼唱歌”了。

## 科学“大跃进”

同教育、文艺界一样，科学界 1958 年也卷入了“大跃进”的浪潮。

这年2月，也就是南宁会议大批“反冒进”之后，中国科学院在北京举行各研究所所长会议，部署科学工作大跃进。院长郭沫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号召科学工作者拿出吃奶的力气来，促使科学大跃进。郭沫若说，过去的两年为科学技术大跃进作了许多准备工作；；国有第一个五年计划已超额完成，为科学技术提供了更好的装备，国家对科学事业发展的需要已经大大增加，现在科学工作者不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而是地无用武之英雄了！

会上许多人都发言认为，科学工作和工农业生产一样，完全可以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来一个大跃时；同时强调科学工作者的思想跃进是科学跃进的前提，科学大跃进的关键在于科学工作者的思想改造，而老科学家的思想改造尤其重要。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赵九章说，科学家从前想的是“我”为中心，而现在应该是以集体为中心。过去有人虽然口头上是为社会主义，而实际上还是以“我”为中心。这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新旧道路的斗争，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跃进。钱学森说，办一切事业的最好办法，包括科学研究在内，是发动大家，依靠大家。怎样发动大家，是一个不易做到的问题。因为我们中间还有个人打算，这样就会把劲头用错了地方。生理生化研究所所长冯德培认为。把心交给党是解决科学大跃进中事切困难的法宝之一。钱学森说，如果每个人把心交给六亿人民，那末每个人的力量就等于六亿人民的力量！

就在会上，不少研究所负责当场便提出了本所的跃进目标。光学精密机械仪器研究所副所长龚祖同提出：“苦干五年，争取提前两年（即在八年内）在光学精密机械仪器的主

要方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石油研究所所长张大煜表示，在五年、七年之后，我国在页岩油、水煤气合成石油生产将远远超过英国、西德和美国，这两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自然也应达到国际水平。

会后，中科院各研究所普遍动员起来纷纷制定跃进计划。5月15日，中国科学院向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报告了全院的跃进计划，包括24个方面的任务，其中直接为工农业等国民经济服务的就达18项之多，还有4项明确提出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一些科学也纷纷表示决心。在上海的17位科学家向中国科学院全体高级知识分子提出倡议，表示：在今日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我们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工作者，深受鼓舞。我们有决心要做左派。不仅在政治生活中是左派，在科学研究中也是左派，在生活作风上也是左派。我们要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指导科学，我们要以共产主义人生观对待生活。倡议书提出了把自己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5条措施，还提出了口号：人人争取，各自规划，平时互助，年终评比，步步向左，力求红透。

八大二次会议后，6月3日和5日，中科院北京地区各研究单位举行跃进大会，响应八大二次会议号召，庄严誓师，“以排山倒海之势发起向世界科学高峰的大进军”。参加大会的有在京学部委员、各所工作人员和外地单位负责人共1800人。各单位在这次大会上提出的指标比不久前在各学部跃进会上提出的指标又有提高，而且互相挑战，彼此竞赛，指标一再跃进。

自动化研究所保证在五年之内，和其他部门密切协作，解决三峡综合自动化的主要技术问题；在自动化工业生产方

面，搞出一套最新颖的仪表和自动化技术工具的标准化和系列化。地质研究所决心把原定十年完成的 34 种稀有元素的研究提前完成，在石油地质的研究上赶上世界先进目标。水利科学研究院要在最短期间提出小河流水文计算必需的资料和方法，做到哪里有水利工程，哪里就有水文资料和方法；这个院的力学所弹性力学组还提出，为配合黄河、长江等水利工程的兴建，在水坝抗震的研究上在不久的将来赶上世界最先进的国家。生物学部昆虫研究所除在学部跃进会上提出的目标外，又增加了几项新指标：提前一年完成六六六水稻内吸作用和杀螟毒效的研究；再提前一年在两年内完成全国粮食昆虫区的调查，立即提出综合防治棉虫的方案。植物学家决心在三年完成下列指标：制定固沙方案，防止沙漠南移，保护农田；提出变荒漠为良田的方案；把草原地区牧草产量提高 3 至 10 倍；提出合理营造腰林带的方案，利用融雪。动物学研究所动物形态学组决定大力研究器官与组织的再生和衰老问题以及神经系统与内分泌器官的关系问题，满足人类延长寿命的愿望。

《人民日报》报道，就在中科院各研究单位提出跃进规划的同时，最新的捷报已经纷纷传来。地质研究所的青年研究人员向大会报喜，该所中心分析室经过跃进，已经把每个岩石标本分析的时间由过去的九天缩短到现在的一天。化学研究所的青年工作人员突击 13 个昼夜，已将一向视为神秘的 11 种稀土元素提取出来，而且光谱纯度一般达到国际水平，其中钬的光谱纯度超过了英国名牌约翰逊厂的产品。应用物理研究所在大会期间奋战一天，做出了认为要几年才能做出来的六十五周兆一百毫瓦的高频晶体管，比长仪、低错

位的锗单晶、纯度达五个九的铽等达到国际水平的东西来。

6月，中科院党组根据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号召，向中央提出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十年赶上美国问题向中央的报告》。报告提出10年内做到三件事：一、掌握新技术，重点项目是卫星上天和原子能和平利用；二、促进国民经济的科学化，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解决中国工业、农业、交通和卫生事业中重大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三、培养和建立一支有四五十万人的又红又专的科学干部队伍。

距中科院跃进誓师大会不到一个月，7月1日至5日，中科院机关党的第二届代表大会召开，院属43个单位向党的生日和机关党代会献礼972项成果，并称其中107项已经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应用物理研究所、化工冶金研究所的代表在大会上介绍了各自的大跃进经验，这些经验都特别强调了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自卑感、大胆地想、大胆地干和群众路线。大会提出了五项原则：以政治带业务，以红带专；继续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走群众路线；组织科学工作大跃进；有节奏地组织跃进运动，一浪推一浪地前进。中科院机关第二届党代会，将科学界“大跃进”形势推向一个新高潮。

科学“大跃进”实际上其主要方面表现为违背科学发展规律，人为地追求高指标，又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于是就出现了不实事求是的浮夸风。例如：1958年7月，全国科联和北京科联组织首都科学家与湖北、河南、浙江、江苏、河北、安徽、陕西等省及京郊30多位农民，在北京东城南河沿文化俱乐部举行丰产座谈会。中宣部一位负责人到会讲话，提出：科研单位要同农民开展种高额丰产田的竞赛，如

果竞争不过农民，就要摘掉科研单位的牌子。在这种压力下，根本不容许讨论，中科院生物学部和农科院被迫仓促上阵应战。生物学部组织了小麦、水稻、甘薯、棉花四个小组，进行丰产试验田的竞赛。此事《大放农业高产卫星满天飞》一章中，已加叙述。

“大跃进”的“左”倾错误，给科学事业造成了许多失误并带来了严重后果。应用物理研究所提出若干天内做出80K的超导体，其实根本不可能，但是低温学家却毫无发言权。在全国号召“大办原子能和加速器”的影响下，中科院很快成立了7个这类研究所，结果后来只有上海原子核研究所能够维持下来。这种高指标、浮夸风和瞎指挥，还造成人、财、物力和时间的巨大浪费，科学研究的政正常秩序被打乱，人们的思想也陷入混乱。

中科学“大跃进”中，各地科研机构急剧膨胀。在科院在各地大部分分院以所谓“边建、边干、边学”的“三边”方针，新建了一些研究所，但是26个分院中有一批分院中没有一个是高级研究人员，多数机构只拥有少量大学生和中专生，大部分是中学生；许多分院研究所竟没有一个专职所长；有的分院是先挂牌子，但没有研究机构，很少能开展正常的研究工作。

更重要的是，在“大跃进”中，由于“拔白旗、插红旗”和批“资产阶级白专道路”，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科研人员、特别是其中的专家、学者受到错误批判。至于在“大跃进”中，一些正直的科研人员对种种违反科学的做法提出意见，更是遭到打击，伤害了许多知识分子。这是“大跃进”造成的更严重的后果。

科学家坚持真理，为麻雀平反而取得胜利，这是当年很少有的事件，值得回顾。《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年第3期《关于消灭麻雀以及为麻雀平反的历史回顾》一文（作者薛攀皋）记述了此事。

在《1956年到1967年全车农业发展纲要》（即“农业40条”）自起草到公布过程中，第27条“除四害”始终有争议。原来草案规定：“除四害，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于是麻雀被定性为害鸟，判处极刑。1956年10月中国动物学大会期间，有关麻雀问题的讨论中，以实验生物学家朱洗为首的一批鸟类、动物学家，表示不赞成将麻雀定性为害鸟，认为麻雀虽有食谷为害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园林果木中害虫的天敌，他们广征博引，举出国外许多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事例，认为麻雀益多害少。朱洗还举出国外这样一个例子：1774年普鲁士国王曾下令消灭麻雀，捕杀有奖，几年中，麻雀捉光了，而各地果园却布满了害虫，果子灭绝，树叶也光了。国王于是不得不收回成命，还得从国外运回麻雀种。

有些生物学家继续在报刊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周建人等认定麻雀为害鸟，应予消灭。动物学家薛德靖、张作人等则认为，麻雀在农业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能作为捕灭对象，可作为控制对象。专家们呼吁，这条规定暂缓执行，等待调查研究后再定。

1957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公布的《纲要》修正草案，麻雀仍被认为是四害之一，第27条内容则修改如下：“除四害。从1956年起，在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

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可是草案公布后，不少城市反而更加大张旗鼓，开展全城男女老少围打麻雀的群众运动。上海市于1958年发动了两次打麻雀大战。第一次4月27日至29日，灭雀88,171只，雀卵265,968只；第二次12月13日、14日，灭雀598,001只。北京市于1958年4月19日至21日，号召全城“苦战三天，彻底消灭麻雀”，真是人人上阵，投入“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战斗”。

于是朱洗和生理学家冯德培等，继续为麻雀鸣不平，谴责上海等城市不遵从修性后草案的规定。可是毛泽东还是坚持要消灭麻雀。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谈到农业纲要40条的修改时，讲了麻雀问题。他说：有人提四害不行，除四害放松了，还要搞，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

1959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上交了一份“关于麻雀问题向主席的报告”，其中反映关于麻雀问题科学家大体有三种意见。一、麻雀是益鸟还是害鸟，国内外科学家意见不完全一致，一般都认为时空不同，益害也不同。二、有些科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提消灭麻雀。三、许多生物学家认为修改后的第27条比较合适，但有些城市没有很好执行这些规定。“报告”附《有关麻雀益害问题的一些资料》，包括外国关于麻雀问题的几个历史事例，目前国外科学家的一些看法，我国科学家的一些看法共三部分。11月29日，这个报告作为中央杭州会议的文件，毛泽东印发各同志。

1959年12月29日和1960年1月9日，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召开了两次麻雀问题座谈会。3月4日，由农业、林



业、卫生、粮食等有关部委和中科院有关所等 11 个单位代表组成的“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成立，由生物学部主任童第周任小组主任。4 月 11 日至 13 日，在北京举行了全国麻雀研究工作会议。就在会议召开前夕，毛泽东终于为麻雀平反了。3 月间，他在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写道：“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随后，4 月 6 日，谭震林在全国人大第二次全体大会作有关农业的报告中谈道：“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纲要所说的除四害中，应当把麻雀改为臭虫。”这次大会对农业发展纲要唯一修改之处，就是麻雀问题。麻雀终于得到了平反，彻底翻了身。应当说，这是“大跃进”狂潮中，少数生物学家敢于顶住逆流而取得的一次胜利。

朱洗 1962 年病逝了。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没能逃脱灾难，被扣上“公开反对毛主席，把毛主席消灭麻雀同封建帝王灭雀类比”等罪名，受到了挖坟、砸碑、曝尸的惩罚。粉碎四人帮后，朱洗冤案才得平反。

当然，“大跃进”期间，科学技术工作也有一定发展，在历史上也留下一定的正面影响。如半导体、电子学、计算机、自动化等学科在 1958 年以后发展比较快。一些重大的科研项目是在 1958 年提出并开始工作的，第一个人造卫星和人工合成胰岛素的设想是 1958 年提出的，原子弹、导弹的很多研究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同时，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获得了重大成果。除了计算机、半导体等四项新技术外，高温合金、特殊化学材料、超纯金属、超纯分析、高能燃料、水声、稀有元素地质、高空物理、地球化学、微

波技术、爆炸力学、新型光学仪器等领域是这个时期新开辟的。在这些研究中，获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如高效能炸药、真空阀门、高温涂层、氟有机塑料、顺丁橡胶、大功率微波电子管、大文望远镜、大型经纬仪、硅半导体器件、攀枝花矿石冶炼，等等。不过，同严重的后果比较起来，科学技术这些发展是有限的。

防治血吸虫病是当年卫生工作大跃进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毛泽东为此事写有两首七律，更显得轰轰烈烈。

浙江嘉兴地区防治血吸虫病的情况，地委书记在一篇文章里说：

“我们向血吸虫病作斗争已有两年多的时间了。前两年共治疗七万病人，今年春季三个月共治疗四万五千病人，而4月份一个月治疗了十五万五千病人。按月份比较，4月份相当于前三个月的七倍相当于前两年三十六倍。”

这样大幅度地增长是怎样发生的呢？地委书记的这篇文章说，在大跃进之前：

“那时医院都设在城镇上，都摆出大医院的架子，都没有病房病床和病人膳食，一套陈规旧习，特别是长程疗法和休养时间至少要三十天，影响生产，花费很大。每个病人平均负担二十七元，农民很有意见。今年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医务人员的工作方法和思想作风也来一个大翻身。目前一般都用二、三日疗法，共需六、七天，就可以恢复劳动，时间短，花费少，病人负担只有一点八元。”（1958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这并不是浙江嘉兴一地的做法。从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

病九人小组负责人的一篇文章中，可以知道全国都是如此做的。文章中说：“

“以前有些医学专家死啃着二十天的长程疗法，硬说‘推广三天短疗法会多死人’。经过第四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会议，采取鸣放、争辩的方式，扫除了某些专家的保守思想、个人权威思想和教条主义的思想障碍，于是三天疗法在今春得以普遍推行。”（1958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1958年6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报道了江西省余江县已经根除血吸虫病的消息，并配发社论《反复斗争，消灭血吸虫病》。社论宣称：“今年头五个月，在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上，打了一个大胜仗。五个月取得的成绩，使观潮派不得不认输了。事实告诉我们：安徽省已有十一个县市基本消灭钉螺，全省血吸虫病流行区基本管好粪便，治疗病人也完成指标的40%以上。湖南省预计在六月底可将全省已发现的二十万病人治疗一遍，并计划进一步复查和治疗复发病人。浙江省收治了三十五万余名病人，达到原订治疗六十万人的指标的58.3%。”

余江县的消息使毛泽东兴奋异常，“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写了两首七律，第二首是：“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可以看出他欢快心情。

当年报纸上宣扬二日疗法、一日疗法的成绩的文章和报道不少，如果细看，写的都是治疗了多少病人。并没有写治愈了多少病人。现在已过去三四十年，据卫生部门的材料，一些当年宣布根绝了血吸虫病的地区，仍有发病的报道。

## 第一次郑州会议

“大跃进”时期，中央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我大都参加了（到1959年庐山会议为止）。唯有两次郑州会议没有参加（北京工业系统的人都没参加）。两次会议的情况，尤其陈伯达挨批的情况。田家英同我谈过（田也只参加了第一次会议），从而得知毛泽东当时思想的变化。这两次会议同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有关。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参加者为主管农村和地方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各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委第一书记。这时，距提出“大办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的北戴河会议，只有两个半月时间。可是，时间虽短，“乱子”却颇多颇大，正如毛自己所说：“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十年总结》）。因此，第一次郑州会议及以后的一连串会议，都是为解决“乱子”而召开的。

“乱子”首先出在农村。北戴河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之后，全国农村一片沸腾，人民

公社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各地竞相办社，且越办越大，有一县几社甚至一县一社的。据中央农村工作部9月30日发出的简报，至9月底，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有12个省、市、区100%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10个省、区已有85%以上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4个省、区（浙江、贵州、宁夏、新疆），在国庆节前也可基本实现公社化。只云南一省计划在十月底完成。全国已建起人民公社23384个，加入农户112174651户，占农户总数的90.4%，每社平均4797户。据11个省、市、区7589个公社统计，5000户以下的社有5287个，5000户至10000户的社有1718个；10000至20000户的社533个；20000户以上的社51个。在河南、吉林等13个省，有94个县以县为单位建立了县人民公社或县联社，据此，中央农村工作部宣布，全国基本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而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一个多月光景的“成绩”，用当时的话，就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刚刚经过三年不到的合作化高潮的6亿中国农民，几乎一夜间，又突然“公社化”，变成人民公社社员。对全国几亿农民说来，恐怕不仅不是当时铺天盖地宣传的“人民公社好”，而实际是很大程度的茫然无措和忐忑不安。

这时，全国上下真是为一种似乎即将实现共产主义的热烈气氛所笼罩。先是“大跃进”鼓起的“浮夸风”，使各地农村竞放“高产卫星”。为了培植“共产主义因素”，柯庆施率先提出“吃饭不要钱”的口号，于是放开肚皮吃饭”成了时髦，成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感。8月上旬，毛泽东到徐水视察，听说该县当年要收11亿斤粮食，平均每人3500多斤，非常高兴，曾问县委书记张国忠：“怎么吃得完那么多

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并即指示研究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其实，徐水当时粮食亩产平均不过 200 多斤，工农业总产值不过人均 130 元，人均收入仅在 60 元左右，很难谈得上解决了温饱问题。9 月中旬，毛视察安徽省，在听到舒茶人民公社已实行吃饭不要钱时，就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公社也应当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可以不要钱了。

当然，毛泽东更关心的还是人民公社这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组织形式。他在视察山东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他还多次说过，人民公社的优点是，一曰大，二曰公。陈伯达曾根据他的想法，对人民公社作出解释，称我们的方针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形成共产主义的雏型。全国第一个打出人民公社招牌的河南省遂平县嵒蚜山卫星人民公社，在其办社《简章》中说：“各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在已经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公社公有。”徐水的县委书记张国忠唯恐落于人后，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宣布：“什么叫共产？共产就是大车、牲口全部归公……除了生活用品和存款是自己的，其余都是公有的，这就叫共产。”“共产共产，越共越好，一共就富了。”在中央、省、地委来人的帮助下，徐水于 9 月 15 日宣布成立“人民总公社”，实行县社合一，并宣称在 1959 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

1963年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山东的范县更加后来居上，干脆对外宣布，他们将在两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

在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中国农村，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当人民公社化运动初起时，他们实质上只能以一种小农经济的狭隘眼光来构想共产主义，他们所能想像的共产主义，也只不过是历史上中国农民平均主义的翻版，即所谓“我的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有人称之为“私有化的普遍化”），绝不可能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对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解；就社会体制、道德水准等而言，他们的理解也远不及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康有为的《大同书》。这也就是说，他们都不过是以一种狭隘的小私有制为基础的眼界，来构想眼前的共产主义的。这就造成了一方面是轰轰烈烈的“群众性人民公社化运动”，另一方面是破坏性非常大的“共产风”。当时许多农村干部迫于压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也有相当多作风品质不好的干部投机取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共产风”便愈刮愈烈。

由于毛泽东在“大跃进”发动的过程中，曾一时同这种上下结合的群众性的盲动，发生过强烈的共鸣，自己也处于非常亢奋的状态，他对那些所谓“共产主义萌芽”的东西，抱着十分欣赏的态度，他本人就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概念的倡导者。因此，在“大跃进”高潮的几个月中，社会思想是相当混乱的，不仅有农村人民公社的化私为公，劳动生活军事化，公共食堂以及供给制、破除等级观念等等，而且有的城市已开始办起人民公社，甚至谣传取消商品货币等。总之，人们生活在热火朝天、似梦非梦之中。

与此同时，北戴河会议后的大炼钢铁运动，成了一切社

会经济生活的中心。顿时，神州大地白天红旗招展，夜间灯火通明，元帅升帐，挤乱甚至挤掉了正常的工业生产，及有关方面的安排，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全面紧张，尤其在9月份之后，为了保钢铁指标，全国参加炼铁、炼钢人数，从几百万人猛增至5000万、6000万，最多时达到9000万人，以致出现“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的局面。从而使粮食、棉花的收成受到很大损失。

几个月轰轰烈烈的“大跃进”下来，其弊端已经充分暴露。首先是农产品收购任务远未完成，至10月底，国家粮食库存减少140亿斤。为此，中央不得不于10月22日发出紧急指示，要求突击收购和调运农产品。由于高征购和共产风，1958年冬，一些地方即发生公共食堂停火，社员外出逃荒乃至饿死人现象（如山东馆陶县等）。工业方面首先表现在电力等能源无力承担巨大的负荷。前面说过，1958年6、7月间，我在参加华东协作区开1959年计划会议时，就向毛写信“泼冷水”反映过电力不能适应这种“大跃进”形势的问题，包括发电设备在内的机械工业的发展，要比炼钢困难得多。直到12月武昌会议时，毛泽东才找我谈话，对我信中所说的内容，比较能接受了。

有些“过火”的东西，毛当时是感觉到了的。这倒不是因为“过火”行为和情绪在他看来是多么坏的东西，而是因为这些东西比他自己的想法冒得太多，有些甚至出了“格”，也就是说，连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最基本常识都太违背了，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从历史上考察，任何大的运动，任何大的革命性“突变”，在毛泽东看来，不出“乱子”倒不是正常的；他认为“乱子”并不代表整个“运动”的方向问题，



也不说明整套方针、政策有错误，而是有些人想“急急忙忙往前闯”，做得“过火”了。加以有些“发烧”发热的东西，捅到国际上要闹大笑话，因此需要加以匡正。我们讲两次郑州会议和 1958 年以后一系列会议的“纠左”，仅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因此，我认为，把这个“纠左”称为“纠乱”，比较更符合事实一些，如果我们把这个“纠左”看做是毛泽东在根本的意义上纠正错误的东西，那么庐山会议及以后的历史就难以说得清楚了。

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后，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提出一条：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要搞个定义。显然，这是他试图解决的中心问题，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全国上下几乎到了各行其是的地步。会议的第二天，有的地方党委的负责人认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过时，提出要搞个人民公社四十条的文件。最早是曾希圣和吴芝圃的主意，毛同意了，并当即让吴桂帅、陈伯达协助，在会议期间起草。

文件草稿起初叫《人民公社发展纲要 40 条（1958 -- 1967 年）》，又叫《中国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因为起草时有人认为中国农村正在搞公社，城市也很快要建公社，都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还是叫共产主义建设纲要好。讨论中，王任重提出这十年的指标：10 年内主要工业产品按人口产量赶上和超过英美。到 1967 年，钢 4 亿吨，机床 1000 万台，电 4 亿千瓦，煤 40 亿吨。王任重还说，明年（1959 年）会出现亩产万斤县。向全国人民提出这样一个方向，不是一个人民公社的问题，实际是全国工农业发展和各项建设发展的问題。毛不同意王的说法，不要发表 4 亿吨钢

之类（的指标）吓人。11月4日的会议上，他对这个文件有个长篇讲话。

这个文件草案根据毛的意见，改为《关于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40条（1958-1972）》。文件草案提出，我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经过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同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逐步增长共产主义因素，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打下基础。15年中要完成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使我国主要工业产品按人口计算赶上和超过英国，农业主要产品赶上和超过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而逐步消灭三大差别，逐步由按劳分配过渡到各取所需。文件草案提出15年经济建设必须“以钢为纲”，带动机械、化工，到1972年达到钢4亿吨左右，机床1000万台，煤炭25亿吨，发电装机容量5亿千瓦左右，铁路40万公里，公路通到每个居民点，大小汽车6000万辆；县县通民航，每人平均布30丈；从1958年起在三、四年内达到每年产粮15000亿斤，每人平均2000斤，三、五年内实现农业机械化；15年内普及中、高等教育；15年内实行基本生活资料各取所需。上面这些数字其实同王任重提的差不多，不过时间推迟5年。现在全世界的钢产量也不过5.6亿吨吧，可见当年头脑发热到何种程度。

“十五年纲要”没有在第一郑州会议上通过，准备提交武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继续讨论。

在11月4日下午的会议上，听吴芝圃汇报，正在起草的人民公社四十条，题目叫《中国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时，毛当即插话说：牵涉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理解不了，尤其我们苏联同志就不懂了。你

看，他们还搞社会主义，你就搞共产主义。并且是十年！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里头有共产主义。母亲肚子里有孩子。还是社会主义为题目，不要一提就提到共产主义。建成社会主义，这好，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你说十年就过了，我就不一定相信，看一下嘛，你晓得怎么样。人家过了四十年，还没有过。我们就快些，十年加上八年，实际上才十八年，你就把一切都过完了？人家到那个时候还没过完；看样子他还不准备过完；他口讲过，还没有动。准备过渡，你加准备两个字，机动一些。不然搞到第九年，说已经过了，还要提前完成，结果到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就叫共产主义，商品消灭！这段话很能反映毛当时的思想状态，这就是期望尽早地实现共产主义，却又不得不顾及左邻右舍，顾及旁人的影响。同时，对怎样就算实现了共产主义，也还说不出一个确切的标准，只是在感觉上似乎觉得快了。

在11月6日的讲话中，毛又谈到这个问题。他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要多长时间？三、四、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是不是短了？还是长了？有时觉得长了，有时又担心短了，我担心短的时候多。人民公社什么时候能达到像鞍钢一样？能不能把农业变成工厂？产品和积累能够调拨；积累不是全部要调，但必须调动的产品，则必须无条件地调动，才算全民所有制。河南说四年，可能短了，加一倍，八年。范县说苦战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他又说：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四年是否可以？标准是鞍钢（按每一个工人年均产值计）。鞍钢除7200元成本折旧，下余10800元，工人所得800元，为国家积累1万元，要这

样的调拨。这种过渡对斯大林是十难万难的，要多少年，未说明期限。这是第一个过渡。第二个过渡，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现在已开始准备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苏联也吹，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我们吃饭不要钱，是各取所需的萌芽。凡是是可以做的必须逐步去做。这不能不说是共产主义因素。由此可见，毛当时对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是“争取快”，却又无充分把握。

但是，尽管要争取快，毛对范县那种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吹牛皮”，还是大打了问号的，说过“两年过渡，要调查一下”的话。他对徐水张国忠的明显不实之词，也感到不满。召开郑州会议的目的，就是要跟大家谈清一些问题，划出一定的界限，把过于乱来的现象加以限制。在11月10日上午的讲话中，他说：“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要不要划条线？有的同志不赞成，说不能划一条线，说划了就损伤了积极性；线内也有共产主义，也有集体和全民所有制（鞍钢和公社）。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秀才都不赞成，是不是秀才要造反？毛在这里所指，确有普遍性。当时有些称为“理论家”的秀才们，“热”起来超过常人，并且振振有词，这些人的弱点在于没有做过实际工作，没有深入到经济生活中，只是热衷于从理论到理论的“论证”。结果，一股“热潮”扑面而来时，他们也有一种理论上的“兴奋”，于是不着边际起来。正如毛当时所指出的：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了。这一股风（卷人的干部）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确还不如毛泽东高明。如陈伯达之流专做投机之事，在理论上赶时

髦，抢浪头，妄谈不要货币，不要商品，结果在会议上遭到毛的痛斥，则属自取其咎。

毛接着说：斯大林是划了线的，三个先决条件，基本上不坏，但不具体。（1）首先是增加社会产品，这是基本的。我们叫以钢为纲，极大地增加产品。（2）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将商品交换提高到产品交换，使中央机构能掌握全部产品。不愿划界的，主要是认为现在时间已到，以为已经上了天，你们是右倾。当然，现在鞍钢是全民所有制，但还没有过渡到共产主义，总要搞个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只有一部分是全民所有，大部分是集体所有。全民所有也不一定就过渡到共产主义。（3）提高文化水平。这三条的基本点是增加产品，极大地增加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就是发展生产，发展生产力。应该说，在当年那种热火朝天的气候中，毛能明确他讲出要划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大线”，和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之间的“小线”，还是很不容易的；他提出极大地增加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发展生产力，是完全正确的。尽管这些都属于马克思主义原理常识性的东西，但在一片“向共产主义过渡”（这在世界范围内也存在）的“虚幻”气氛中，他能讲到这种程度，也还是比较冷静的。如果将这些说法同几个月前的一系列言论相比较，如在北戴河会议上说的，我们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等等，应当说，有了相当大的转变——似乎又回到马克思基本原理来了。

毛泽东之所以强调要在全民与集体、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划线，除了认为那些“三、五年过渡”是吹牛皮，恐

怕靠不住以外，显然是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现实：各单位、各地方间在贫富方面还有很大差别。由于这些差别的存在，实行产品调拨与取消商品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方面，毛可能受到田家英所反映情况的影响。10月下旬，他曾特派家英等人到河南新乡七里营和修武县作调查，目的当然是为获得第一手情况。家英他们下去后，发现问题不少。一个是虚报产量，成千上万斤的亩产和高得怕人的总产量，大多为弄虚作假，根本不是“稍掺水份”的问题；再一个是为了造声势，到处搞“大兵团作战”，“挑灯夜战”（搞深翻地），社员有的每天只能睡3、4个小时，普遍有怨恨之声（自然还不敢明讲）。当然更重要的，是家英他们发现基层干部对人民公社性质与所有制的变动问题，有很多实际的、不同的看法，例如修武县委书记张洋芹就向家英反映，他不赞成现阶段人民公社实行全民所有制，理由很简单：现在实行全民所有制，如果碰到天灾，农业减产，国家能不能把农民包下来；如果丰收了，国家要调农民的粮食，农民千不干？家英他们当时虽不可能有否定人民公社的想法，但对这个意见却深以为然。第一次郑州会议前夕，毛泽东路经新乡，家英如实将自己看到的情况和张洋芹的意见向他作了汇报。毛对这些情况是重视的。在会议开始后，他几次强调要保证社员的休息时间，一个月至少两天（女社员要5天），并肯定修武县委书记的设想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劳动、土地，其他生产资料统统是农民的，是人民公社所有的，因此产品也是公社所有。应当说，毛的这些话是明智的，表明他着重实际和捕捉问题敏感性的一面。但是，就他总的思想倾向说，实行全民所有制和产品调拨，仍是尽快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标

准。因此，他只是在目前阶段还达不到这两个标准的意义上，批评下面的“乱来”现象。例如他说，徐水的全民所有制，不能算是建成社会主义。小全民，大集体，人力、财力、物力都不能调拨。又说，有两种所有制，即全民和集体，但有一种起决定作用，即要能调拨，不能服从全国的调拨，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就是要产品调拨，显然，这说明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标准以及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的理解，仍是十分浅层次的。现在我国经过四十多年的实践后，我们可以说，产品调拨只是马列主义经典中的一种设想。由于价值规律的存在，即使生产力有了极高程度的发展，已经属于一种所有制的条件下，各生产单位的产品也不可能实行无偿的调拨，因为这样做，不仅将削弱生产积极性和劳动效率，而且，也无法合理配置物质资源。至于究竟何时才能以“无偿调拨”来配置资源与产品，那真是一个“哥德巴赫猜想”似的难题。马克思设想在三大差别消灭之后，在国家消亡的前提下，人类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内究竟能否实行产品无偿调拨，这是很难设想的事情。三大差别主要是社会差别，如果说这些社会差别可以在将来消灭，那么，自然差别（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等差别）是无从消灭的。因此，差别总是存在，无偿调拨前提就不具备。由此可以说明，在“大跃进”时期，包括毛泽东在内，大家比照着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设想，掺和着自身对共产主义的理解，由公社这座“桥梁”向“天堂”迈进，自然无法避免陷于“理想”或“空想”。

与“产品调拨”相联系的是商品问题。毛泽东对陈伯达在起草文件时避而不谈商品生产问题）就颇不客气了，说有

些人认为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没有存在必要，主张实行产品调拨，是助长了“共产风”的泛滥。他于是讲了大段关于商品生产存在必要性的话。在11月9日下午的会上，谈到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许多观点，他是赞同的，现在还是要利用这个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来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在目前来讲这是有用的，是不坏的。他说，我们的国家是商品很不发达的一个国家，现在又很快地进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同商品交换还要发展。同一天，毛给中央、省、地、县四级党委写了一封信，建议读两本书（另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信中说：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有一大堆混乱思想。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这些话都是针对陈伯达说的。当周小舟等谈到，社会上怕废除票子，因而银行提款的多，发生了抢购。毛就说：废除货币，陈伯达就有这个倾向。

11月10日下午，毛再次讲到：现在我们有些人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有一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中的中小生产者，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社会



主义初期阶段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以为有了公社，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破除迷信又恢复迷信。有人倾向不要商品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我们只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的一小部分，只有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社会产品十分丰富了，才能废除商业。

应当说，这是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讲过的最精彩的也是最实际的一段话，尽管他只是笼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这个概念，也对商品的属性作了阶级概念的限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但在商品存在的必然性和长期性的阐述上，还是清醒的，尤其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有其特殊的意义。但是，我认为这些话是在纠正“乱子”的意义上说的，即为了把那些过于“狂热”的气氛冷却下来，而不是从彻底总结反右以来三面红旗的经验教训，认真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角度出发。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这些认识和看法的实际指导作用，也不能使它们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为什么这样说呢？正是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反复讲解这些道理的同时，他仍不断坚持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那些基本思想。这种认识与实践的矛盾，这种自造的“怪圈”，他是无以自拔，走不出来的。

何况，他对实现产品调拨仍情有独钟，而对价值规律的作用却仍加怀疑。他说，商品、生产、调拨，我完全赞成。为什么公社与公社之间实行合同制，国家与公社之间不可以订合同呢？我们现在的商品生产，不是为价值法则所指挥，而是为计划所指挥，我国的钢铁、粮食、棉花难道都是价值

法则所指挥吗？（注意：在这里毛是把国有制的产品钢铁同集体所有制的产品粮棉放在一起说的。）他又说：价值法则是一个工具，只起计算作用，但不起调节生产的作用。

同时，毛虽然看到保留工资制等的不可避免性，也讲到要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但仍然希望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用以实现社会的平等，改造人们的思想，他的理想仍是供给制。他说，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解放后，不利用供给制的长处，改成工资制；那时让一步是必要的，但有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闹级别、闹待遇。他说：这些也让步，就不对了。

此外，对于究竟要多长时间过渡到共产主义，他虽然说过苏联一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差得很远；我们只搞了几年，则差得更远。虽然说了这样一些话，但是也流露出苦战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大致设想。他说，不能完全以生活水平来讲，否则那些腐败的皇帝和贵族早已是共产主义了；要讲需要，要说热量，二千五百卡路里就够了。共产主义也只是以一定量的元素作营养，不能太多。11月6日，当他看见山东范县“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那个顺口溜时，仍这样批示道：“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乎太促，只3年。也不要紧，3年完不成，顺延也可。”可见对这种粗糙的理想、空想还是心向往之的。

毛泽东当时虽然给陈伯达之流“左派”们泼冷水，劝他们读斯大林的书；他也确实运用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商品

生产和价值规律作用的观点；但是，又感到斯大林一套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甚至认为在总的方向上是不足为训的。他说，斯大林写的东西必须看，好处是只有他讲社会主义经济；最大的缺点是把框子划死了，说集体农庄只愿意商品交换，不愿意调拨。这是因为不要不断革命，要巩固社会主义秩序。俄国农民不会那么自私，不会不要不断革命。俄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秩序，但这种秩序是不能巩固的。我们则相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一部分，供给制部分就是破坏这种秩序的。又说，母亲肚里有娃娃，社会主义有共产主义萌芽，斯大林看不到这个辩证法。

上面这些左右模棱、自相抵触的东西，正是毛泽东晚年思想中矛盾状态或胡思乱想的反映。（庐山会议前期，他同我们几个人谈话时，明确承认“大跃进”初起自己确有胡思乱想。）一方面他感觉到有些人太“狂热”，惹下或将要惹下“乱子”，让别人听到会成笑柄；另一方面，他又坚信自己确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是一条正确的和独创的道路，其中包括了许多共产主义的因素，“是世界上没有过的事”，是建成社会主义并为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这样，他既提出了不少清醒的思想，为某些模糊的东西划了界限，可是又在自觉不自觉中消磨掉了这些思想的锐利之处。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对眼前的状况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这就是第一次郑州会议时，毛的实际思想状况。当然他提出的正确思想（尽管同自己正在实践的思想是矛盾的），还是应该给予肯定。他严厉批评了陈伯达，也是当时大快人心之事。田家英当年同我详细谈过这一情况。

这一次郑州会议开过之后，已近年末。半年“大跃进”

---

的利弊得失，通过年终的算账与分配，就看得更清楚了。于是，接着又召开了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

## 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

两次郑州会议之间，党中央在武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两个会是连起来开的，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先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然后11月28日至12月10日开八届六中全会。两个会我都参加了。

###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两次讲话

1958年11月，斯大林格勒水电站截流，我应邀率中国代表团去苏联。等到回国后赶到武昌开会时，已经迟到了两天，23日才开始参加会议。记得晚到的还有田家英、张平化、张春桥等。毛在第一天的讲话，是会上听传达得知的。

参加武昌会议的除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中央书记处的部分成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常委除周恩来、朱德、林彪外，都参加了。会议主要是讨论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工农业生产指标问题，目的是继续第一次郑州会议的精神进

行降温。21日和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两次讲话

1958年秋，“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乱子越来越多，问题也越来越暴露。武昌会议前，毛泽东批阅过的反映农村问题的几件材料，就反映了“大跃进”和公社化的混乱情况。如11月10日，批转《中办机要室关于在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情况的报告》。11月14日，批发了新华社《内部参考》电讯稿《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电讯稿说，入秋以来，河北省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痢疾、肠胃炎症也有发生。患病人数之多、蔓延之快是历年所未有的，已波及到21个县市、70多个村庄。发生流行病的主要原因是，某些领导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了对群众集体生活的领导和关心，食堂办得不好，社员得不到休息，身体抵抗力下降，疫病蔓延很快。这些文字材料所反映的问题，不过是冰山之一角，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广泛得多。毛认为，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急急忙忙往前闯，有必要使头脑清醒起来。

21日，会议开始的第二天，毛就说：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压缩一下，变成固体空气。不要像唱戏拉胡琴，弦拉得太紧，太紧了，有断弦的危险。这可能有一点泼冷水的味道。23日，毛又说：我说把空气压缩一下，不是减少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样多，只不过压缩一下而已，成为液体和固体状态。他强调，路线还是那个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办法仍然是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几个并举，三个结合，还加上上洋结合。在毛泽东看来，“空气”只是过于膨胀了一些，压缩一下就好了，不是减少“空气”，更不能改

换“空气”，总路线还是要坚持的，三面红旗必须高举。

毛泽东在讲话中承认，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中国人大概是冒失鬼。开会的前几天，1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报告提纲，这个提纲提出苏联未来十五年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地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毛要大家看看这个提纲：苏联已经四十一年了，还准备搞十二年（按应为十五年）。看它的思想是想过渡，但并没有讲过渡。赫鲁晓夫很谨慎，他已经有了5500万吨钢，1亿吨以上石油，他还那样谨慎，还要十二年过渡。现在国内局势，我们倒有几十万、上百万的干部，就是想抢先，都想走得越快越好，对全局照顾得不够。这时，毛批评北戴河讲三、四年或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搞到共产主义，是个缺点。他说，三个差别、资产阶级法权没有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现在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错误。

但是，会上有不少人的意见仍然是快些过渡。如刘少奇说：达到150—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按由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彭真则认为：每人到150—200元才可能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即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过渡。

对这种意见，毛似不以为然。他说：整个中国要进入共产主义要多少时间，现在谁也不知道，难以设想，十年？十

五年？二十年？三十年？苏联四十一年，再加十二年，五十三年还说是准备条件。中国人就那么厉害？我们还只有九年，就起野心，这可能不可能？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考虑，也是苏联先进好。也许在巴黎公社百年纪念时（1971年），苏联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十二年怎么样？也许可能，也许不可能，我看不可能。即令十年，到1968年我们已准备好了，也不进，至少等苏联进入两三年后再进，免得列宁的党、十月革命的国家脸上无光。这样的意思毛在两次讲话里都说过。在第一次讲话中，他就说：苏联已经搞了四十一年，再搞十二年，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的后面，现在他已经发慌了。他们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我们抢上去，过渡了，苏联脸上无光，全世界无产阶级脸上也无光。怎么办？我看要逼他过，形势逼人，逼他快些过，没有这种形势是不行的。你上半年过，我就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最多比他迟三年。

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武昌会议时毛泽东有所退却。北戴河会议提出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即可过渡，这时的估计比北戴河会议的说法延长了，而且说这个时间“难以设想”。这就遏制了“抢先进入共产主义”的势头。当然要看，毛仍然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难以设想”，比如十年、十五年或二十年、三十年，而没有认识到从现在起到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这是按当年应当具有的理解说）。还要指出，毛一方面承认苏联的基础比中国强，另一方面似乎又以为中国有可能先进入共产主义，从国际影响考虑，要“逼”苏联先过渡，思想上还是有急于求成的情绪。



同第一次郑州会议一样，毛泽东再次批评了取消商品的主张。他说，有一个时期仿佛认为商品愈少愈好，时间愈短愈好，甚至两三年就不要了，这是有问题的。我看商品时期搞久一点好，不要一百年，也要三十年，至少也得十五年，这有什么坏处呢？他还说，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如“三风”“五气”，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彻底破除，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要破，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还有用，这就要保护它，使它为我们服务。毛在这里所讲要破的那一部“法权”，其实是干部作风和干部制度方面的问题，与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并无关系。不过破除这一部分东西，应该说是对的。他提出要保护工资制，是对他在北戴河会议上关于取消薪水制主张的改正。至于提出“商品时期搞长一点”，则否定了在近期内取消商品、取消货币、取消价格的“共产风”主张。

毛泽东在会议上讲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降低过高的指标。这也是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之一。

北戴河会议曾确定1959年钢产量2700—3000万吨，这个目标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会议第一天，毛就提出要不要这么多钢、搞不搞得出来这么多钢的问题。他说：钢3000万吨，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出来？邓小平说：“明年任务，各省自议。3000万吨他们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就得改。是不是定3000万吨，是应该考虑的。”薄一波也认为值得考虑。薄是经委主任，对工业生产的情况比较熟，他说：今年1700万吨铁，是6000万人搞出1000万吨来，实际有700万

吨是估出来的，但能炼钢的高估也就是 200 多万吨。说钢 1100 多万吨，数量上可能有超过，分析内容，情况大变，好钢不会超过 900 万吨，可能是 850 万吨好钢。如到 3000 万吨钢，就要翻 2.5 倍。薄的估计接近事实，1958 年经过核实的好钢只有 800 万吨。毛于是说：明年是不是老老实实只翻一番，今年 1070 万吨，明年 2140 万吨。他还谈到，北戴河会议时，我们对搞工业，还没有经验，搞了两个月，钢铁运输到处水泄不通，这就有了相当的经验。总要有实际可能才好。

毛泽东承认：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真正掌握客观规律，要熟悉地掌握与运用它，整个说来，还是个问题。多快好省是客观的东西，有它的客观规律，能速则速，不能速就不速，不能勉强。第一次郑州会议搞的《关于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 40 条》，毛不主张作为武昌会议的重点。他说：40 条这次可以议一下，但不作为重点。郑州会议提出来了，很好，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再议下去，没有把握，也议不出名堂。需要不需要 4 亿吨钢，能不能搞到？王任重给我的说明不解决问题，只说明可能的问题，需要不需要，没有回答。毛点王任重的名是有来由的，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 40 条时，王提出 10 年内工业主要产品按人口产量赶上或超过英美，钢在 1967 年达到 4 亿吨产量，机床达到 1000 万台。对毛的发问，王无言以答。倒是最早提议搞 40 条的曾希圣说：全国 4 亿吨，安徽就要（生产）3000 万吨。毛追问说是不是可能？是不是需要？曾也承认：连明年 120 万吨钢也是有困难的。毛接着说，40 条如果传出去，很不好，叫做务虚名而受实祸。

毛泽东提议，把 1959 年产钢 3000 万吨降为 2200 万吨。但他心里仍无把握，当晚半夜里，又找李富春、薄一波、赵尔陆等人谈指标。他认为不是 3000 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 2200 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薄一波建议定为 1800 万吨，对外公布 1600 万吨。第二天晚上 11 点钟，毛找各大区负责人谈钢指标，对 1800 万吨也表示怀疑。23 日的大会讲话，毛说：昨天和大区同志吹一下，究竟 1800 万吨有无把握？要能说服，才能打通。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远不能服。我已经是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并为此而奋斗。打我屁股，与你们无关，无非将来又搞“马鞍形”。过去是人家反我的冒进，现在是我反别人的冒进。1800 万吨，我觉得现在还是根据不足。如果有充分根据，还要减到 1500 万吨。

从钢铁生产，毛谈到了有计划、按比例的问题。他说：钢铁上去，各方面都要上去。六十四种稀有金属，都要有一个比例。什么是有计划、按比例，要在实践中慢慢摸索。恩格斯说：要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它，然后去熟练地运用它。我看斯大林认识也不完全，运用也不灵活，至于熟练地运用就更差；他对轻重工业不那么正确，重工业太重，是铁拐李。（像何长工一样，两条腿不成比例。）现在我们摸了一点比例，是搞两条腿走路，三个并举。我们搞三个并举，就是使腿长得差不多，使农业的腿长一些。

除了提出压缩钢的指标外，毛说，还有什么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也可考虑减轻些。任务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要从反面考虑一下。会前，谭震林、廖鲁言向中央提交了有关农业生产安排的报告，提出 1958 年冬 1959 年春全国农田水利建设要搞 1900 亿土石方。这个工程量相当于

1957年冬 1958年春的近4倍。毛泽东认为，1900亿土石方多了，要减轻任务。他说，你要人家睡足觉、吃饱饭。“睡足觉、吃饱饭”，是要求各级干部要关心群众的生活问题。会议期间，毛批发了云南省委的一个报告。这个《关于肿病死人的检查报告》说，今年春夏之交，农村中因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发病近39万人，死亡39712人。有些干部发现缺粮是肿病致死的主要原因，由于怕犯“右倾”错误，不敢反映真实情况。陆良县县委员刘云才坚持反映缺粮真实情况，反被新派去担任县委书记的省委委员监委副书记陈盛年撤职并开除党籍。该县马街乡出现了使用皮鞭的“督战队”，强迫患病群众出工，陈盛年还在全县推广这个“经验”，他说，“生产不跃进是大是大非问题，打人是小是小非问题”；“打人是促进派，不打人是促退派”。全县于是捆绑吊打合法化，甚至于“打人是为了打一千斤”“不打就是没有干劲”等等说法，云南省委的这个报告对自己的官僚主义等领导作风，作了比较深刻的检讨。毛的批语虽然没有针对陆良县的打人问题表示意见，但他还是批评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同时指出，这“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提出两条解决方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高指标的产生，同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有直接关系。毛泽东在讲话里特别批评了作假之风。他说：现在横竖要放“卫星”，要出名，就管他作假不作假。没有那么多东西，就要作假。我建议同县委书记、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

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嘛，不要争虚荣。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两年扫光，我就不相信。从中央、省委、地委到县委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了。

作假的原因不只是在于上面相信，更主要的是上面压任务、上面好浮夸导致的。其实毛本人就有直接责任。为了完成他提出的钢翻一番的指标，他在北戴河宣布六条纪律，泰山压顶，谁敢少一吨。

北戴河会议之后，我忙于自己的业务，到甘肃和青海出差，参加刘家峡水电站的开工典礼，查看黄河最上游的龙羊峡坝址，并到青海北部看当时的“引大（通河）工程”。随后，11月又率一个代表团到苏联，参观斯大林格勒水电站的截流工程。由于写给毛泽东的第一封信不合时宜，同当时的狂热太不协调，有点泼冷水，整个北戴河会议期间他没有找我谈过话，之后也没有见面的机会。武昌会议时情况起了变化，即狂热已过，开始降温，于是想起我那封信来了吧。有一天晚上，接到通知，要我到他的住处东湖招待所去。这个地方我是非常熟悉的，不仅珞珈山与东湖分不开，而且一九五二年从湖南调北京之前的夏天，我到中南局组织部谈话时，在这里住过几天。这是一个不规则的长廊式的平房，就在东湖之滨。毛先提到这封信，说是“观点不甚明朗”。我没多作解释，心里想不过是“不中下怀”罢了。谈话的时间不到一个小时，现在记得起来的谈了三件事：一是大炼钢铁，谈到小土群，几千万人上山并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决非长策，钢铁这个东西还得靠大洋群，否则不能保证质量，从而会影响到用户，首先是机械行业一系列问题。我最后说了

一句：不到黄河心不死。他也笑了起来，这些话听进去了。其次谈到大炼钢铁产生乱砍树木毁林的恶果，当时我就有所接触，联想到水土流失。这个问题未能深谈下去，第三件事是粮食放卫星问题，我特意问他，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他说看了钱学森写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原来一九五八年6月16日，农业放高产卫星时，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太阳能如果能够多利用多少，科学论证，一亩地即可打几万斤粮，钱的文章对毛固然起了作用，当时我心里想，一个自己种过地对农业如此熟悉的人，恐怕主要还在欣赏群众的冲天干劲，也相信这种积极性或许能创造奇迹，不想给这种“热情”泼冷水，因而对高产“卫星”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吧。说受钱文影响，是否有点推卸责任呢。何况，即便在武昌会议上，他还是相信一九五八年粮食产量硬有7500亿斤。这个比头年翻一番的产量，他是很满意的。（后来经核实，五八年只有4000亿斤）。

我的《龙胆紫集》中，“戊己诗”九首组诗中，有一首七绝即记这夜谈话情景：

岂有闲情忆少年，湖边夜召话当前。  
黄河不到心难死，特作如斯斗胆言。

这晚谈话使我感到，钢铁也好，粮食也好，毛确实比较清醒了，“不到黄河心不死”这样重的话，不仅不以为忤，还笑了起来。虽然粮食产量仍坚持公布7500亿斤，他还是号召反对作假，直接批评了当时盛行的浮夸风和弄虚作假的

恶劣风气，这就有利于降温工作的进行。

值得指出的是，这次会上毛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又推进了一步，提出了“政治思想上的阶级”的概念。他在讲话中谈到消灭阶级时说：消灭阶级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经济上的，容易消灭，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但是作为政治、思想上的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由此他又说：我看消灭阶级这个问题让它吊着，不忙宣布为好。究竟何时宣布才有利？恐怕基本上没有害了，才能宣布消灭。如果宣布消灭，地主都是农民了，资本家都是工人了，有利无利？记得毛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两个剥削阶级”的概念时，政治标准和思想标准，是隐含在他作出这个判断的过程之中的，这两个标准还没有显性化，更没有归纳成为明确的概念。5月，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报告，即提出了“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把右派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划入剥削阶级。武昌会议则沿着成都会议的逻辑轨迹，将隐含在“两个剥削阶级”概念中的政治、思想标准显性化了，并且提出了“政治、思想上的阶级”这样一个明确概念。关于这个概念的错误，我在《“大跃进”亲历记》上卷作过分析。一是没有正确反映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状况，把已经消灭和正在消亡的地主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依然作为存在的实体。二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学说，把非经济标准（政治、思想标准）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与偏离。

在这里，我想说这么一点意思，就是经济上的“左”的

错误，实际上也推动政治上“左”的错误发展。反过来，当然也一样。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产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到武昌会议又有发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推波助澜，是一个重要原因。有人以“大跃进”是搞经济为理由，否认这中间有政治上“左”的错误。这种说法是站不住的。从成都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武昌会议，直到后来的庐山会议，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与认识，总是伴随着经济上的冒进错误同步发展，每一步都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系统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这一个环节构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链条，即经过一步步发展，最后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不是理论推导，而是历史事实。不管承认不承认，它都是已经发生过的客观存在。

武昌会议期间，对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的问题的决议草案和1959年经济计划都进行了讨论，然后将两个文件提交给八届六中全会继续讨论、审议。

## 六中全会的开始和小组讨论

武昌会议结束的第二天，11月28日，接着举行八届六中全会。没有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委、候补中委纷纷赶到武昌。周总理和朱老总也来了。

会前，11月27日，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六中全会拟于十二月二日开会，由十一月二十八日起到十二月一日止，在这四天内，请同志们阅读文件。”全会按大区分组，一共七个组。华北组组长林铁，副组长陶鲁笏、张苏；华东



组组长柯庆施，副组长曾希圣、江渭清、廖鲁言；华中组组长王任重，副组长吴芝圃、安子文；华南组组长陶铸，副组长刘建勋、叶季壮；西南组组长李井泉，副组长宋任穷、谢富治；西北组组长张德生，副组长王恩茂、王震；东北组组长欧阳钦，副组长黄火青、李葆华

28日晚七点钟，邓小平主持全会的预备会议，讲了会议的日程安排和全会的任务。从29日开始，每个小组阅读了四天文件并分组讨论。这个期间，11月30日下午，毛同常委和各小组组长谈过一次话，可以看作是在全会正式开始的吹风。第二天，各小组作了传达。

——今年夏、秋两季，我们国家出现了两个大问题，为人民公社，二为以钢为纲。大家有点紧张。郑州会议感到紧张，现在搞出些章程来，心情就比较舒坦了。二十一号开会，十天了，也比较紧张。斯大林的书过去看过，不感兴趣，现在感兴趣了。人民公社的文件是从郑州会议搞起来的，有所准备。工业问题也有所准备，但计划会议是条条搞的，中央没跟地方结合，条条没跟块块结合。块块第一书记，过去你们不是干劲冲天吗？华东现在就走下坡路嘛！过去没有经验嘛！

——这次是不是泼李富春的冷水？工业与农业不同，工业方面的相互关系牵制很多，搞钢必须搞煤、电等等，缺一项也不行。农业方面，相互牵制也有，但比较少一点。计划要积极可靠，放在稳妥的基础上，还要鼓气，气可鼓而不可泄，不要挫伤群众的积极性，要接受1956年的教训。我现在代替了总理和陈云，你们在北戴河反我的冒进，现在不一样。那时反冒进就是不对。

——北戴河会议一股热情，3000万吨钢，那时谁听了3000万吨钢不喜欢？现在看来，当中至少有1000万吨是主观主义。事非经过不知难（总理插话：确非神秘，并不简单。小平插话：钢的指标，各地还可研究，减一点国家计划不会受影响，钢、电、交通按第二方案，其他指标按第一方案。）

——1959年农业生产的指标，究竟提多少？今年粮食是7500亿斤，明年增产3000亿斤，达到10500亿斤，每人平均1500斤以上，苦战三年达到每人2000斤。今年来一个以多报少的方针，留有余地。棉花今年报6700万担，明年1.1亿担。粮食收成到底有多少？是不是增加一倍左右？可以写增加90%左右，比较稳当。现在还未收完，还要看看，这次会议不公布最后数字。明年人代会上再公布。

——少种多收。粮食原来没有计划翻一番，开了几次会，就翻上去了。农业的“八字宪法”，只管地，不管天（管不了日照和空气），天地是对立的统一。山西石楼县的经验很好。要深耕细作。这是党、群众、技术人员三结合创造出来的经验；试验田、高产，是人类的一大解放，是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大解放。三三制，这个提法，舍不得丢掉。我已经打了许多保险系数。这一条还是写进去好，时间再灵活一些，再修改一下，全国大多数地方每人一亩左右。（关于粮食产量，毛当时还是极其乐观的。会上印发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文中说了这样的话：“使亩产一百多斤或几百斤粮食向亩产几千斤或者甚至几万斤粮食转化。”）

——城市要不要办公社？肯定要办，但可以等候一下。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听了思想很混乱，要作酝酿，要使人懂得，要把问题讲清楚。

——军事化、民兵，展开一下，讲的理直气壮。

生活集体化，以家庭问题为中心，展开回答。杜勒斯攻击我们，一有机会就整我们的人民公社，说我们一是奴隶劳动，一是破坏了家庭。这要回答。其实资本主义国家早就消灭了家庭，完全是金钱关系，真正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父不认子，子不认父，老子讨饭，儿子不管，下饭馆了，各人开帐。我们现在是社会养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工资差额问题，要展开一下。四倍左右或者更多一些。因为农民有平均主义的倾向，工资过于悬殊，他们不赞成，但也不能没有差别。

——作风问题，以半天时间谈一谈。现在的问题是相当当地发生了一些强迫与作假。造假比强迫的害处轻一些。比如，枣阳县，文盲一个未消灭，县委一布置，限三天消灭，结果县委登报说文盲消灭了，伟大的胜利。但为什么造假比强迫好些？无非是文盲未消灭，四害、蚊子未消灭；强迫就要打人、捆人、劳改。要专门将这个问题谈一下。

分组讨论从11月29日开始，一直进行到12月8日。讨论的内容主要是两个，一是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二是关于1959年经济计划安排问题。这里分为几个问题对讨论内容作些介绍。

### 一、关于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

在公社化运动中，急于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成为全国范围内的一股风。刘少奇在华中组第一次讨论中，就提出这个问题请人家讨论：到底怎样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怎样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之时就是开始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日，这中间没有一道鸿沟。有人认为，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按人口平均，农民的生活水平相当或超过工人的生活水平，即农民每年收入达到 150 - 200 元。另一个是收入稳走，在此条件下由国家包下来，给农民发工资，就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

东北组有人认为，讲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应该把精神条件强调一下，甚至在决议中专门写一段。有人不同意这个意见，认为现在一方面有见物不见人的现象，但也有人把物质条件看得很轻，因此还是以文件中物质条件与精神条件并提为好。

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如何转法，华南组有人说，必须根据条件成熟的程度分批地转，但是，不能认为，在一个县、一个地区转了，就算建成社会主义。所谓建成社会主义，应指整个国家来讲。现在有的县的标语写着：“1959 年建成社会主义，1960 年实现共产主义”，是不对的。

## 二、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问题。

讨论中普遍认为，决议草案强调在现阶段发展商品生产，是针对当前一些人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出发的，这些是很正确的。有人提出，草案中“继续保留商品的外壳”这句话，用“外壳”仍然是回避商品生产的提法，实际上，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商品存在，所以不要“外壳”两字。

西北组有人提出，草案中“商品经济仍将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给人一个很长的印象，可否改为一定时间。多数人认为原来的提法较好，可以不改动，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不可能完全消灭商品经济，如稀有产品，不过这种商品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有本质的区别。华南组也有人认为，商品是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而起不同作用，到共产主义社会，商品也还会在生产与分配过程中起它的作用的，但不一定叫它“商品”。

讨论中还提出了一些与现实直接相关的问题。华南组提出，现在国家调拨的产品（主要指生产资料）算不算商品？有的人认为是商品，而且是实在的商品，不是“商品外壳”，如鞍钢的产品装配轻工业部的工厂，轻工业部生产出的商品，在计算成本时包括了鞍钢产品的价值。有人则认为全民所有制的工厂企业范围内进行产品调拨，不能算是商品，只有从全民所有制的工厂企业调拨产品给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公社，才能算是商品。华东组还有人认为，在实现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后，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仍然实行劳动价值相等的新产品交换，商品就不止是“外壳”作用了。

### 三、关于人民公社问题。

对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比较普遍的意见是赞成“缓办”。很多人都提到，城市办公社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这不仅是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在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中还相当浓厚地存在着，还由于城市经济情况复杂，究竟采取什么组织形式和办法为好，都没有经验，需要进行试点，取得一套适合城市情况的经验。刘少奇在华中组讨论城市公社问题时说：城市要以市或区建立公社，不能以机关或工厂为单位建立公社，将来要下放一部分小工厂给公社，大工厂还是国家的，人员可以参加公社，机关、工厂不挂公社的牌子。城市公社要进行重点试验，取得经验。

对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有人提出，现在人民公社不能“包”得太多，因为每个人的需要和爱好都不一样，特别是因为当前产品还不丰富，如果“包”多了，就会使生活搞得简单化，就不能刺激生产的发展。对“吃饭不要钱”的提法，西南组有人建议把草案中“实现了吃饭不要钱的理想”，改为“做到吃饭不要钱”。华南组有人认为这个提法严格推敲起来，不够确切，容易使人误解为“白吃”，因农民自己劳动吃自己的，不是“不要钱”的问题。华东组有人认为这一提法不很准确，因为实际上是要了钱的。但不少人认为这句话很重要，不改为好。

对公社的规模，华中组有人指出，草案说“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这里面有社大、社小的问题。根据北戴河会议的意见，一个公社以不超过两千户为宜，但现在的情况是一般都超过了此数，这样队就大了，因此考虑队以百

户左右，山区四十户至五十户，一个公社下属十至十五个队为好。

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华南组有人认为，在现时提出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是十分必要的，但不能将社会的必要分工同等级制度混淆起来，加以反对。

#### 四、关于农业生产问题。

对实行耕作“三三制”，许多人都认为应该因地制宜，根据本地情况有所变通。西北组有人指出，草案要补充这样的意思：应根据各地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有所不同的步骤和办法，如地少人多的地方，种树、种草和休闲地可以少于三分之一；而地多人少的地方则可以各三分之一，或多于三分之一；并且实行的时间可以有快有慢。华北组讨论中，大家赞成写“三三制”，但是为了避免下面机械地硬套，修改时可以把这个问题写得灵活些，说明“三三制”是就全国范围来讲的，各个地区应当根据耕地的好坏、山地、平川、人口多少等具体情况，进行统一的规划。华中组许多人认为，“三三制”是在单位面积高额丰产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实行这种制度，需要经过若干年在农业生产上的努力，但这是耕作制度改革上的一个方向。华东组的意见，认为农业“三三制”在全国范围这样提是可以的，但是由于南方某些地方地少人多等情况，做起来恐怕有困难。在执行中应该根据南方北方、平原山区、地少人多和人少地多、复种指数高低等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在人多地少、复种指数较高的地区，首先是降低复种指数，水利、土壤条件较差的地区，暂时还不要过多缩减耕地面积。还有人认为“三三制”这样固定化

的提法，还值得研究。华中组也有人认为“三三制”、“十八亿亩”、“两千斤”的数字在草案中讲的死了一点，可否修改得灵活些。华南组有人说，根据有些地方的条件，实现“三三制”不是在几年内就能办到的事情，故建议在决议中对如何搞好当前农业生产、认真贯彻“八字宪法”问题，强调一下。

华东组有人提出，亩产万斤粮、千斤棉，在部分地区是可以办到的，但普遍实行不易做到，在文件中不具体提为好。对1959年的农业生产，不少人感到工业生产的安排，财力、物力都很紧张，将化肥、排灌机械、农业用电等支援农业的项目，几乎挤掉了，对这方面要作适当安排。

### 五、关于干部作风问题。

许多人都指出强迫命令和弄虚作假的问题是比较普遍存在的，有些地方很严重。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压”、“逼”、“拔”（拔白旗）、“辩”（辩你一下）等办法强迫群众；有的地方对群众体罚很严重，甚至使用了吊打等刑法罚；个别地方组织了“劳改队”，“督战队”等等。浮夸、虚假不仅表现在谎报粮食和钢铁生产成绩上，在扫盲、商业、税收、地质调查，以至公安部门的破案中都有。弄虚作假已经带来不良后果，有的群众对放“卫星”这样说：“不怕办不到，就怕说不到”。

关于发生强迫命令、弄虚作假严重现象的原因，大家作了分析，比较一致地认为，除了干部本身的问题外，同各级领导有直接关系。东北组许多人认为，造假和强迫命令现象，除干部品质问题和个别地方组织不纯外，也是同有些地



方领导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分不开的。如给下面的任务太重，超过实际可能，完不成又要批评为“右倾”，要“拔白旗”。有的只喜欢听好的一面，只看到“红旗招展，遍地灯火”，而看不到“十面埋伏”的真像。下边干部往往看领导颜色行事，有的形容说：下边干部汇报时两个口袋装材料，一是“左”的，一是“右”的，你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材料。这个组的讨论特别指出：现在有一种情绪，一提纠正缺点就被认为是泼冷水，抹杀成绩，“右倾”。这种连一个指头的缺点也不让批评的现象是危险的，应当警惕。不解决这个思想问题，纠正强迫命令和弄虚作假是不容易的。

西南组讨论认为：强迫命令和虚假倾向的滋长，除了部分干部思想作风不纯外，各级领导都有一定的责任：领导头脑太热，不善于冷静地分析情况，布置任务超过了实际的可能，布置任务时又没有充分教育干部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与关心群众生活。这个组还指出，由于这种不良倾向是在一种“左”的幌子掩盖下滋长的，有些干部误以为一提纠正缺点就会“泼冷水”，有的人明知有问题也不敢提出，怕戴“右倾”帽子，不少基层干部甚至地、县委干部不愿和不敢暴露问题。

西北组有些人指出，大跃进以来各方面的成绩很突出，另一方面却也滋长了讲形式、图表面的风气，有的检查团下去时，到处扎彩棚，贴标语，过分铺张。也有干部滋长了骄傲情绪，只讲成绩，看不到缺点。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也只表扬，没有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这种作风。

华东组总结了发生干部作风问题的六条原因：（1）有些干部的思想不纯；（2）省地县级对基层干部的教育不够；

(3) 上面交下面的任务重，弄得下面干部为难；(4) 干部对党的政策、方针理解有片面性；(5) 干部听正面的话很愿意，听“九个指头”的话很有劲，而听“一个指头”的话就听不进去；(6) 报纸宣传不冷静。

对纠正强迫命令和弄虚作假，大家认为关键在于领导，首先在领导布置任务时，必须实事求是，无论布置任务或听取反映，都必须有清醒的头脑。还有人特别提出：进行各项工作时要让人民群众充分发表意见，允许人们讲不同的意见，不能认为讲反面意见不利于工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同群众有共同的语言，才能造成广大群众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

讨论中也有一些人唯恐出现对三面红旗的怀疑，认为高产“卫星”总还是真的多假的少；还认为对干部作风上的问题应该有确切的估计，要认识到这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否则，反对弄虚作假的口号一喊，有些人就会误认为什么都是假的，很可能把成绩和缺点真假不分，把大跃进和群众路线也反对掉。

## 六、关于 1959 年经济计划安排问题。

如何安排 1959 年计划，首先有个如何估计和总结 1958 年经济建设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看法一般维持在基本肯定的基调上，但也有些意见较为尖锐。华中组有人指出：1958 年以钢为纲的方针非常正确，取得了异常巨大的成绩，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我国找到了一条利用群众路线的办法发展工业的新道路。但是，在办钢铁以来，也出现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某些失调现象，致使有些人又回顾到 1956 年出现

的“马鞍形”，中央各部也感到“元帅”升帐以来有苦有乐，所以大家都想搞运动，都讲第一书记挂帅。这样一来，其结果是压力太大，处于过分紧张的状态，相应也带来各种物资供应不上，长久下去，群众会反对我们。这个组认为：我们不是“唯条件论”，但是必须注意和考虑到客观条件，因为我们是唯物主义者。

东北组在讨论中，有些人认为决议草案以 1070 吨钢为例，说明“经济发展速度必须建立在客观可能的基础上”，似乎是说这个任务没有建立在客观可能的基础上，因而不主张举这个例子。另外有些人则认为决议草案的写法是适当的，1070 万吨钢的问题本身就包含着既可能又太紧张这两个方面，我们正是从这里得到了文件中所提的经验教训的。

对 1959 年的计划，西南组建议将决议草案所说“为 1959 年钢、铁、铜、铝、机床、发电设备等产品的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的项目，分别加以斟酌，确能赶上的才列上去。东北组谈到轻工业和重工业，工业与农业，煤、铁、木材内用和外调，等等矛盾。由于东北电力不足的影响，不少轻工业工厂已经停产，这样势必影响今后轻工业品的供应。

在讨论计划的具体安排时，各方面的矛盾还是较大的，降低指标也不很容易。东北组感到全国任务指标降了 36%，投资也降了 36%，但东北各省的任务减得很少，有的不但没减，反而增加了，但投资却减了 36%，因此在计划项目的安排和投资、材料供应上还有矛盾。西北组认为，投资安排西北困难更多一些。因为西北地区工业基础薄弱，钢铁、机械元帅没有升帐，钢材指标的削减，就会影响西北的基本建设，如石油、石油机械、有色金属、军工、铁路占了很大

部分，这些方面的项目和投资都不会消减很多，这样就势必削减地方基建项目。在讨论中，部门也有类似意见。机械工业部门反映 1959 年计划生产重型设备 155 万吨是不够的，按各方面的需要是 200 多万吨；机床 13 万台也是不够的，按各省最近提的要求计算是 60 多万台。

情况其实是很清楚的，造成指标难降的原因，主要在总路线、“大跃进”仍然是旗帜，高指标产生的根源没有消除。此外，由于前一段已经造成各方面比例失调和关系紧张，一下子降低指标势必继续导致各地方、各部门的重重矛盾（比如一些在建工程就要停工下马），这些矛盾短时间内也难以解决。

从上面概要介绍的分组讨论情况，可以看出，经历了近一年、尤其是经历了北戴河会议以后几个月的“大跃进”运动，不少人感到出了许多乱子，照这几个月的搞法还会继续出乱子，所以开始从狂热中有所降温。有的还作了某种萌芽性质的反思（如指出不良倾向是在“左”的幌子掩盖下滋生的）。“大跃进”的一整套路线、方针以至做法，在实践中碰了壁，撞了南墙，人们才往回退却。但这只是一种实践本能的反映，还不是一种意识的觉醒。退却和降温都只是量的减少，远远不是对质（即“三面红旗”）的改变，因此它不能纠正全局性的错误，也难以遏止更大灾难的发生。我知道一件事情，是胡乔木讲的，很说明这种退却的局限性。武昌会议通过有关公社的决议后，王稼祥向刘少奇说，不要公布。王不敢向毛汇报，刘少奇向毛转告了，结果毛发了脾气。关于 7500 亿斤粮食，持怀疑态度的人是不不少的，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征购。会后彭德怀到湖南考察时，就担心征购多了

影响农民的生活，要给中央打电报。关于耕种“三三制”的问题，毛仍然坚持，许多人倒是发表了不同意见；照此办的地方，后来吃了大亏。

## 毛的讲话和全会决议

除了11月30日同常委和各小组组长的谈话，在正式的全会上毛泽东只作过一次讲话，时间是全会结束前的一天，即12月9日。

毛一共讲了十二个问题。这里概要叙述一下。

（一）人民公社的出现。中国出了这么一件事，三月成都会议没有料到，五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也没有料到。其实四月间这件事已在河南出现，我们五、六、七月都不知道；一直到八月才发现，北戴河会议作了决议。这是一件大事。我们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办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

（二）关于保护劳动热情问题。对犯错误的干部90%以上，耐心说服，不予处分，叫他们作些自我批评就够了。没有对90%以上犯错误的干部采取不处分的方针，就不能保护干部，就会挫伤干部的劳动热情，也会挫伤劳动人民的热情；没有对严重违法乱纪的一部分人，经过辩论之后，给以轻重不同的处罚，也会挫伤群众的热情，因为他们严重违法乱纪脱离群众。有些特别严重的要作刑事犯处理。总而言

之，在这个问题上，处罚的极少，教育的极多，就能保护广大干部的劳动热情。对干部如此，对群众也是如此。

(三) 有一个口号问题。“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这个口号是否适当？三年办得到办不到？农村也许能够办得到，至于全国，我看还要考虑一下。三年之内，能搞多少钢？大概能搞到三千到四千万吨钢，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搞三、四千万吨钢，就能说基本改变了面貌了吗？这个标准我看提的低了一点，如果这就算改变了全国面貌，今后就没有改头了。这个口号到底怎么说好？值得商量一下，因为报纸已经在大力宣传了。或者提五年基本改变，十到十五年彻底改变；或者说超过英国，算基本改变；超过美国，算彻底改变。我们把改变全国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但是这样的机会主义，当了很有味道，我愿意当，我说马克思会赏识这种机会主义，不会批评我们的。

(四) 党内外某些争论的问题。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外有各种议论，国际上也有议论。主要就是说性急了一点。有冲天干劲，革命热情很高，非常宝贵；但是对于国际的、历史的情况，对于内外局势条件，缺乏分析，过早地纷纷宣布自己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进入共产主义。这些人好处是热情高，缺点是太急了一点。我们这次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对关键的这一方面讲的。可能有几千几万干部，他们是很好的同志，忠心为党为国，他们怕我们搞得太急了，他们不是观潮派、算帐派，不是站在对立面的，是同我们商量问题的。各省都有，有的不讲出来，实际上他们内心是有忧虑的，恐怕我们跌交子。这些人是好的，这个决议也可能说服他们，因为我们并不那么性急。这个决议也给了观潮派、算

帐派以答复，他们则是不怀好意的，他们不懂得当前国内外局势的迫切要求，而且时机已经成熟，并不是不成熟的问题。

我提倡读斯大林的书，提出了两个过渡。两个过渡，如何过渡？这个问题过去不可能答复，比如，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就没有解决。郑州会议作了些准备，经过一个月，已经成熟，现在可以答复了，就有可能在十二月这次会议上作出这个决议。共产主义分两个阶段：初级、高级，现在全世界对这个问题议论甚多，都要我们答复。杜勒斯也在议论，一有机会就讲一篇，他说我们搞奴隶劳动，破坏家庭；说我们剥削太多，积累太多，因而建设的速度快；他们剥削少，所以速度慢。中间阶层、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共产党人也都议论纷纷，各国共产党、无产阶级、外国的同志出来替我们辩论，替我们答复。他们的根据就是北戴河会议和报纸上的消息。我们如果不答复，一大堆混乱思想就会蔓延开来，就会出现很多无政府状态，各搞各的，省、地管不了县，县管不了社，成为脱缰之马。所以，一方面要防止太急，一方面要答复这些问题。

（五）讲一讲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在这几个月内，读一读斯大林的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有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拿出几个月的时间，各省要组织一下。目前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六）研究辩证法问题。郑州会议，小平同志他们提出：“大集体、小自由”，这一提法很好。要抓生产，又要抓生活，两条腿走路，都是属于对立统一学说，都是属于辩证法

范畴内的。马克思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1958年在我国有很大发展。例如，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工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小土群与大洋群、土法与洋法，几个并举。在农业中也是很复杂的，现在有高产、中产、低产同时存在。实行耕作“三三制”是群众创造，北戴河会议抓着了。提出了在高产条件下，减少耕作面积，实行“三三制”，这可能是农业革命的方向。

再有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阶段，有两种所有制同时存在，是对立又结合，是对立的统一。公社，它的根本性质是集体所有制，但是包含了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徐水、遂平都看到此点。

武昌会议提出要实事求是地制定1959年的计划，订计划时要有热有冷，要雄心很大，但又要有相当的科学分析。明年搞3000万吨钢我也赞成过，一到武昌后，就觉得有点不大妙了。过去，我也想过1962年搞到一亿或一亿二千万吨，那时我只忧虑这些钢谁用，只担心需要不需要的问題，那时我还没有考虑可能性的问题。现在看来，还有能不能生产这些可能性的问题、今年搞1070万吨，把大家累的个要死。因此对可能性发生问题，明年3000万吨，后年6000万吨，1962年一亿二千万吨，这种可能，是虚假的可能性，不是现实的可能性。现在要提高客观可能性，不提搞3000万吨，把这盘子放小，只搞1800—2000万吨。是否可能超过呢？到明年再看情况，2200—2300万吨都可以，甚至更多点，行有余力则超过嘛！提出的计划低点，让实践去超过。

现在我们有些人，有些县总是好抢先，提出要先进入共



产主义。其实要先进入共产主义，应该是鞍钢、抚顺、辽宁、上海、天津。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一个是对国际主义不利，中国比苏联先进，跑到苏联前头，看起来不像样子；再一个有没有可能也是个问题，值得研究。

（七）十五年纲要。在郑州会议搞的十五年纲要，这次会议上搁下没有谈。十五年搞四亿吨钢，可能不可能，需要不需要，都缺乏根据，不仅没有充分的根据，而且连初步的根据都没有。所以，目前不定这样的计划纲要。

（八）1958年我们的军事工作有相当大的发展，大整风，军长当兵，参加生产，大办民兵师，这是几件大事。

（九）关于教育制度的改变。实行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制度，应该说这也是一件大事。当然，也发生了一点问题。例如，有的学生不想读书，劳动搞出味道了。如果很多人不想读书，就成了问题。成了问题，就开会；开了会，又想读书。

（十）两种可能性问题。一种事物总有两种对立的東西。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托儿所，会不会巩固？看来会巩固。但也要准备有些可能垮台。巩固与垮台两种可能性是对立的两面，同时存在，如果不准备就会大垮其台。我们这个决议是为了让它巩固，但是如果垮几个，就不会巩固。总趋势是巩固、发展。

我们的党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巩固，一是分裂。精神上要有准备。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胜利下去，或者灭亡。所以，我们要积极准备，大搞钢铁、搞机器、搞铁路，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我们的工业基础，使我们国家比现在巩固。我们现在全世界名声很大，一

一个是金门打炮，一个是人民公社，还有钢 1070 万吨。这几件大事，我看名声很大，而实力不大。这一点要看清楚。不要外国人一吹，报纸一登，打开报纸一看，尽是说的大话，尽是说干劲冲天，就搞得神乎其神飘飘然了。

要估计到不高兴的这一面，索性讲清楚。别人讲不爱听，我就借机到处讲一讲倒霉的事情。无非是托儿所垮台，公共食堂垮台，人民公社垮台，党内分裂，脱离群众，或者被美国占领，国家灭亡垮台，只剩下一些游击队打游击。但是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规律管住了，不管怎样，所有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

（十一）关于我不担任共和国主席的问题。这次要作个正式决议，希望同志们赞成。

（十二）国际形势。今年这一年有很大的发展。敌人方面烂下去，一天一天烂下去；我们方面好起来，一天一天好起来。真正丧气的是帝国主义，它们烂、乱，矛盾重重，四分五裂，它们的日子不好过，他们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它们没有变成帝国主义之前，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是它们的好日子，现在的时代是帝国主义灭亡的时代，是我们的好时代。我们社会主义的情况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当然，也要估计到曲折，还有长期的、复杂的、艰苦的斗争，并且要估计到战争的可能性，可能要打大仗。（会议期间印发了毛写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充满了豪情壮志，大大鼓舞了与会者的情绪。）

毛的这篇讲话，对一些过高的指标有所降低。比如，1959 年钢产量计划，由 2700—3000 万吨下降到 1800—2000 万吨；“三年改变基本面貌”的口号，延长为五年以至十年、

十五年；对抢先进入共产主义的浪头，也批评“性急了一点”。他号召大家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政治经济学；还认为《十五年社会建设纲要》缺乏起码的根据，主张目前不定这种计划。

然而，也就在这次讲话中，毛对人民公社有许多由衷的肯定，认为人民公社是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实现两个过渡，便于办很多事。他以徐水、遂平为例，说明人民公社包含了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并认为人民公社总的趋势是巩固、发展。毛确实对人民公社极为欣赏，因为同他的理想社会模式是一致的。

会议期间，毛批示印发了《三国志》中的《张鲁传》。他先后写了两个批语。第一个批语说到：“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了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天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这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

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

第一个批语的铅印件，毛用墨笔划去，另写了一篇，即第二个批语，印发给会议。这个批语主要是介绍汉末张鲁行“五斗米道”的情形：“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来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

张鲁，汉末北方农民领袖，为反抗朝廷，行“五斗米道”，以“置义舍”、“置义米肉”等动员农民百姓。“五斗米道”是以宗教形式进行农民斗争的手段。把人民公社同一千多年前的“五斗米道”联系起来，将那时的“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看作公共食堂的“先河”，毛泽东自己再明白不过地揭示了他的理想社会的模式，同中国几千年来农民平均思想传统的历史联系。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孕育、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传统，在中国源远流长，不仅被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当作旗帜，而且一直影响到近代中国的许多先进人物。无论是拜上帝教的洪秀全，受过西方文化熏染的康有为，还是土生土长的青年毛泽东，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理想的精神幽灵，都曾在其思想空间里徘徊过。毛早年关于大同社会的梦想，到晚年又重新燃起火焰。从给徐水送《大同书》，到武昌会议印《张鲁传》，尽管前者是公社初起之时，后者是开始降温之际，却有着前后完全一致的思想底蕴，即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迷恋与神往。

毛在六中全会既讲划清两个界限，又着力维护人民公社

这面旗帜，恐怕还同国际上的反应有关。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哄而起，国际上议论纷纷，有褒有贬。两方面的评论他都注意到了，其中来自西方的批评和指责更为注意。11月10日《参考资料》刊载合众社电讯称，美国官员说：“毛泽东已经使他的国家野心勃勃地执行过去从来没有执行过的共产主义原则；“这位共产党中国领袖正在纸面上把社会组织成为最有效的生产单位”。14日和19日的《参考资料》，再次先后刊载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美国的两次演说，其中指责了中国的公社化运动。这些材料毛都批示印发给了全会。

毛泽东是“挑战”与“应战”心理极为强烈的人，对于来自西方的批评自然是一概予以坚决回击。这就是他在讲话中说的，“要答复这些问题”。反对西方国家对国内政的干预，理所当然，天经地义。问题是在解决国内问题时，他也带有这种心态，把国内的批评意见指责为“观潮派”、“算帐派”，认定有不同意见的一些人，“是不怀好意的”。相反，即便是批评“抢先进入共产主义”时，仍然肯定这些抢先的人，“有冲天的干劲，革命热情很高，非常宝贵”。结果是自然给予这种“想象中的农村乌托邦”，以更多的维护，对急于过渡的批评则打了几分折扣。无怪乎，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公社的决议，一开始就是对人民公社的礼赞：“一九五八年，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东部的广阔的地平线上出现了，这就是我国农村中的大规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它一出现，就以它强大的生命力，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

全会于12月10日结束。这天的会议通过了四个文件：《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

划的决议》，《关于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首先肯定人民公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整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大跃进的产物；北戴河会议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的决议是正确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认为，农村人民公社成立的时间虽然不久，但广大农民已经看到了它带来的显著利益；并认为它指出了农村逐步工业化道路，农业中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道路，三大差别逐步缩小以至消失的道路，国家对内职能逐步缩小以至消失的道路。

《决议》认为，人民公社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并将成为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决议》提出，全国人民的任务是经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高速度发展生产力，促进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逐步使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从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实现全民所有制，逐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决议》说，全部完成这个过程，从现在起，将需要经历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同时指出，由农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转变，由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是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区别的几种过程。企图在农村过早否定集体所有制，匆忙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是不适当的，也

是不成功的；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决议》还提出，人民公社的生产、交换、消费和积累，都必须有计划。人民公社的计划应当纳入国家的计划，服从国家的管理。《决议》又说，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错误的。

《决议》还提出，农村人民公社分配给社员个人消费的部分，要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人民公社必须注意关心群众生活，办好公共食堂、托儿所和幼儿园、敬老院、中小学和成人教育。《决议》要求公社各级领导人员必须对社员群众采取同志式的态度，严格禁止用那种压服群众的国民党作风、资产阶级的作风来对待群众。

《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主要是对北戴河会议通过的1959年计划作调整，降低一些过高的指标，毛在12月9日的讲话中说，这个决议慢一点发表为好，只发表一个公报，到明年三月人民代表大会上再发表好一些。所以会后没发表这个《决议》。但是新华社发表的全会公报，还是公布了钢、煤、粮、棉四大主要指标，钢为1800万吨，煤为3.8亿吨，粮为1.05亿斤，棉为1亿担。其中除了

钢的指标下降了之外，煤的指标还略有提高，粮、棉指标没变；况且就是已经降低的钢指标，后来证明也是不可能达到的。因此，经过调整的指标仍然很高，会议期间，陈云曾向胡乔木谈到，公报不要公布钢、煤、粮、棉指标和1958年7500亿斤粮食产量，乔木没有向毛汇报。后来上海会议时，毛批评了乔木，说你有什么权力不报告中央副主席的意见；反过来表扬了陈云，还说“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里”。这是后话。

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是继第一次郑州会议之后再次给“大跃进”降温的会议。对原1959年的某些过高的经济指标，会议作了压缩；对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势头，有所遏制。但是，由于对总路线牵头的“三面红旗”从根本上肯定，因而降温只能在这个大框架内进行，不能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毛泽东在这期间，与各省负责人、几个地委的书记进行了座谈，从中进一步了解到一些实际情况，这使他对人民公社以来体制方面的混乱现象，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对第一次郑州会议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两大界限问题，作出了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普遍存在的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激动情绪。但是，这两个界限还都是讲的人民公社外部关系问题，对于人民公社内部的管理体制并未涉及。因此，人民公社仍维持着越大越公就越好的局面，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和扩大核算单位的倾向还存在着。农村中的供给制，“吃饭不要钱”，以及“公共食堂”这些所谓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东西，还是至高无上的，“共产风”仍有增无已。



到武昌会议开完，轰轰烈烈的 1958 年就将要结束了。“戊己诗”组诗中，有一首七律记“1958 年 6 月—12 月”，这是概括这半年中我同毛泽东接触中的“感事”：

春风得意似非时，敢有微言表虑疑。  
海浪滔天心寂寞，湖边消夜话投机。  
镂冰无奈徒功损，画饼如何快朵颐。  
世界大同霎眼到，毫无兴趣论谈之。

第一、二句是说 7 月在上海写第一封信；第三句是写北戴河会议时自己的心态；第四句是写武昌会议找我谈话；五、六两句写浮夸风；最后两句还得略作说明：即武昌会议期间，一次晚饭后同田家英（记得还有陶鲁笏）散步，他们两人对过渡到共产主义，对公社决议中的意思，还是颇有兴趣的，发表了一些意见，问到我的看法，我淡然答曰：毫无兴趣。我刚从苏联回来，到斯大林格勒水电站工地参观截流时，到工人的家庭看过。有的好酗酒的工人，家徒四壁，但总还有一张像样的铁床。我就说，中国家家户户有一张软垫铁床，不知什么时候实现？莫斯科中上层干部的家庭我去过，其生活水平我们还是不能比的。

## 第二次郑州会议

第一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之后，一哄而起，急于向全民所有过渡、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共产风”，虽然受到了评评，但是并没有完全被遏止住。1959年1月15日，王任重还在湖北省四级干部会上作的报告中说：“有的公社调这也调不动，调那也调不动。我说，先礼后兵。经过教育，还是不服从国家统一计划和调配的，就要给以必要的处理，从警告、撤职、直到开除党籍。”至于关于公社和“大跃进”中的其他种种问题，并没有缓和下来。尤其钢铁指标和公社的“共产风”，仍旧是毛泽东两大“心病”。1959年1月底2月初，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几天省、市委书记会议。2月2日，关于经济建设问题，毛发表了一篇深刻自省的话。他说，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虽然我们年纪不小了；应该承认这一点，即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开战，这个战略战术，我们就是不懂，就是不会；要正面肯定还没有认识到，这是我们的错误。他还谈到，这一场战争我们经验不足，我们定的这些指标，这些主观愿望，这些计划适合不适合，我们还都是从实践中找经验。关于经济建设的客观规

律，按比例，这个问题我是没有解决的，这个问题我不懂。现在我们似乎在这里接触到这个问题了。请大家接触这个问题，研究研究，究竟什么叫按比例发展。

他当时更关心的还是公社问题，接触起来也容易了解个细，发现问题。2月下旬，毛又来到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作调查研究。他发现公社化后，国家同农民的关系日益紧张，不少生产队瞒产私分，公社内部所有制方面问题太多，公社平调生产队的物资、资金和劳力，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搞穷富拉平，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2月中旬，他看到广东省委批转赵紫阳（管农业的书记）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的报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报告反映出农村严重存在的社员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问题。所谓瞒产私分，即社员和基层干部不堪忍受虚报高产的重负，故意向上级隐瞒产量，以便能尽量多分一些口粮。也有的干脆就是抵制公社的无偿调拨，保卫自己的劳动果实。因此，瞒产私分既是农民发自内心的一种无奈，又是他们对“共产风”本能的反抗。雷南县集中全县生产小队以上干部4000人开大会，逼出瞒产、私分的粮食达7000万余斤，搞得民怨沸腾。毛之所以对瞒产私分和干部高压逼粮现象极为敏感，是因为他平时对两种情况保持着警惕：民主人士哇哇叫，人民群众上街闹。这都是对政治大局具有威胁性的事情。因此，纠正“共产风”已势在必行，不能再耽搁了。

于是毛泽东决定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参加人员，中央多了周恩来、彭德怀、陈毅、薄一波、陆定一等人，各大区和中南各省负责人同第一次会议基本相同。从2月27日开到3月5日。会议主题是

如何解决“共产风”和公社内部所有制问题。当时，毛已认识到，为了解决公社内部的“共产风”就不能不从人民公社内部的所有制关系入手，就必须在理论上给予必要的说明。

“共产风”这个词首先被使用，正是毛在2月27日的讲话中提出的。他说，1958年，粮、棉、油、麻等大丰收，但是在最近四个月内有大闹粮、油不足的风潮。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管理区六级党委，大批生产队和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即所谓瞒产私分，帽子一顶叫本位主义；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保卫他们自己的产品，反过来，批评公社和上级平均主义、抢产、共产，写条一张，普遍过斗拿走。我以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合法的。他们基本上不是所谓不合法的本位主义，而是基本上合法的正当权利。公社是1958年秋成立的，刮起一股共产风，内容有几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鸭、鸡无偿归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共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遍全国，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在当天的讲话中，毛反复地谈到了上面这些意思，说明在思想中已引起高度重视，其批评也是十分尖锐的。

问题是当时的“共产风”确实发展到十分可怕的程度。湖北是当年领导人思想解放最彻底的省之一。当阳县跑马乡曾经出过这样一件事：1958年10月的某一天，该乡召开社员大会，党委书记当众宣布，11月7日是全乡社会主义结束的日子，8日进入共产主义，一切以共产主义的方式来办。会一开完，社员群众纷纷上街去拿商店的东西，商店的

东西拿光了，就拿别人的，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拿。你家的鸡，我可以抓来吃；我们队的菜，你们也可以任意来挖；甚至连小孩子也不分你我的；只是一条，老婆还不能随便拉别人的。可是，党委书记竟然说，老婆能不能拉，还要请示上级。在 20 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出现这种现象，多么荒唐，多么可悲！这说明，在一个物质产品极端匮乏，文化素质十分低下的国度里，人们只能以一种近乎野蛮人的方式去“实践”所谓的“共产主义”。说得彻底些，这已不是什么“理想”、“空想”的问题，而是一种向人类原始形态的倒退。正如恩格斯在《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所断言的，越是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构筑共产主义，离共产主义也就越来越远。

对毛泽东说来，要纠正这些混乱、荒唐的现象，只能将几个月前设想的那种“大而公”的社会组织形式——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关系进行调整，即降低它们的公有程度和组织方式，这几乎是迫不得已的了。毛泽东甚至认为，党内的主要锋芒还要反“左。”

2月27日，他在会议的第二次讲话中说：目前全国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 1953 年和 1955 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该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的，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接下去，他作了一大段论述：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是

不是公社一成立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马上就可以消灭生产队的所有制呢？我这里说的是生产队，有些地方生产大队即管理区，总之，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第一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对急急忙忙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向共产主义过渡给予了批评，但是没有认识到公社内部的所有制仍有问题。所以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六中全会对积累问题、分配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而不解决这个问题，大跃进就无积极性。现在要出安民告示，现在人民公社基本上是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公社只部分所有制。

从这段论述看，毛泽东对闹“共产风”的原因还是看得很准的，他自己恐怕没料到会发生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后来他很长时间内老感到下面办事没规矩，乱来。殊不知这些乱子的根源，就在于超现实地建立起所谓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方式——人民公社，而除去急于求成和夸大主观能动性等思想原因外，人民公社更多地表现为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

方面的盲目冒进。前面讲过，中国不仅在物质基础方面还处在极为贫困的状态，而且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的文化素养，也是极为低下的。事实上，越是处在这种落后的状态里，人们平均主义的愿望越强烈，人们所设想的共产主义，就是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就如同土改时，有的地方分地主家仅有的一匹布，即使每人只能分得几寸宽的布条条，那也得大家平分，否则事情就很难办。人民公社的“共产风”也同此理，人们仅仅把共产主义理解为“吃饭不要钱”，“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等等。

事实说明，这种“共产主义”是维持不下去的。贫队共富队的产，上级共下级的产，一定会引起后者的反抗，即使你给大家都戴上“人民公社”的帽子也无济于事。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给这种“不分你我”的“共产主义”泼冷水，即在过渡的时间和目前公有制的程度上加以限定。毛泽东说：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要基本上消灭这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把三级所有制基本上变为一级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成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个生产队的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而这就需要几年的时间。目前的问题是必须承认这个必不可少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什么向农民让步的问题。

这种承认社、大队（管理区）、生产队之间的差别，以及三者之间从低向高的过渡，看似“退步”，实际上比八届六中全会以前的认识是大大进步了。毛说：生产队好比是党内过去的山头，不认识，不承认，不照顾，就不能基本消灭

山头。作为过程来看，过去我们没有分析，武昌会议时没有分析，一、二月才分析。谢谢几位农民瞒产私分，使我来想这个问题。要使公社一般懂得这个问题，这是客观法则，违反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根据当时的状况，要说服各地干部接受“三级管理，队为基础（即指生产队）的所有制结构。”是很不容易的，首先是要说服参加会议的各省第一把手。毛说：要承认三级所有制，重点是生产队所有制。“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所有人、土、财都在生产队，五亿农民都在生产队，上面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如不承认所有制，就立即破坏。又说：所有制只能基本队有、部分社有，逐步转过来变为基本社有，部分队有。由互助组到高级社，没有过渡不行。这样做，基本上不是向农民让步的问题，而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公社所有制只能经过几年时间，引导农民一步一步地完成，现在硬要办就违背客观规律，请你自己缩手。关于从基本队有向社有过渡的时间，毛当时认为，可能是“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尽管这还是绝对肯定公社的前提下，所作的一种估计，但是毕竟已从1958年夏秋那个乐观的顶点，亦即“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个“狂热”中清醒过来了；而且终于从所有制这个要害问题上，退下来了。

承认了基本队有制、部分的社有制，也就使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这两大突出问题成为可能；在理论上，也使按劳取酬与等价交换顺理成章了。早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时，毛泽东就几次说过大型人民公社容易出秦始皇，闹独立王国。这次他又提到了“变秦始皇就危险”的话，意思无非是指



“统一拉平分配、积累，社办事业过多，即所谓平均主义与过分集中两种错误倾向产生的根源。他指出：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广大干部讲清道理，经过充分酝酿与讨论，使他们得出真正的了解，然后，我们和他们一起共同妥善地坚决地纠正这些倾向，克服平均主义，改变权力、财力、人力过分集中于公社一级的状态。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至此，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生产大队）为基础的思想基本确定下来。作为一种体制，它又维持了两年半左右的时间。直到庐山会议后，由于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再次大刮“共产风”，使生产力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从而不得不将人民公社改为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1962年），这是后话了。不过应该在一定意义上承认，受到严酷事实的教育，第二次郑州会议的认识水平，毕竟比以往又向中国的历史实际走近了一些。

两次郑州会议，如今已是史有明篇了，论说者们大都给予了较高评价。1958年夏秋之后，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奔腾而来，泥沙俱下。当时热情的人多，冷静的人少。毛泽东较早发现了“乱子”，坚决地说服大家“降温”，并从理论上加以分析，提出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划线问题，把生产大队作为核算的基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共产风”的劲吹，这个及时自我转变，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毛究竟是“始作俑者”，当时所作的这一切，还都是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就不能不使纠乱、纠“左”受到了根本的限制。如北戴河决议和六中全会决议所

说，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使我们农村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也是我们的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完全肯走的了。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又说：谁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他就不过是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账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如果说，毛泽东上述关于经济组织形式与理论问题的划线，是一种探讨性的，还容许研究的话，那么在政治上的划线都是严格的和绝对的，丝毫不容人们有所疑问。因此，即使是在纠乱、纠“左”，人们却不能超越这个政治界线；而这个界线又是由他个人掌握，因人因事而异的。这在随后的庐山会议上，就得到了证明。

由于三面红旗不容怀疑，这使毛在“乱”与“左”的性质问题上，有很大保留。例如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讲到“共产风”的原因时，他说：“只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的过远了一点”；但马上又说：“很明显，这种缺点只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这首先是由于中央没有更早地作出具体的指示，以致下级干部一时没有掌握好分寸。”这就是说，犯错误只是方法问题，而主流是必须肯走的。“十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是我们在“大跃进”中最耳熟能详的提法了，可它既不能对错误作真正定性定量的分析，又常常使人背上政治包袱，结果，对“乱子”的纠正也就深入不到本质上去。而且即使设想从基本上生产队所有过渡到基本上公社所有制有个过程，也过于乐观地估计了这个过程的时间。毛洋

东说，由高级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到公社的集体所有的完成，可能要经过四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譬如五年、六年、七年时间。他设想，从 1958 年算起，三、四、五、六、七年内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完成了，并且可能有一部分人民公社或大部分人民公社转到全民所有。毛泽东的这个估计显然还是过急了。今天我们看得更清楚，不要说公社所有制，就是生产队所有制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也是超越了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这个问题有待历史的发展来解决。第二次郑州会议刚结束，毛就在一封党内通信中说：“3 月份可以基本上澄清和解决人民公社问题中一大堆糊涂思想和矛盾抵触问题。4 月份起，全党全民就可以一个意向地展开今后的大跃进了。”可见他对问题的性质想得多么简单，自身情绪又是怎样乐观轻松了。

毛泽东在两次郑州会议上虽然讲到价值法则的作用，但那并不是在实行商品经济的意义上讲的。他说，一平二调，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等于剥夺，因此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无偿占有。后来他还说过价值规律是一所伟大的学校的话，这无疑都是对的。但是，他仍是在向共产主义过渡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同商品生产的关系上，来谈这个问题。商品经济中的价值规律，是迄今为止的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无法超越的。对于价值规律的历史作用，他的认识是很不够的。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这样说过：“价值法则不起调节作用，只是计算工具”；还说“旧账一般不算”这就表明，在这些经济规律亦即马克思学说的基础的认识上，他同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有很大的距离，也是似是而非的。

对于“共产主义”的憧憬，可以说是毛泽东一生从未稍懈的追求，以致使他常常陷于空想。1958年之后，他一直按照这种来源复杂的非常虚幻的共产主义模型，以他驾驭战争的胆量和魄力，去改造中国，这就难勉不出乱子。直到乱子越闹越大，他才把自己的时间表拨慢了一些，但仍然抱着可以预见的企望，15年、20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以后，社会主义的公社就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公社。”这对于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说来，是近于荒唐的。中外史家们对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源，作出了种种分析。这个问题，我在《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文中，有所论述，这里不再多说。应当指出的是，根据当时那种天下大乱的情况，两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确实起了一定的急刹车的作用，也提出了些合理的思想。但在改正“左”的错误方面，是极不彻底的，没有接触到完全脱离实际和理论误区的深层，甚至还有进一步文过饰非的倾向。比如《郑州会议记录》就收入了他这样的话：对于批评，“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顶住”，以“粉碎那些落后分子的嘲笑和敌对分子的进攻。”结果不久就出现了严重的反复，并且造成更大的破坏。

## 陈云抓设备成套工作

“大跃进”时期，陈云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他虽然仍是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但这个职位当时很难起统筹全局的作用。两者开会时，我常参加，这种印象很深。记得有次参加建委日常会议，他问我：新安江有没有把握？新安江水电站规模同东北的丰满相似，已于1957年开工。1952年，我转业到工业系统，主管水电建设是陈作的决定。五十年代初燃料工业部时期（煤、电、油还没有分开），苏联专家组组长曾一再告诫，中国要接受苏联的教训，不要急于建大水电站。他的这个发问，可能还受这种影响。当年被毛泽东认为“保守主义思想代表”的陈云，“大跃进”时受到的压力很重，被迫作过检讨，处境是很困难的。接管沈阳时，我在陈的身边工作过半年，知道他处事的思维习惯：根据实际情况，反复比较，定要做到稳妥可靠。“一五”计划执行过程中，他常提醒大家，计划搞大了、快了，行不通，再一调整反而慢了，结果好心不得好报。他常说的打趣话：“快了就是慢了，慢了就是快了。”苏联计划工作按比例求平衡的主要经验，陈云有深刻理解。他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常谈农

业与工业、重工业与轻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工业与交通之间的四大比例关系，以及财政、信贷和供需三大平衡，必须经常注意。他还常谈到中国的弱点：人多地少，工业底子太薄，技术力量有限。总之、他所坚持的经济必须按比例发展，搞好综合平衡的思想，我认为当年在工业系统干部是比较理解而且遵从的。

1954年电力工业代表团（刘澜波任团长，我任副团长）曾在苏联参观四个月，深入了解了苏联水电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回国后，我就根据中国水力资源和优越的开发条件居世界首位这一情况，广为宣传中国应当大力和优先发展水电，自己也有能力建大水电站；水轮发电机的设备制造，也比火电机组容易自力更生。“一五”期间，狮子滩、古田、官厅、上犹等中型水电站建成后，新安江、新丰江、拓溪、刘家峡等大型水电站也先后开工。新安江从流域规划到坝址选择，从设计方案到工程局的组建，全过程我都直接参加，尤其同苏联专家关系密切；1957年开工后，施工质量也抓得很紧，因此，对陈的这个提问，我作了负责的肯定的回答，并作了简要的说明，要他放心。1958年12月，建委在杭州召开了全国基建工程质量现场会议，12月23日、26日，陈云先后两次讲话，谈到1958年基本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尤其是厂房建筑结构，以及设计、施工到建筑材料都发生许多严重质量事故，出现了大量的人员伤亡。《陈云文选》中已收入这两篇讲话。新安江等大小电站的建设，还是比较正常的。

## 1958 年设备不成套情况

当时在基本建设和重工业生产中暴露的突出问题，还是设备的成套供应困难重重，尤其炼钢、轧钢、电站等重大设备，都难以成套。这在当年的经济建设中是一个新的大问题。“一五”时期所有的重点建设项目，其设备主要由国外供应，国内只是管某些辅助设备和零件的生产。1958 年根本改变了这一情况，基建项目所需设备的绝大部分，改由国内制造供应。这标志我国机械工业由修配为主转而制造为主。这方面取得成就应当予以肯定，对中国的工业发展可以说具有历史意义。例如制成了 1513 立米的自动化高炉、500 吨的大型平炉、25000 千瓦的高压高温发电机组等，这些设备安装后都已正常运转。但全国各行各业出现的“大跃进”，随即带来了严重的后果。1958 年生产并且配成套的中、小型高炉共达 61000 立米，而在“一五”期间建成的全部高炉（包括国外供应的大高炉），也只是一万多立米；转炉共达 1723 座，年产钢能力 1342 万吨，而“一五”期间建成的炼钢能力，包括平炉、转炉、电炉在内也只有 431 万吨。全国生产并且安装了 75 万千瓦的发电机组，而“一五”期间国内总共只生产 22 万千瓦。其他如煤炭、化工、建筑材料、轻工、纺织等方面，一年新增加的生产能力也都大大超过了“一五”期间的任何一年，有的接近“一五”的总和。

问题的严重就在设备不能成套。“以钢为纲”、“元帅升帐”之后，全国各地一年之内共生产了大小高炉 14 万立米，

配成套的只有 61000 立米，比重为 43%；生产了大小转炉共 3223 座（容量 4681 吨），配成套的只有 1723 座（容量 2684 吨），比重为 57%；轧钢机布置了 261 套，生产了 197 套，配成套的只有 33 套，比重为 17%。共生产大小发电设备 110 万千瓦，安装了 75 万千瓦，真正配成套发电的只有 52 万千瓦，比重为 47%。从设备的大小来考虑，大的配套少，小的配套多。如高炉，255 立米以上的配套比重为计划的 28%，75 立米到 255 立米的 31%，3 立米到 75 立米的则超过了计划，达到 119%，其他煤炭、化工、建材、轻工、纺织等设备，配套的情况也都同冶金、电力差不多。

所谓设备不成套，1958 年发生的具体情况有 4 种：

一是有许多单机不成套。如沈阳水泵厂工业用泵共发货 11690 台，有 25% 缺电动机，35% 缺阀门。沈阳空气压缩机厂共生产空气压缩机 1377 台，其中有 40% 以上不成套。其他如鼓风机不带电动机，机床不带电动机和卡盘，高压开关不带瓷瓶和套管，以及电器控制设备、滚珠轴承、风罐等等供应不足情况，较为普遍。

二是基本生产车间的设备不成套，如高炉，转炉、轧钢，主要是缺吊车、卷扬机、水泵、鼓风机、空气压缩机、电动机、变压器、渣灌车、铁水车、铁水包、钢锭模、热工仪表以及电器控制等辅助设备。

三是辅助车间的设备严重不足。有的生产车间的设备虽然已经基本成套，但辅助车间如机修、耐火材料、木工、氧气站、煤气站、试验室等等，所需各种设备则严重不足。

四是许多新建工矿企业的厂内运输系统、供水排水系统、配电变电系统的设备和器材，都不能配备齐全。有的



则是厂外协作的工程和设备。如铁道专用线、车辆、厂外输电变电等没有同步到位。

这种现象当然是由于计划几次变动，各级又层层加码，钢铁一马当先从而万马奔腾的局面造成的；同时也是由于大家都对设备成套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这也说明我国机械工业从修配到制造，从制造辅机到制造主机，再进面到全部成套，短短一年之内，一哄而起，齐头并进，自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上述这种局面。具体分析起来，存在这样一系列问题：

(1) 扩大了主机生产，没有安排相应的辅机和配件生产，经过商业环节供应的产品更注意不够。

(2) 设备供应同进度脱节，主机同辅机的进度脱节，基本生产车间同辅助车间设备的供应脱节。

(3) 机械工业内部有关各种设备的生产能力，严重的不平衡，主要是主机与辅机之间，主件与配件之间，机械与电气之间、基本生产车间与辅助车间之间，大都存在前大后小的情况，尤其是大型铸锻件、起重运输、动力、电气控制等设备，以及仪表和滚珠轴承的生产能力不足；工业基础薄弱的地区当然更是严重不足。

(4) 材料分配制度、品种与数量等不能适应设备成套要求，由于层层加码，材料使用也过于分散。

(5) 商业系统的五金、交电公司和一机部的销售工作，当然跟不上全国“大跃进”的形势。

(6) 各行各业管理权限下放，行业间的协作关系大变动，加以地方的积极性大大调动起来，组织协调工作一时跟不上去，自然也影响设备的成套供应。

到 1958 年年底，上述这些情况和问题已大体暴露出来。为了深入了解当前重大建设项目设备成套供应的具体情况，研究 1959 年第一季度计划安排中的成套问题，提出今后如何组织设备成套生产和供应的办法，在建委开会研究后，陈云决定派出中央检查组到全国几个大区，配合各省市区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根据检查情况，对现有不成套的或多余的设备，进行合理的调配；也可以对一季度的生产分配计划，进行个别的调整，以保证主要建设项目及时投入生产。

### 向全国派出检查小组

1959 年 1 月 2 日，中共中央为此事向上海局和各省市区党委发出通知，中央派出六个小组，于 1 月 5 日左右到达各地，进行设备成套的重点检查。检查的范围以冶金设备（炼铁、炼钢和轧钢）、发电设备的成套生产和供应为中心，同时也检查其他行业重点单位的配套工作。建设单位和生产单位相结合进行检查，其依据为国家批准的建设项目、进度，以及北戴河会议时规定的冶金、发电设备生产计划。通知还提到建委已经做出的决定，中央要建立设备成套总公司，各地设公司和分公司（当时一些工业重点城市已经开始建立这种公司）。

通知中还开列了六个小组的负责人名单：东北组以辽宁（沈阳）、黑龙江（哈尔滨）为重点，组长是国家经委副主任王新一、水电部副部长李锐；华东组以上海为重点，组长是国家经委副主任谷牧、副组长是一机部副部长汪道涵；华北

组以太原、包头（包钢）为重点，组长是冶金部副部长高扬文；中南组以武汉为重点，组长是国家经委副主任叶林，西南组以贵州（贵阳）为重点，组长是一机部副部长黎玉；西北组以兰州为重点，组长是国家建委副主任杨作材。各协作区办公厅主任为各组副组长。

出发前两天，1月4日建委开会，经委、计委负责同志都来了，当时形势已很紧张，第一季度的基建、生产任务肯定完不成，制造出来的设备多不能成套。发电机要发电，缺一个仪表、一台变压器也不成。当时要抓三个环节：生产厂家、商业系统和基建单位自理。陈云首先谈到，当前为什么要抓成套？“一五”都靠国外进口，现在基建规模如此扩大，主机要由国内解决。1958年只注意了主角，对配角注意不够，越砍越不成套。接着谈到体制下放，分级管理，所谓“全国一盘棋”，实际上地区、系统都各自打算，旧有协作关系打破了，新协作关系没有建立起来。如大连机车厂，机架原由上海供给，现改由冶金部门供应，为别人打杂，地方不干了。此外，配角都想升格当主角，也造成紊乱。长春汽车厂的配套设备无人负责。只有主角没有配角，是唱不成戏的；加以到处材料紧张，于是只好保主角了；第一季度的非标准件供应，即差20%。他说，设备没有成套的问题，要从生产厂矿和基建单位两方面检查。东北、华东着重生产，西北、西南着重基建。他随即谈到建立成套，公司的问题：单机成套由生产的厂家解决；生产线的成套则须设立成套公司这样的机构；新建一座工厂的设备成套则需要建委统筹。成套公司的任务，对生产是总订货人，对用户是总交货人。上海、东北主要是机械出口公司，贵州这样的地区则是进口公

司，成套公司也不可能一切都包，只能管设备分交；一个地区的公司也不能一切全管，有的要由外地管一部分。各地公司之间要有适当分工。建立成套公司必带来一喜一忧，落后地区高兴，先进地区则忧虑重重。

陈云在会上还讲了很多具体意见。说西北地区不能永远靠人家，必须自己建设设备的配套工厂；落后地区可以派人去建配套厂。关于机械制造，由一机部统管。东北缺精细，上海缺重型；哪些可以出口，哪些还要进口？一机部统管也分直接与间接。分组下去检查重点，各地有所不同，要深入了解配套力量，尤其落后地区。新建厂子要有足够力量配套。有一些上马厂要准备下马。要研究一些配套办法，凡现在能解决的，可以就地处理一批。配套还得分级统管，一机部有调动权力，一年开几次会，各地建委参加统管。总之，要解决好四个环节：配套厂，配套分配的计划，协作关系，总管机构。陈还强调，配套决不次于主件，要提高配套的地位；计委要考虑周全，材料要统一分配，要做好协作、调配工作；要对先进地区讲清楚，命中注定要多搞配套，这是光荣任务。下去调查 20 天，找出典型和问题，回来再开会和解决问题。

当时各地交电器材公司已抢购一空，周转材料很少。1957 年国家有 150 万吨周转钢材，当时只有 120 万吨，周转余地很小，影响厂矿正常生产。大家认识到，1959 年面临两大危哈，即材料与运输。初步估计，整个机械系统只能完成计划的 50—60%，高指标互相挤压着，都不能前进，因此必须退够的问题已提到日程，不能再搞形快实慢，而要转为形慢实快，待局面好转再加速。当时有个共同性的问题，

即 1958 年 6 月中央各部放权，80% 以上厂子都下放给地方，发生种种严重脱节现象，如材料不能及时到位，尤其钢材保证不了品种规格，有的地方甚至改变厂子的性质，辅助厂改产主机，全乱了套，好些下放厂必须收回，地方办不好，也无力解决遇到的种种问题。建委开会时，已作了此种考虑。

我所知道的电力设备中有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绝缘材料难解决，这些厂都下放了，而化工厂不能保证材料供应，有的厂已半停产。绝缘材料主要是云母和玻璃纤维及其制品，当年我国这两项工业都很落后。1958 年全国生产云母粗选矿 3200 吨，1959 年计划 10600 吨，而一机部根据已定的电机、电讯器材计划，必需云母 20000 吨，只能满足需要的半数；其他军事、科研、邮电等部门还需要一些云母。1959 年，一季度全国需云母 4000 吨，各地反复磋商，只能安排 1100 吨。当年全国 21 个省、区 60 多县的 200 多处矿点，已查明的云母藏量仅 37000 多吨。高级玻璃纤维更是一门新的工业。1958 年全国生产玻璃纤维 13 吨，1959 年新建的工厂，满打满算可以生产 2100 吨，而一机部按计划共需 9200 吨，只能满足五分之一，一季度只能满足所需的十分之一。

## 东北组的检查情况

参加东北组的共有建委、经委和一机、冶金、水电、煤炭、石油等部的局处级干部 20 多人，由王新三和我领队，于 1 月 6 日到达哈尔滨，东北协作区办公厅主任倪伟参加哈尔滨组。第二天即开大会，东北三省的有关领导和冶金、电

力、机械三个局及有关各部门的负责干部一百多人参加。会上决定分冶金、电力和一般机械三个组，先听取汇报，然后分组检查讨论。7日到10日，三省汇报冶金和电力设备生产情况，并听取哈尔滨发电机、汽轮机、锅炉三个电力设备制造厂的详细汇报；11日、12日，哈尔滨地方有关电力、冶金配套厂汇报；13日，一机部副部长刘鼎专门谈了水压机问题；15日到17日，黑龙江省继续汇报冶金设备及地方有关情况，三个电力厂继续谈存在的问题。17日晚上，陈云在北京主持召开了6个检查组连同北京组的电话会议。王新三大概是13日率一部分人员到沈阳，检查和研究辽宁有关厂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我还到三个电力设备制造厂的车间参观，并同厂内干部分别座谈有关问题。自己职责关系，电力设备的情况我了解较多。水电部1月24日在天津召开全国水利电力会议，我于21日经沈阳先期回到北京。

除开某些非标准件需由基建单位自理外，所谓设备成套，从制造方面说，全是机械工业系统的职责。为了适应“大跃进”的形势，1958年2月，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和电机制造工业部合并，成立新的一机部。北载河会议之后，粮食、钢铁和机械并称三大元帅。全国基建投资，1958年比1957年增长一倍，1959年比1958年又增长30%，所有基建单位尤其冶金、电力都向一机部要设备。据我当年的接触，一机部同冶金部相比，上上下下的领导干部尤其部一级领导，在当年那种狂热的形势下，他们还是比较冷静一些的。因为机器这个玩意儿同炼铁不同，很难动员千百万群众上山搞“小土群”；机械设备同“洋”结合得紧一些，只有“大洋群”；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可是，由于80%

的部直属厂都下放地方，加上管理权层层下放，计划层层加码，所谓由部来统管、平衡、技术和统一技术标准，在当年那种“遍地开花”，竞放卫星，地方也大办机械厂的形势下，自然无法实现。相反，造成重数量、轻质量等混乱局面，尤其打乱了原来的协作关系。“大跃进”3年中，机械工业的浪费也是惊人的。例如冶金设备，1957年年产量1.38万吨，1958年到1960年总产量达66万吨，其中就包括上万套简易小高炉、小转炉，上千套简易炼焦设备，300多套简易轧钢机。又如金属切削机床，1957年产量2.8万台，其后3年累计达35万台；其中简易上机床和皮带机床就有28万台。所有这些都是效率低、能耗高、性能差的设备，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都是极其严重的。

关于东北三省1958年冶金、电力等等设备和配套完成情况，以及一季度任务预测的汇报与讨论，当年我作了详细记录，三个笔记本有幸保存下来了。密密麻麻的数目字，各种设备名称、专业术语，现在看起来，真是头昏脑胀，难以理清，我尽可能将简要情况摘录下来。

关于1958年冶金设备和配套完成情况，第一天三省分别作了汇报。炼铁高炉：75立米以下超额完成200多台，以上完成较差，但最大的1513立米建成了，这是一个很大成绩。吉林计划61座，完成5419座，其中最大32立米，小的都在10立米以下。黑龙江计划323座（北载河只计划13座），完成597座，最大的255立米，大部是55立米以下的。三省的炼钢转炉、电炉都超计划完成1至2倍不等。轧钢机全国计划261套，东北三省64套，已完成37套，其他都已投料。为轧钢机配套的设备，从220千瓦到1800千瓦

的电动机，都已超额完成，多余近 100 台；鼓风机也已完成。有关三省冶金设备情况，1 月 17 日夜的电话会议时，王新三作了扼要的汇报。

关于电力设备及成套问题，当年是自己的专业，许多问题比较在行些。1958 年 6、7 月间在上海参加华东计划会议时，我去参观过闵行的三大电力设备制造厂，深知电机制造的复杂与质量的严格要求。当时在一机部主管电机制造的负责人周建南，是我延安时的老朋友，抢救运动时一起在保安处坐过牢，我们之间能够无话不谈，当时对“大跃进”的许多做法，也都有共同的忧虑。火电机组转速每分钟 3000 转，对主轴的质量要求很严格。我国的水轮发电机制造始于 1941 年，容量几百个千瓦。四川龙溪河下碛第一台立式水电机组 800 千瓦，是 1952 年由沈阳和哈尔滨两个厂子制造的，转速每分钟 750 转，总重 10.6 吨。那时就感到万事开头难。从 1954 年制造官厅水电站的 1 万千瓦机组，到 1959 年，可说是“三级跳”，制造新安江 7.25 万千瓦机组：转轮 4.1 米，每分钟转速 150 转，发电机座直径 10 米，机组总重 730 吨。其中种种困难我是了解的。

当时全国制造电力设备的大厂主要是哈尔滨（上海 3 大厂建立稍晚），四川德阳厂刚开始基建，其它工业城市只能做较小的电力设备和参加配套。哈尔滨发电机、汽轮机、锅炉 3 个大厂担负任务很重，正在生产多种容量的火电与水电机组，火电大机组有 1.2 万、2.5 万、5 万千瓦，还有大量的 1500 千瓦等小机组；水电有新安江的 7.25 万千瓦，以及 1 万、1.25 万、1.5 万、1.6 万、7500 千瓦不等的机组。火电还准备放卫星，试制 10 万千瓦机组。水电机组所需材料，



其质量、规格远不如火电要求高、如汽轮机比水轮机复杂得多，水电也不需锅炉（它的锅炉是水库）。经过几次汇报、座谈，并到三个厂子察看，情况了解得比较清楚。1958年计划生产的35万千瓦，尚缺许多材料，没有完全配套出厂。1959年计划更大，如一季度火电即需生产3台5万千瓦、5台2.5万千瓦。当时2.5万千瓦机组还未达到完全稳定成熟阶段。5万千瓦机组没有试制期。许多新产品要试制，与配套有关问题甚多。

3个厂突出的问题是材料供应严重不足。首先是铸锻件大轴（汽轮机与发电机以及水电机组转子的主要部件），1958年的任务就没有完成，如5万千瓦火电机组14套，北满特殊钢厂只交了3套。其次是绝缘材料。云母第一季需要150吨，厂家只能交30吨；云母制品70%靠剥片，由于缺原料已经停工。东北的海城、凤城、辽阳、清源、罗北等县都有云母矿，归建设部管，有的矿只缺人去开采。其他如富尔马林（甲醛）全年需要3300吨，甲苯要1200吨，以及碳酸等，都还无着落，白布带也缺（1958年需7万匹）。绝缘材料共计63种，是一个特殊困难问题。大家的意见，这些厂子应归中央统一管理。发电机缺铜线，也缺玻璃丝（1吨铜线要60公斤）。这是由于电线厂缺铜料，第一季度需152吨，直流机使用的钢排，都无着落，汽轮机厂的合金钢管差30吨，无缝钢管差200吨，叶片锅差70吨。叶片锅的利用率低到10%：如用5吨到10吨的模锻锤压，可争取达到50%。5万千瓦汽轮机的7个部件（所谓“小岛”）——高压加热器、低压加热器、起动抽气器、真空泵、汽油器、输水器、油水器管及阀门，都是新产品，都还没安排生产。5

万千瓦高温高压机组的 230 吨锅炉，有气包，没有钢管与过热气管；由于缺材料，管道车间已停工，水冷壁也全停工。此外，如蒸发器、减温减压器都还没动手，给水泵连图纸也没有。可是“放卫星”的劲头仍高，同时，还忙着搞 10 万千瓦机组的 680 吨锅炉去了。

3 个厂几次汇报，我当年的笔记本子中还记录了这样一些项目和数据：小岛上的合金钢管，分配 307 吨，都未到货。仪表、电动机、轴承、阀门等都没解决，这是原有上海十多个厂协作的。铸造车间材料，缺生铁 2100 吨，废钢 3000 吨。电焊条缺钢丝，原由天津供应。全部阀门需浇制钢 750 吨，只得 300 吨（制作无问题）。全部自制配套件需钢 2120 吨，都还没有着落，这些有关浇铸件过去全由上海厂供给。铸铁产品要 1648 吨，5 个协作单位不愿干了，他们都要生铁和焦炭。温度计、压力表、小电动机等外购件，都无协作单位。煤气站原煤也有问题，共需 4.2 万吨，只得 1 万吨。电石 270 吨没着落。作为动力的氧气问题严重，30 立方米机只能生产 200 瓶，差一半。厂内需要内燃机车头、50 辆卡车。这些都没有解决。

大家感到，电站配套问题，需要认真解决 1 台 5 万千瓦机组的全部环节，从铸锻件到绝缘材料的所有问题，以便心中有数。有的按老手册安排，主要配套在直属厂或下放厂，次要配套在省属地方厂，订货会议时应全部查对清楚。地方要动员各有关厂，经过群众性检查，才能将问题全部暴露出来，尤其辽宁有关厂子多，要早动手。从设计、基建、材料供应到生产配套等单位，都要派人参加，长春电力设计院、哈尔滨工业大学（担负有任务）都要来人。先检查 1958 年

的，然后再检查一季度的。倪伟和李范五（黑龙江省省长）都强调：国家同地方关系，先国家后地方，先一本账后二本账（所谓“二本账”是当年地方追加的计划，比国家“一本账”要高），先保证完成国家的计划任务，对此思想定要打通。此外，新闻界还要多宣传配套光荣。

同冶金、电力等重大设备制造有密切关系的锻压件，如轧钢机的轧辊、汽轮机、发电机的主轴等等原材料铸锭都由北满特殊钢厂供给。这个厂存在的问题，除数量不足外，还有成品率低，只达一半左右；此外煤气炉原煤不能保证，低硫、磷好铁也供应不上。

所有这些需要锻压的部件，都离不开水压机，当时好些大厂都想搞水压机，但精密的320吨高压泵却无人管。好几台3000吨水压机开不了机。冶金系统的水压机68%已转给一机部组织使用。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6000吨、3000吨、1200吨的水压机都已安装好了，但是26个热处理炉未能及时交货，经过试验的上加热炉已告失败，而且还缺吊车，以致这些水压机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为此，一机部军工厂解决水压机的非标准件，但要求中央解决急需物资，除木材6000立方米、焦炭900吨外，还需1200吨水泥、3000吨钢材、54吨生铁、260吨矽砖、1860吨其他砖、1.7公里钢轨，等等。

1月16日晚上还专门谈了铁路运输问题。1959年第一季度，全国按计划需运123000万吨。比58年四季增加400多万吨。黑龙江任务很重，第一季1400万吨，比上年第四季增180万吨。当时全国计划每天需34000车皮，实际只有2900，首先是车皮不够。依次的问题是：机车用煤质量差，

导致晚点。打乱运输秩序；装车速度慢，在厂内停车延长了时间，如北满特殊钢厂、哈尔滨锅炉厂都常发生此种情况，锅炉厂每天有 80 个车皮出入；运输人员有情绪问题，吃包米稀饭，取消了计件工资，等等。一月份顶高日完成 3000 车皮，二月份难有改善，春节放假，严冬，客运挤货运。三月份可能有些改善。全国一月份可能制造 6000 到 8000 辆货车皮。当时不合理运输甚严重，如黑龙江的煤运到两广炼铁。

我的第二个笔记本封里有这样几行字：已写报告和拟写报告：1、绝缘材料。2、合金钢材。3、35 万千瓦（1958 年）生产情况及其材料问题。4、35 万千瓦基建情况。5、一季生产情况。6、电站配套问题。7、三厂问题。8、协作问题。

这些报告现在当然找不到了。但有一篇千字小文保存下来，可以稍稍说明我当时对设备成套问题的看法和急切心情。这就是 1959 年 1 月 16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我写的杂文《配角万岁》（已编入杂文集《苦瓜的味道》）。想必此文是 11 日左右在哈尔写的，《人民日报》立即发表，且被报社编辑部评为当时有影响的“优秀作品”。附带说一句，1959 年庐山会议后回京大挨批半并被开除党籍，此文是罪证之一。这里，不妨将这篇短文录下：

## 配角万岁

办任何一件事情，总有主次之分，轻重之别。演戏有主

角与配角。喝茶有茶壶与茶杯。开火车有司机与司炉。盖房子有梁柱与檩椽。军事机关有司令部与后勤部。工厂有主厂房与辅助车间。医院有医生与护士。工业与农业、中央与地方、大与中小、洋与土，四个并举要以工业、中央、大与洋为主干。

主与次，轻与重，是永远存在的。主次不分，轻重倒置，就会办坏事情，永远要反对。这是无人怀疑的。

可是从另一个方面看，光有白娘娘，没有小青，是唱不成《白蛇传》的；光有司机，没有司炉，是开不成火车的；光有司令员，没有后勤部长，是打不成仗的；光有医生，没有护士，是治不好病的；光有梁柱，没有檩椽，是盖不成房子的；光有主厂房，没有辅助车间，是制造不出东西的。这就是牡丹虽好，终要绿叶扶持。”然而，这个似乎很简单的道理，并不是人人通晓、时时刻刻记得牢的。岂不是吗？只愿唱主角，不愿跑龙套；当医生有前途，当护士没出息；战斗英雄光荣，炊事员伺候人。这一类重主轻次，重“重”轻“轻”的错误思想，不是还随处可碰吗？

上面讲这样一大堆，为的是指出这种不愿当小青——不愿当配角的现象，目前在工业生产中颇成为一个问题。自从大跃进以来，大家争着生产大产品，生产主机主件，许多原来做配件的工厂升级为做主机的工厂，譬如汽车修配厂生产汽车了。配角唱主角，这本来是件好事情。可是主角配角一多一少，主机的生产与配件的生产一脱节，不成比例，即设备不成套，那问题就大了。工业生产还不比唱戏喝茶，缺一个跑龙套的、缺一个茶杯，总还不致唱不成戏喝不成茶。一台机床缺一个螺丝钉，一台发电机缺一个仪表，硬是开动不

了或不敢开动的。

现在，很多人的注意力都集中于汽车、机床、发电机这类主机去了，而螺丝钉、仪表、阀门这类配件，这类缺一不可的“小东西”，却关心不够，跟不上去。一台汽轮发电机的主体是三大件：锅炉、汽轮机和发电机，可是它们的辅机和配件却有一百几十种，五千三百多件；三大件由三个工厂生产，而五千三百多配件却需要成百的工厂来生产。主机大跃进了，配件没有大跃进，主机仍然不能发挥作用。主次轻重是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工业生产中最为显明，而且有的时候，某些配件的作用并不亚于主件，甚至比主件关系更大，有的配件比主件还难制造。这正如在《白蛇传》中，小青的的关系重大一样。

这种重主轻次，重“重”轻“轻”的思想，在宣传工作中也常有反映。在工业生产方面，请问我们的记者和报纸，对于螺丝钉、仪表、阀门配件的生产，是不是有了足够的重视呢？

让我们高呼：配角万岁！

## 陈云主持电话会议

1月17日晚8点，由陈云主持，召开了各检查组的电话会议。上海和东北是当年生产机械设备的产要地区，汇报的时间较长，其他地区情况比较简单。

谷牧首先汇报上海的情况。总的情况比1957年有进步。如电站设备58万千瓦中，有60%配套，主要缺变压器等；

1957年配套只有40%。冶金设备好一些。中小高炉510座全部成套，225立米则没有配齐，主要差热风炉等；3-4吨的转炉已完全配齐，6吨以上的没配齐；轧机18套基本成套，只差小部件。其他如石油设备，1958年有200多台（件）没有履行合同，十多个厂因未得到化工设备不能按时投产。从供应地区讲，上海本市问题不大，市委对冶金设备高度重视，全市有关厂集中得像“一个厂”一样，解决问题较好。各地对上海则都有意见，各地多不明成套范围，不管计划内计划外，只要缺什么都来找上海；各地派来的干部从处级升到厅局级，经常有4至5万人来跑设备，对上海的压力很大。

1959年第一季度的情况看，首先供需有矛盾。如国家任务，需要电动机共135万千瓦，只能安排60万千瓦；需要变压器396万千伏安，只能安排100万千伏安。这是能力与材料供应不足的矛盾。二是自己需要与供应外地的矛盾。如一季度上海计划生产电动机60万千瓦，本市即需48万千瓦；变压器100万千伏安。本市即需56万千伏安，可供外地的都有限。还有重点同一般的矛盾，重点项目能保证，其他行业保证不了。如润滑油的生产还没有解决，变压器就配不成套。三是新老任务的矛盾。要完成去年积累下来的配套任务，势必影响今年。

市场五金、交电公司供应情况，由于去年不断地跃进，对市场需求很猛，已远远不能应付用户需要，到年尾已有786种（占五金交电公司90%以上品种）脱销了。今年1月上半月市场供应物资，只完成计划的7%，原因是材料不足，市场需4万多吨，只拨了2万吨，因此有80多家五金

工厂处于停工和半停工状态。上海的市场关系全国，必须迅速解决。

谷牧还谈到，从上到下对工作抓得不够紧，有些人在指望订货会议，对日常该抓的放松了。华东各省向上海供应铁的计划，完成得很不好，如江苏1月份1万吨，只供应了770多吨，占7%；江西只完成24%；山东只完成31%。如果北京抓得紧一些，可能会好一些。华东各省有8万吨铁要上海加工。柯老（庆施）说，“人心不全，很困难。”他强调全国一盘棋。（这时陈云插话：你的意见很对。昨天财经小组讨论时反映，鞍钢没有生铁，给省里的有，给鞍钢的没有；不能保证重点，就出不了好钢，这样下去什么都完不成。现在必须全国一盘棋，把材料集中到重点基本建设和生产企业。）看来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贯彻到下面需要个过程，现在认识不一，没有按武昌会议精神办。如山东在国家计划外，又给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布置了3套轧钢机，江苏给戚墅堰机车车辆厂布置了6套轧机，影响这两个厂完成国家计划。又如化工部一季度给上海安排了6000万元的任务还不够（这已经很大了），还要求再增加2000万元，而投资、设备和材料都要上海自行调剂，上海自然感到为难（陈云说：你的意见是对的。在书记处讨论时，小平提出化工、轻纺是否可以增加些。估计不会增加太多，而且一季度不增加。）此外，生产设备的大型企业提出，因为生产周期长，希望有一半订货能早些订下来。

王新三的汇报先谈冶金设备配套情况。黑龙江有16座100立米高炉主体设备没有完成，也没有调出。到去年底转炉能力已达120—150万吨钢，今年钢的任务为90万吨。小



的鼓风机多余 200—330 台。轧钢机国家任务为 28 套，其中外调 18 套，去年只完成 1 套，9 套没有投料，而地方在国家计划外造了 9 套，7 套已完成，2 套只完成 80%。辽宁情况，49 套高炉的外调任务已经完成。自用高炉 790 座，去年已投入生产的 370 套（容积共 3600 立米），年产 110 万吨生铁。轧钢国家任务为 49 套，8 套本省自用。总之，高炉、转炉越查越多，基本上已经停止制造，调整工作不宜再拖，希冶金部将东北多余的冶炼设备调到需要的地方去。

发电设备的情况。去年计划 35 万千瓦（其中水电 15 万千瓦），东北开了几次会，才布置下去，材料给得少，缺 100 多吨合金钢，又多布置了 7.5 万千瓦（3 台 2.5 千瓦），材料分散，大家都不全，层层加码害死人。计划完成得不好，到年底只交了 4400 零件，完成订货的 13%。大连 2 台 2.5 万千瓦机组，缺 100 多个零件，经过自己拼凑只 1 台发了电。阜新 1 台 2.5 万千瓦，也缺 100 多个零件，不能发电。主要原因是，向上海订货的自动控制设备等没有按时交货。今年第一季度电站配套计划有了 3 本账，应按哪一本呢？一是按国产主要设备和进口设备需配套 64 万千瓦；二是按国产主机和进口主机需配套 78 万千瓦；三是二本账再加地方超过 35 万千瓦的需配套 92 万千瓦。根据进度条件，按第二本账为好。东北电站设备制造需要 2500 吨镍铬钢，希望冶金、一机两部在东北组织生产；哈尔滨一季度需要 150 吨云母片，现在只能解决 36 吨；此外，还需电动机、高压水泵、高压阀门、球磨机钢球等。

单项产品成套问题。各厂库存材料都已寥寥无几，不仅缺生铁、焦炭、电石，甚至做木模型的木材也没有。1958

年积压下来的半成品比历年都多，有的林立在马路上。如沈阳水泵厂（全国 80% 的工业水泵由该厂供应），由于缺电动机，很多水泵配不成套，厂门口到处摆满了。

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一是协作关系应迅速定下来，不然不仅一季度计划，而且还会影响全年任务的完成。东北现在的协作关系是动荡的，而且看不出何时能稳定下来。二是不正常以货易货。哈尔滨铁路局用木材到沈阳换钢材和水泥，内蒙古派人到辽宁用 1.5 万立方米的木材换设备。工厂食堂到街上买菜。卖菜的人竟要求用钢材来换白菜。三是产品质量检查不够。大跃进以来，有些工厂把质量检验员下放劳动了。不再检查产品质量；即使人在，也是走形式，产品最后出厂才做个手续。如果高温高压设备不进行质量检查，是会出大问题的。

王新三谈完了，负责北京检查的李葆华说：一波同志嘱咐转告你们（新三和李锐），东北因缺煤少发电 5 万千瓦，鞍钢减少 3 万千瓦，锦西发不出电，要求你们解决这个问题。

我接着汇报。由于有关问题已写了书面报告，只是简单讲了例子和主要问题：黑龙江小型轧机的电动机多余 133 台，鼓风机多余 300 台，都可以往外调。一季度电站设备制造的中心问题不是加工能力不足，主要是合金钢和云母等材料不能解决。一月份哈尔滨同全国 130 多家工厂的协作关系，处于中断状态，特别是电站设备制造同上海中断了协作关系，发生很大困难。材料供应目前非常紧张，可是哈尔滨有些重型厂还有多余，如锅炉厂库存 7000 吨钢材中，有 4000 吨钢板用不上。我特别提到当时“好大喜功”的一面。

哈尔滨电机厂在计划中安排了4台10万千瓦的机组，采用内部水冷却（这在当年属新技术）；而且为了放卫星，还准备搞20万千瓦的机组，是否说服他们只试制一台10万千瓦的机组，这样任务可能落实一些。富拉尔基6000吨的水压机已安装好了，由于吊车、热处理没有预先安排，现在只好生几个大炉子来熏它。北满特殊钢厂堆积了一万多吨钢材，运不出来。

倪伟发言，谈到钢铁生产高炉、转炉考虑得多，对电力、运输注意不够、锅炉厂、机床厂产品压在厂内；煤也运不出来，市民排一夜长队买不到煤。东北厂移，现在维持不下去。车皮靠新三、李锐解决不了，这要铁道部派负责人来解决。东北最主要的是运输、电力和煤的问题；少发了电，也是煤的问题。电表厂、绝缘材料厂、电瓷厂等产品，属于全国性的，原料是从全国来的，这些厂子仍划归中央管为好。中央的厂子接受地方任务，在安排上要定出个办法

武昌叶林也谈到原材料紧张的问题，有的大厂派七、八十人到全国跑材料，丹江口水库3个局长有2个出外采购。冶金设备生产不少，不配套的多。如高炉，湖北按北载河规定为324座，安排了477座，配套的只23%，按北载河指标为30%。转炉，配套的18%，只生产出1套。造成这种形势的根本问题，是基建和生产都脱离了现实可能性，加以计划外的点子又铺得太多，从而比例大大失调。湖北有个县2座71立米的高炉因缺原材料不能投入生产，但还开始建一个28立米的高炉，关于全国一盘棋，各人理解不一样，不像“一五”全国156项，以东北为重点那样明确，现在各地都有自己的“一盘棋”。

随后，太原高扬文、兰州杨作材、西安杨拯民、贵州黎玉等，都分别作了简短发言，内容大同小异。

最后，陈云讲话：各组提出的具体问题不可能作具体答复。中央书记处要求我们在2月10日前作一个关于设备成套的报告。希望大家在25日以前回北京，回北京再开会讨论研究。回京以前，在当地召开一次配套会议，请地方领导人（工业书记、成套公司和商业部门负责人等）和典型基建单位有关人员参加。讨论三个问题。一、成套公司范围内的配套工作，以及下放厂归队问题。二、基建单位自制配套设备（现场自制）问题。三、商业环节供应的成套设备问题。这三条讨论出个办法来。这样，回北京后讨论，就有个底子了。

## 建委向中央的报告

1959年1月下旬，派到全国的6个检查组都回到北京，连同在北京的检查组，1月29日到2月12日，国家建委由陈云主持，召集各检查组进行了汇报和讨论；3月2日至4日，在全国基建会议又就设备成套问题进行了讨论。随后建委党组向中央作了“关于设备成套问题的检查总结报告”3月20日，中央向全国转发了这个重要的报告，同意报告中所提出的各项措施和组织工作。在批示中说：工矿企业的建设必须根据今年大跃进的特点，按重重急急排除的次序，保证按期建成并且投入生产，以满足生产大跃进对它们的要求。为此，必须使成套设备的制造、供应和安装之间的安

排，紧密结合，一一落实。由建委领导，经委、计委、一机部、商业部和有关工交各部人员参加，成立设备成套办公室，务必在5月以前做出显著成绩。

建委的这个近2万字的报告，谈到1958年设备的成套的基本情况，详细论述了以下3个问题：“怎样保证工矿企业建成并投入生产”，“当前措施”，“保证设备成套的组织工作”，最后小题为：“一定要做好设备成套工作”。我从头至尾参加了汇报讨论。经过一年的“大跃进”，可以说，这个报告让人们了解到经济建设比打仗、土改要复杂得多；发动群众容易，办好经济工作却多么不易。这个报告的一些要点特摘录如下：

基本建设的目的是扩大再生产。一个工矿企业建成投入生产，仅就有关设备、工具、器材而言，必须具有三个基本条件，即工厂设备成套，生产工具、仪器齐备，厂外协作条件完善。

基本生产车间是工厂的主要构成部分。如一个钢铁联合企业的矿石处理、炼焦、炼铁、炼钢、轧钢，都是基本生产车间。每个车间一般又由主机和辅机组成。如轧钢车间，主机包括原动机、传动机械和轧钢机本体，辅机则包括起重机、加热炉、推钢机、辊道、剪切机、矫正机和电气控制设备等，两相配合才能进行轧钢生产。辅机的数量很大，如一套800厘米轧梁轧机的主机约重为600多吨，辅机重量则10倍之。

为了保证基本生产车间的正常运转，各种工厂还需要多少不等的辅助车间，较普遍的有机修车间、试验室、锅炉房、煤气站、供水站、变电站、压缩空气站、氧气站等等。

各车间内部及相互之间，还需要各种运输车辆以及厂内的通讯设备。

工厂设备成套所需的设备和配件的数量很大，种类繁多，尤其是钢铁联合企业和电站较为复杂。以一套5万千瓦的火力发电设备为例，锅炉、汽轮机、发电机三大件是主机，与之相配合的辅机和配件有144种，5000多件（如果以原件来计算，则有48000多件）。其中还有一部分是非标准设备，即形状特异、有特殊要求和未定形的设备。正因为工厂设备成套所需设备和配件的数量很大，种类很多，不可能由一个部门供应。目前供应分4个部分：一是设备成套公司按规定范围；二是物资分配部门经过定货会议；三是建设单位自行解决非标准设备（现场制作或委托加工）；四是商业系统。以包钢为例，建成年产300万吨钢的规模，全部设备总重量达23吨，其中设备成套公司供应的占47%，定货会议分配的占25%，非标准设备占20%，市场采购占8%。还有必要说明，成套设备都是由很多单机组成的，例如机床、水泵、吊车等等都是单机；单机又都是由原动、传动、作业三部分部件构成，缺一不可；因此单机成套，是设备成套的基础，必须由生产的工厂负责配齐。

工厂建成、设备成套之后，还必须做好生产准备工作，包括必要的生产工具、备件、仪器、人员的培训，以及各种技术资料的准备。以钢铁工厂为例，有钢锭模、轧辊、翻砂箱、试验检验仪器等等。所有这些准备工作，绝不能稍有忽视。

厂外的协作配合，一般指厂外的铁道专用线，输电、变电工程，电讯工程，供水、供气，以及原料、燃料、电力的

供应等等。所有这些也是缺一不可的，否则不能进行正常生产。

因此，基本建设中的设备成套工作，十分复杂而细致，是同国家计划的安排，各工业部门间尤其机械制造业的协作生产，以及商业环节的充分供应，密切不可分的，哪一个环节出问题都是不行的。

鉴于 1958 年设备成套方面出现的种种问题，报告中提出当前应采取的措施。

1958 年没有成套的设备，有关部门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处理。凡已经基本建成，又担负重要生产任务的企业或车间，应优先配套。凡已经建成投入生产，但生产工序之间不平衡，或受到某些辅助设施限制，其薄弱环节应迅速补上。这两种情况，责成一机部于 5 月底以前认真解决。

各地没有配成套的高炉、转炉应予调整，如多余支援急需，先进支援落后，使之拼凑成套，由冶金部负责处理。1958 年已经开始建设，而未列入 1959 年的计划项目，其已到或已安装的设备，分别由主管单位负责调与急需单位；难以调出者应妥善保管，避免损失。单机不成套者应迅速补救，严格规定不成套不准出厂，由一机部负责处理。

机械制造部门必须根据建设项目排队的先后和建设进度，使辅机、配件与主机互相衔接，分批投料，分批制造，分批交货，按期成套；以避免积压在制品、半成品，以及在建设单位不能如期安装而积压设备

制造成套设备的材料，数量与品种应保证供给，做到专材专用，避免分散；品种规格不合用者，可组织相互调换使用。各种特殊钢材及各种合金及某些有色金属，应当从生产

与进口两方面积极予以保证。非标准设备所需材料应单独列出，专料专用。目前市场物资供应紧张情况，责成商业部和一机部从第二度起逐步好转。商业环节经营的产品难于计划，必须经常保有一定的周转量。目前供应不足，尤应注意防止抢购囤积，造成人为紧张的现象。

一机部必须积极担负起全国机械工业生产的总管责任，统一安排并综合利用全国机械行业的生产能力，同时加强各部门和地方即条条块块之间的协作关系。各地的机械厅(局)应成为当地机械生产的主管部门。目前辅机、配件和市场供应的五金、交电器材严重不足，有关这些生产的薄弱环节，应积极加强。有关零件、配件的生产，应根据条件分散安排，就地制造，以改变目前集中在几个大城市的不合理现象。各企业间的原有协作关系应尽量维持，有的需要长期固定下来，并建立新的更为合理的协作关系。工业基础薄弱的地区，应积极发展本地急需的辅机和配件生产，尽快建设通用机械厂或机修车间。近期应召开省和中央部门的两级生产协作会议，由建委牵头，计委、经委、一机部、商业部、工交等有关部门参加，正式成立设备成套办公室，统管这项重要工作。

关于保证设备成套的组织的工作，主要是确定公司的供应范围。一机部在1月20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成套公司暂时先担负电站及冶金设备的配套工作，以后当按具体情况逐步扩大。”建委认为，对煤炭、机械、化工、石油、建材、纺织、造纸、制糖等工作部所需的成套设备，也应当由设备成套公司负责组织供应。关于公司供应产品，一机部原来也是考虑担负基本生产车间生产作业线。大家讨论时，认为一



方面考虑避免抓得过多，分散力量，有失重点；但也应包括辅助车间所需国家统一分配由部管的设备。所有这些，应分行业编制设备目录。至于限额以下的建设项目，必须取得国家计委批准，公司才接受供应设备的任务。各省、市、区的设备成套公司，除担负统管列入本地区项目的设备成套外，还应组织好有关外调的任务。外调任务繁重的上海、辽宁、黑龙江、河北等省市，尤应加强公司的工作。经济协作区目前可以不设立成套公司。各工业部门在总公司领导下，还应设立有关专业公司或专业处（组），在3月底以前都建立起来。总公司担任总交货人，或指定有关地方公司执行其任务；各地工交部门担任所属建设项目的总定货人；双方应当签订总协议。各地公司根据计划安排，同当地机械制造工厂签订定货合同。数量、型号、规格、供货时间等，一一落实。非标准设备的制造和供应办法，也在报告中作了安排。

商业环节供应的设备器材，主要是仪表、工具、量具、刀具、电表、开关、各种配件及其他五金交电器材，品种规格十分繁杂。商业部的五金、交电系统和一机部的销售办事系统，两者都必须加强，有所分工；前者主要是通用、民用产品，后者主要是较大型和专用产品。交叉也不可避免，应各自迅速定出经营目录，作为双方依据。各类工厂都应分别制定成套设备目录。

由于全国建设规模的扩大，由物资部门统一分配的一部分标准设备，如一般通风机、油压机等，需要量日益增加，必须实行全国统一平衡调拨，由一机部统管。

以上所有环节的设备成套供应工作，中央规定由国家建委统一管理。但是，属于生产安排、物资分配、厂外协作安

排等工作，仍应分别由主管部门负责，一机部是设备制造的总管部门。各地建委应迅速成立设备成套管理机构。

报告的最后部分“一定要做好设备成套工作”，首先强调这项工作“早抓比晚抓好，积极抓比等待抓好”；“要实现巨大的建成任务，必须过好设备成套这一关”；要求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中央各部分行业抓到底，发扬共产主义精神，积极协作，贯彻“全国一盘棋”的方针。同时还强调“需要有一个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轮廓”。由于重大建设项目要多年才能建成，大型设备制造周期长，“二五”计划没有一个大体安排，大家心中无数，严重影响各个部门工作的正常运转。建议计委在年内编制好这个“二五”计划的轮廓。对这个建议我印象深刻。当年我同毛泽东的接触，以及自己的上书中，都着重谈过、提过这个问题，后来在庐山会议前期，他同我们几个人座谈时，我又提出这个问题，但他始终不表态。这可能是关于“大跃进”的速度限量等等问题，他还一直在反复考虑，拿不定一个说法有关。因此做具体工作的计委也就很为难了。1958年从南宁会议开始，“二五”计划变动多次，一直上涨，到一次郑州会议，发热的头脑开始降温，也主要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年限这些方面，钢铁指标的下降是1959年4月才真正开始的。

设备不成套，这是“大跃进”中工业系统普遍出现的一个突出问题，国家建委及其领导人陈云抓了这件大事，花了几个月时间，在全国作了调查，动员上上下下统一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产生了这样一个实事求是的文件。可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在计划冒进了，贪多嚼不烂，摊子铺得太大收不拢来。于是最后接触到“二五”计划的轮廓非定下来不

可，否则设备成套问题仍然解决不了。

不过，尽管“三年困难时期”整个经济大滑坡了，但在“大跃进”时期，促进了设备成套这个大问题的解决，从认识到组织，可说得到提前解决。

1959年3月基建会议之后，基本建设进一步缩短战线，但设备成套问题仍然严重。1958年和1959年第一季度的国外进口和自制设备，仍然有很大一部分没有成套。3、4月间对此事又进行了研究和清理，确定将其中最急需的项目首先设法补配套，使之在第二季度订货中优先安排。为此建委经过中央批示于6月8日向全国下达了一份报告。指出这批项目主要是以下两部分：

一是属于收尾工程的214个企业或车间，今年有生产任务，只需补配少量设备即可投入生产。在这次订货中共补配少量设备即可投入生产。在这次订货中共补配了水泵、风机、空气压缩机、电动机、变压器、锅炉和各种起重运输设备7000多台。

二是1958年不成套的单机（单个设备）13000多台主要是机床、起重机、卷扬机、钻探机、柴油机、破碎设备、运输设备、洗选设备、风机、水泵等等，由于缺少相应配套产品（其中96%缺电动机），不能投入使用。这次订货中共补配了电动机41万千瓦、变压器162台（配电炉）、柴油机541台（配钻机）、风机6台（配锅炉、冷冻机）、水泵21台（配锅炉）、空压机1台（配空气分离器）。

这些未成套设备，所欠配套不多，不仅有煤炭、铁矿采掘的，还有很多化工、石油、轻工、纺织等部门的。报告中还提到在一两个月内还要再组织一次各部门和各地的补配成

套工作。附件中列出 214 个企业或车间的名单，其中属水利电力部的（电站）有 61 项，冶金工业部 37 项，化学工业部 45 项，纺织工业部 35 项，轻工业部 13 项，石油工业部 5 项。

## 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

1959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中央在上海先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

。“大跃进”期间，有两件事最为频繁：修改指标和中央开会。从1958年1月起，中央召集的比较重要的会议先后有：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武汉会议、广州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此外，还开过一些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这些会议大都是毛泽东提议召开并亲自主持的。这说明，毛泽东始终是在中央第一线，直接领导和推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可以说，全党、全国都围着他的思路转；有心的人们，还可以从中看出中央的决策方式、决策程序和决策机制。

这些会议多数我都参加了。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是上庐山前我参加的最后一次中央会议。到了庐山会议，就让我这个“兼职秘书”在“大跃进”中的“昙花一现”划上个句号了。

## 上海会议

经过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一系列中央会议，到1959年春，“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势头比以前有所减弱，农村开始整顿公社，一些工业指标也有所下降。但是，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在整顿过程中，陆续暴露出一些此前尚未察觉的政策性问题。工业方面问题更多，已经下降的指标（如钢产量），仍然同可能实现的产量有距离，而一些部门和地方为完成1959年的指标，还在争材料、争设备、争资金。上海会议东北组在讨论中说到过一件事：3月份在沈阳召开东北、华北各省工业书记会议，不让提困难，要工业书记回去动员各省第一书记在上海会议上也不要提困难；要拍胸膛，坚决保证完成钢铁、煤炭既定指标。

从东北开完设备成套会议回来后，我愈发感到问题很多，矛盾丛生，当时曾反复考虑1959年钢的指标难以完成；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就很难办，会影响到全局。一次开会时遇见计委廖季立，他是计委委员兼综合局局长，我们是延安抢救运动时，同关在保安处认识的。（庐山会议后，他也曾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直率问他，钢2000万吨到底能不能完成？他也直率答道，不可能完成。有了这个底，我便于二月底或三月初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反映问题的信（这封信的底稿至今未能找到）。信里主要讲了1959年钢产量指标必须下降，并且落实，这样才能免于影响全局。否则，最大问题是同一机部的矛盾无法解决。一机

部的主要产品有赖于钢的数量尤其质量，从而电力也是无法保证的。信的末尾，还引用了列宁的话：“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信写好后遇见周太和（陈云的秘书，延安时老熟人），他将信给陈一阅，并跟我说，信中所反映的问题不少牵涉到计委，最好能给富春也看看。于是我将信的抄件送李富春，原件送毛泽东，并说明同时给了富春一份抄件。

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七中全会，就是为讨论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问题，同时讨论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方案等问题，因为当年要召开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和决定新的政府领导人。3 月 25 日至 4 月 1 日先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般称之为上海会议。关于计划指标落实的讨论，是由邓小平主持的。接着，4 月 2 日至 5 日开八届七中全会。

为了开上海会议，上海市委专门在原法国俱乐部的对部“十三层”（旧上海的高级公寓楼）旁边，以 15 天时间的“跃进”速度盖了一座小礼堂，能容纳地一二百人。

上海会议第一天，毛作了讲话，主要谈农村人民公社问题，他说：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问题，人民公社管委会、管理区、生产队的组织形式，还没有一个章程。他提出要搞出一个公社章程来，同整顿农村人民公社有关。北戴河会议虽然通过了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但对公社的组织形式只有原则性规定，比较笼统，人民公社一哄而起之后，实际上是无章可循。第一次郑州会议之后，各地开始整顿人民公社。对公社化运动狂潮中出现的混乱现象进行清理，必须规范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形式。所以需要搞人民公社章程。上海会议和七中全会虽然没有制定出这样一个章程，但会议通

过的人民公社十八个问题的文件，对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作了初步的规定，并要求各省于当年7月在全民讨论基础上提出一个示范章程草案，作为中央起草的依据。

毛泽东还说：小队的部分所有制，有的充分注意了，如浙江；有的尚未注意。小队不搞好，公社恐怕不行。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是毛泽东最早提出来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首先否定了现阶段搞公社所有制，指出应该基本上是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所有制。第二次郑州会议之后，公社所有制被否定并取消了，但是在生产队还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问题上，地方上产生了两种意见，湖北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河南则主张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3月上旬毛泽东到武昌，专门把周小舟找来，问周的意见，周赞成河南的办法。没两天，广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则赞成湖北的办法。究竟哪种主张好？3月15日，毛泽东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写了一封《党内通信》，他说：“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期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毛没有肯定哪种办法，要求征求基层干部的意见，这说明他这时不再随意作决策，而注意听听各方面的反映了。两天后，3月17日，他在另一封致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党内通信》中提出，还应当讨论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问题。这次上海会议上，他要求大家重视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



题，把小队搞得好不好问题看得很重。生产小队相当于原来的初级社，生产队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生产大队是两三个高级社的组合，无论以这三级的哪一级为基本核算单位，都是从公社所有制退步。这种退步实际是向符合当年农村生产力实际状况的方向接近了一步，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

毛泽东还谈到了整顿公社中的算帐问题。他说：算帐问题，主张不算的是公社、穷队和县委，下边还是要求算的。应该反过来，县、社非算不可，下边可以糊涂一点，实际是算得清的就算，算不清的就拉倒。我赞成算帐，算帐也可以锻炼干部；一般不算帐，并不能保护干部反而会毁坏干部。毛提出的算帐问题，实质上是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中，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小社的公有财产和社员个人的生产资料 and 许多生活资料，统统充公，归公社所有。整顿人民公社，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过程中，要不要对这些无偿占有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重新计算，并退赔给小队集体和社员个人，是关系到能否解开社员群众心里的疙瘩，消除他们的怨气，重新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的问题。开始毛泽东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还说：“旧帐一般不算”，并且写进了会议通过的《郑州会议纪要》之中。在上海会议头一天，毛就改变了第二次郑州会议的结论，提出要算旧帐，这是整顿公社、取信于民的重要一步。会议期间，3月30日他还在山西省委的报告上批示：“旧帐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帐一般要算，算帐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

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算旧帐立刻得到广大农民群众和农村基层干部的普遍拥护，价值法则已不是抽象的理论学说，而变成了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活生生的实践。

毛泽东最后谈了抓工业的问题。他说：工业、交通非抓不可，指标要低于可能性，不要放卫星。不要一要求产一千斤，就布置三千斤，这个做法不行，还是要实事求是。从武昌会议开始，毛就提出要降低高指标，还说是指标要讲现实可能性、不要讲虚假的可能性。1959年1月上旬，他找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彭德怀等谈经济工作和工业问题。陈云表示：武昌会议定的指标难以完成。毛说，那就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他提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并让陈云讲话。陈云以为毛要他检讨，在会上作了一番自我批评，降低指标一事自然未果。60年代毛在一次谈话中曾讲过这件事：“1959年：1月，我建议开会，这是陈云跟我谈一次话的影响，建议开会，开一个星期，仍然不动，我的意见是降低指标。作了报告，还是2000万吨。我希望陈云出来讲几句话，谁料到他讲的是自我批评，承认错误。”真是阴差阳错！也许我的信也起了点作用，毛对此事一直不放心，所以才在这次会上说：“指标要低于可能性”，“还是要实事求是”。

“事非经过不知难”，毛在武昌会议说过这么一句话，这是他的心里话。一年前发动“大跃进”时，他踌躇满志地说过：我就不信搞经济比打仗还难！他是把打仗看作天下第一

难事的。打仗，他能“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搞经济，也以为只要群众发动起来，“大兵团作战”，就能让“钢铁元帅升帐，粮食卫星腾空”殊不知，打仗与建设是两回事：所处时空不同，内在规律各异；“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比较起来，建设所面临的问题、矛盾、关系要复杂得多，凭激情、意气以及过去战争年代的经验，都解决不了经济生活的问题，碰了壁，闯了祸，跌了跤，这才知道搞经济确实比打仗要难。到上海会议时，毛泽东的头脑比较冷静了，这时说出“还是要实事求是”的话，无疑包含有对“大跃进”以来若干教训的总结与反思。

毛讲话后第三天开始，直到4月1日，会议先后讨论了下列问题：1959年计划，1959年钢、煤、粮、棉指标，1959年第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的安排，外贸工作，劳动工资，等等。其间，中央政治局还开过常委扩大会，讨论西藏问题（关于平息西藏叛乱），1959年计划和机构及人事配备方案。

1959年的计划指标始终是会议的一个重点。一月份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仍然维持了武昌会议确定的虽有下降但仍较高的指标（如钢1800—2000万吨）。降不降低指标，实际上是能否进一步降温的关节点。正是在这一点上，党内的认识很不一致。不少人从维护“三面红旗”出发，坚持较高的指标。上海会议一开始，柯庆施、李井泉就固执地要各省、市、自治区接受既定的指标。李井泉说，如果其他省完不成粮食指标，四川可以再分担些，无非多增产红薯，允许一斤红薯顶一斤粮（按国家规定，四斤红薯折一斤粮）。柯庆施也说，如果别的省完不成钢指标，上海也可

以再分担些。一些地方党委的负责人，虽然知道指标难以完成，却感到左右为难，降低指标颇为困难。

但中央领导层比较倾向降低指标。3月26日下午，薄一波作关于第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安排的报告。薄谈到炼钢设备未能按计划完成时，毛泽东说：搞了十年工业，积累了十年经验，还不晓得一套套要抓。安排了98套（指大中型轧钢机），2月底还报可完成31套，结果只搞了16套，还有一部分配不齐全，这是什么人办工业，大少爷。现在工业要出“秦始皇”，我看你们搞工业的人不狠，老是讲仁义道德，搞那么多仁义道德，结果一事无成。搞那么多（指基建项目）？削它500项，如果不够，再削，削600项。总理插话：要有决心，头上要沾点血。毛说：根本不要决心，干掉就完了。小平插话：1000多个项目，一季度只有20多个投入生产，毛接着说：何必那么忙？急得要死，一定要搞1000多项，又搞不成。从前讲轻重缓急，现在讲重重急急要排队，算得一点经验了，重中有重，急中有急。

3月28日，李先念作关于财贸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邓小平在此之后，讲了降低指标问题：现在提出一个计划问题，计划要放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中央、地方都觉得有些问题，主要是肩膀上的担子重得很，感到为难。讲出来好，应该实事求是解决。总的就是原材料不足，主要又是钢材不足。武昌会议是按钢材1400万吨（加100万吨进口）来订的计划。王鹤寿讲过，即使搞到2000万吨钢，钢材不会超过1200万吨，加进口95万吨，不到1300万吨。邓说，问题摆得很明白，即使是1500万吨钢材，也不可能完成，所以存在危险。大家一致赞成这样一个办法，把计划定在确

实可靠的基础上，宁肯超过，大家心情舒畅一点。想把我们的计划放在 1100 万吨钢材的基础上，包 1800 万吨（钢）保重点，冶金部 18 个企业，是 1200 万吨，赵尔陆的企业是 100 万吨，吕正操的企业是 40 万吨，不下这个决心，计划有危险。

毛泽东、周恩来都同意小平的意见。毛还说：现在看，人心所向，横直没有东西，我们从来讲过的，钱只有这么多，现在是钢材只有这么多，看办多少事。

毛、周、邓对降低指标的意见明确且坚持，一方面看来是因为初步总结了“大跃进”的教训，比如毛说：“重重急急要排队”，邓说：“计划要放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另一方面也同一季度生产状况不好，显示出完成全年指标的难度，而降低指标比较困难有关。

### 我的第三封信

上海会议刚开始两三天，得到通知，毛泽东要我去谈话，他住在一所很宽敞的花园洋房。进客厅时，胡乔木也在座。刚坐定，他就指着我对乔木说：这个人是不敢做强盗的。转入正题谈钢铁指标落实，对计委的工作有很大意见时，我才醒悟到，是指我写给他的信，为什么要送一份给李富春看，认为我胆子太小了。谈到我的信，毛说，为什么只给他几根骨头吃，不给些肉吃。我这第二封信写得大概很简要，主旨在 1959 年钢的指标肯定不能完成的理由何在，如不立即落实，后果会如何等。看来，这封信内容被接受了。

不然，谈话不会如此风趣，出门时，乔木还跟我谈到，去年赫鲁晓夫来北京，请吃饭时，毛问到：苏联有无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赫答：苏联没有这种经验。对这种问话，乔木当然是不以为然的。

会议期间，北京来的人都住在“十三层”和旁边的一栋楼。上海主人招待殷勤，集中川粤扬鲁四大菜系名厨，每餐都由客人自由点菜。我几乎每顿必点麻婆豆腐。这种同当时社会供应形成鲜明对照的生活，曾引起黄克诚的批评。主人还安排服装公司上门来定做衣服，两三天即交货，除了量身以外，其他都由秘书们代劳，想必是真正的物美价廉，法国俱乐部有舞厅和游泳池，跳舞的人多，游泳者少，我在游泳池碰见过刚学打水的罗瑞卿。周末还请杂技团到舞厅来表演。有个小孩头倒顶在大人的头顶上做表演，大概是发现了就在身旁的人竟是毛主席，吓得头部垂直摔在地板上，轰碎一声，杂技还继续表演下去。此事我终生难忘。

田家英晚到了一两天，他是从四川来的，穿的粗布服，进宾馆还被盘问过。住下后就来找我谈农村见闻。一月份，他带了一个工作组到省里的先进典型郫县红光公社，这是省委安排的。他们发现，公社干部早给群众打过招呼，不能随便向工作组反映情况。他们到哪个食堂吃饭，哪个食堂就“打牙祭”，菜就好一点。家英于是向省委要求换个地方，来到他的舅母家（他幼年在舅家寄养过）新繁县崇义大队，以便于了解真实情况。首先发现食堂经常吃稀饭，社员吃不饱，晚上在家煮点菜叶子吃。食堂的仓库里表面一看，堆满了谷子，用手往下一插，底下垫了别的东西。于是终于了解到，去年亩产只有五百多斤，但上报一律平均亩产千斤。他

找到大队长一问，才说了实话：郫县、成都郊区和别的大队，亩产都是报的千斤，我们如果讲了实话，就影响左邻右舍了，于是田的工作组到各生产队查帐，证实了去年种种浮夸虚报的情况，并向县里反映了这个大队群众生活困难，先缓解口粮问题。家英还同我谈到自己饿肚子的难受，一次同几个大队干部到成都办事，由他出钱在馆子里饱餐了一顿。我同他谈到第二封信的内容，家英也准备向“主公”（他对毛的私下称呼）反映四川真实情况。

毛找我谈话后，我受到一定的鼓舞，就决心进一步提些意见，于是立即写了第三封信。这封信的底稿保存下来了，自从南宁会议到上海会议这一年三个月时间中，我除了自己的水电业务工作外，有一半时间是泡在各种会议和调整计划指标之中，对这种“纸上谈兵”和“画饼充饥”的生活，体会极深；对中央和地方高层决策程序和毛泽东的领导方式及性格特点等，也有一些感性认识了。当时心中最焦虑的问题也是经济工作较有经验的干部最关心的问题，是1959年和二五计划主要指标的具体落实。我觉得我可以将这点心情和意见向毛透露了。第三封信全文如下：

想到几点意见（仍只是几根骨头），供您参考：

（一）在1958年大跃进过程中，关于1959年计划的安排（也包括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的几次调整），从成都会议到这次上海会议，大体上涨了五、六次，下降了两次；如果划一根曲线，则北戴河为最高点，武昌为转折点，上海为落实点。这是一个冷与热、浪漫与现实、藐视战略困难与重视战术困难的发展过程。从做计划来说，回忆一下这一年来的情况，接受一些经验教训是必要的，这对于安排明年和今后

的计划有很大的好处，中外古今没有过这种大跃进的经验，一年来计划安排的上下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但有一点要引起注意，就是今后做计划，应当避免再这样几上几下、大上大下了。对于全国条条块块成万千做计划工作的人来说，这一年中是极为辛苦的，是颇有苦可诉的。由于计划的上下摆动，长期不定，思想不实，对日常工作也有一定的影响。例如今年一季的订货迟了，影响到一季生产任务完成得不够好；现在二季订货还在北京难解难分。

在这一年的计划波动过程中，也有个思想问题，就是对一些问题不敢大胆怀疑，否则会有离开总路线和产生立场问题的担心。

(二) 也许经过今年一年的工作，可能基本估计出钢、铁、煤炭、重型设备、发电设备等几种重要工业产品年度跃进的可能限度，可能摸清工业交通内部的几个最重要的比例关系。三委（按指国家计委、经委和建委）和各工业交通部应当有专人来研究这种限度和比例，以利明年和长远计划的安排，以免今后不必要的几上几下和大上大下。

(三) 同时还应当很好研究苏联、美、英、德、日等国的跃进经验特别是苏联的经验。去年一年的思想解放运动，确带来某些负作用，对苏联的某种“不足为训”是负作用之一。还是要认真研究人家的经验，哪些是必须参考的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四) 以上这些有了进一步的考虑，对于如何才叫做贯彻了总路线，才可能得到比较一致的认识。例如重工业跃进的限度，主要决定于哪些因素？在哪些部门，这些因素又各占怎样的比重？这些重要因素如：头年已经达到的可以充分



发挥作用的设备能力，当年基建可以发挥的能力，两条腿的作用，重大技术革命的措施，鼓足干劲的能动性，等等。

(五) 主席在成都会议上着重讲过留有余地和事物波浪式前进的问题。这两条去年大家不大多谈了。留有余地和波浪式前进是客观的东西，违反不了的。做计划工作不应当忘记这两条。

(六) 三委和各部门现在就应当有人来考虑明年的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轮廓。我们现在是用尽全部精力和全部当前条件来赶今年的任务，其间譬如在基建方面，就同明年和长远计划有一定的矛盾，如何解决好这些矛盾，为安排明年计划有很大关系。尽管还会改多少次，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轮廓还是早定出为好。

从当时的气候看，信中所讲还是比较尖锐的，讲了“冷与热”、“浪漫与现实”、“藐视战略困难与重视战术困难”的关系；讲了订计划要避免“几上几下，大上大下”，讲了工业交通内部的比例、工业跃进的限度；甚至讲了“去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带来某些负作用”，讲了人们担心离开总路线和产生立场问题而不敢大胆怀疑。可以说，这些话都是直接对着毛的心态而言的。

## 七中全会的小组讨论

上海会议结束后，紧接着开八届七中全会。

全会于4月2日开始，刘少奇主持。内容一是讨论1958

年计划完成情况和 1959 年计划指标，二是关于七中全会议事日程问题。邓小平谈了全会日程：全会搞三个问题，一、肯定去年宣布的数字，确定今年的指标（只作口头说明）；二、讨论《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后经修改，公布时名为《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谭震林作说明；三、国家（机构）的组成（方案）。一天开完。这里说的“一天开完”，是指全会大会一天通过各项文件，全会还安排了三天时间讨论。

邓小平在讲话中谈到 1959 年钢的指标落实：经过中央三委（计、经、建委）和各省摸的结果，加上原材料不足，从冶金设备、焦煤、采矿等方面考虑，今年只能搞 2500 万吨铁。最后核走钢的数字是 1640 万吨。即使搞不到 1800（万吨），搞 1600 万吨洋钢，那也比去年翻一番，钢材 1100 万吨也比去年增加 80%，也并不丑。

周恩来讲了谈了三条经验：一、一定要有保险系数，统统打满不好，要留有余地，从北戴河以后步步退却，就是因为不落实；二、逐步提高定额，超额完成；三、实事求是。自南宁会议批“反冒进”以来，周恩来很少说话，其实他在这里讲的订计划要留余地、要实事求是的意见，以及邓小平讲的计划要放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的意见，早在 1956 年反冒进时他就提出来了。但是毛泽东大批“反冒进”以后，这些本来正确的意见被当作“反冒进”的主张压倒下去了。“大跃进”中谁要提“留有余地”、“切实可靠”，谁就会被指责为“右倾保守”。出了问题之后，重提这些不久之前还遭批判的观点，大家听起来似“如梦初醒”。

全会讨论仍分 7 个组，以大区划分，中央各部委的人则

分散在各组，东北组组长欧阳钦，副组长吴德、张启龙；华北组组长林铁，副组长刘仁、王从吾；华东组组长柯庆施，副组长江华、刘澜波；华中组组长王任重，副组长周小舟、张际春；华南组组长陶铸，副组长刘建勋、徐冰；西南组组长李井泉，副组长周林、罗瑞卿；西北组组长张仲良、刁仲勋。我在华东组

分组讨论，大家的重点在关于农村人民公社问题方面《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二个问题》的修正稿提出，人民公社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一般以相当于原高级农业社的单位为基本核算单位；这种情况还不能很快改变，要由生产队基本所有制、公社部分所有制改变为公社基本所有制、生产队部分所有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讨论中大家最同意这个意见，同时也提出一些补充意见。有人说，这个问题主要是解决“三级管理、三级核算”、“队为基础”下生产小组（或作业小组）的部分所有制问题，着重把包产单位的职权写清楚就可以了，标题应改为“队为基础下的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问题”。

算旧帐是讨论得最多的问题，大家最赞成的就是在整顿人民公社中算旧帐，这反映广大农民群众的真实呼声。这一点，应该说毛泽东是抓到了点子上的。对算旧帐的意义，华北组一致认为，帐应该算，而且可能算，算帐体现等价交换原则；算好帐，群众才相信党的政策，情绪就会高起来，上下左右关系会搞好，不会搞乱。东北组不少人指出，把旧帐算一下很有好处，这可以使农民看到我们不仅在口头上承认他的所有制，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也体现出来；这可以更加安定生产情绪，鼓舞生产积极性；教育干部也主要是使他在实

际工作中真正承认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西北组在讨论中认为，原则上“旧帐”都要算，都要清理，这很好。有人还提出，文件对算旧帐的意义应再强调一下，算帐才能体现所有制，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和解决绝对平均主义的问题，不然是会影响广大群众生产积极性的。

对算帐的内容，各组也提了较多意见。东北组有人提出，目前公社要清理的旧帐，大体有四个方面：一是社和国家的帐，如大办钢铁、修铁路等，从公社抽调了大量的劳动力，有的只管吃饭，不发工资；有的发一点工资，但很少。群众对此有意见，社干部背着很大的包袱。其实责任主要不在公社，要通过算帐把话说清楚，卸下干部的包袱。二是生产队和公社的帐，这主要是由于一平二调造成的，这是非算不可的。不算，富队即要吃亏，但是如果把已经调给穷队的生产资料马上抽回来，又要影响穷队的生产，因此要作好具体安排。三是各队进行基本生产建设，但各队的收益不同，如水利工作，秋翻地等。这不仅是穷队占富队的便宜，也有富队占穷队便宜的。这笔帐也是必须清理的。四是集体和个人的帐，如社、队在办集体福利事业时，征用社员的家具、房屋等，这多半是富裕中农和队的问题，也要算清，实际上有些帐只能结清挂在那里。

这个组有人还提出，有的地方国营工厂和农业社共同建成了公社，“大跃进”中动员农民和职工家属参加公社的义务劳动，有的只管饭，有的给一点钱，但很少，这一笔帐也要算，并且也好算，因为公社一般都有帐。算帐不一定拿出很多钱，但要把话说清楚。

东北组对文件所提原属社员私有的猪、羊、鸡、鸭、鹅

等能退还的退还，不能退还的要作价退款一条，建议将猪、羊和鸡、鸭、鹅分开写。从实际情况看，今后猪、羊还是以集体饲养为主，鸡、鸭、鹅以分散饲养为主。如果这样，已集中起来的猪、羊就不一定都退还给社员，一般可以作价还款，由集体饲养。（可见当时的退却还是有局限的，实际上猪、羊本来就是社员私养的，也适合私养）。

西北组认为，地、县所办的水利、公路占地相当多，不付代价不好，按国家关于征用土地办法的规定处理，又用钱太多，解决不了。建议写得灵活一点。华北组有人提出社与社、队与队之间调用劳力不好算，例如平原社支援山区社用了很多劳力、物资，山区社劳力少、穷，怎么能补偿得起呢？这种情况，可由双方说清楚，不必再还。也有人认为，算十项帐，从生产资料到鸡、鸭，范围过细，到生产队执行起来会更细。去年大兵团作战，有些帐不好算，补偿要支付很大。算帐方法也应注意，不要影响农活，不要为“算帐派”钻空子。

对责任问题，讨论中有人指出，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问题，不要一律归咎于社干部，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辛辛苦苦为社工作的，虽然有少数人有缺点和错误，但除了思想和品质恶劣的以外，很多事情和省委贯彻执行中央精神不全面有关，因此省委也要分担点责任。

关于公社内的分配问题，也讨论较多，其中对供给制的议论最集中。东北组有人建议明确制定出工资和供给的比例，以防止某些地方供给部分比例过大的偏向；有人提出，目前供给的范围不要过宽，供给的比例不要过大，并且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工资的比例，以体现按劳分配

的原则。

华东组叶飞（福建省委第一书记）专门谈了伙食供给制问题：福建省有些公社，除了对无劳力的社员实行伙食供给制，一部分劳力少、人口多的户（即经常超支户）给以适当的伙食补助以外，对其余社员都改“吃饭不要钱”为“吃饭要钱”实行这个办法的结果，有利于刺激劳动积极性。

西北组有人说，文件关于“超产部分可以全部归本小队所有和分配”的规定很好，但在实际工作中要注意包产指标要有较大实现的可能性。华南组有人提出，超产部分上缴一定比例的规定应明确。大家认为，超产部分上缴的应该是少部分，大部分应该归小队所有和分配。华东组还有人建议：分配给社员消费的部分，应该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讨论中还有人谈到食堂问题，认为农村今后主要应办集体劳动需要的食堂，不要提倡办全年的集体食堂，更不要规定办全民的食堂。这样对降低成本、节约粮食、取暖等问题都有好处。建议在文件上指明这个意思。

关于1959年农业生产指标，华北组有人认为，1959年粮棉指标定的不要太紧，留有余地，叫下边去超额完成，这很重要。但规定指标要低于可能达到的实际产量20%，值得考虑，因为可能达到的实际产量很难预计。西北组有人提出，在1958年和1959年粮食指标内，都可考虑把油料产量算进去（过去只算了大豆），这样为实现1959年10500亿斤的指标增加了更大可能性，同时还可避免为完成粮食指标，而挤掉油料作物种植面积的问题。

分组讨论的情况表明，党内对人民公社问题的认识，比前一段有所前进，对解决问题的政策建议，也比较接近农民

的要求了。这同毛泽东自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一直把关注点放在公社化运动的问题方面有关。毛先是提出划清两种界限，继而又提解决公社内部的所有制问题，然后又提出要算旧帐。其意义不只在这些政策本身，而且多少给人们思想上松了松“绑”，使人们敢于初步触及视为禁忌的问题，讨论中对供给制、公共食堂的意见就是例证。

1959年计划的讨论，是开大会进行的。4月4日下午，参加全会的人集中讨论1959年指标问题。李富春说，决定把原来2000万吨钢的计划，调到1800万吨（其中好钢165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原来安排360亿元，调到260--280亿元；基建项目原安排1500个，现削（减）500个，剩下1000个。少奇说：1650万吨，还有很多问题，如煤、矿、专用线、调运，需要很多措施；武昌会议定的2000万吨是比较困难达到的，要努力争取1800万吨。

大家就指标和生产中的问题，各自发言，提出意见。没有想到，我同康生发生了争执。讨论中，一向不管工业（更不管水电）的康生，突然发言，批评水电，以四川狮子滩水电站现在发不出多少电为例，说要接受苏联教训，少搞水电。会场一时哗然，因为南宁会议曾通过电力的长远方针应当“水主火辅”。于是逼得我当场反驳，说明事实真相：狮子滩为四川长寿县龙溪河梯级的龙头，有多年调节的大水库，只因四川电管局调度不当，去年为火电节煤，降低成本，多发了水电，寅吃卯粮，恰又碰上今春枯水，以至水库水位大降，影响三、四月份的出力，问题全在电网没有及早动用电火的后备。至于苏联水电吃亏，是因为欧洲部分基本是平原河流，伏尔加河长3500公里，整个落差才200来米。

修建占比雪夫、斯大林格勒等水电站，都是低水头，工程浩大，造价比火电高几倍，工期特长，经济上是否合算，国内议论甚多。尽管如此，苏联仍坚持优先开发水电，现在转向开发东部西伯利亚水电，长距离东电西送。中国国土三分之二是山区和高原，河流落差大（长江、黄河都是5000多米落差），上中游多经山地峡谷，工程量相对小，造价一般同火电不相上下。同苏联相比，彼之所短，我之所长，快慢省费恰好相反。我这样一番话，算是驱散了忽然而来的一片乌云。为此事写了一个说明材料，会上作为文件发了。

回到北京，我以《关于水电与火电问题的讨论》为题，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长文，发表在《红旗》1959年第10期。内中详细说明了“水主火辅”方针的根据，如何在长期努力中予以实现，同时决不能放松火电的发展；关于水电的枯水年问题，在设计中已预见并有调度方案，从而谈到狮子滩的情况本是不应当出现的。

## 4月5日毛的讲话

4月5日，全会开最后一天大会。7位常委全都到了。都坐在台上。整个上午是毛泽东讲话，一共讲了16个问题。

党的总路线，大家都赞成。去年政治上的主要标志是总路线的制定，但是还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工作方法问题。我们要实现总路线，必须有好的工作方法，没有好的工作方法，我们的总路线是不能完全贯彻的。有了总路线，还必须要有好的工作方法，才能实现多快好省、几个并举的方



针。所谓方法，无非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和成作方法是互相结合的，思想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现在中心问题是工作方法。我也是半瓶醋，但我要讲，讲几条。

一、多谋善断 这句话的重点在谋字上，谋的目的是为了断。曹操有个参谋叫郭嘉，他批评袁绍多谋寡断，有谋无断，没有决心，不果断，结果官渡之战就打了败仗。所以有谋还要善断。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多方面商量。我们了解情况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多看看各种材料，各种方案，善于判断，善于下决心。现在我们有些人就是少谋武断，根本不同人家商量，这是武断。有些同志不大愿意听不同的意见，只愿听相同的意见。与相同的意见谋得多，与相反的意见谋得少；与干部谋得多，与生产人员谋得少。他不是听听别人的不同意见，看看别人不同意见的材料，来做出判断。听听不同的意见才有好处。不一定相同的意见才有好处，不同的意见就不正确，不同的意见也可能是正确的。

有些同志在订经济计划时不同别人交谈，不去多谋。为什么不跟秘书谋一下？不跟工厂的厂长谋一下？可以谋你左右的干部，也可以谋工人、农民，可以谋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他既然提过不同的意见，你就谋谋他，看看他的意见怎样。有些同志很主观武断，认为自己的意见就是正确的，实践结果，不行，还可能造成虚假现象。要听听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反面的意见，不同的意见，将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分析研究，订的计划才能正确。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多谋的方法很多，如开调查会、座谈会，例如，1月25日的会议（按：指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

议)是我建议召开的。其原因是1月上旬四五号、七八号,我找陈云、一波、先念、富春、德怀几位同志谈工业问题。陈云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意见:一条,从前工业生产,主要依靠上一年建成的工厂,15%依靠新的,85%依靠旧的;而1959年变了,30%是依靠新的,只有70%靠旧的,这样不行。二条,武昌会议定的指标完不成。我当时说,完不成就拉倒。他这个人是很勇敢的,他犯错误也勇敢,坚持真理也勇敢,我从来就说,我们的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要观察,有待证明。

作计划的同志要多谋,计委、经委、建委、各部缺乏多谋。多谋,就是多听从人家不同的意见。1月上旬陈云同志讲的话要听。去年武昌会议的公报,陈云同志提议四大指标是不是不写,被乔木顶回去了,没有反映,4月2日乔木才告诉我,认为大会都通过了嘛!有两个观点不正确:第一,大家有时会犯错误,而一两个人是正确的。列宁常占少数,我也有时一个人孤立。第二,组织关系不正确,你乔木是个秘书,对于副主席的建议不反映。起草宪法时,总理建议增加文化一条,给杭州打电话,乔木也顶了回去,没有报告。武昌会议是陈云一个人正确,但未反映到我耳朵里。1月上旬也是陈云正确。建议在坐的同志多谋一点。

二、留有余地。成都会议时讲留余地,后来就不讲了。俗话说要有后手。一切工作都要留有余地。我们在安排工作计划时要留有余地,给下面点积极性。不给下面留有余地,就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留余地上下都有好处,如农村包产问题,包产指标两千斤,就是没有给下面留有余地,也是没有给上面留有余地。过去我们打仗也是一样,要留余地,集

中兵力打击敌人，还要有个预备队，必要时把预备队拉出去。现在搞生产就忘掉了。计划工作要留有余地，长短期计划都应如此。要让实际工作去超过，要给群众超过计划的余地。让群众超过反而会鼓舞群众的干劲。我们有些生产计划、经济计划，满打满算，不留一点余地，很容易造成虚假现象。我怀疑搞工业的同志是否懂得工业。留有余地是政治问题，也是工作方法问题。我第一次访问苏联同斯大林谈话时，问他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有什么经验。苏联同志说，经济建设有两条经验，第一是留有余地，苏联“一五”计划留了20%的余地，它公布的数目就少20%。苏共二十大公布七年计划，钢的生产指标9000多万吨，它实际生产不止这个数。农业生产也好，其他也好，都是留有余地。实际超过了，人民群众心情更加舒畅；一点余地不留，将来完不成计划，就造成悲观失望。苏联经济建设的第二条经验是抓住重点。有重点才有政策，没有重点，平均分配就无所谓政策。这是很好的经验。我们要按政策办事情。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重点。打仗也一样，要有重点，有个主攻方向。有个箝制方向，这样才能打歼灭战。不仅建设工作要有重点，打仗要有重点，就是舞台艺术、做文章，写诗也要有重点，留有余地。周扬告诉我，舞台艺术也要给观众留有余地，不要把戏都演完，看完戏群众还会想想，这样的戏演得才算成功。现在我们有些戏用不着去看，都是一个公式；开个群众大会，开个斗争大会，喊了几句口号就收场，没有给群众留下余地就结束了。所以写文章、做诗、演戏都要留有余地，要让群众去想想。

三、波浪式的前进。我说过，“马鞍形”不要紧。我

1957年反对“马鞍形”，重点是批评“反冒进”，那时有人公开在群众中反冒进，反“多快好省”路线，1956年超过14亿基本建设投资，1957年不可能不把计划降下来，钱和材料只有那么多，只能办那么多的事。今年计划也稍微降低了些。社会主义建设要懂得波浪式的前进。“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不能天天搞高潮，我不反对波浪式，但是在群众中公开反冒进是不对的，这是泼冷水、泄气的办法。“马鞍形”将来还会有的，主要是不要反冒进，美国从1860年到1958年的99年中，也不过是七次生产高潮，不是逐年高潮，也是波浪式前进。我们的经济建设，按实际情况，可以高些，可以低些。比如钢生产到一亿六千万吨，你还要翻番就不容易了。少的时候翻一番可以，多了翻一番就困难，也没有这个必要。这是波浪式前进。波浪式前进也是个工作方法，凡是运动就有波，在自然科学中有声波，电波。凡是运动就是波浪式前进，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做工作，订计划，也要照顾到这一点。我怀疑我们工业建设上的经验到底总结起来没有。

四、我只是不同意反“冒进”，同意按照形势改变计划。形势变了，情况变了，人的思想也要跟着变，我们就要改变计划。如1956年11月全会我讲过，钱只有这么多，只能办这样多的事，不能搞多了。我是历来如此。我所反对的是公开在群众中间，在报纸上反“冒进”，反“冒进”在报纸上登泄气，群众抬不起头来，外国人骂我们。但是我赞成削下来。不根据情况改变计划，工作就被动，武昌会议到现在就改变了，经过第一季度的实践，认为非改变不可，不改变就

会造成困难，造成混乱，任务不可能完成。要根据情况变化，适应情况变化，按情况办事。脑子不要硬化，不要主观地订计划。

五、观察形势。脑子不要僵化，要注意观察形势，观察动态，了解情况，要提倡嗅一嗅政治形势，嗅一嗅经济形势。所谓政治形势就是观察各阶级思想，观察他们立场变化。书记要观察，各委员也要观察。各委员不但要做好分管的工作，也要做好集体工作。北戴河会议时，指标定得太高。六七八九月，我也热过一阵子。但是8月在北戴河开会，没有人提议在我那个地方召集个小会，讨论一下1959年的指标。那时我的主要精力是搞金门打炮，人民公社的问题不是主要的，那是谭老板挂帅，我只写了一段。北戴河会议后，计划工作一直被动，北戴河大会太多，决议我都没有印象，我翻了一下真有一个“1959年计划”决议。后来我到河北、河南走了一趟，就发现1959年3000万吨钢不行了，到武汉觉得只能搞两千万吨或者还少一点。陈云同志建议四大指标不说出去，看几个月再讲。上海会议毫无准备（按，指计委没有将1959年指标等预先通告），我写了多少东西给你们，使你们懂得我写的是什么问题。

六、当机立断。只有观察形势正确，才能当机立断。把握形势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计划。有的同志上不摸底，下不摸底；有的工作也有断，但断的不恰当，有点武断。我也有武断，比如（第二次）郑州会议说：“一般不算旧帐。”恰好相反，一般要算旧帐。还有公社若干问题决议，各级管理，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别人写的意见，不是我的意见。我看了这个东西，我不懂，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公社

好。至于内部情况，我不懂。你们写了，我觉得好。我还找了几个同志，一个叫胡乔木，一个叫陈伯达，在广州搞了两天半，过细地搞了；还是几级管理，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经过12月下半个月，1月上半月毫无感觉，下半月我感觉到了。1月27日就提出这个问题，要谢谢《内部参考》，对我很有帮助。还看了地方的材料，湖北顶牛顶得厉害，瞒产私分。还有赵紫阳的信，还有城里没有副食品了。我在：1月25日开始的那个会上讲了，没有副食品了，猪肉买不到了，要排队了，蔬菜有一个时期每人只配给一两，而合作社每人两斤，其原因何在？我也想不出。现在想，我为什么要卖给你呢？钱都归了公社，不归生产队，他还不自己吃。2月下旬阴历年之后，我就感觉这个问题了，逐渐形成了生产队所有制这个思想。以后跟刘子厚在天津谈话，谋了一番，然后到山东，舒同讲了平调的情况，吕鸿宾合作社一张条子、一顶帽子、一把秤，转变为一把钥匙、一张布告（不上调）、一个楼梯（让下楼来）。乱调物资不行，搞心理战、神经战，农民不伯，你没有办法。现在看来，实际上本位主义在公社，在县里，你不生产就拿来，是什么主义？人家瞒产私分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明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有些同志三分怕上级，七分怕下级。因为他摸到了上面的底，有什么错误缺点，上级总是要掌握“团结—批评—团结”、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方针。他怕的是群众，你要他开五、六级干部大会，几万群众参加，他就怕了，他就经不起检查。以后要来一个上级、下级夹攻中层。很多县委、地委的话可以不听，尽是好话，不把事实情况让你知道。工业方面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中级干部的话往往不能听，要听也要上下结合才

能做出正确的结论。1959年我找到一种方法，开五级干部会。县开五级干部会，基层干部有60%，占绝对优势，这样的会才开得好。要善于分析情况，抓紧时机，当机立断，下定决心，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方针政策。

七、与人通气。上下左右，左邻右舍，上上下下，都要通气。中央与地方商量通气，党委委员互相商量通气，与书记要通气。我们过去通气少了些，要想办法通气。现在采取了写信的办法。一个月写一次，这就是通气的办法。通气有好处，不通气怎么了解情况？怎么指导工作？做工作，开会，应该事先有个酝酿。这次上海会议，3月25日要开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谁也不知道，中央委员、政治局主席也不知道，各省第一书记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先通气？为什么不把题目和简单意见通知人家？为什么（只顾自己）梳洗打扮（按：意指不如蓬头垢面见客）？我说了一万次了，大闹了一顿是南宁会议。北戴河会议也没有通气。这一次要邓小平挂帅，他脑子比较灵活，政治上比较强，要他来作报告。北京会议（1月25日到2月1日）我听了八天训，2月1日我讲话，叫大家留一天，我说，两千万吨钢有三种可能：完成，超过，完不成。第三种可能出现也不要哭，不要如丧考妣。我要陈云同志讲话，他不摸底，反而作了检讨，说对两千万吨钢动摇过，犯了错误。请同志们脑筋灵活一点，对反面的话要好好听听。

八、解除封锁。封锁得厉害，片纸只字都不让你知道。平时不向中央反映情况，开会才拿一大堆材料来，平时不下毛毛雨，到时就下倾盆大雨。要把封锁消息的同志狠狠批评一顿，让他几夜睡不好觉，以后就会好。杜勒斯的封锁政

策，我们共产党里边也有。他就是不给你反映情况，不汇报，不请示，就是不让你知道。开会前一天不知道，第二天听训。名曰主席、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实际是跑龙套而已。你们不解除封锁，我是不高兴的，我号召被封锁者起来，反对倾盆大雨。要下毛毛雨，不要下倾盆大雨。对省委书记也不要封锁情况。要把情况如实反映上来，不要封锁。

九、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真理在他手里，不在多数人手里；多数的时候是多数人胜过少数人，有时候又是少数人胜过多数人。你们不要看开大会，大多数人赞成就是正确，就是真理，那不见得。往往真理是在少数人手里。如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他马克思一个人手里。你们看过联共党史，有一次会议大家都举手了，就是列宁一个人不举手。列宁没有举手是真理，其他人都不对。列宁讲，要有反潮流的精神。（毛说井冈山被批为“枪杆子主义”，认识论上是“狭隘经验论”，政治上是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布哈林主义，这些打击激发他对抗这些。讲遵义会议，讲巴西会议全场反对，他只有一票，决不屈服。）各级党委要考虑多方面的意见，要听多数人的意见，也要听少数人和个别人的意见。在党内要造成有话讲、有缺点要改进的空气。批评缺点往往有点痛苦，但批评之后改了就好了。有些同志不把自己心里话说出来，中庸之道太多了。不敢讲话无非是六怕：怕扣机会主义，怕撤职，怕开除党籍，怕坐牢，怕离婚，怕杀头。杀头，岳飞就是杀头才出名的。要言者无罪。按照党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有些同志深怕对自己不利，这就要提倡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错误的意见提出来，还可以受教育。领导干部对极少数人的意见，应该很好地考虑，注意分析这



些意见，不要马上顶回去，看看里边有没有真理。

十、北戴河会议、武昌会议、北京会议、上海会议的历史过程，要好好总结。北戴河是高潮，武昌是中潮，北京基本维持武昌的调子，我当时有意改变，但是没有人和我商量，也不听陈云的话，最后我争取了一天发了一通牢骚。这次上海会议比较恰当一点，比较合乎实际，可以争取完成或超一点，这是讲钢。至于粮食、棉花两个东西，我看是超不过，这个东西是我历来怀疑的。搞九千亿斤就好了，搞一万亿斤就更好，去年可能是5700—6000亿斤，增产2000亿斤也不得了，1956年只增了150亿斤，是最大丰收。我曾讲过增产一千亿斤也不得了，谢天谢地，也是前无古人。10500亿斤也不好改，改了泄气，外国人、中国人都不好看。不改的东西很多。去年放了很多“卫星”，有的未放起来就掉下来了。为什么不去更正呢？一更正就会给群众泄气。去年确有一个大跃进，增产10%就是跃进了，苏联是8%，增产20%是大跃进，增产30%是特大跃进。客观事物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认识的。不到今年2月下旬，我就不认识公社所有制问题，武昌还没有提出所有制问题，也是（第二次）郑州会议才提出来的。

十一、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我说的是禁止。有些工业部门拿出来的文件，别人看不懂，问他，他自己也不懂。写文章、写报告，不能用加减乘除的方法，即形而上学的方法，一定要有情况，有分析，切合实际。我怀疑搞经济工作的同志，是否懂得经济，有的经济学家是不是真懂经济。如果真懂得了，一定会从意识形态上表现出来。自己还不懂，写出来的东西别人当然也看不懂。为什么写的文

章别人也看不懂，就是没有钻进去，没有掌握材料，没有把每个问题都交代清楚。你们都是大学生，都是 80 岁的大学老教授，讲孔夫子、韩愈、唐宋八大家、六朝文学，而我呢，就是小学生。因为我写了文章，不入大雅之堂。你们看看吧，这一个多月我写了十几二十篇给同志们。但是我劝同志们写我这种通俗文章。你写文章干什么？你是让人家懂。你写古文，许多问题不交代给人家，人家怎么会懂呢？今天交代了，明天又不交代，结果忘记了，不懂心理状态。我赞成朱自清的风格。朱自清是清华大学的一个教授，他的文章写得好；另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第一个神气的是鲁迅。他的话是口语，你看《阿 Q 正传》不是口语？“和尚动得，我动不得？”“儿子打老子”之类，都是口语，一讲出去人家就懂。对于这个问题，我讲一万次了，但是许多同志没有改正过来，也许从今天起还是改正不过来。但是我有生之年，没有见阎王，我都要整这件事。六亿人民，一千三百万党员，你要给他们阅读，但是你写古文，写半文半白结合的文，又不交代问题，不使人看了通顺，懂得你的意思，不行。所以，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一定要禁止，不要拿出来，你拿出来，我就要反对，立即顶回去。

十二、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叫毛泽东，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挂副元帅，为副总司令，我们俩人一正一副，你是总书记嘛！我向你们要求这个权力，要你们通过。中央常委七个人，书记处十二个人，十几人集中领导。但要挂帅，没元帅怎么行？我姓毛，毛遂自荐，我要挂帅，六亿六千万人，一千三百万党员，不挂帅不行。现在的形势很有利，也很有害，有许多办得不好，不如意。以上各

条，都要有这一条才能保证，不然都是空话。要反对封锁，小事强迫签字难以避免，但重大问题不能“封锁、禁运”做计划一定要先在常委会、书记处讨论大纲，在南宁会议就提出这个问题。不准你们先讨论，不能你们搞好了，把一大本计划拿到面前，造成既成事实，强迫签字，这是不行的。

十三、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这是唐朝人的两句诗，好像是《太平广记》上的，要当秦始皇，当秦始皇就要办事。先在常委、书记处讨论，我和邓小平挂帅。邓小平你挂了没有？你敢不敢？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也是常委会的总书记，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但是你还是我的总书记。不过你还是相当硬的，中央委员会那么多人怎么找到邓小平呢？还是我找为好。

十四、我要找几位通讯员，名曰秘书。从三委（计、经、建委）三部（冶金、机械）找，一部一人，人由我自己找，找那些有一点马列主义的，脑筋灵活一点的人，借此同你们唱对台戏。然后再逐步增加，找几个部的。前面乌龟爬开路，后面乌龟照路爬。你们可以找通讯员，为什么我不可以找一点通讯员呢？你们反对得了呀？我找了个李锐，在长江水利上和林一山是唱反调的。他写了三封信给我。我看这人算是好人，有点头脑，就是胆小，给我的信先给富春看，怕你的顶头上司，不怕我，我这里不是正统，是插野鸡毛的。（大声地）李锐来了吗？（我坐在会场的最后一排，只好应声站了起来。）你坐在后面干什么？你坐到前头来嘛！你写的东西有“骨头”没有“肉”，你给我点“肉”吃嘛！你给我写了三封信，给我很大帮助，我很感谢你，是共产党感谢共产党。

十五、李锐怕鬼，要改。要解放思想，不要怕鬼。现在我们同志中有一种空气很不健康，怕挨整，以为总不知有哪一天要整到他头上来，所以谨小慎微。好嘛，公事公办，怕什么？只要不杀头就行，其他都可以，戴机会主义帽子，记过，撤职，开除党籍，老婆离婚。“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王熙凤乃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舍不得砍掉头，就下不了最后的决心。岳飞不是砍了头，比干不是挖了心吗？明朝有廷杖制，顶皇帝就打，廷杖打死者几百人、千把人，至于推出午门斩首者更多。但是那些人敢讲，冒死上谏。我们共产党高级干部很不勇敢，不肯尖锐。无非是怕穿小鞋，怕失掉职务，怕失掉选票。我就讲透这些人的心事。我跟陈伯达讲过，你不尖锐，无非怕丢掉选票。连封建时代的人物都不如。无非是开除党籍、撤职、记过、老婆离婚，砍头也只是一分钟的痛苦。风波亭的戏还要唱，岳飞砍了头，有什么不好？

十六、一机部较好，冶金部较差，希望改过来。王鹤寿这一时期有很多人对你都不满。无论对你整得对，还是整得错，都有好处。我捧你一年多了，我赏识你的几篇文章，也许因为如此，你的尾巴翘起来了。我批评的这些人，以及没有批评的人，都是好同志，我没有偏心。但要批评，要在这样的大会上批评。一个人没有人恨，是不堪设想的。我这个人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是不是这样呢？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因为我跟他闹别扭闹得相当多。会理会议、延安会议，中央苏区江口会议，我们两个人斗。但是我们两个人我看是好的，有什么不好呢？都是革命党。我是寸步不让，你一炮来，我一炮去。我跟彭德

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仅跟彭德怀同志一个人的问题，跟其他同志也是这样。冯玉祥批评我这个口号，那是对国民党，他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要犯我，我必自卫。”我就不赞成，你这个（说法）没有神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而且立即当场一秒钟我就犯过去。你使我下不去，我也使你下不去。我跟我的兄弟也是这种关系，其人叫毛泽覃。1927年他跟我谈话，谈得不对头，我手上有一支铁棍子，我就臭骂他一顿，结果他吓得乌呼哀哉。回去几天睡不着觉，然后他跟同志讲，共产党是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就是这样，不能正家法，只能正党法，而我是正了家法，封建主义。毛泽覃这个话讲得很好，我老是记在心里，讲得非常正确。后来我们兄弟很和睦，都是好同志。我的缺点，你们也要批评，互相帮助嘛！我得罪了你们，全体不投票，一个也没有，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林彪、董必武、朱总司令，你们都不投我的票那也好，我无非是拉倒。我没有饭吃，我要饭讨米，为什么不可以？此外，我讲了杀头、开除党籍，撤职、留党察看、记大过、老婆离婚，统统来，我准备着，我就游黄河，游长江，从黄河口沿河而上，搞一班人作警卫，找一个地质学家，一个生物学家，或者还找一个文学家，找这三个人，只准骑马，不准坐卡车，更不准坐火车，就是骑马，一直往昆仑山，然后到猪八戒的通天河，翻过长江上游，然后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为止。我有这个志向，我现在开这个支票，但哪年兑现不晓得。

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

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我送了《明史》“海瑞传”给彭德怀同志看了。你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是很不客气，非常不客气，皇帝看了这封信丢到地下，然后又捡起来看一看，又丢到地下，然后又捡起来，想一想觉得这个人还是个好人的，但是终归把他捉到班房里头，恨透了，准备把他杀掉。嘉靖皇帝炼丹修道，昏庸老朽，坐了四十几年天下，就是不办事。有一天皇帝死了，班房里的人告诉海瑞，恭喜你了，你要出班房了，要升官了。他听了这话以为是假的，他就拼命吃饭吃肉，准备杀头，以为是要杀头了。班房告诉他，不是要杀他，是皇帝死了。他听了以后哇哇大哭，把所有吃的东西统统吐出来。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的勇敢，海瑞比包文正不知要高明多少。有一个戏叫《三女抢牌》，有海瑞出场。我把这个《明史》给彭德怀同志看，同时我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周恩来：看了。）

我讲我跟一些同志的冲突，冲突过后我也过去了，我也不记仇，绝不报复。我们这些老同志没有打过架的相当少，不打不成相识。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我跟恩来打过架没有？跟彭德怀打过架没有？跟朱德打过架没有？跟你（指刘少奇）也打过架，就是合作化问题，对于洛甫的处置问题，翻你的案，也打过架。跟陈云我们打过架。跟林彪也打架，我们在闽西一路合作得很好，遵义会议以后我跟你们两位（一个林、一个彭）都分裂了，搞了一个会理会议整你们。因为你们要把我们搞掉，要搞掉三个人，一个毛泽东，一个朱德，一个周恩来，你们要来组织司令部、你们没有纪律，你们是错误的，那得整。后来他们觉悟了，林彪觉悟得很

快 而彭德怀觉悟得很慢，在后来似乎也觉悟了，总觉得耿耿于怀，会理会议批评了；一个百团大战批评也是耿耿于怀；一个王明回国的延安会议，首先我就批评他，我说你是错误的，你这个方针，军委会议的一个文件，我就指出这个文件是完全错误的。他那时答复一句话，他说，你这个人坐在延安，没有看见群众，你是脱离了群众，意思是讲我彭德怀在华北接近群众。等到王明回国，他就跑到王明那去了，虽然这些事情我们整扭闹得相当多，但你还是一个好人，是革命党，我信任你，有工作能力，有革命感情，要把革命的事情搞好。萧劲光我跟你打过仗没有？那个仗恐怕是我错的多，你正确的多。但是那个时候你也有错误，你一点错误没有？你当留守处主任，我们把贺龙同志跨在你头上，那时候你是很不舒服的。还有已经死了的蔡树藩同志，在保安我们可斗得厉害，那也不客气，他说罗炳辉那个人可不行，缺点甚多，硬是不行，我说你要做工作，你是政治委员，为什么不工作？我说这个完全不对，罗炳辉有缺点，你为什么帮助他？我得罪人的事总有十几、二十件。50岁以前肝火很盛，盛气凌人，50岁以后比较温和一点。比如现在我这篇讲话，虽然也是不客气，还算温和的。

刘伯承同志我们两个不是斗得厉害？我还写了书，战略问题，那就是批评你的，你也没有答复。后来你在军事学院大概是想答复一下，没有尖锐地提出那些问题来批评，因为我那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不能驳的，是驳不了的。那个里头批评了刘伯承，批评了任弼时，没有指名字。任弼时封我一个“狭隘经验论”；刘伯承封我一个“怕打烂坛坛罐罐”，军事上不行。还有已经死了的凯丰同志，那时

他是博古派，那个同志好不客气，在遵义会议时，他说，你这个人的兵法，无非是《三国演义》、《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了，而且看了几次；《孙子兵法》在那以前我一次也没有看过，只听说有此书，他说我看了那个东西，我就问他《孙子兵法》有几篇？第一篇叫什么题目？《孙子兵法》十三篇，第一篇叫什么题目，我现在也忘记了，我就用这个方法来问，他也没有看过。我说你也没有看过，你说我的兵法是《孙子兵法》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兵法，理由在哪里？至于跟粟裕同志，萧克同志，还有陈伯钧，还有郭化若同志，我们几个人是历来斗的，他们是我的反对派。但是你们是反对派，你们的官还可以做，我不报复。去年报复一次，不是我的报复。去年报复是开军委扩大会议，四五百人，是你们犯了错误，把你们这一批评，我就开心了。

总而言之，都是好同志，我没有偏心，但是我要批评，其目的是使同志们找到一个较好的工作方法。如果你们不投我的票，那就拉倒。这是最后一条。

从上午9点到12点多，毛泽东讲了三个来小时。如此疾言厉色，说古道今，冲天怨气，无穷感慨，来回顾“大跃进”一年多来出现的情况和问题，是谁也没有精神准备的。关于钢铁挂帅高指标计划的变动，其升降形成的抛物线过程，其严重影响与各种苦头，讲话中算是接触到了某种表层的反应，但他只是责怪计划部门尤其国家计委的“失职”，附带批了一下王鹤寿，责备他们少谋专断，忘记了留有余地，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都不对头，而根本没有触及到产生这一严重局面，乃贯彻总路线、高举三面红旗、形成全国群



众运动的结果。关于自己的责任，只轻描淡写说了一句：我的头脑也发热了三个月，讲话中似乎接触到“反冒进”问题是批错了，但又不愿松口，只是说不同意“反冒进”这个提法。其实有计划按比例，综合平衡，留有余地这一套苏联的计划工作经验，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计委和各工业系统是熟悉的，国务院的领导也是熟悉的（因此1956年一出现冒进现象，随即予以制止）。只是毛本人不熟悉罢了。由于他本人过去没有直接领导经济建设，对工业不熟悉，自己直接到前台过问了一年多，结果“大跃进”惹出这么多问题，于是就责怪主管部门不懂经济。应当说，关于钢铁等高指标问题，到上海会议时大家都有了一定的觉醒，毛泽东也感到要下楼来，他的这篇讲话可说是一张楼梯，指标定要落实下来。可是，指标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农业的高指标也没有落下来，整个经济工作仍悬在楼梯半空中。至于突然提到挂帅问题，主帅、副帅问题，更使人大为惊诧，对于这些话的意思作了许多猜测

我所经历的“大跃进”期间，作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是紧跟毛泽东，极尽全力高举三面红旗的，主要表现在计划指标的变动。关于1959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到1962年）的指标，从南宁会议调整八大定的计划起，经过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前后到北戴河会议，中间大概向上调整过五、六次。北戴河会议到1959年4月上海会议，最后庐山会议前期，就又几次往下调。这一年多中，计划工作人员是最辛苦的，没日没夜地工作，尤其历次中央会议之后。可是，一遇计划指标变动，尤其后来指标下调时，挨毛的批评指责的总是计划部门，富春首当其冲。我在会议上就

几次听过，总说计委的文件看不懂；做计划的人少谋寡断，满打满算，不留余地；武昌会议有封信说是：“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悬冰之冻。”计委简直变成一个出气筒。除上海会议之外，批得最厉害的，还是庐山会议前期。（我在《庐山会议实录》中写到此事）我自己真没有想到会在大会上受到如此奇特的夸奖。“你坐到前头来嘛”，“给我点肉吃嘛”，“共产党感谢共产党”，此种声调、语气、神态，至今仍历历在目。南宁会议讨论三峡时受到表扬，“要培养像李锐这样的秀才”，但那毕竟是在小范围讲的。这次是中央全会，坐了一满礼堂的人，而且是满篇怨言、气话中冒出来的称赞。于是我又一时成为关注和议论的对象，一些人对“骨头与肉”不知所云，甚至有人对我开玩笑说：“你真是红得发紫了”。

当天晚上，见到田家英，同我一样，他和胡乔木等人都对主帅、副帅的提法，感到突然和费解；家英甚至说，是否头晚安眠药吃多了。这样谈到海瑞，似乎是鼓励人们学海瑞，敢于讲真话，不要今不如昔，连明朝的廷谏之风都赶不上。家英向我反映了乔木的观点：毛提起海瑞的说法不止这一次，实际上还是要求不要出海瑞。当时我和田都认为乔木这个看法很深刻，他对毛理解得比较深。（吴晗写的论海瑞的文章，庐山会议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时，胡乔木加了一个尾巴。）我们共同感到，这一年多来，乱子闹得太多太集中，毛也感到自己有责任，却又不愿意直接痛快承担起来（他有一种“不能下‘罪己诏’”的情结）。因此，通篇讲话很是情绪化，谈到历史教训，反复举了那么多人那么多的例子，都是曾经反对过他的，包括林彪也在内（我们感到举林

彪是一种陪衬，家英同我谈过，毛最看重的两个人是林彪与邓小平)。以此证明，他是一贯正确的，反对过他的人都是不正确的。于是强调挂帅、主帅副帅的问题。证之三个月后的庐山会议，上海会议这一长篇讲话简直是可怕的伏笔。彭德怀是一个真诚而不失天真的人，他认真读了《海瑞传》，受到海瑞精神的感染，才在庐山写出那分“意见书”吧。

我个人再次受到此种夸奖殊荣，同北戴河会议冷遇相比，自也感到一种安慰；但心中却又怀着一种惶恐，即今后这个“秘书”怎样当下去？能否再这样“若即若离”下去呢？同家英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还是比较乐观的。

第二天，赵尔陆（一机部部长）找我长谈了一次，主要谈一机部同冶金部的关系。机械产品的周期都比较长，其数量、品种和质量三者，都同冶金部提供的原材料分不开，彼此依赖，互相制约；一年多来，计划的多次改变，其重点任务的变化，突击小高炉，突击轧钢机，造成许多半成品，尤其是铁含硫量高，不能使用，等等。他准备将面临的问题，向中央作一次全面报告。1958年6月的华东计划会议，我就接触到一机部的问题，部长助理陈易也同我谈过同冶金部的矛盾。关于大型电机的制造，主机与配套之间的复杂情况，我多少知道一些。赵所谈的问题与他们的困难，我是很同情的。记得后来庐山会议时，赵还带了一些不能使用的生铁样品，准备用物证来说明问题，后来会议形势突变，就没有摆出来了。

当时也还有经济方面的领导同志，找我谈同主席接触的经验，我只能根据自己的一点感想这样谈到：还是如实反映情况，不要顾及对方听不听得进去或听后的反应如何，以直

说比打折扣好。

记得在总理主持的一个小会上，总理对我写信反映情况，很是赞同。于是我趁机动员他到杭州后，去新安江看看，这是除三门峡外，正在施工的大型水电站，完全靠自力更生，由我们自己设计的（三门峡由苏联设计），72500千瓦一台的发电设备也是国内生产的。4月9日，由我陪同，总理去新安江工地看了半天，留下了这样一句题词：“为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的胜利建设而欢呼！”新安江值得欢呼：施工三年半后的1960年，就开始发电，造价没有超过预算，促进了工程质量，一直安全运行了几十年；水库形成的千岛湖，已成为东南旅游胜地。

上海会议之后，经过毛泽东提议，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于1961年出版，在全国发行。在所长何其芳写的序言中，毛泽东加了不少话，并针对1960年“反华人合唱”的国际形势，增写了一大段，要扫除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上所有内外障碍、一切妖魔鬼怪。序言在报刊发表，此书并译成外文。

### 三个文件的说明和会后讨论

4月5日下午，全会开大会，通过三个文件：1、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2、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3、关于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方案。少奇主持大会。

邓小平先作两个问题的说明：一、关于经济工作；二、关于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

邓小平先谈了会议对武昌会议确定的 1959 年计划指标的修改情况：钢由 1800—2000 万吨定为 1800 万吨，煤由 3.8—4 亿吨定为 3.8 亿吨，基建项目由 1500 个减为 1000 个左右，基建投资由 360 亿元减为 260—280 亿元，粮食、棉花指标不动。在这四大指标之外，还有一些调整：生铁由 2700 万吨降至 2400 万吨，钢材由 1400 万吨降至 1150 万吨，发电量由 495 亿度降为 410—420 亿度，发电设备由 600 万千瓦降至 350 万千瓦，金属切削机床由不包括简单机床的 9 万台降至 7 万台；大豆由 420 亿斤降至 300 亿斤，烤烟由 1935 万担降至 1300 万担，花生由 22635 万担降至 12000 万担。

邓小平接着谈了降低指标的原由。他说，为什么要作这样一些变动呢？这是因为经过了第一季度的实践，看来我们原来规定的某些生产指标大了一点，基建项目多了一点，而原材料生产的发展是有限度的，不可能保证这样大的生产指标和基建规模，如果不实事求是地加以变动，势必在原材料和设备不能如量、如质、如期保证的情况下，使本来不多的原材料更加分散使用，结果引起连锁反应，各方面都完成得不好，重点不能得到保证，一般也不能不受影响。例如生铁不减少 300 万吨，则与此相适应的采矿、冶炼、焦煤等等生产和基建项目都不能削减。例如基建项目越多，重点项目就越不能保障。现在看得很明白，如果不根据客观的可能来制定计划，就难免在执行的过程中作一些不适当的安排，造成一些人为的困难，其结果不是搞得更多，很可能是搞得更少。必须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但它是受客观实际可能限制的。如果我们不比较充分地认识客观的可能，制定一个积极

可靠的计划，并且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去完成和超额完成这个计划，那我们就会像 1957 年那样，犯保守主义的错误。我们都想多搞一点，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热情是可宝贵的，但是，如果我们过分夸大人的能动性，制定一个人们难于实现的计划，那我们也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同样不利于事业的发展。

李富春接着作了关于准备提交全国人大讨论的 1959 年经济计划指标的说明。

李富春说，1959 年的计划自北戴河会议起，经过了三次修改调整（武昌会议、二月会议、上海会议）。这三次调整，形成节节退却，错误正如今今天上午主席批评的，就是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有毛病。我觉得去年大跃进了，今年可以更大的跃进。事物是波浪式前进。少谋武断（有了主观主义），不是多谋善断，情况没有摸清楚。“一五”计划 156 项设备都是苏联给的，现在我们自己搞，关系复杂得多。

全会原来安排，李富春对 1959 年计划指标只作口头说明，但毛泽东定要有一个文件，所以他又同薄一波赶出一个文字说明的材料。说明谈到 1959 年经济指标经过调整以后，工农业总产值比原计划降低 9%，但仍比 1958 年增长 45%；公布的计划比调整的计划指标降低 7%，比准备公布的 1958 年产值增长 40%。工业总产值比原计划降低 10%，但仍比 1958 年增长 46%。农业总产值比原计划降低 4%，但仍比 1958 年增长 44%。说明还谈到，1959 年钢产量定为 1800 万吨，其中好钢为 1650 万吨；铁路运量由 6 亿吨降至 5.65 亿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 700 亿元降至 670 亿元。

李富春在说明中还专门谈到关于 1958 计划完成数字的

调整问题。1958年工农业总产值的统计数字为2132亿元，比1957年增长72%。考虑到一些农产品统计数字需要作调整，工业产值中有一部分计算也不准确（主要是公社工业），同时为了照顾1959年增长速度，将这个数字调整为2050亿元，比1957年增65%。烤烟、甘蔗、甜菜的统计数字打七折，花生和油菜籽的统计数字打八折，猪的饲养头数由2亿头改为1.8亿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统计数字由553亿元调整为548亿元。这些调整将提交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批准。

谭震林作了《关于人民公社十二个问题》（修正稿）的说明。

谭震林谈到，八届六中全会以后，在整顿人民公社中暴露出比较普遍的瞒产私分、大闹粮食等现象，反映出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其主要问题还是公社内部的所有制，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破坏了生产队的即原高级社的基本所有制。这是八届六中全会的一个缺点。《关于人民公社十二个问题》的文件，就是根据六中全会以来的问题所形成的解决问题的意见。

谭作了五个方面的说明。（一）关于所有制的问题。总的讲，人民公社在现阶段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但是，这样笼统地讲，还不够，还要加以分析。农民感觉生产资料归公社所有，认为公社是国家办的，他们的东西收归国家了。所以必须肯定，现在应当基本上是大体相当于高级社的生产队所有制。生产资料基本归生产队所有，产品也就基本归生产队分配，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二）算旧帐的问题。县社之间、社队之间、社社之间，队队之间的旧帐，包

括银行错收回的农贷在内，都应该算。既要算清县、社同生产队之间的帐，解决大集体与小集体之间的矛盾，也要算清生产队内部的帐，解决生产队干部与生产小队内部的帐，解决生产队干部与生产小队干部、全体社员之间的矛盾。这些旧帐不清理，谈了半天所有制，还是一句空话。（三）关于人民公社的收入分配问题。对实行伙食供给制的几项补充规定，目的在于既坚持保障人人有饭吃，又进一步体现“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原则，做到多产多吃，多劳多吃，使生产搞得好的队和劳动力强的人得到照顾，这对于刺激生产积极性是有利的。这种物质利益的刺激，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也是不可忽视的。（四）1959年的粮棉生产指标。武昌会议确定的1959年粮食产量1.05亿斤和棉花1亿担的计划，必须力争实现。在粮食产量还没有达到亩产千斤以前，保持一定的播种面积仍然是很重要的，基本农田可以搞，这主要是在一些地多人少的地区，但是，还是要基本农田和多种多收两条腿走路，要达到全国平均亩产千斤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58年总产量按7500亿斤计算，每亩单产不过420斤左右），所以不能轻易缩减播种面积。在“二五”计划内，还必须多种多收，提高单位产量和保证播种面积并重。（五）关于公社的组织建设和领导方法、工作作风问题。中心要求是管理民主化，并且要从管理制度方面来体现当前的生产队基本所有制。

谭最后说：“我是中央书记处分工管理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对于人民公社所有制这样带根本性的问题，在主席指示以前，我只看到一些现象，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而且，在几个过渡的问题上，我的头脑有一个时候也发了热，



在生产数字上，对于浮夸虚假现象也缺乏冷静的分析。这是我应该检讨，应该负责的。”

“大跃进”以来，谭震林的脑子一直是比较热的，办公社，放“卫星”，他都抓了不少轰动全国的典型，很得毛的赏识。但谭没有投机心理，出了问题，敢于认错，不推卸责任。

与谭震林作检讨形成对照的，是柯庆施在会上的发言。全会已在降温，他仍强辩说：武昌会议决定两千万吨钢，那并不是谁想出来的，那是我们开的单子，我们上海也开了单子的。钢这样一退再退，心里不舒服，也不甘心。在第二天的小组讨论中，柯又说：钢和钢材任务的调整是对的，但我们华东有可能完成1800万吨所分配的任务，不完成决不甘心。柯的发言有潜台词：原来的钢指标不是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有客观依据。他明确说对降低钢指标“心里不舒服”、“不甘心”，实际上是文过饰非，想维护自己的某种“乘风破浪”的形象。事实上，华东的钢生产状况很成问题，1958年计划是192万吨，武昌会议预计到年底只能完成168万吨。6月的华东计划会议柯提出1959年计划是600万吨，按实际生产能力根本完不成，所以武昌会议降到400万吨。就是这样一个降低的指标，华东也完不成。曾希圣在武昌会议时就说过，分给安徽的指标完不成。所以上海会议再次降低指标，华东调整为350万吨。柯内心对此是很不满意的。“大跃进”时期，我对柯庆施的印象根深，这场运动的形成，他负有很大责任，当时感到这是一个心怀叵测的人。

全会通过了上述三个文件。其中《关于人民公社十三个问题》的文件，会后毛泽东又主持继续作了修改，增加了部

分内容，改为《关于人民公社十八个问题》，由中央政治局于4月5日通过后下发。通过文件后，少奇提议大家再留一天，谈谈心。第二天又分组讨论了一天，会议实际上4月6日才结束。

分组讨论主要是围绕毛在全会上的讲话展开的，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

#### 一、关于“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估计

总体上都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认为这些都是正确的。但也指出，它毕竟是新事物，具体执行起来问题不少。江渭清说，北戴河会议期间，头脑有些发热，有积极性是好的，但盲目性较大。廖鲁言说，去年八、九、十月间脑子最热，所以在粮食产量上，在人民公社化问题上等等，都出现一些问题。江华说，对总路线的精神领会、掌握不够，偏重多快，对好省注意不够。华南组认为，去年工作确实胜利很大，但一些人觉得农业问题解决了，被胜利冲昏头脑，安排计划就不冷静了，把许多困难看得非常容易。加上人民公社化，更加热起来了。徐冰发言比较尖锐：去年很大成绩，但工作上也带来一股左风，如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有右也有左。如认为两年内一定可消灭阶级，另外有认为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的看法，去年搞城市人民公社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哇哇叫，于是有人又提出阶级斗争又尖锐了，造成人为的紧张局势和对立面。西北组讨论认为，1958年肯定是大跃进，成绩是主要的，但是在工作方法上有缺点，有些缺点还是严重的。例如，把工业建设、技术问题看得太简单了，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订计划对于客观可能性考虑不足，即使考虑到可能性，也是把力量打到十分、十二

分，不留余地，而且计划指标只能上去，不能下来。报纸上有些宣传不加分析地反对“根据论”、“条件论”，宣传“巧妇能为无米之炊”，宣传成绩有虚夸现象，不是卫星也说是卫星，产量没有那么多硬说是那么多。

当然，对问题估计的基调，讨论中的说法大都认为，这次是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属于认识方面的问题，有些缺点在大跃进中是难免的；但也有人认为，几个指头与一个指头（关系）不能误解，不能因为九个指头来掩盖缺点，忽视缺点。

## 二、关于问题发生的原因

讨论中谈得最多的，还是发生上述缺点错误的原因。这方面多是按照毛讲话的内容展开，其中有些分析比较透彻。

首先是思想方法有问题。汪渭清说，主要的由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有些毛病，例如主观片面，间接听汇报多，直接深入群众和联系群众较少；听正面意见多，听反面意见也较少。华中组有人指出，我们思想上的片面性还表现得只有一点论，没有两点论，只看到有利的一面，忘了不利的一面，看到胜利，忘了缺点，从一年多来的实践中，说明了这种思想是十分有害的。曾希圣说：我们的头脑曾经有些发热，思想方法上有毛病，没有留余地；粮食指标扩大宣传，1959年先准备搞1100亿斤（安徽），现在打折扣到700亿斤；去年大放卫星，办钢铁放卫星，办中学放卫星，办大学放卫星，财经也放卫星，棉花还刚结桃，就说要收购800万担。华中组讨论认为，许多事情，一方面脑子发热，另一方面也是心中无数，不摸底，北戴河提出搞3000万吨钢，大家脑子都很热，也未感到有问题。

其次是盛行浮夸之风，作风不民主，听不得不同意见，

造成一种极坏的空气。东北组讨论指出，有些同志民主作风不够，还有些人把实事求是和右倾、把干劲和浮夸混为一谈，甚至说任何时候都需要三分牛皮七分实在。领导人如此，下面有些干部就难免投其所好，或者有话不讲，或者不讲真话。这个组有人指出，不少干部是看气候、看领导人的颜色行事，有两个口袋装着不同的材料，你要什么，他给什么，甚至以少报多，以无报有，以假报真。西北组认为，前一个时期，一些地方空气不够活泼，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不能畅所欲言，对于计划指标和创造发明的怀疑不大敢讲，讲了这样的意见就可能有人说你不是“跃进”而是“跃退”，不是“英雄”而是“狗熊”，不是“模范”而是“麻烦”。

另外，一些人的品质也有问题。东北组讨论中有人指出下面干部的党性问题，有些人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风格不高，或者品质不好。华南组甚至有人指出，有的人喜欢摸主席的脉搏，主席喜欢什么，就反映什么，这种搞法是很危险的，使得主席难以了解到真实情况。（这条意见不管其本人是否意识到，客观上却是非常尖锐的，可以说既批评了下面的人，也批评了毛。）

讨论中，还指出了宣传工作中的浮夸问题。东北组认为，我们在宣传上确实有搽粉太多的现象，如讲到工人学哲学，就把刚刚开始学习了一些基本哲学知识的工人，描写成似乎是哲学家。又如放映一周就扫除文盲的电影，把罗马尼亚已经用过的奴弗卡因封闭疗法说成是我们的创造，无根据地放卫星等等。这样作久了，就会使我们的宣传失去信誉，在政治上形成很大损失，敌人不信，朋友怀疑，我们自己也不相信。

应该说，最后一天的讨论，比武昌会议乃至这次会议前一段的讨论，大家对问题的认识深入一层，对原因的揭示也尖锐一些，人们的头脑也清醒一些了。毛泽东的讲话起了直接作用，尽管他没有也不可能分析发生问题的根本原因，没有也不可能对自己作真正彻底的自我批评，但他所谈的“多谋善断”、“留有余地”、“波浪式前进”、“观察形势”、“与人通气”等问题，的确是有利于对当时“大跃进”某些经验教训的总结。当时他不讲这些话，可能退却和降温的困难还要大些。

事实上，即使上海会议和六中全会总结了某些教训，党内的认识仍是不一致的，前面提到柯庆施说：“心里不舒服，不甘心”就是一例。所以，会议对高指标的降低也是有限的。会后，国家计委会同国家统计局核实 1958 年钢、煤、粮、棉指标完成的确切数字。经过核实，1958 年钢产量为 800 万吨（基本上不包括土钢），煤产量 3.69 亿吨，粮产量 4000 亿斤，棉产量 3938 万担。根据核实的材料，1959 年要完成钢指标 1800 万吨的计划（实际等于比 1958 年翻一番还多），显然是不可能的。计委廖季立组织有关人员就钢产量计划再次研究，提出一份报告，认为 1959 年钢产量计划是完不成的，按 1200—1250 万吨安排比较切合实际。廖季立还向总理提出，1650—1800 万吨钢的计划是完不成的。

毛泽东这时委托陈云对 1959 年计划尤其是钢指标计划进一步研究落实。陈云征求了各有关方面的意见，包括听取冶金部 6 次汇报以及国家计委各有关局的意见，然后召集中央财经小组进行讨论，拟定钢产量 1300 万吨，5 月 11 日，陈云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报告，会议确定了 1300 万吨钢的指

标计划。当年年底执行结果是完成了 1387 万吨钢的计划，这证明上海会议之后对钢指标作进一步调整是正确的，否则，按原定计划指标完不成，可能又会搞出“大兵团作战”、几千万人上山这类劳民伤财的荒唐事情来。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上海会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确是在“节节退却”。这种退却或叫降温，是在“三面红旗”的大框架内进行的，退却只能退到“三面红旗”这道底线，不允许越过和突破。在毛泽东看来，退却只是暂时降温，抑制一下过于急躁的情绪，梳理一下过于混乱的秩序，然后继续大跃进；但是，退却和降温在方向上是同高举“三面红旗”相矛盾的。如果沿着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上海会议“节节退却”的方向发展，上述两者之间终究会发生抵牾和冲突。这种冲突的结果可能有两种：一种是“退却”和“降温”逐步突破“三面红旗”的框架，从而逐渐纠正乃至否定“左”的错误认识和实践，使经济和社会生活走上良性运行的轨道；另一种是“三面红旗”的框架扼止住退却和降温的进展，甚至发生方向上的反弹，急躁和冒进情绪重新升温，使原来的降温成果也被冲销，经济和社会生活出现更大动荡。不幸的是，后来庐山会议的结局，历史没有出现前一种情况，而出现了后一种情况。回顾这一段历史，真是令人万分痛心！

## 上庐山开会前形势

上海会议时毛泽东的长篇讲话，曾引起很大震动。他一开始就说要多谋善断，批评有些人听不进不同意见，不仅要多听干部的意见，还要听下面直接参加生产的人的意见。又老话重提，凡事要留有余地，甚至说不怕马鞍形。还说定要同中央通气，下情上达；弄清形势后，就要改变计划。从我写的三封信，讲到“不要怕鬼”，不要谨小慎微，提倡海瑞精神，敢于直谏，敢于犯上。又重提“六不怕”，鼓励大家向他提意见。还点名批评了一下王鹤寿，表扬一机部。

“大跃进”时，冶金部确实是逼得一马当先，想尽了一切促进办法，大胆打破常规，来完成翻番任务的。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也是根据冶金部的作为，来安排计划变动的。因此，上海会议后，冶金部立即行动，在北京召开华北五级干部大会，落实上海会议精神。国家计委也随之行动起来。

## 继续落实钢铁指标

早在 1958 年 12 月武昌会议（即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1959 年钢产量计划已降为 2000 万吨。进入 1959 年，钢铁生产形势事实上更为严峻。1 月上半月，钢铁生产的计划完成得很不好，比上年 12 月份的生产水平下降很多，距离一季度计划指标的要求相差甚远。按照一季度的计划要求，平均日产钢应为 35200 吨，钢材应为 222000 吨，生铁应为 56600 吨。但 1 月份全国平均日产量钢仅为 25000 吨，钢材仅为 16800 吨，生铁仅为 46100 吨。更为严重的是，重点企业的生产情况也不好，钢的日产量仅为 2200 吨，比上年 12 月份日产量下降了 11000 吨，钢材的产量下降更多，几个既有炼钢能力又有轧钢能力的重点企业，如上海、天津、重庆、大冶、唐山、太原、北满等钢厂，从月初以来，钢的产量一直不能上升，甚至有的不断被迫停产。上海各钢厂上年 12 月平均日产好钢曾达到 6000 多吨，但 1959 年 1 月日产量一直在 2300 吨左右。其他重点企业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当时了解到，扭转这种情况，钢和钢材的产量迅速增长上去，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生铁的及时供应；坚决执行生铁的调拨计划，是增产钢和钢材的一个关键措施。按照当时日产生铁 46000 吨的水平，钢的产量应该达到 3 万吨以上的水平。为此中央于 2 月 6 日发出指示要求各省在生铁的使用上，要先外后内（先外调，后自用），先保证重点企业的需要（包括机械、铁道部门的铸铁），再保证中小企业及



其他的需要。各省调给重点企业的生铁，要保证调好铁，能生产好钢和好钢材，二类铁和烧结铁一律不准外调。中央还认为，解决生铁供应紧张的根本办法是增加生产，为了增产生铁，必须大力增加洗煤和焦炭的生产。要求各地机械化洗煤厂生产的洗煤，一定要按煤炭部的调拨计划，调给各重点企业的焦炉使用，各地不得留用。各省立即抓紧建设简易洗煤厂和简易焦炉，争取2、3月陆续投入生产，让小高炉出好铁。各省还要采取紧急措施，保证已经建成配套的小高炉绝大部分在2月份投入生产，保证它们所需要的洗煤供应。与此同时，中央还就组织钢铁生产问题作了几项规定。《规定》中强调，1959年要生产好钢2000万吨，这是一个跃进的指标。为保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生产出足够数量的好铁，要保证供应铁所需的原料。鉴于炼焦煤和焦炭严重不足，同时许多小高炉的原料消耗，特别是焦炭消耗过多，有浪费，因此，要求中央有关部和各省、市、自治区，扩大炼焦煤和洗煤的生产，突击简易焦炉的建设，并且强调小高炉要进行经济核算，规定了几项降低焦炭消耗量的经济指标。

由于各种实际情况从不同渠道反映上来，上海会议对1958年12月武昌会议拟定的计划作了调整。钢产量从原来的2000万吨降为1800万吨，其中好钢为1650万吨。

到了4月份，钢铁生产情况依然难以好转。钢的日产量，计划要求是4万吨，但实际产量还是停留在3万吨上下。4月份计划钢产量是126万吨，截至4月15日只生产出44.5万吨，时间已过去一半，而计划只完成三分之一。“一个多月以来的钢铁生产日报表，如刻了板一样，3万吨的水平稳如泰山，一动也不动，喊了好久，总是上不去，日

报表令人越看越不舒服。”这样，中央书记处于4月17日发出《党内通信》，要求从5月份开始，钢的日产量争取突破4万吨。冶金部为此作艰苦努力，4月15日在北京召开华北地区钢铁系统五级干部大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部长、司局厅长（包括重点企业经理）、厂矿长、车间主任、工段长（包括党政工青）及部分班组长和工作，总计1400多人，其中车间主任一级干部468人，工段长462人，工段长以下84人，部机关处、科及工程师100人。也就是说，车间以下基层干部约占80%。召开这样大规模的群众性干部会议，在冶金部还是第一次。会议讨论了进一步调动钢铁战线上的一切积极因素，提高钢铁的日产量，促进钢铁生产的大跃进，确保完成全年钢铁生产任务问题。要求华北地区钢铁职工以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利用已有“物”的条件，充分发挥“人”的作用，为完成1800万吨钢而奋斗。周恩来到会作过讲话。他讲到“不要浮夸”等问题。

这个会议的情况，4月17日，冶金部党组给毛泽东写了报告。报告写到，目前钢铁生产的情况不好。虽然一季度生产比上年同期有很大提高（钢提高73%，铁167%，钢材28%），但均未完成一季度计划（钢完成77.3%，铁86%，钢材82%）。担负着今年计划任务的主要部分重点企业，同样完成得不好（钢79.8%，铁85.4%，钢材81.8%）。全国除北京市、云南省、本溪钢铁公司、大连钢厂、石景山钢铁公司和抚顺钢厂在一季全面完成了钢、铁、钢材的计划以外，绝大部分省、市及重点企业均未全面完成计划。华北区的山西、河北、内蒙古及包头钢铁公司、太原钢铁公司、龙烟钢铁公司、唐山钢厂、天津钢厂等单位，也

都未完成计划。报告还写到去年大跃进的群众运动中出现的  
问题：成本高，部分产品质量低，企业管理混乱一个时期，  
规章制度破的多立的少、不该破的也破了，某些浮夸现象等  
等。同时又说：在很多干部中似乎有点“谈虎色变”的样  
子，不敢理直气壮地宣传破除迷信、敢想敢做、反对教条、  
反对贾桂思想了，去年各地企业蓬蓬勃勃气象，现在低下来  
了，但报告认为，这并不是群众没有了劲头，而主要是干部  
中这种意识所引起的。因而，《报告》还是着重强调继续解  
放思想和群众运动，要求干部解除顾虑、大鸣大放、大胆揭  
露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各种生产的消极因素

在会议讨论时，也有一些基层干部反映了不少当时的实  
情。包钢金属结构公司一代表批评大公司领导作风说，公司  
有三大——压力大、计划大、声势大；三少——解决问题  
少、完成任务少、取得效果少；二多二差——会议多、问题  
多、调查研究差、劳动纪律差。内蒙古小包钢（1958年包  
头市建设的一个钢铁厂），有人讲，领导热多冷少，坐不下  
来，工业会议特别多，厂内会议也多，一天就有几个会。三  
个厂长，因为会多，还得请人代工。有人对学先进、赶先进  
有看法：太原一炉长说，二号炉就是赶不上一号炉，全国也  
不能像本溪（本溪高炉是当时全国高炉生产最好的）一样，  
条件不同。有人强调客观条件，唐山就提了16个问题，绝  
大部分是有关物质条件，其中就有转炉车间的配套问题、生  
铁供应不足、生铁含硫高等等问题。有人更强调管理方面  
的问题，天津第二钢厂代表说，操作规程虽有，根本不贯彻，  
炼钢各搞一套，好的九号炉全部合格，不好的六号炉就报废  
五炉。违反操作规程的更多，人累，就连渣也不扒，热了就

不搅铁水，影响脱硫效率。山西小组反映，按规定进炉焦煤3公厘以下的应占90%以上，而现在有达300公厘的，而且煤中夹杂有不少石头和泥沙，影响焦炭生产质量，北京特殊钢厂有不按规程办事的情况，如配料是根据各人经验来加熔剂；耐火材料烧成温度也由1280℃降到1100℃；轧钢规定应压6次，改为4次，结果损坏了机器。但是，冶金部党组的《报告》仍认为，只要彻底走群众路线，就可能争取完成钢铁计划。

对这份《报告》，毛泽东作为《工业界的新事》，于4月19日批示：“此件印发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各部委党组、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以供参考。”

1959年4月22日，中央书记提出，7月15日以前，要集中力量打一个钢铁战役。一季度以来，钢的日产水平一般在3万吨左右，达不到计划要求的4万吨的水平。为了把钢产量突击上去，书记处决定：从现在起到5月15日止为这个战役的第一阶段，目标是钢的日产量达到4万吨；从5月16日到6月15日为这个战役的第二阶段，目标是钢的日产量达到4.5万吨；6月16日至7月15日为这个战役的第三阶段，目标是钢的日产量达到5万吨。达到了目标，就叫做取得胜利”，超过目标就是巨大胜利。为了取得“这一战役”的“胜利，强调要切实解决好高炉的燃料问题，切实抓生铁的调拨问题，切实抓运输问题，抓技术、抓钢铁的质量和品种。在工作重点方面，首先抓18个重点企业和一机部、铁道部、化工部等部的平炉生产。中央还派出以国家经委、计委为主，联合中央工业各部的4个工作组，分别到东北、华

东、华北、华中 4 个产钢铁的重点地区去，协助各地党委进行检查督促工作。

可以说，当年为了实现钢铁生产的“跃进”计划，上上下下确实下了大决心，尽了大努力，但指望依靠如同打仗一样的办法，靠“勇敢”搞“战役”，靠“热情”搞“运动”，这种与科学相悖、脱离实际的做法，不论出发点如何，其结果不是能同战争年代的胜利同日而语的，这次“钢铁战役”的情况说明是“没有奏效”的。

4 月 29 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钢铁及整个工业生产建设问题，会议责成中央财经小组研究三个问题：（1）1959 年钢铁生产指标分成两个，一个是可靠的指标，另一个是争取的指标。（2）钢材的分配，要按照本年度能够生产的可靠数字来进行。（3）如果钢材分配的数字减少了，势必要削减一些建设项目。5 月 11 日和 15 日，陈云先后向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报告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落实钢铁指标的意见。陈云说，把钢材指标定为 900 万吨，退到可靠的阵地，是为了扎扎实实地前进。这样做，不会使人泄气。指标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使人泄气。6 月 13 日，中央发出关于调整 1959 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国家计委针对 1959 年以来工业生产建设计划定得过高过大，造成燃料、原材料供应紧张，使一些建设工程陷于半建半停状态的情况，对一些产品的生产指标进行了一次调整。钢产量（不包括土钢）由 4 月上海会议确定的 1650 万吨降到 1300 万吨，钢材由 1150 万吨降到 900 万吨。据统计，中央组织的这次“钢铁战役”到 7 月份，钢的日产量只达到了 3.13 万吨，足以证明当初计划日产钢 4 万吨、4.5 万吨、5

万吨的指标仍是何等不切实际。到年底统计，由于 1958 年建的成千上万个土高炉、小高炉、土转炉多数消失，主要靠一些比较正规的大中型钢铁厂和机械行业自身的炼钢设备。算是完成了 1386.5 万吨钢的任务。

1959 年庐山会议错误地反右倾机会主义后，1960 年继续“大跃进”，钢产量达到 1860 万吨。1961 年钢产量猛降到 870 万吨，1962 年降到 600 万吨。1962 年全国“关、停”的县以上工业企业共 4.4 万个，相当于 1960 年商工业企业总数的 45%，多数地区保留下来的企业数量只相当于 1957 年的水平。

## 江苏钢铁布点的两封信

我的旧档中保存了中央批转全国的两封信，内容是有关江苏省委钢铁的布点问题。

李富春的信是介绍计委两位同志所反映的江苏钢铁重新布置情况，明确提出了“宁可少些、但要好些”的观点，时间是 1959 年 5 月 22 日，全文如下：

中央、主席

兹将计委两个工作同志的一封信送上。

我认为江苏省委决心对钢铁工厂的建设采取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合理布点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建议冶金部帮助其它有类似江苏省情况的各省市也采取这一措施。目前的钢铁工业，特别是地方的钢铁工业，在基本建设上要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根据资源、运输、技术等条件，确定定点、

再不能分散分量；在生产必须于五、六月份以至七月份，集中力量过好技术关，提高生铁和钢的质量，以便在这个基础上，提高高炉、转炉的利用系数，并且做好雨季的准备工作；在六月至七月内，地方所产生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样，一方面可以节约煤炭，及各种辅助材料的消耗，节约劳动力，积蓄矿石，节约运输力量，以便在提高生铁质量后使下半年生铁的生产能稳步上升，以利于更好更多地完成钢铁任务；一方面在此农忙时期，减少些钢铁战线上的劳动力和短途运输力量，以利于农业。这样做对于整个工农业的安排和前进大有好处。

计委写信的两位同志范慕韩、张雁翔，当时是计委机械局、交通局的负责人。信是5月16日写的，全文如下：

党组并李主任：

我们到南京、常州、无锡、苏州等地了解钢的生产情况以后，感到今年江苏省钢的生产问题较大，总的情况是：今年计划中有生产任务和建设任务的25座（105吨）3吨以上转炉，直到5月15日为止，只有6座（18吨）投入生产，而投入生产的都是机械所属企业（徐州矿山机器厂，浦口车辆厂，戚墅堰机车厂）建设的，冶金系统工厂还没有一座30吨以上转炉投入生产。

今年计划规定江苏省产钢105000吨（包括部属企业在内），1至4月实际完成112880吨，时间过去三分之一，而任务只完成全年的12.3%，后8个月的任务是十分紧张的。江苏省根据这个情况，考虑今年确保完成85000吨，争取完成105000吨。

江苏省钢铁工业的生产和建设完成得不够好，最根本的

问题是基本建设铺的太大、太多，未能集中有限的力量一个个地上，因而 6 个新建钢铁厂现在还都是“半拉子”。

1、徐州钢铁厂，房子未盖，只有两座 6 吨转炉体和部分配套设备。

2、南京钢铁厂，炼钢车间房子未盖，正在打 3 个 6 吨转炉基础，有 3 个转炉体和部分配套设备，还缺白云石车间的全套设备，两台吊车，省机械厅正集中力量为钢厂赶制大约 2000 多吨的非标准设备。

3、常州钢铁厂、炼钢厂房基本完成，3 个 3 吨转炉基本安装完成，只缺白云石车间设备和少量配套设备，这是省属企业进展最好的一个。

4、镇江钢铁厂，厂房未盖好，有两个 6 号转炉体及一台吊车，缺设备较多。

5、无锡钢铁厂，厂房一季度已盖起，因设计的不合规格，柱子要加固，木架屋顶要拆去重换混凝土的，有 3 个 3 吨转炉体和部分配套设备，缺吊车和白云石车间设备。

6、苏州钢铁厂，厂房在建，3 个 3 吨转炉体已有，还缺吊车及不少配套设备。

可以看出，由去年下半年到现在，江苏省同时建设的 6 个钢铁厂（6 个 6 吨转炉，9 个 3 吨转炉）都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开始生产。因为这种情况，有相当多的配套设备和非标准设备要压机械厂赶，制钢铁厂要买这些设备又普遍感到投资不够，对外欠账不少，影响其他工厂和建筑单位的资金周转，要求解决投资问题，省的负担很大。

现在江苏省委对上述 6 个钢铁厂的建设已经重新作了布置：先保证把常州钢铁厂尽早配套投入生产；争取在上海市



帮助下把南京钢铁厂和无锡钢铁厂配好套，争取在7月份左右开始投入生产；其他3个钢厂暂时停止建设，把已有设备尽先调剂给常州、南京和无锡钢厂使用，待下半年看情况再考虑这3个暂停厂的安排。

我们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集中力量，保证钢铁厂一个一个地上，而不是一拥齐上，会大大减轻建设和配套的压力，也有利于保证钢的增产。如果转炉技术关过得好，加上原材料供应及时，今年江苏省超过85000吨钢产量是有可能的。这种情况并不是江苏省独有的，看来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各省钢铁厂的建设安排，真正做到缩短战线，集中力量。这是保证今年钢产量的有效措施。

毛泽东看了这封信，5月23日批给刘少奇、邓小平，请小平与陈云、王鹤寿商量，“用中央名义将江苏办法，通知各省、市区仿照办理。”邓即于5月26日代拟了中共中央指示，将这两封信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 赵尔陆关于重工业生产建设的意见

在整个“大跃进”期间，我所接触的工业部门的领导人，一机部部长赵尔陆是头脑比较冷静的一位。上海会议前后，他发表意见比较积极，他对一机部同冶金部的矛盾当然感触最深。整个工业尤其重工业的生产都同一机部分不开，因此他对情况有比较全面的了解。5月26日他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并报毛泽东，谈他对重工业生产建设的意见。

赵尔陆的这封信曾作为文件印发，旧档中找到了。这信

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讲必须加强计划的综合平衡工作，“大跃进”中出现种种严重问题都由于这项工作没有做好，着重谈了大炼钢铁中小高炉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产品数量、品种和质量的统一性。只有品种多样、质量优良的数量，数量才有更大的积极意义。着重谈到当时生铁含硫量太高的问题，也是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意思。第三个是关于制造和修配问题。当时全国缺乏维护和修理系统，设备坏了，不有及时修复，就会导致停工。

信的全文如下：

小平同志并报主席：

自去年生产大跃进以来，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以机械工业来说，生产比历年都增长很多，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思想开阔了，看到我国一些特殊条件、有利因素以及可能采取的发展速度，这对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有极大意义的。至于当前国民经济中的一些脱节、失调现象，不过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个回波，是难免的。它固然给目前的生产建设带来一些困难，但也给我们很大教育，逼着我们摸索经济生活规律和认识客观事物的必然性，对今后长远建设来说，也十分有利的。

从近一年来的实践中，我感到在重工业生产建设方面有许多问题值得考虑，需要分析研究，总结经验，定出措施，加以改进的。例如计划方法问题；产品的数量、品种和质量三者之间的统一性问题；制造与修配的关系问题；物资分配体制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带有一般性，但对机械工业生产有极大关系。现在先把对前三个问题的不成熟的看法提出来；至于物资分配体制问题，容后再报

### 一、关于加强计划的综合平衡工作问题。

当前国民经济出现的一些脱节、失调现象，看来，主因还是计划指标高了。从工业方面讲，首先是钢铁指标定的高了，钢铁指标一高，各方面都跟着高上去，基建盘子要的也就大了，设备数量要的也就多了，于是要的原料、材料也随着多了，运输也就显得不够了，等等。各方面的要求，分开看，似乎都可能解决，加起来，就都超出了客观可能性。原因之一，是计划的制定缺乏细致的科学综合平衡过程。

近代工业生产，是一个大协作。各工业部门之间的关系，都是彼此依赖，相互制约的；各个工业内部，也是环环衔接，互相扣得很紧。正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把一个问题孤立起来考虑。因此，计划的制定必须有细致和综合平衡过程。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愿望与可能，然后截长补短，加以平衡。使各个工业部门之间的计划能够彼此给于接，相互联系；使每个部门内部的各个环节，也能够环环套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看出计划指标大小，以及实现的可能性，也才能做到彼此适应，按照有计划按比例的原则发展。

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年度计划变了好多次，几乎来不及做综合平衡工作。以机械工业来说，年度计划经常在变，只能根据季度计划和重点任务安排生产。而重点任务也是变来变去，去年第四季度突出生产小高炉，大部分机械工厂都卷进去了。原布置生产6万立方米，由于层层加码，结果生产了13万立方米。在突击小高炉时，大家让路，结果炉壳子上去了，其他方面跟不上，最后只能配成6万立方米。在突击小高炉之后，又突击轧钢机，原布置生产261套，结果生产了370多套，由于也是只注意生产轧钢机的本体，以致配

套产品没有跟上去，多生产的也不能全部配套。今年又提出“六保”，现在看来，又得要变。一年多来，工厂没有一个稳定计划，领导和群众都心中无数，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因此也谈不上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合理地组织生产，及时采取措施，保证任务的完成。

在安排生产时，根据国家需要，保证重点是必要的。但重点与一般是相对的统一体，其中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如果重点过分突出，仅是孤立地保证重点，结果往往是重点也突不上去，返回来还要补课。据统计，去年第四季度配成套的6万立方米小高炉，由于缺乏矿石、焦炭、耐火器材和运输工具，目前开工的也只有半数。今年年初，机械工业除“六保”任务之外，已有专案十几起。这些专案大部分属于“补漏洞”性质。例如洗煤设备专案，就是由于洗煤供应不上炼焦；而炼焦专案，又是由于焦炭供不上冶炼；现在又突击采矿设备，就是由于矿石供不上炼铁。这些情况，说明重点不能是孤立的，各个工业部门之间，每一工业部门内部的各个环节之间，都必须相互适应，一个一个地衔接起来。割断这些内在联系，来代替综合平衡工作，自然不可能有计划按比例，也必然会出现脱节、失调现象。

生产要有重点，但重点也只能体现在一个年度计划中，或时间更长一些的计划中，不可能一季一个地突击。以机械工业来说，产品生产周期很长，一般都要一个季度、半年、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机械产品用的原料、材料和协作关系，又极为复杂，如果按季突击，任务是根本无法保证的，近半年来，不少工厂由于紧急任务多，定的晚，要的急，虽然做了很大的努力，最后还是完不成任务。造成半成品大量

积压，使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受到很大挫伤。

当然，总的指标定大了，计划不能不变。如果能够加强计划的综合平衡工作，也许我们订的指标，可能更切实际一些。综合平衡工作，是一个细致的反复过程，必须逐级做起，按系统、按行业、按地区一级一级地综合平衡，只有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把这个工作做好，国家才能有条件更好进行全面综合平衡。如果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经过平衡后提出的计划是比较切实实际的，那么，国家总的指标，也就不至于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大增大减的现象了。

计划经过综合平衡之后，新的情况必然会影响到旧的平衡。但目前计划层层加码，很轻易地破坏平衡，也是不好的，产生层层加码的主要原因，还是综合平衡工作做的不好，各方面的情况没有综合到计划之内。例如，现在由中央各部统一规划，如果不考虑地方的一些必不可少的需要，必然会造成加码现象，冲击计划，破坏平衡。只有把各方面的情况进行认真考虑，加码现象才能消除。此外，怎样在一定程度上，强调国家计划的严肃性，从目前情形看，也是必要的。

## 二、工业产品数量、品种和质量的一致性问题的。

从当前重工业部门生产来看，在产品的数量、品种和质量三者之间，有畸轻畸重和脱节的现象，一般的是重视数量，而忽视品种和质量。自从去年以来，机械工业突击任务多，强调数量，赶时间，严重地忽视发展品种、提高质量，甚至连原有品种和质量水平也保持不了。最近检查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生产的一批轧钢机，较普遍地存有质量问题，有的非常严重，甚至不敢交付使用。在机械工业用的原料、材

料方面，也同样可以看出数量、品种和质量的矛盾情况。往往看来在总的数量上是满足了，但不是所需要的品种和合格的质量。现在就有不少工厂一方面因为材料品种不齐，质量不好，使产品计划完成的很差；而另一方面，又有材料和半成品积压的现象。

工业产品的数量、品种和质量，这三者是联系着的，有其统一性，不能单纯强调一面，而忽视另一面。就国家建设需要来说，不论机械产品或原料、材料，目前在数量上都是不够的，迅速增加数量，这是工业战线上一个比较长期的任务。但是，在努力解决数量时，必须兼顾发展品种和提高质量。只有品种多样、质量优良的数量，数量才有更大的积极意义。如果单纯追求数量，而忽视了品种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会降低甚至失去数量增长的意义，有时候，还会造成很大的浪费。

以机械工业来说，由于国民经济迅速发展，需要很多各种各样的机械产品，从目前国内能够生产的品种与许多工业国家比较，还差得很远。而构成一个成套设备，要的品种规格更多。因此没有多的品种，既不能适应需要，也不能保证设备成套。

机械产品的质量问題，更为重要，因为机械产品是再生产的重要手段，如果“母机”质量不好，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就会更加不好。几年来国内生产的工作母机，一般说质量还是比较好的，但近来也有普遍下降的趋势，将来这种母机生产出来的机器，质量当然也不会好，而且质量不好，还容易造成事故。所以对机械工业来说，数量、品种和质量，是统一的，不能分割的。

在原料、材料的生产上，我认为也应该具有同样的看法。据4月份的调查，河北省生铁日产量，已达到4500吨，以含硫量占0.2%，就算作合格验收，合格数量也只1350吨，约30%。如果按照国家原定标准0.1%以下才算合格的话，则合格率就更少。又如，河南省有些小高炉生产的生铁，含硫量超过2%、3%，有的竟高到6%。现在机械工厂就积存有几万吨含硫过高的生铁，不能使用。钢材的质量，有些也显著下降。这样单纯的数量增长，就失去意义了。

在原料、材料品种上，同样也未能随着数量增长而增加上去，从二季度材料订货看，许多品种过去能供应的，这次一吨都没有订到，似乎也有下降趋势。机械产品因为承受力量大，或是转速快、温度高，或是严格要求耐腐蚀、耐磨擦，所以在设计时，都规定好使用材料的品种规格，一般不能轻率代用。因为机械产品品种多，因而要原料、材料品种规格也特别多，不少品种规格的原料、材料历年都要依靠国外进口，过去生产规模小，困难还容易克服，现在生产规模大了，如果不及早动手自己解决，就会使国内机械工业的生产，不能适应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工业产品的数量、品种和质量，都是发展国民经济所必须的，如果三者能够同时并进，自然很好。如果不能同时并进，也应该在兼顾品种和质量的基础上，努力争取数量。以目前我国情形来说，在争取产品数量方面，已经普遍注意了，而在发展品种和质量方面，似乎还注意不够。为了充分发挥这些物资的作用，促进生产，我认为有时宁可影响少许数量，也要把一些急需的品种搞出来，把质量稳定下来，并不断提高。从机械工业产品来说，宁可少产些主机，也要保

证产品成套和产品质量。从钢材生产来说，假设生产 1000 万吨，但由于质量不高，品种规格缺的过多，不能全部用于生产，实际上就发挥不了 1000 万吨的作用，还不如就只生产 900 万吨而把急需的品种搞出来，把质量稳定下来为好。这样做，从数量上看，似乎是降低了一些，但可以最大限度发挥这些物质的作用，比较起来，还是有利的。在当前可否这样：即争取在一定数量基础上，要求即或少些，也要全些，也要好些。

### 三、关于制造修配问题。

我国机器设备一年年的增加了，这些设备如何维护修理，以及修理时所需要的配件，如何生产供应，是已经发生和急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设备维护修理和制造修理所需要的配件，是使国家现有的机器设备能充分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据了解，在苏联就有规模很大的修理网。修理与制造，固然不能截然分开，但有些产品，数量大、使用地区分散，如汽车、拖拉机、农业机械，可以集中制造，但不便集中修理。因此，在工业发展到一定阶级时，必须考虑建立从事设备维护修理的力量，形成一个维护和修理系统。目前不少企业的生产和运输设备，就由于缺乏按期维护和及时修理，以及修理时缺乏必要的配件，而日趋损坏，甚至不得不停顿下来。例如：全国现有 17 万辆汽车，由于损坏后缺少配件不能修复的就有 18000 多辆，而今年计划新生产汽车，也不过 18000 辆。又如，河北省已交给农村使用近 30 万马力的排灌机械，根据对天津、保定、唐山、石家庄、邯郸等 5 个专区调查，真正在运转的，只有三分之一。其余的，有一部分是缺少配件和



燃料，而停顿下来，但大部分是损坏了，未能修复。目前，各种工厂里也有类似情况，修理车间不搞修理而搞制造了，因而，也有不少设备坏了，未能及时修复。从以上情况看，由于我国设备一年年增加，需要建立修理力量；而另一方面，现有的修理力量，还有转各制造的趋势，这是值得十分注意的。

我国机械工业，解放以来有很大发展，基本上已由修配、仿制逐步转向独立制造阶段，但从国家建设需要来说，基础还是不强，本事还是不大，还需要继续提高制造能力和制造水平。因此，有必要另行考虑组织修配力量。过去，我们在这一方面认识不足，安排不够恰当，使制造和修配之间有脱节现象，现在看来，必须迅速采取措施，加以弥补。

从需要修理设备来看，有一定的地区性和专业性。例如，汽车和农业机械，只能就地组织修理；电站、冶金和矿山等设备，只能按行业组织修理。因此，一方面需要在各省、市、自治区以至专区，分别不同情况，逐步建立若干新的修配基点，并组织修配网。在各个工业系统的修理工厂，也要首先做到自己所担负的修配工作，有余力时，方可从事一部分制造任务。原来从事修配的工厂，在大跃进后改业的，也须适当地调整一批，恢复一部分修配工作。制造主机的工厂，也要同时生产若干易损零件，以备磨损替换。国家在制定生产和原料、材料分配计划时，还要将制造和修配定出适当比例，加以保证。这样就可以使我国现有设备和不断增加的设备能够充分发挥作用。

对以上几个问题的看法，是否妥当，请予指示。

毛泽东看了，立刻表示了赞赏，5月30日，他写了一

个很长的批语：

“此件好，有相当的说服力，是一个工业界有了改进的文件，可以一读。凡是使人看不懂，看了之后觉得头痛，没有逻辑（内部联系），没有论证，因而没有说服力的文件，以后千万不要拿出来。例如今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报告（二月六日修改发出的那个今年计划的文件，）是一个坏透了的文件，没有内部联系，没有合理论证，已经证明毫无用处，写这样文件的同志，根本不用脑筋，对于事物根本不懂，是个计划经济的外行。所谓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国民经济法则，一窍不通，今后应当认真改正。多想多读，多谋善断。谋之于主席、副主席、总书记，谋之于秘书、部长助理、副部长、司局长，谋之于省地县社直至生产小队长，谋之于反对派即不同意见的同志，这一点很要紧。就是说，认真地做调查研究工作。这类不会做工作的同志，在全国可能有半数以上。特别坏的，可能有百分之二十、三十。这是一个大教育工作，期以十年，可能相当做好我们国民经济。我写这些，言重了一些，但是我认为必须说，应当说。我必须在这种时候，不怕得罪一大批同志，否则事情不好办。我不向同志们封锁我的意见，同志们对我封锁，我是大不高兴的，过去的封锁，必须改正。”

6月17日，毛泽东再次批示：

“此件写得很好。除已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外，加发中央各经济部门党组织和各省、市、区党委。”

显然，赵尔陆的这些意见，毛是听进去了的，而且大感欣慰，希望工业系统尤其计划部门反映意见，要论证合理，逻辑清晰，使人一看就明白。顺便又对国家计委数说了一

顿，意思就是 1958 年出的乱子，责任在计委。

除开在上海会议提倡海瑞精神外，会后毛泽东又批转上述这样的文件，以鼓励大家提意见，不怕意见提得尖锐。关于 1958 年“大跃进”中种种情况，大家也确实敢于提出一些看法了。这是 1959 年 6 月开始的庐山会议前的基本形势。

## “大跃进”失败的惨痛教训

恩格斯说过“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以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为是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马恩选集》卷47477页）恩格斯晚年这段经典性论述，可以看作是研究人类的历史创造和解读一切历史事变的钥匙。

“大跃进”也可以称作古往今来中国历史的一大“创造”。它对中国经济的破坏自然重大，但思想影响更其源远流长；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无法摆脱特定社会的经济前提和条件的限制；同样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无法摆脱特定社会的经济前提和条件的限制，也仅仅是作为“单个意志”去参与这种创造。这情形就如戏剧中

演员与舞台的关系一样，演出生动威武的表演，要受到舞台的制约。舞台的大小、深广决定了演出的规模和持续的时间，甚至也影响到戏剧的成功与失败。这个比喻用之于革命很恰当，用之建设也同样恰当。毛泽东所导演的“大跃进”，问题就出在大大超越了中国经济政治所提供的现实舞台，这就决定了它不能不归于“失败的命运”。

我们的革命理论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我们的建设理论也是源于马克思的。马克思去世已经一百多年了，他的学说创始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西欧，正进行残酷剥削、掠夺世界，又周期发生危机之时。他不可能预见到 20 世纪将要出现的巨大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资本论》中所分析的资本主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现实的资本主义已经有极大的不同。同样，我们也必须承认，马克思学说中的社会主义同我们实践过（和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是有很大区别的。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发生，可是事实上，世界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从俄国到中国都发生在生产力落后、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的国家，中国比俄国尤甚。这同马克思设想的无产阶级一旦取得胜利，立即实行全社会的共同劳动，共同占有，直接分配社会劳动，取消商品、货币，全部社会生产直接由中央计划控制、调节的状况和条件相去甚远。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差距，造成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实践中两种必不可免的趋向：其一，是教条主义地按照经典理论去“复制”社会主义的“原形”；其二，是在现实国情与经典描述明显不符的状态下，去进行属于自己的有特色的创造。当然，上述两种趋向，很大程度上在人们头脑中是同时并存，兼而有之的：就是说，

人们常常既有“复制”、“摹写”的一面，又有“借鉴”、“创造”的一面。并且随时间不同也常侧重不同。大体说，着重“复制”的一面趋于保守，着重“创造”的一面显得富于生气和活力。由于领袖人物马克思主义修养，革命与建设的经验，以及文化性格等方面差异，他们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思想趋向往往存在某些差异和多具其特色。前苏联如此，我们中国亦如此。毛泽东晚年的实践更突出地表现为后一种趋向。他发动“大跃进”主要是为了有所“创造”，有超越前人的意识在内，但整个思想状况又是十分复杂的。中外学者著书立说，对毛发动“大跃进”的动机和原因作各种分析，我们应当将这个历史性的“创造”作更深入的研究，以求解释得更合理一些。

“大跃进”形成的潜在原因，自然同中国走怎样一条工业化道路分不开。工业化萌芽期本身是受到历史的限制和规定的，西方的历史说明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道路，大体四种类型：（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模式；（二）较发达社会主义国家模式；（三）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模式；（四）阶级矛盾解决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模式。第一种模式以美、英、法为代表，继续实行私有制和完全的市场经济，辅之以海外投资和殖民掠夺，长时期内大量积累社会资本和财富促进科学技术不断发展。随着资本结构的变化，国内阶级关系也在起变化，逐渐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中美国上升为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仍在世界经济中占一定的领先地位。日本和德国经济迅速发展和赶上英法，是由于美国的支持和各种内外的原因促成。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模式中，还可以附带提到北欧、

西欧一些福利国家。如瑞典，丹麦、荷兰等等。就阶级关系和社会经济结构说是资本主义的，但已有了较多的公有制。第二种模式则以前苏联为代表，实行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和国际形势，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三十年代以后，苏联凭借这种经济体制，迅速壮大了经济实力，增长率获得了长期稳定的提高，并使它在卫国战争中顶住了德国法西斯的残酷进攻，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在战后全球普遍发展和加速现代化过程中，仍继续坚持国家高度集权的政治与计划经济体制，封闭的对外关系，使得经济长期停滞，科技相对落后，加以改革的失败，终于导致东欧剧变和前苏联的解体。实行或靠近第三种模式的，主要为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这些国家一般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经济羸弱，但由于殖民统治影响，独立后大都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以私有制和市场为主导。因其对外依赖严重，以及民族工业薄弱等原因，发展较慢，亦不稳定。第四种模式同第二种模式具有相同性质，一般为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所采纳。差别在于刚刚摆脱帝国主义统治的这些国家，长期的兵燹与社会动乱，使得经济基础极为脆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起步艰难。但正是这一点，又促使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后，试图以较快速度改变国家的面貌。这就要求他们主动学习第二种模式，即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以充分调动全国的人才物力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压缩人民暂时的物质需求，实行高积累。从本质上说，第四种模式采取的是一种加速型发展战略，即一方面客观基础较差，另一面又强烈要求改变国家面貌，于是尽可能运用强有力的手段，推进工业化和经济建设的进程。所谓“急于求

成”的倾向，于是尽可能动用强有力的手段，推进工业化和经济建设的进程。所谓的“急于求成”的倾向，很大程度上是从这种模式发展而来的。

按照中国当年的情况，选择第四种发展模式是必然的。这不仅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规定，即应当采取最能保证社会公正的公有制，最有可能加快生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苏联的榜样又摆在那里；而且，由于我们长期遭到压抑的民族自豪感和革命胜利提早到来，更增加了我们加快发展的愿望。毛泽东在1956年党的人大预备会议上说过一段广为传诵的话，明显表现了这种“跃进”的情绪。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样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又说，“再有五、六十年，在钢产量上赶上美国是完全可能的。这是一种责任历来自诩的地大、物博、人多，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毛选》第5卷第296页）

由此看来，中国的发展模式同世界格局及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是紧密相关的心态，如同斯大林不可能改变以重工业为主的发展战略一样，五十年代的中国也不可能认识社会主义也必须实行市场经济。当时的中国要发展，只有学习



苏联，走一种历史规定好了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前 8 年照抄外国的经验。

从 1953 年开始，在苏联的巨大援助下，我们边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边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成绩是十分辉煌的。到 1957 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已全部超额完成。工业总产值比 1952 年增长了 128.6%，平均年增长率达到 18.40%（世界银行的统计中，这是当时世界最高增长率之一），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原定的 14.7% 的速度。钢产量达到 535 万吨，比 1952 年增长了 266%；煤产量 1.31 亿吨，比 1952 年增长了 96%；粮食产量达到 390 亿斤，比 1952 年增长了 19%。同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比较，这一连串的数字确实是值得自豪的。

但是这毕竟只是中国工业化的起步，离工业化目标的实现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离超过美国的目标则更加遥远。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旧墟清理完了，但一穷二白的面貌并未改变，因为在这个旧墟上还没有建造起共和国强盛的大厦来。所以毛泽东对这一前进步伐仍感到不满足。早在 1955 年夏季，他违反自己原来的设想，批判所谓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斥责坚持实事求是的邓子恢是“小脚女人”。于是应该“花几代人的时间”（列宁语）完成的对农民的改造，在不到半年时间即告结束。有关这一问题第二个《历史决议》已有定评。在工业方面，由于受到农业合作化“热潮”的影响，毛在指导思想急于求成的倾向更加强烈起来。1955 年 12 月，刘少奇向在京中央委员传达了毛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谈话：“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

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一条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毛泽东当时还设想八大的中心思想，“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可见其“加速”愿望在心中占有的位置。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说：“在我的记忆里，毛主席是在 1955 年底就提出了以‘似苏为鉴’的问题。”这同刘少奇上述传达在时间和意向上是互相印证的。也就是说，1955 年至 1956 年之际，毛已在重新考虑“前进道路”问题，原有发展模式所带来的速度，已不能令他满意，要探索“非常规”的道路与速度；即是说，要采取不同办法，要超过苏联，比苏联走得快些。1956 年 2 月中旬，毛开始分别听取中央 34 个部委办的汇报，经过思考、比较和总结，4 月作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论十大关系》开篇明义即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要引以为戒。”斯大林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确存在严重缺陷，主要问题是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结果长期解决不了粮食问题，而且对农民剥夺过甚，造成经济失衡。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看到了这些缺陷，并试图在中国的实践中加以克服，当然是十分明智的。由于感到经济建设方面中国创造不多，仍处处受苏联经验的限制和束缚，回顾革命年代的教训，毛的心情自不平静，强烈希望从中国情况出

发，在建设方面也有所创造，走出自己独特的道路。《论十大关系》中，他批评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使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伤害，提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正确处理这三方面关系的问题，他还批评过去什么都集中在中央，把地方搞得太死，从而提出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问题，他论证了正确处理好十个方面的关系，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就能够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从 1955 年到 56 年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和有关中央会议上，曾提出“又多又快又好”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随后李富春加了“又省”。这八个字为毛欣赏而接受。

但是，从后来的实际效果看，我们不但未能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继续维持过高积累，追求以钢为纲的片面发展，造成经济的严重失衡，而且“创造”出“大跃进”这种荒唐的“运动”。结果比同期苏联经济的损失要大得多。这又作何解释呢？难道我们所极力肯走的“探索”就这样含糊其词地被事实否定了吗？难道我们不应对所谓“探索”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加以科学的总结和合乎逻辑的说明吗？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讲过这样的话：1956 年 4 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我以为，这段话可以作为解释上述疑问的一条重要线索。

所谓“原则相同”，指的是我们仍然承袭斯大林创造的经济模式，即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把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的追求放在经济首位，这是为主的东西。前文已经指出，作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 50 年代似乎只能选择这

样一种发展模式。同时在理论上，从斯大林起，我们就把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理解为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工业部类，即优先发展重工业，认为这是由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所决定，也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巩固关键所在，因此必须实行先建设后生活的方针，也就是要高积累，对工业高投入。在中国，则特别要求人们要“勒紧裤带”。早在1953年，毛泽东和梁漱溟之间，就发生过实施“大仁政”还是“小仁政”的争论。道理已经说得很明白：“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太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的这些话并非没有道理。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当年国内外形势下，当然首先要加强基础工业和重工业建设。应当指出的是，我们并没有发明新的发展模式，基本上还是在前人计划经济体制的轨道上运行。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与苏联“原则相同”。在经济结构上，一五计划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基础，奠定了突出重工业的建设格局。

因此事实很清楚，1956年前后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主要表现在毛的那后半句话上，即“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论十大关系》是一篇重要的理论文献，它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针对苏联建设中倚轻倚重的偏向，用辩证的观点阐述经济建设中的诸多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对旧的一套观点有所突破。后来八大提出“三个为主，三个补充”的意见，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都可以从讨论十大关系前后的思想中找到源流。这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但是，尽管阐述的是经济建设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兼及政治方面的内容，《论十大关系》并不

是一篇经济学文献。虽然问题的两方面都说到了，却没有规定性，也就是说，缺少严格的定性定量的经济指导意义。而经济运行最需要的就是精确的规定性、比例等量化的东西。因此，在很长时期内，我们总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论十大关系》在理论上有很多重要的内容，而在具体实行中，却难于照顾到这一面又不丢掉那一面。特别是一股什么风吹来之时，两面性就被冲掉了。这种现象使人想到“大跃进”中不少貌似“两点论”的东西，比如“工农业并举”、“土洋并举”等等，当时都是作为中国工业化的独特性而大加赞誉的，称之为“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但是，同十大关系类似，这些“并举”更象运动的口号，而不是经济学用语。它们没有准确的经济学定义，因此人们无法掌握“并举”关系的度，也无从了解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土法与洋法等之间的比例关系。只是在感觉上认为提出了“两点”，有了自己经济建设的新方法、新内容，可以傲视前人了。结果，“两条腿走路”和“同时并举”，造成了两条腿一起狂奔，土法、洋法一轰而起，完全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生产秩序（当年计划经济中的综合平衡规则）。几千万人上山，土高炉遍地“开花”，如回到人类炼铁的上古时代。这就根本不是什么“独创”的问题上，而是虚幻和荒谬，恰恰与经济工作要求的精确与科学背道而驰。在革命年代，靠“农村作风”、“游击习气”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在建设时期，却不能靠这两手实现工业化。因此，“大跃进”时期那些所谓“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的东西，表面上似乎是“两点论”，实质上不过是在苏联旧体制之上，运用战争年代行之有效的办法而已。所谓“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象诗

的语言，是形象思维的产物，而非理性思维。结果反而把苏联经济建设中那些弊端扩大化了，造成更大的结构性失衡。以1958年为例，全国上马的大中小型项目成千上万个，积累率由1957年24.9%陡然超过40%，而同期国民收入只比上半年增长22%。这就意味着国家大量挤用消费资金和压低农业投入，来上工业项目，如此何来“兼顾”“并举”呢？因此“大跃进”中这一套自诩的“创造”，在经济模式的意义上说来，无非是“新瓶”与“旧酒”的关系，“新东西”没有创造出来，“折腾”和“胡闹”倒非苏联所能比拟。这就不是辩证法所能解释的了。因此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以苏为鉴”，实际借鉴的仅仅是浅层的或操作层次上苏联的缺陷，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而这些表面上的东西又大多“过度”或“无度”。这同苏联模式即其经济政治体制无关，我们仍然在这种模式的旧体制上进行，但在“冒进”上却非苏联所可比拟，他们在几届五年计划中没有出现过我们当年的猛上猛下，出现过那种“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出现过饿死人，是农业集体化时期的事，同工业发展无关。

为了“创造”，搞出一套与苏联不同，有自己特色的建设方法，毛泽东曾大力提倡“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乍看起来，这个口号同上面“形象思维”的“两点论”一样，都是正确得不能再正确的东西。但是“热烈”的气氛、过头、荒谬就接踵而来。如西谚所说：伟大与可笑相差一步。在成都会议上，毛讲到对教授的态度，他当时说：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无穷的恐怖；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象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怖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由此还称赞了柯庆施敢兼任教授之举。当时听来，颇有新奇之感，把教授或有科学知识的人作为建设的对立面，这于理不通。但当时听者动容，很得启发似的。这些话无形中成了一种“创造”。如果说毛对广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早有反感的话，那么在一年前的反右运动中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他此时此他讲这番话的目的，却是针对着以系统性、规律性和客观性为特征的科学知识而言的。因为不打破这种“迷信”，那套“豪放”的“创造”就难以为干部和群众接受。毛自己是知识分子，并非不了解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他也提过“向地球开战”，“开展技术革命”，“向科学技术进军”之类的口号。但他主观上超乎想象的一面，又时常与实实在在的科学发展相冲突。他在经济建设中的浪漫情绪和超越前人的追求时时让他感到科学知识对驰骋想像的束缚。“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正是以诗言志。政治斗争可以“无法无天”，可以厌恶法律的约束，结果不过错划了几十万个右派；经济上也“无法无天”，也厌恶规章制度的束缚，那就不止是几十万“右派”挨整，而是亿万黎民百姓遭殃了。28年的残酷斗争，战胜一切内外敌人，取得革命胜利的成功经验，自然养成一种绝对自信的心理；客观上六亿人民齐唱“东方红”的最高音响，是否也使历史伟人对不可违背的客观经济规律和许多基本的科学道理时有违背呢？不然，“大跃进”时期出现那么多荒谬的事情，一时怎么能信以为真呢？缺乏科学素养和排斥科学精神，这也是毛泽东和我们党在很长时期内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

排斥知识，破除迷信，在“大跃进”拉开帷幕之后，有

一股发狂热而不可收之势，以致在思想上连老祖宗马克思主义也有些看不起了。成都会议上毛说过：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是随时代发展的，当然，不能抄书照搬。一般的说，这段话很有道理，教条主义的东西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害人不浅，曾经使革命遭受严重的损失，毛泽东感触最深，为“破除迷信”奋斗不已。这已经有了历史的总结。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中，也当然不能照搬教条，应该走出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同我们这些人个别随谈时，毛不止一次说过，马克思主义可用的东西不多了。这种精神是完全对的。但是，“大跃进”中鼓吹的“不要迷信”，不要“抄书照搬”，则是另外的事情；说明白了，是觉得马克思主义也不在话下了。自己要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典范，要搞些独一无二的东西。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又讲到“破马克思”的问题。他说，自整风以后，我们大多数同志慢慢地不大怕资产阶级教授了。但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怕”，即怕无产阶级教授，怕马克思。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好像高不可攀，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上去。于是他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不要怕嘛，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无非是脑子里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在楼下的人，不一定要怕楼上的人。我们读一部分基本知识就够了。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又说，“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功，我们革成功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是理论。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事，东方的无产阶级为什么办不到？要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等。这些话，这些感想，应当说



都是对的。一个真正的革命家，一个抱有雄才大略的人，应当具有这样的精神和气质。问题还在任何人都要受客观规律的约束，不可以超越客观规律胡思乱想，即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理论必须联系实际。何况如恩格斯所说，任何一个人受三种限制：即时代的局限，自己已有的经验、知识水平，和思维能力。否则，还是那句话，伟大与可笑，只差一步。

“敢教日月换新天”，1949年得到证明，1958年却不能同日而语了。建造“新天”“新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就气势而论也同三大战役时一样，曾经在全中国铺天盖地奔腾而来。这种主观随意性，远离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原则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毛泽东自己在仅仅三个月之内，也觉得太过份了，不得不连续召开会议“纠乱”。但问题就在仍是坚持高举三面红旗下“纠乱”，作一些量的调整，而不是作质的变更；放下这三面红旗，回到客观实际中来。这里想特别指出的是，在“大跃进”的狂热年代，上面和下面某些领导人总是揣摩毛的意图，投其所好，即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把马克思主义丢得更远，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开其端，李井泉、谭震林等人紧随其后。可举一个具体例子：1958年7月，在湖北省委机关刊物《七一》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该省第一书记王任重的开篇之作：《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该文原题为《学习马克思主义，超过马克思》，由于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的反对，才改为现在的题名。此文可看作是毛泽东在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有关讲话的诠释和发挥。当年王任重是很被毛赞赏的地方领导人。文章一开始就批驳了有些人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为理论，而不认毛泽东著作为

理论的观点，提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是现代最重要的、最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看做理论，不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看做理论，这是一种迷信，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提出，在当前学习理论的过程中，必须“反对厚古薄今的偏向”。接着，作者以讥讽的口吻说：“某些读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人，实际上他们的马克思水平很低，其中有些人简直是在那里反对马克思。”“假若有一个企图在《共产党宣言》里，或者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所有著作当中去查找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你能说这个人对马克思主义一有所知吗？”文章的用语是犀利的，有点兴讨伐之师的檄文味道，但读来给人印象最深的不过是“不要迷信”几个字，那就是说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要多看毛泽东在当代的“创造”，看那些毛泽东“超过”了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因此必须“厚今薄古”，而不是“厚古薄今”。在“大跃进”的背景之下，在“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的到来已不是遥远的事情了”的形势面前，这些话当时真给人们以“激动不已”的力量。

然而人们不能总靠“激动”过日子。几个月的狂热下来，许许多多的人已有所顿悟：在我们中国到底是马克思主义多了还是少了？我们目前所作的，到底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在中国这块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土地上虚心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还是目空一切，在那里妄自尊大地进行所谓“创造”？《共产党宣言》中固然没有“总路线”、“大跃进”，但它绝不会告诉人们去作如河北徐水、湖北当阳闹共

产主义那样的荒唐事情。据说李达当时闻得书记的这番高论，甚感焦的，曾据理力争，甚至还当面向毛进言，说已经发高烧了，再热下去不得了。杨献珍其时也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浪漫主义”之说。可见当年有不少头脑清醒的人。这篇文章虽说最后不得不换了题名，但点睛之笔尤在“学生要超过先生、儿子要超过老子、青年人要超过老年人、活人要超过死人……这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赞成的。”“毛泽东同志也是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尤其是后者，一切科学都是发展的。但该文作者的本意却在“超过”，就字义而言（这同后来林彪用的“顶峰”相似），“超过”与“发展”也是两码事。作者当年的意思就在：马克思的东西已经不管用了，毛泽东已经超过了，只要学毛泽东的就行了。其含义同后来林彪的读“老三篇”和手摇小红书，如出一辙。

“大跃进”时期，一切“旧”的思想、理论、规章、制度都可以破除，唯一一件事是迷信的，那就是“群众”。毛泽东认为，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只要将它们释放出来，可以创造任何人间奇迹。“大跃进”中无论是大炼钢铁还是兴办人民公社，无不以群众运动推行之。前面谈到，这种做法同长期进行革命战争有不解的渊源、同时又是试图打破一切常规的寄托。或者说，也是一种对生产组织、制度的“超越”。毛多次在中央会议上批评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一反冒进就泄了气，六亿人民泄了气不得了。毛为什么要说得这样严重呢？核心在于他要在经济建设方面搞一个大突破，超过前人的设想，超过前人的速

度。而要实现这个抱负，就必须打破常规，运用战争年代、革命时期搞群众运动的经验，人多力量大，只要焕发出六亿人民的干劲，天下哪有办不成的事情。应该说明的是，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根本是两回事情。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政党特有的工作方法和思想作风，来源于理论依赖实践又指导实践的认识论，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群众运动则是一种激励人们的手段，它具有规模大、力量强、激烈性和无序化等特征，同稳妥、科学、秩序化、条理性等等格格不入。在革命年代，群众运动往往能达到一定的革命目的或工作目的，如上地改革，参军支前，以至春耕秋收等等，革命形势成熟时，其排山倒海之势，可以迅即打翻旧的统治制度。这是为中外历史所证明了的。但在建设时期，群众运动的上述同优势相对称的缺陷，却会造成灾难。“大跃进”中的群众运动，是以“革命的冲天干劲”的面貌出现的，针对的正是计划与平衡、规章和制度，以及一切经济生活必须遵从的程序和秩序，它们的外在联系和内在联系。这些“正规化”的东西，应当说从理性到感性，毛都是很不熟悉的，他没有过这方面的直接经验。他早就不满意国务院的工作，因为计划与平衡就来自国务院，毛认为国务院尤其计划工作是搞条条框框，这些东西束缚了人的手脚，影响群众的热情，即给群众的积极性泼冷水。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毛多次谈到规章制度问题，认为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要同群众见面，不适用的应当改革。实质上，这同批判反冒进的“保守”、“右倾”是一个意思。《人民日报》1958年2月28日社论《打破旧的平衡，建设新的平衡》说，1956年的反冒进，“是那时候有一些人被这种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中的不

平衡状态惊呆了，简直惶恐得很，因此就错误地提出了‘反冒进’的口号，给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群众运动高潮泼了一瓢冷水。”因此社论提出：“我们必须反对庸俗的平衡论，或均衡论，反对消极的平衡方法。要求从庸俗的平衡论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这篇社论将平衡视作庸俗，等于贬低了生产管理的科学性，于是为一轰而起的乱来开了方便之门，通了畅行之道。毛对国务院工作的不满还在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几十个部委，平均使用力量，没有抓住纲。于是提出“以钢为纲”等口号，三个元帅、两个先锋的说法。造成全民办钢，各行各业为钢铁让路的局面。破除条条框框，大搞群众运动，在大炼钢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1958年9月中下旬，毛泽东在视察了安徽几个钢铁厂以后，曾感慨谈到：“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好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这些话同其后几千万人搞小土炉，所谓群众性大炼钢铁有直接关系。王鹤寿10月29日给中央报告中就说：“现在全民大搞钢铁，声势浩大胜过淮海战役的群众运动。毛主席提出了书记挂帅，全党全民抓钢铁工业。两个月的实践证明，在钢铁的生产建设上，只要书记挂帅，群众一起来，什么问题都会很快解决，完全没有搞过钢铁的群众，很快能生产出几百万吨的钢铁。”毛即予批示：“此件很好。这是我要鹤寿写的。”可见钢铁战线上“一场真正的革命”，也是毛亲自发动起来的。此事还有另一层意思，这就是“超越”苏联的经验。“大跃进”中批判“马钢宪法”，搞两参一改三结合，实际是否定苏联搞工业的方法。《马钢宪法》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毕竟是苏联组织工业生产几十年摸索出来曾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它在合

理地组织生产方面，是经过多年实践的。现代大工业本身，需要严密的规章制度，对各个工艺流程和生产部门进行监控，以实行优化生产，得到高质量的产品。这已经是不容怀疑的经验和定论。否认“马钢宪法”，认为它限制了人的积极性，还加以“不准革命”的罪名，实际的着眼点还在于实行工业上的群众运动，大炼钢铁也就附带破除了《马钢宪法》。至于“小土群”遍地开花等等，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不仅没有经济效益，反而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尤其是大量破坏森林，多年也难以恢复。但当时搞这些乱来的东西，却被说成是“弄清楚了一个工业中的根本问题”。从本质的意义上说，迷信群众运动，并不是真正的依靠群众，而是一种“放大”了的主观主义，即把个人意志强加给群众，借群众运动来达到某种主观愿望，无论从方式还是最终效果来看，都跟群众需要相距甚远。在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还普遍处在较低状态时，这种群众运动往往易于耸动起来，产生很大的破坏作用。为了进行科学有效的生产，人们必须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及责任制度，这是现代化生产所必然要求的，任何人为的“超越”都将自取其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乱来的作法，为我们民族留下了长久而惨痛的教训。

实现经济建设的高速度，是毛梦寐以求的。高速度绝非坏事，但要看怎样来实行。前文说过，我们所取的建设模式本身即是一种“加速”型模式，极易诱发急于求成，但就“大跃进”发动的过程看，导致急于求成，又有特定的国际因素和主观作用的交互影响。毛很早就对苏联的建设速度表示怀疑，多次讲到我们自己能否快一点的问题，并认为在总

结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可以做到更快一些。1956年形成《论十大关系》前后，即有这样的想法，但提法上是借鉴苏联经验，少走一些弯路。1957年以后，“反右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情绪高昂，一再讲要把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上去（按此处所讲“技术革命”是广义的，指政治以外的经济建设，而不是狭义的技术上的革新和革命，但后者也包括在其中）。而就在此时，国际局势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动。两大阵营的对峙，在朝鲜战争结束后趋向缓和。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一段时间，世界局势不再像二次大战结束时那样两个阵营间剑拔弩张。1956年前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明确判断世界形势正走向缓和。苏联方面也提出“和平竞赛”的口号。这种形势对“大跃进”运动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应该说，赫鲁晓夫提出“和平竞赛”口号，本身即含有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挑战的意味。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又提出在今后15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已经有些自不量力了。但毛泽东的气魄更大，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并提出中国在15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年底，刘少奇将这个口号正式公开出来，全国一片欢欣鼓舞，后来，“赶超”时间一再缩短，1958年5月，毛曾决心再过一年在钢产量上“首先超过英国”，预计到1962年时，“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

在赶超英美的同时，自然也就超过苏联了。多久以来，对苏联憋了一口气。早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就说过：“我们是不是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比如钢的产量，我们可不可以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达

到两千万吨？经过努力，是可能的。”到 1958 年，就这样谈到：“我们比苏联早进入共产主义，也不对外公布。”因此毛要为“发明‘跃进，这伟大口号的人授一号博士头衔”。前文已经提到，苏联在斯大林时期集中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模式，使它在相当长时间内获得了两位数的高增长率。这已经是超高速发展了。沙俄时期，尽管经济落后，但已奠定了较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基础。三十年代斯大林大力发展工业，使苏联经济迅速强大起来。相形之下，旧中国的经济基础要薄弱得多，据西方的统计，我国五十年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及苏联 1928 年时的 1/5 稍强，工业设备、技术也落后于苏联约三、四十年，人口则为苏联四倍左右。（马寅初至 1959 年仍坚持说“我们要快、人多就是个大负担。”）这些差距都是实实在在的，绝非单凭主观愿望就能一蹴而就之事。在这样的基础上实行“赶超”战略，其状况必然是打破平衡，疾进疾退，伤了整个经济的元气。《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平衡思想、辩证关系，时隔两年到 1958 年已经丢得无影无踪了。美国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麦克法夸尔在论述这个问题时，也感到大惑不解，他判断说：“或许，毛从未完全接受他在《论十大关系》中阐述的经济思想，那些思想看上去不像他自己的。”《论十大关系》中的思想当然应该说是源自于毛，是他当时听取各经济部门汇报后，深入思考的产物。但随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毛本人既为 1957 年反右斗争的胜利所鼓舞，又为求强求快的思想所催促，迷信群众运动等经验，在一系列自制的假象面前，主观主义日益膨胀起来。加之 1956 年底以后，由于复杂的国内外原因，我们实际上已从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立场上后退，放弃了八人对



个人迷信个人专断的批评与警惕，从而助长了党内个人意见至上的传统，随即扩大了对毛泽东的迷信、盲从，柯庆施、康生等人在中央会议上，正式鼓吹“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正是造成“大跃进”局面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

回顾起来，当全党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建设作战略性转移，由于我们缺乏经验，需要特别小心谨慎之时，毛泽东却口渐骄傲、自负起来，他越来越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发展一人专断的局面。这也同回顾历史正面经验有关，促使他只迷信自己的一套，赞赏“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此话列宁说过，斗争王明路线时毛也说过）这样的话，表示过“只要正确，就不要推，不如我独裁”的想法。因此批判“反冒进”同反右斗争相联系，早已越过了经济发展方针的分歧本身；实质上这是毛个人否定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个人凌驾党之上的严重事件。而对“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方针”的否定，则基本上改变了当年切合中国实际的经济发展战略。在这种状态下，毛个人无论怎样发挥想象，把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提到快得不能再快的地步，也不会再受到任何制约了。终于形成上上下下察颜观色的局面。如钢产指标一再加码，粮食产量一升再升；在几年之内，不仅超过英国不算回事，就是超过美国也理所当然。回顾起来，这是多么荒谬可笑的事情！郑州会议开始提出所有制方面乱来的问题之后，毛仍不愿降低钢的指标。1959年庐山会议一个“反击”，“大跃进”又起高潮。直到1960年9月，局面明显太严重了，才被迫同意调整，而此时国家的经济已沉疴难起了。1960年钢达到

1866万吨，1961年猛降到870万吨，1962年又降到667万吨。粮食产量1958年实际只有4000亿斤（公布7500亿斤），1959年降到3400亿斤，1960年又降到2870亿斤，1961年2800亿斤，降到1951年水平。因此发生人口年减少以千万计的严重情况，这种猛增猛降、大起大落自是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结果，欲速而不达，“大跃进”事实上变成了“大跃退”。

“大跃进”年代还出现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这是当年毛泽东所试图进行的一次“最伟大”的“超越”。这个“超越”在思想和理论根源上，要比经济上的急于求成和超高速发展深远得多。它的目的，是要进行一次社会性的大改造，或者说在改造社会主义方面进行一次前无古人的实践。在这一过程中，毛的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和认识，都全面表露了出来，使我们得以窥其堂奥。应该指出的是，这个“超越”性的实践，并不如一般所说，仅指人民公社化运动——那只是最集中的表现而已；这个“超越”是毛泽东对未来社会模式的摹写或设想，包括了城市、农村、思想、理论、道德、政治经济制度乃至每一个人自身。因此，它是极其广大和复杂的党国体制和思想体系，是新旧观念交织在一起，又从主观出发而进行的社会改造运动。这个改造运动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世界都引起了震动。遗憾的是，当时许多“观潮派”、“算帐派”和“攻击者”“诋毁者”的话，却被历史证明是逆耳忠言，是真知灼见。

我在《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一文中说过：“大跃进是轻视社会主义阶段，‘文化大革命’，是否定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阶段……可见，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建设问题

上，毛可以说是相当混乱的，不仅离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而且在追求‘大同’方面，连康有为的一些认识也未达到，他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的长期历史性是相当轻视的，总希望找到尽早过渡之‘捷径’。历史已经说明，在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度中，凭主观想象，任意对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加以根本变动，还名之以‘超越’前人，其后果是何等的灾难性。”

“大跃进”时期，毛围绕人民公社而构想的向共产主义过渡，或称设计的共产主义的远景，主要以旧的思想材料为源泉。例如关于“大公社”的思想，毛的设想大多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和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而来。1958年2、3月间，他在同陈伯达的谈话里，就说过公社政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4月在广州同刘少奇谈公社问题，“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人大二次会议上陆定一转述了毛对人民公社的具体构想，即乡村中的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各级学校、科研机构、各种服务行业、公共食堂、应有尽有，若干农村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仍能看到“新村主义”的明显遗痕。1958年7月，陈伯达《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一文中，正式公布了毛对建立这种新的社会基层组织的构想，即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也没有超出上述旧思想材料。毛的这些想法一经透露，全国上下一片响应之声，徐水、七里营、范县等便率先“急闯”，生产军事化，生活集体化，甚至消灭家庭都成了一时议题。城市也开始大办公社，家庭妇女和老少幼儿统

统组织起来，尝试新的集体生产，集体生活。似乎整个中国社会一下就到了“大同”之境。

现在人们一般都承认，毛泽东上述关于通过“公社”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乌托邦”、“空想论”。这种判断当然是对的。但毛为什么特别钟情于未来中国社会组织“大”（政社合一，乡社合一）和“公”（扩大公有制范围，实行统收统支，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共负盈亏，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为什么他要从旧的思想素材中汲取养料，塑造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面貌呢？直到去世之时，他毫无反悔之意，还惟恐后人否走了他的这些作为。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从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的基本思想看，空想社会主义的“空想”，本身可能并非是错误的，如追求人的平等，社会的公正等等。其谬误性在于“空想”是从单纯的想象出发，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可以不依赖时间、空间和历史条件而发展的社会形态。再深入一层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公正、平等和对公有制度的追求，正是对贫穷、分散、分化、偏私的一种反动。也就是说，空想的美好，正是对社会丑恶的折射。无论西方的空想论者如欧文、傅立叶，还是东方的康有为等等，无不从此出发去阐述自己的理想和设计。对他们说来，公有制度或共有制度是解决社会不公正和贫富分化的最佳选择。换言之，空想社会主义者并不把解决生产力问题放在改造社会的首位，而是寄希望于在分配原则上实现较高的社会公平，认为这是解决国家和民族生存与贫穷的关键。事实上，这是一种“社会拉平”主义，即平均主义。经济落后的国家和民族易

于接受公有制的原因，恐怕亦在于此。科学社会主义要始终同平均主义作斗争的根源，也出于这个原因。

毛泽东在深层意识上，是否受这种产生于落后经济条件下的空想影响，实值得后人研究。早年，由于家庭身世的原因，他对旧中国特别严重的阶级压迫和社会不公正现象，已有了深刻的感触和一定的思考。1918年以前，他在自学和作为学生寄身于湖南第一师范五六年中，曾读了大量的经世济国的书籍、从孔孟儒家、宋明理学到王船山、颜习斋、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孙中山到陈独秀、李大钊、从赫胥黎、斯宾塞尔宣扬的进化论，康德的二元论到18、19世纪欧洲的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乃至托尔斯泰《泛劳动论》和日本的新村主义，他都有深浅不同的接触和研究。这些思想资料无疑给他的思想带来长期深远的影响。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思想状况：“在这个时期，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族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可见旧思想资料中的乌托邦在他心目中引起了很强的共鸣。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即投身于长期的革命斗争，激烈的武装斗争，人类历史罕见的艰苦环境，尤其是在“左”倾错误路线下，长期受压制受委屈的处境，使他经受了极大的锻炼，也积蓄了最高的才智。他终于创造了一整套在落后国家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和经验，这几乎使他享有世界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武装斗争之父”的声誉。但是，武装夺取政权是一回事，实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又是一回事。对于建造新的社会，他的思想认识是复杂的，既有马克思主

义的东西，又有来源于其他方面的影响。但毛在马克思主义的修养方面，最不熟悉、未彻底接受的恰恰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即“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是第一性”，这些唯物史观的观念。他希望大力发展生产，希望“向地球开展”，甚至是以冒进的形式，牺牲平衡的方式，短时间内达到一定的经济指标；但那更多地是从“求强”从“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愿望出发。至于如何科学地发展生产力，求得人民的富足，在社会生产力人人发展的基础上再考虑向新的社会阶段过渡，则是非第一位的构想。相反，他甚至顾虑人富了，要变质，“变修”，因此要“趁穷过渡”，等等。他留恋的、肯定的是战争年代的平均主义的供给制生活，他认为这种生活可以使人的精神境界纯洁高昂了，人的精神得到某种升华。

“趁穷过渡”，具有典型的“空想”特征，也表现了毛宁愿以一种更高的公有制，而不是通过发展生产力，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基础上来解决社会差别的意识。显然，在经济条件十分低下的状态中，设计和追求社会组织的“大”和“公”，是典型的“空想主义”和乌托邦。——因为它们是离开了时间、空间和历史条件的“空中楼阁”。早在合作化初期，毛就主张迈开快步伐，其主要的担忧，就是如搞不及时，会出现两级分化。1953年关于山西合作化的争论，1955年对“小脚女人”的批判，无不反映了他的这种求“公”意识。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和城市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之后，才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任务，真正提上了日程。对于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毛当然不是未予理解，但他更感兴趣的，是对社会的改造，是社会关系和所有制的改造，

是求得真正的公正、共有和平等。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生产。所以后来那样钟情于搞“学大寨”运动，可以说，这是他晚年的愿望所在。一旦群众中出现生产上的联合愿望，他立即捕捉到这一“深刻”的社会动向，提出了“人民公社”和一整套“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设想。而人民公社的实质，就是在生产力尚未得到应有的发展时，人为提高所有制的程度，或人为地拉平人们之间的财富差别，以为如此一来，社会的共有和公正就实现了，说到底，这仅仅是一种小农的“共产主义”。

果然，在“共产主义”的招牌下，一切落后的东西都破网而出，最典型的的就是破坏性极大又屡禁难止的“共产风”，“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县共社的产，社共队的产，队共农民的产，打的都是共产主义的旗号。于是较为富裕的农民杀猪卖牲口，有的生产队干脆组织起来进行“瞒产”，站岗放哨，像战争中对待敌人一样。由于那些类似“新村”的作法，如生活集体化公社食堂等等，不久即引起农民的反対，只是在政治压力下强行维持一时而已，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实验，可以说在几个月中就遭到了失败。

1958年11月以后，他开始了解到农村中急于过渡，已引起了一片混乱，于是提出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划线的问题，1959年初，又不得不确立基本队有制（大队）的原则，以解决平均主义的问题。但即使如此，他还是对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实践寄予深情和厚望。例如1958年11月6日对《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的批语说：“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

范县在两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是什么呢？还是那一套所谓“把全县九百九十三个自然村在三年内合并为二十五个合乎共产主义的新乐园”的吹牛皮，所谓“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这套小农式的“共产主义”，毛泽东确实始终极感兴趣。1958年12月7日、10日，他又在印发《张鲁传》的批语中写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又说：“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可见其感情与意识中同传统中国的空想主义有很深的沟通。他希望在中国尽快实现共产主义，而又始终解脱不开经济、文化都处于很低水平的农民空想主义这个情结，当然是无法实现“超越”的。有人说，他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是点燃了一个幻想，希望通过“大跃进”、人民公社乃至《五七指示》（《五七指示》是人民公社化的继续发展），来达到那个“圣境”，结果屡遭挫折。我则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他既有十分高远的想象，又有丰厚的历史素养，独独缺少对人类（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普遍规律的了解，其中有为马克思所总结过的，也有马克思以后一百多年尤其是二次大战后新发展的，他都不熟悉，或者茫无所知；同时又违背革命年代自己的经验，急于求成，不是脚踏中国实际，用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探索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终于造成了晚年的悲剧。

当然，仅仅从旧的思想资料和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状况对毛的影响，去分析他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源，这还是很不够的。毛泽东信奉马克思主义，他读过马克思的一些重要著作，但有些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曾对他的空想论产生了



重要影响，或者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往往形成了某种“发展”了的状态，今天很多人把这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在这方面，“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法权”应译“权利”）即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1958年11月，毛在一份摘录斯大林论过渡到共产主义三个基本条件和材料上，写有如下一段批语：“基本点是极大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产品，问题是怎样多快好省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产品，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教育，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没有整风运动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林的三个条件是不易达到的。”这番话表明，毛并非不了解共产主义要有极大增加社会生产力作基础的道理。但问题是，毛感觉到文章要做在如何发展生产力，怎样多快好省地增加社会产品上面，即寻找一条具体和“创新”的道路来达到这个目的。而这恰恰是斯大林未能解答的。毛泽东认为，全党大办工农业，几个并举和群众运动，是高速发展生产的最有效办法。而在上层建筑特别是观念形态领域，“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则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途径。因为马克思和列宁都有这个思想。

从“大跃进”到发动“文化大革命”，直到垂暮之年，毛泽东几乎从未放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其执著简直达到了百折不挠的境地。1975年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可以说把他的这种观念推向了最后的高潮。毛的这种执著确实值得加以分析。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提出共产主义要划分为两个阶段，具有理论上的科学预见性。但他又提出资产阶级权利的问题，认为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权利造成了人与人之间

事实的不平等。到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资产阶级的权利问题就被说死了，即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资产阶级权利已被剥夺，但在交换范围内的资产阶级权利还存在着，由此造成的事实的不平等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温床，而国家则成为“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在理论上就成了难翻之案。马克思、列宁的这些理论，在当时已建成或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东欧的党内，并没有引起后来象中国那样高度的理论重视，却在毛的思想里产生巨大的反响，以致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当作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这是有深刻思想背景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毛空想式的社会主义观念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发生了“共鸣”

前文说过“空想”的错误性不在于“空想”本身，而在于它脱离了时间和条件，把目前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当作一种真实。毛泽东受小农经济影响而产生的空想论，刚好可以马克思、列宁的“资产阶级权利论”为“武装”。毛的这种空想，既企求在低物质水平上实现社会平均与公正的特征的思想，终于在这里找到奥援，因此，他试图在现阶段就消灭一切形式的不平等，例如级别、地位、薪水乃至商品、货币等等，甚至认为这些差别是万恶之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毛看来，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实践。于是提出恢复供给制；通过所谓教育革命来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通过干部下放，来缩小城乡差别，等等作法风行于世。似乎这样一认真推行，马上就可以达到理想之境了。毛泽东在倡导破除法权时，又常常带着对以往革命战争时期经验的依恋，认为“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

有 8 小时的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的人调动起来。”“过去实行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22 年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进城后，后退了。”于是填补这些“鸿沟”，要超越。这些想法同他脱离实际的空想论，在逻辑上都是一致的，但这种貌似“超越”的做法和追求，并不能使社会前进，而是向低经济水平的社会形态靠拢，其平均主义的目标模式，同社会主义所要求的高速发展生产力，实行商品生产，更同今天实践的市场经济都是格格不入的。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能再世的活，他们面对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社会所呈现的复杂变化，也会重新考虑“资产阶级权利”问题的。至少我们原来估计的资本主义已处于其最后阶段，通过暴力革命消灭资产阶级政权和国家，进入一个完全公有制，没有商品，只用“劳动券”的社会构想，已是很不现实的了。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夺取了政权，再通过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途径，首先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再进一步追求均富；而不是立即消除一切不平等，取消商品、货币，采取“穷过渡”的方式，这种观点已逐渐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所证实、所认同。至于何时才能实现《哥达纲领批判》和《国家与革命》中，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描述，那还是极其遥远的事情，甚至应该不做现实的考虑。在这样的意义上，除必须指出毛泽东晚年思想中固有的空想主义一面外，还应承认他所受到的理论，历史的局限，他毕竟也只是—一个时代的思想家和领袖。他发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所遭到的失败，应该成为整个社会主义实践的教训。

我在《龙胆紫集》中有这样的句子：看事容易做事难，是非经过不知艰，束修或少或多付，须戒倾囊赌棍然。这是指毛晚年许多违背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作法，并希望大家能引以为鉴，不要用“付学费”一语，对错误曲为回护。“大跃进”的教训是深刻的，甚至我们子孙后代都应不断从中吸取教训。除需要在加强党内民主、政治民主方面去反思以外，更应研究我们怎样违背了客观规律和为什么会违背客观规律的问题。正如开篇所说，历史为人们提供的活动舞台是有限度的，任何试图跨出这个舞台，作“超越历史”的努力，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要遭败绩。就此而言，《历史决议》的判断是正确的：“总路线、大跃进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因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遗憾的是，党没有有效地制止毛泽东错误的思想和错误的行为，以致他将这些东西发展到了极端。“大跃进”作为人们对历史的“主观超越”，已经由历史来证明是办了蠢事。但是如果我们对导致这种错误的主观意志论和不负责的政治随意性，加以彻底清算，那么我们党或者某个人（掌权的人）还会不会再干类似的蠢事，我们这个民族还会不会再次陷入类似的“狂热”？（请不要忘记1978年经济上的新冒进。）这个问题似很难作肯定或否定的答案，尤其因为事实上还有“理论家”或“权威人士”在写洋洋大文，想根本否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国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想根本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好局面。他们认为中国已经复辟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安全已经受到威胁；他们留恋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

泽东时代，认为对“文化大革命”也要一分为二，等等

恩格斯说得好：“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关于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两大错误：“大跃进”运动与“文化大革命”，虽然党已经做了彻底否定的正式《决议》，但是想翻案的确还有人。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从理论上对之加以彻底的清算，经过这样的清算之后，我们具有中国的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真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理论，才能从彻底批判错误中建立起来。